帝国政界往事

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李亚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引子 努尔哈赤拿天下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

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

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zhì），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

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敢死队）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



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第一章 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

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他的老师徐阶那样活到八十岁，假如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能够再年轻二十岁，假如万历皇帝不是在酒色财气中一混就是三十年，假如帝国官场没有陷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泥沼中不可自拔，假如……

诚如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时常可以看到的那样——当大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关键性人物，时常会以他们的作为将时势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必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变革，其原因根本就是为了人，为了将人的作为及其影响尽可能地纳入到公正合理的轨道上去。舍此之外的堂皇言辞，大体上都可以被看成是扯淡。

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如”中，哪怕有一个成为事实，晚明前清的历史都可能要重新书写。那位据说是雄才大略的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大约便很难有机会施展他杰出的军事才华，说不定只能像他同时代的女真部族兄弟们一样，在醇酒妇人的陶醉与怀抱中，在白山黑水间的奔腾渔猎中，度过一个部落酋长快乐而悠长的岁月。

不过，“假设”和“如果”对于历史没有意义，于是，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关于这个人的传奇。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大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其地在今日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

这一年，大明朝连着换了三个辽东巡抚，显得有些蹊跷。南倭受到挫败，北虏却折腾得很凶，京师大震，致使蓟辽总督入狱。

此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发生。如果说这个年份有理

由被记住的话，恐怕就是因为努尔哈赤生在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女真族酋长家里。人们要是知道，这个女真族男孩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改变中国的话，大概就不容易忘记这个年份了。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是蒙古人的王族，爱新觉罗则为女真人的王族和黄金种姓。据说，天上的姐妹三仙女下凡到长白山上的天池洗澡，小妹吃了一枚乌鸦衔来的红色果实后，生下了一个落地就会说话，而且见风就长的男孩儿，名叫布库里雍顺。

这个男孩儿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先祖。该传说和秦始皇的祖先起源传说几乎一模一样。

在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起源传说里，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王族神话谱系，这是人类早期建立意识形态时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神化王族之地位，保证其权势不受侵犯，并借以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努尔哈赤不像他的祖先布库里雍顺那样神奇特异，他生下来后的第一个声音，是和别的男孩儿一样的哭声，而不是朗诵一首优美的诗篇。关于他的神话，需要在他成了大汗之后，由他的那些意识形态工作者来完成。

到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一代，其家族已经衰败成了一个很小的部落，其势力范围可能不会比今天的北方乡镇更大。

据说，努尔哈赤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是“野猪皮”的意思，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则是“小野猪皮”，另一个弟弟雅尔哈齐意为“豹子皮”，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多尔衮名字是“獾子”的意思，嫡长孙杜度则意为“斑雀”，外甥库尔缠意为“灰鹤”。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此钟情和热爱动物，必定与他们依赖渔猎维持生存有着密切关联。

同时期的史料显示，在努尔哈赤生长的时代，已经有女真人从事农耕，不过，更多的女真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奔放豪迈的渔猎生涯。

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亲生母亲去世了。



对于这个少年和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来说，这个打击应是至为惨痛。此后，他们的继母以不那么贤淑的行为，令他们再受创伤。为此，他们可能吃了不少苦头，以至于多年以后努尔哈赤都不肯原谅他的这位继母。

于是，《清史稿》在对于这位女士只有几行字的简短记载中，还没有忘记指出：她对努尔哈赤不好。努尔哈赤回忆说，自己年纪不大就必须上山采蘑菇、挖人参、下河捞鱼、拼命打猎。他可能必须学会忍辱负重，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一点，在他早期与明朝的关系中，可能发挥了绝大的作用。

女真人的财产继承制度与汉族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他们实行的是“幼子守产”制度。年纪大的兄长成家后，就要分出去单过。因此，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便分家自立门户。在今天看来，这个年龄不大，但在当时，十四五岁就算成年，可以娶妻生子了，十九岁已然老大不小，早就应该成家立业。《清史稿》作者继续抱怨说，分家时，唯独大清朝的这位创始人分到的家产最少。

这种比一般孩子更多的磨难和历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那不顾一切，甚至时常是不择手段的奋斗，包括他极端而多重的个性。

在中国流传的人生格言中，有“少年得志大不幸”之说，意思是：优越的青少年生活，培养不出有出息的男子汉。只有那些在青少年时代经受过生活磨炼的人，才有可能立志、成才。

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表明：那些自幼失去母爱并感受到生活不公正的人，成年后，感情倾向容易变得强烈而偏激，他们对于生活中残忍而冷酷的事物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在未来的岁月中，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努尔哈赤兄弟，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心有戚戚焉之感慨。努尔哈赤的继母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粗俗妇人的短浅见识，竟会成就了一位改变中国的大人物。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努尔哈赤在江湖上闯荡，大约承受了诸多生活磨炼。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努尔哈赤就是在此期间投

弃了对他一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可能在李成梁身边，受到了军事才能上的培养与熏陶。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成为明清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没有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从此，努尔哈赤高举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大旗和为祖父、父亲复仇的利剑，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终至将女真人统一到了他一家一姓之下。三十六年间，他的剑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目标，直到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打击更大的目标——大明帝国时为止。

这样的事实表明：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对于努尔哈赤的事业来说，实在不是件坏事，这一事件为他换回来了足够多的、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其中包括帝国政府对他的歉意和补偿，包括使他获得政治地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理由，包括得到大明帝国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长期的支持，甚至还包括他力量足够大了之后与帝国反目成仇的理由。

三十六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帝国为努尔哈赤失去亲人的悲恸付出的代价称得上是高昂了。如果再加上本人的才华与能力，几乎提供了努尔哈赤实现雄心大志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最后剩下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所必需的运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努尔哈赤的运气太好了。

尤其是大明帝国晚期政治上的腐烂，使努尔哈赤在差不多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使他能够在只有十三副盔甲、一二十个人的情形下顺利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长达三十多年。

人们传说，努尔哈赤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可能是真的。他尤其喜欢使用偷袭、长途奔袭、疑兵与埋伏、里应外合等战法，看上去相当精彩，既很像那些古代故事，似乎又有点儿李成梁的影子。这种军事训练使他在统一女真的漫长岁月中，受益不小。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努尔哈赤身经百战，除了最后一仗败给袁

崇焕之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有证据显示，与那些生理心理正常、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士一样，努尔哈赤对于美丽的异性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克制。他可能是十几位妻子的丈夫——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妾妃嫔，他还是十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的父亲。

他可能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奔放的男人，有时这种感情会表现得偏激而暴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指出："酋长努尔哈赤为人多疑、狞厉、威重、暴烈，那些素来亲近昵爱的人，比如妻妾、子女等，一旦稍有忤逆，即加杀害，所以没有人不畏惧他。"（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他显然是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达到了特别偏执的程度。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他众多的妻子、儿子、弟弟中都有人死在他的手下。这一再证明，做这种人的亲人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他具有典型的多重性格，在不同的方向上，都会表现得十分突出：陷入感情纠葛时，他狞厉暴烈，十分可怕；一旦感情与他从事的工作发生冲撞时，他会立即表现得冷静而理性，同样很可怕。

对于这位好汉来说，父子、兄弟的骨肉手足亲情，朋友、同事、战友的友爱之情，夫妻、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恋之情等等，都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时，在他身上，便完全没有了感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现实主义者。

在这种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甚少考虑人性因素的政治文化传统，便严丝合缝地连到了一起，构成了以冷酷和暴虐为主的多重性格。他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同胞弟弟、两个侄子，对于辽东汉人实行种族灭绝式屠杀，鼓励亲生儿子杀死自己的母亲，临死时留下遗言杀死自己最喜爱的女人，为这种冷酷和暴虐提供了很难辩驳的例证，令我们对于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天性凶残，不抱有幻想。

从大明万历十一年到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583—1626

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族、对抗大明帝国的努力历时四十四年。

如果从时间参数上看，人们有理由在比较中怀疑努尔哈赤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折腾事儿的时间似乎过于漫长了些。

这种看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对于努尔哈赤似乎有欠公允。原因是，努尔哈赤面临的局面过于复杂。此时，大明帝国尚未天下大乱，尽管只是凭借惯性在活着，但它毕竟没有死，它那天朝上国的庄严假象还足够吓人。这种情形，使努尔哈赤周围布满了虎视眈眈的敌人。

粗粗看上去，他们哪一个的力量都不比努尔哈赤弱，如朝鲜，如蒙古各部族，还有努尔哈赤同一种族的其他女真兄弟。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得到大明朝的支持，从而令努尔哈赤处境险恶。

为此，努尔哈赤处理得十分艰辛。

一方面，他频繁出击，用暴力摧毁、武力胁迫和利益诱惑，将那些女真部族兄弟强力整合到自己的麾下；另一方面，他要让那些暂时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制服的兄弟感受到自己的善意，而不是威胁。

于是，他需要与他们结盟、对天发誓和联姻——将自己的女人们嫁给或许诺嫁给对方，将对方的女人们娶来或许诺娶她们等等。

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盟十分脆弱，常常今天刚刚杀马杀牛地对天盟誓，或者刚刚为新婚夫妇百年好合、白头到老干杯，转过脸去就发现对方或自己需要毁约了。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种多样。努尔哈赤认为：大明帝国明里暗里发挥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对此，只要读一读他的众多谈话和文告，就会一目了然。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频繁的战争、结盟、背叛，再战争、再结盟、再背叛中，努尔哈赤十分细心地呵护着大明帝国君臣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使事情变得十分圆满——继祖父和父亲被误杀而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后，李成梁将军在第一次离开辽东总兵任之前，又帮助努尔哈赤获得了帝国政府册封的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

几年后，努尔哈赤以“为帝国保卫边疆的功勋”，被封为大明帝国“龙虎将军”。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崇高头衔，据说历史上的女真族人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荣耀。努尔哈赤的道行不可谓不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对努尔哈赤的道行建立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关于东哥的故事。

在晚明前清时代的女真部族中，东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对当时女真各部族之间的风云变幻起过重大影响，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

东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东哥是女真叶赫部酋长的女儿，据说，这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用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的说法形容，大约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号称叶赫第一美女或女真第一美女。

与那位西方美女比较起来，东哥的命运要悲惨得多。

原因是，海伦虽然导致了血流成河的特洛伊大战，但毕竟享受到了真挚深切的情爱。而东哥则在她父亲和哥哥两代叶赫酋长手里成了一个政治筹码，在不断挑起女真部族间的攻伐仇杀中，蹉跎了容貌美丽、情感丰富的青春岁月。

据说，东哥只有十岁左右时，作为叶赫部酋长的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为此送了数量不菲的聘礼。长大后，东哥出落得明艳不可方物，成了闻名遐迩的美人。在此期间，作为海西女真之一的叶赫部落却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更糟糕的是，东哥的父亲偏偏在战争中死在了努尔哈赤部下的手里。

于是，虽然还没有婚嫁，但本来可能成为一对佳偶的东哥与努尔哈赤，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怨偶。情感强烈的东哥甚至放出狠话：她愿意嫁给一位英雄，只要这位英雄能够杀死努尔哈赤。

此后，在大明帝国的支持下，叶赫部落与建州部落长期对峙。



此时的叶赫部落酋长布扬古是东哥的哥哥，大约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羞辱和刺激努尔哈赤，布扬谷不停地将自己的美貌妹妹许配给那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一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刻骨耻辱和愤恨。而那些大部落首领，也都很仰慕东哥的绝代风华，以能够娶到这位美丽女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这样，叶赫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美丽妹妹的价值发挥到了极限。那些大部落首领则宁要美人，不要江山，或至少是不在乎为美人而面对战争，结果引发众多纠纷。女真海西四部中实力强大的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相互之间钩心斗角，实力大为削弱，可能都与这位东哥有关。最后，这些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灭掉。

显然，东哥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分量不轻，否则，他不会为此一次次大动干戈。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些部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并不比他弱。这位女真好汉可能确实很在乎这位美丽的女子。或者，也有可能，他更加在乎这种动武的绝好借口。

韶华易逝，转眼间已是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完成了八旗制度。此时，东哥已经三十三岁，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叶赫老女”。她以自己的命运，为我国古老成语“红颜薄命”做出了精准的注释。偏偏事情还没完。这一次，她不由分说地被他哥哥远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子。

面对这真正的羞辱，努尔哈赤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提醒他们注意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此时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分支，他们虽然早已不复成吉思汗的雄风，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一些站在大明帝国一边对付努尔哈赤；还有一

些，则帮助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对。于是，争取与他们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盟友关系，就成了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放过那位蒙古王子的真正动机。

而对于叶赫部落，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当年，叶赫部落的老酋长、东哥的父亲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死时，据说为了表达歉意，努尔哈赤曾发誓在若干年之内不对叶赫部落动武。是故，以往东哥被许配给其他部落首领时，努尔哈赤只对付那些部落首领，从不找叶赫部落的麻烦。这种说辞很动人，很煽情，将努尔哈赤表现得仿佛一诺千金的好汉。但是，这种说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因素：在相当长时间里，叶赫部落的力量比努尔哈赤要大得多，而在努尔哈赤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叶赫部落又得到了大明帝国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努尔哈赤下决心公开与大明帝国为敌之前，对叶赫部落，他难免会有很深切的投鼠忌器之感。

事实上，他曾经多次试图对叶赫部落开战，最后，令他克制住自己的显然不是什么承诺，而是实力对比上的综合考虑。

在很多时候，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大约就不会离题过远。

这可能是努尔哈赤长时间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

面对东哥被改嫁蒙古王子这一事实，努尔哈赤身边的人怒不可遏，强烈希望出兵征讨叶赫，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努尔哈赤则表现得极为冷静、理智。为此，他曾经长篇大论地说服那些怒火万丈的战友，劝告他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打仗，特别是当这个女人背后站着叶赫部落与大明帝国时。他特别清醒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够，现在肯定不是对叶赫与大明开战的好时机。

他嘲笑那些满腔怒火的人说：按理说，我是当事人，我要是

因为愤怒想去打仗，你们都应该劝阻我才对，现在怎么变成我置身事外，你们反倒固执己见呢？努尔哈赤还针对东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因为这个女人，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都灭亡了，她使各部落不能和睦相处，兵连祸结，达于极点，这样的女人不会活很久的。结果，努尔哈赤一语成谶。东哥嫁到蒙古部族后，仅仅一年真的得病死了。

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

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决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今日中国东北方向的——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

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



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

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

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汉字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之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之后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据说，舒尔哈齐感到生不如死，于是打算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努尔哈赤立即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将舒尔哈齐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一个忠实于舒尔哈齐并可能很勇敢的军官，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目前，没有人知道舒尔哈齐究竟是怎么死的。有研究者根据努尔哈赤的一生行事风格，断言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如果说舒尔哈齐死得足够蹊跷诡秘的话，还有一个人的死就称得上是彻底地蹊跷诡秘了。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元妃佟佳氏。这位女士为努尔哈赤养育过两个孩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

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断言：佟佳氏必定对努尔哈赤的早期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奇怪的是，这位努尔哈赤的原配夫人、两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影响的儿子的母亲，竟然在历史上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舒尔哈齐在

《清史稿》上好歹还有大半页纸的传记，而这位佟佳氏则只有一行字的记载，曰："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她的身世如何？她的一生怎样？她的性情与为人有什么特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她死后埋在哪儿？等等等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历史也算得上是混账透顶了。同样可以断言的是：其中一定隐藏着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重大机密。

佟佳氏的命运，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两个儿子。褚英的乖戾和不可理喻，代善的庸懦和凡事忍让，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有着绝大关系。

褚英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的嫡长子，幼时曾经被送到李成梁处充当人质，长大后号称能征善战，多次立下显赫的功勋。因此，努尔哈赤曾经让他代理国政，看上去很像是要培养他做接班人。结果这位褚英很快以自己的作为，让他周围几乎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愤怒。

当褚英的母亲可能失去了影响力时，这些手中掌握了不小权力的亲贵，便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控告他的儿子。

据他们说，褚英至少有三点令人厌恶的罪行：

其一，他企图使这些控告他的人——除了他的弟弟们之外，全部都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彼此之间失去信任与和睦。

其二，褚英对于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已经不能满足，他还要不停地勒索弟弟们的马匹和财物。

其三，当周围的人使他感到不愉快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是等自己继位之后，就要干掉那些让他厌恶的弟弟和大臣。

努尔哈赤十分烦恼，采取了让他闭门思过的措施。据说，在此期间，褚英做的事情是——祷告上天，诅咒父亲和他不喜欢的人快点儿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将他圈禁在四堵高墙之内。不久，将他处死。

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

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著名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

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清史稿》中记载：当九部联军前来攻伐努尔哈赤时，这位衮代夫人担心努尔哈赤胆怯，焦虑得寝食不安。

从中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这位女士曾竭尽全力支持过丈夫的事业。因此，至今在东北满族地区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可见，这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

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而且，不久这个恶子便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成为后金主持国政的最高决策层成员。这使人有理由怀疑，努尔哈赤与这桩恶行有关。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以他的遗命为由，杀死了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为他殉葬。从努尔哈赤的品性与为人上考察，他十分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命。这样做，和女真人的生死观念、丧葬习俗也颇为吻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类似或坏得多的宫廷烂账比较起来，这应该算不上是特别恶劣。

在大清朝历史上，出身叶赫部落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不少。除了那位东哥之外，叶赫部酋长的另一位格格孟古，也颇为不凡。这位人称孟古姐姐的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并且可能曾经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她是皇太极的母亲。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之后，将大金国的汉语国号改为大清国，并正式称帝，成为大清朝理论上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母亲孟古格格被追认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高皇后。由此，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孟古也可以被看成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后。

孟古格格生活得很不幸：努尔哈赤是她的丈夫，叶赫部落是她的亲人和家乡。前一位叶赫部落酋长是她的堂哥，死在努尔哈赤的部下手里。这还不算，努尔哈赤下令将她堂哥的遗体劈成两半，只将

一半还给其亲人。在笃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可以转生的古代，这种做法的意思就是让你永远不能超生，在当时算是狠毒残忍到家了。

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对抗努尔哈赤，兵败后纵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两家结下的应是血海深仇。但是，叶赫部落的人仍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除孟古可以被看成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之外，清朝的最后一位孝定皇后——隆裕皇太后也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康熙朝重臣明珠是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的嫡系孙子，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则是整个大清朝享有盛名的满族第一才子；鼎鼎大名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大清朝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虽然不见得是好的知名度。

这种情形似乎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政治遗传基因密码，表明女真人并不以种族仇恨为政治分野的依据。

据说，金台吉自焚时曾发出毒誓：哪怕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爱新觉罗。这句话似乎成了魔鬼的诅咒。二百多年以后，当大清朝葬送在慈禧老太太手中时，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这句不祥的咒语。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

平心而论，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如成吉思汗等人比较起来，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

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讨伐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



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南向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都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雄心勃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第二章 李成梁：努尔哈赤的杀父仇人和庇护神

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曾经是大明帝国真正的英雄。

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极为诡异，至今无人能够考证清楚。

诚如我们所知，早期的努尔哈赤远不像后来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强大与传奇；而早期的李成梁则是一位真正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位起于贫寒却曾经百战百胜的将军。

可惜，当努尔哈赤日益强大起来时，这位英雄却在大明朝万历十年之后扑朔迷离的政局中，如美人迟暮般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努尔哈赤崛起的整个经过，几乎贯穿在李成梁没落的全部过程之中。双方此种消长的原因何在，正是我们需要在此展开的。而这种消长的结果，便是大明帝国辽东局势的糜烂日深。

仔细观察一位真正的英雄走向末路，真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体验。

李成梁四十岁时，一位慧眼识人的大明巡按御史发现了李成梁。

当时，这位具有朝鲜族血统、出身于中级武将世家的李成梁，正在辽东铁岭卫走投无路，苦度时光。这里，就是今天出了个赵本山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辽宁省铁岭市。

李成梁，字汝器，又作汝契，号银城。他的先祖李英是朝鲜人，明朝初年从朝鲜渡江来到中国，定居在辽东铁岭卫并以军功当上了大明帝国的中高级军官。按照帝国制度，军职可以由子弟世袭，然而，由于家道中落，到李成梁这一代时，贫困交加，穷得连去北京办理袭职手续的盘缠都没有。四十岁的李成梁，空怀一身本领和满腔雄心大志，却只能在窘迫中长吁短叹。

恰在此时，他的幸运之星降临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成

梁见到了那位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巡按御史李辅。李成梁器宇不凡，给这位御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慷慨地拿出一笔不算少的钱，赠给这位在贫穷之中已经蹉跎到不惑之年的好汉，资助他来到北京，获得了辽东军事要塞险山堡参将一职。这一年，是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这一年，努尔哈赤八岁。

险山要塞的所在地位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西南约十二公里处。参将一职是明代镇守边疆的领兵官，职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大体相当于今天的边防部队团级军官，负责一地或一路的防务与策应。就此，李成梁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位虽然落魄却仍然在《明史》记载中被形容成“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的中年男子，一飞冲天，成为一颗照耀在帝国东北部上空极为耀眼的将星。（《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第二年，大明隆庆元年，四十一岁的李成梁第一次在对抗蒙古骑兵的战斗中崭露头角。他因“赴援有功”而一战成名，随着捷报进入帝国最高层的视野。战后，虽然继续驻守险山要塞，却已经官升副总兵。按照帝国军事制度，总兵一职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或军分区司令，负责统率镇军即整个军区或军分区部队，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兵，为奇兵；游击略低于副总兵，分领三千兵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此时的李成梁已经成为至少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高级将领了。

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在他的老师徐阶提拔重用下，以礼部侍郎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兼中央组织人事部第一副部长，开始“预机务”，即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与制定。

此后十六年，前六年名臣云集，徐阶、高拱、张居正联手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新政；后十年，则是更加著名的张居正新政。这十六年，是李成梁走向辉煌、功成名就的十六年。在惨烈的政治、军事搏杀中，相当于今天内阁副首相、首相的张居正给予李成梁极大支持。这种支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欣赏、信任、重用之外，帝国制

度上的保证，譬如在张居正万历新政中最为重要的“考成法”，可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万历六年正月，一个名叫速把亥的蒙古部落酋长率军大举入犯，李成梁闻报之后，昼伏夜行，飞兵出塞，长途奔袭两百里，出其不意地直捣敌营，连续杀死对方五位首领级人物，阵斩并伤敌数以万计，李成梁大获全胜。

当年底，速把亥会合其他部落，集结三万多兵力，声势浩大地前来报春天的一箭之仇。李成梁竟然摸透对方心理，一点不变地又来了一次昼伏夜行、长途奔袭两百里。那蒙古酋长事先准备得颇为充分，却怎么也没想到李成梁会把一模一样的故事再演一遍。结果，大营被李成梁奇袭踏破，伤损比前一次还要严重。一年之内，两次飞兵出塞两百里，并大获全胜，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大功，为帝国有史以来诸将之冠。为此，皇帝专门登上皇极殿举行大典，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按照“考成法”，李成梁被加官晋爵，先是加封为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继而晋封为宁远伯爵，岁禄八百石。受到帝国如此大张旗鼓的表彰，李成梁喜悦之余，为了表示对张居正赏识提拔的感激之情，给张居正送去一笔数额颇大的礼金，结果，被婉转谢绝。张居正的理由是：按照帝国制度，李成梁获得的荣誉和地位，都是靠他自己一刀一枪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我。我若是收了他的钱，就是侮辱了他。我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原因。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长途奔袭是这位将军最擅长的战法。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这位将军带领以步兵为主的部下，曾经多次星夜急行军两百里以上，一鼓作气直捣敌人巢穴，将毫无防备的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一败涂地。显然，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骁勇善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出色的情报工作。同时，这种战法，对领导者的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亲和力要求极高；对

统帅与部队的意志、毅力、训练与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也必定要求极高。

这一切，李成梁都做到了。在数十次战役中，李成梁“出师必捷，威震绝域”，在职业生涯前期，几乎百战百胜地捍卫了帝国边疆，立下极为显赫的战功，成为——如果不是声望更高、战功更为显赫的话——至少是与同时代的戚继光并驾齐驱的一代名将。因此，当时在军中与国人口中，有“南戚北李”一说。他们成为大明帝国后半叶军事成就的最高代表，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四年以后，速把亥再一次卷土重来。当时，这位酋长在蒙古部族中最为剽悍凶猛，号称勇冠蒙古各部。他曾经在战场上亲手将李成梁之前的一位大明帝国辽东总兵斩于马下，并先后数次重创其他几位总兵率领的大明军队。与自己忠实的骑士们呼啸着杀入大明边关，如入无人之境地烧杀抢掠后从容离去，成了这位酋长最为快乐的节日。就此，速把亥为患边疆长达二十多年，成为令大明帝国君臣将佐谈而色变的一方巨祸。

自从李成梁出现后，这位酋长便屡屡败在李成梁的奇袭之下，令他感觉很不爽，于是，越败越勇，发誓要和李成梁决一胜负。这一次，据说他是动员了所有兵马和子弟精锐，准备一举拿下李成梁。李成梁则改变战术，将速把亥的兵马引入设在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境内）的埋伏圈里。结果，开战不久，此人便被李成梁所指挥的部下一箭射死。酋长的弟弟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而去，从此势力大衰。



就这样，李成梁屡立大功，受封为伯爵，跻身于帝国贵族行列。在其当时，他的地位、名望等，很有可能已在戚继光之上。有一种看法，包括《明史》的作者们认为：恰恰因为戚继光威名太盛，于是坐镇蓟门十六年，使敌人从来不敢来犯，转道入侵辽东，才给了李成梁屡立战功的机会。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掩去李成梁军功的耀眼光辉。历史上，甚至就在李成梁的同一个时代，面对与李成梁同样的敌人，损兵折将，丢尽帝国脸面的军人和官吏可是不在少数。

当时，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帝国推行“考成法”，赏罚严明。为了表彰李成梁，万历八年，在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的广宁，修建了一座大牌坊，上刻“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给予了李成梁将军极为崇高的荣誉。在朝鲜保留的史料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宣祖大王四十一年七月丙戌）对于李成梁以边帅之身所创下的军功之盛，《明史》作者评论说：是大明帝国“二百年来未有也”。（《明史》卷二百三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就是说，作为帝国边防军高级将领，李成梁独领风骚二百年。

大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是大明帝国晚期历史上意义特别重大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时年五十八岁、凭借一己之力和十年坚持，几乎实现了大明帝国辉煌中兴的张居正，重病后死了。

此后数年间，帝国政治地覆天翻，张居正时代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被一一废止，帝国政界在动荡不安中变得晦暗不堪。受到张居正支持重用的戚继光被迅速边缘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五年前以战功受封宁远伯爵位，进入帝国贵族行列的李成梁，如今五十六岁，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他同样受到过张居正的支持和倚重，然而，可能由于下面的三个原因，李成梁避免了池鱼之灾：其一，远离京师，与张居正没有过多的私人交往；其二，赫赫战功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动荡不安的辽东局势离不开这位骁将。

第二年，即大明万历十一年，清算张居正的工作拉开序幕。随后，张居正家产被查抄没收，十余口人饿死在被贴上封条无人敢于启动的家中，张居正那些或真或假的罪行被公告天下。

时年五十七岁的李成梁，耳闻目睹了张居正的生前身后——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全部过程；也耳闻目睹了另外一位真正的英雄——戚继光，从威震天下、威名赫赫到默默无闻地死去的全过程。

我们无法知道李成梁对此的感受如何，无从知道他是否物伤

其类，是否胸怀不平？但肯定有证据表明，从此以后，李成梁渐渐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件不大的谎报军情与战功开始的，随后，逐渐加速度，并扩大为几乎是全方位的堕落。此时，如果张居正回到人间，可能会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曾经深切信任与支持过的老部下，如今怎么竟变成这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远离帝国首都的白山黑水之间，发生了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乱军混战中被李成梁部下误杀的恶性事件。

相隔千里之遥的两件事情，显得同样乖戾不祥。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件事情看作是大明朝死去和大清朝新生的起点。从此以后谈论大明帝国时，似乎只要说“这个政权正在死”就可以了。而大清朝则在此时现出自己极为微弱的一丝丝曙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不停地看到，整个帝国呈现出来的，几乎全部是病态的景象。面对着生气勃勃的努尔哈赤，大明朝所发生的一切，可以典型地告诉我们这种病态已经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不久，他开始了血亲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被称颂为“十三副遗甲起兵”。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努尔哈赤还太年轻，太无足轻重。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祖父、父亲被官军误杀，如果被误杀的不是朝廷认可的建州酋长的话，大约没有什么人会把这个满腹悲伤、委屈和愤恨的小伙子放在心上。

因此，关于他在此期间的记载，大体上都不是当时做出的。这些后来流传下来的东西，充满了种族的、国家的、英雄的、贼寇的、忠诚的、叛逆的、牛皮哄哄的、低三下四的等等激情。有些像“卧薪尝胆”的故事一样，带点儿悲伤而阴冷的人生智慧；有的又像“水晶鞋”那样，满是激动人心的纯情浪漫天真可爱……

诚如我们所知，清代官方与民间史籍的不可靠程度，大约可以排在我国历朝历代包括堂皇二十五史之首。原因来自于到那时为止

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持续时间最久的文字狱。这种注定要留下恶名并受到历史永久诅咒的文字狱，在顺治皇帝进入山海关以后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时期锋芒小试，在雍正皇帝手中头角狰狞，在那位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时代登峰造极。因此，隐恶扬善便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后来主流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与方式。因此，这些记载中的许多部分都经过了刻意的扭曲与修饰，从而显得云遮雾罩，或者怪诞乖张。

这种情形反证了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系建州女真，曾经受到过大明帝国长时间优厚待遇和汉族人士的长期帮助。这些历史事实与人物，常常受到大清国权贵们的刻意歪曲与打压。好在漫长的岁月里，累积起来的资料已经够多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再加上不需要很多的一点儿常识，似乎就能够还原出当时的大体面貌。

努尔哈赤是大明辽东建州左卫指挥世家的子孙。“卫”、“所”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军事制度，在理论上讲，一个“卫”应该有军人五千六百名，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人员也不停地逃亡流散，到努尔哈赤的时代，卫所制度残破不堪，早已不复当年的光景。努尔哈赤家族属于边疆部族。他可以明确向前追溯的六代祖先，都是接受过大明朝廷封赏的地方土酋。

永乐初年，他的六世祖带领斡木河，即今日图们江（位于吉林东南边境）下游的女真部落归服朝廷，被永乐皇帝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带有政治上笼络抚慰的性质，可能并非真的具有一个卫的军户编制。他还曾经跟随这位皇帝，一起远征过漠北，即今日之外蒙古地区。

大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设置了建州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努尔哈赤的几代祖先便世袭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到他的祖父时代，整个家族迁居到了赫图阿拉，隶属今天辽宁省新宾县治下。当时，他祖父兄弟六人，号称“宁古塔贝勒”。宁

古塔是满语“六”的意思，贝勒则是满语“大人”、“老爷”之意。“贝勒”这个词汇，后来成为满清王朝的一个皇室贵族爵位。

当时，这“六位老爷大人”分住六城，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他们居住在泥草房里，四周围着木栅栏，比那些身份低贱人家所居住的地窝子，已经豪华了许多。其情形大约和我们今天在东北农村能够看到的那些村落差相仿佛。与今天不同的地方在于，由于相互间的攻伐械斗频繁，这些村落便时常坐落在形势险要之处，并围着土城土寨，以资保卫。这种情形表明，这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虽然名头不小，其实际的势力范围，不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北方乡镇大很多。

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处恰恰就在于此。

事实上，当时不论是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头衔，还是建州都督同知甚至都督的头衔，虽然级别不低，听起来也吓人，实际上离开了他们那小小土城之外，其权力便有限得可怜。除了每年来自朝廷不多的财政补贴，他们最大的实惠就是朝廷发下来的敕书。这些敕书的作用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委任状、特别通行证、特别身份证、特别护照之类，还兼有贸易特许状或今天的进出口许可证的综合功能。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大明帝国对于边疆包括东北地区成百上千女真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城主、部落头人、土著酋长的控制，凭借的就是敕书——政治、经济羁縻再加上军事威慑这两条腿。

努尔哈赤即建州爱新觉罗家族就是这几十上百个部落酋长中的一个。从当时辽东——东北的情形判断，他们实在没有理由比其他土豪酋长更应该被高看一眼。这种情形在敕书分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政府发给东北地区女真部族的敕书可能一共有一千五百道，建州三卫合计可以分到五百道，而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总共才可以拿到三十道。

问题在于，有证据显示，迁居到赫图阿拉，即今天辽宁省新宾县境内的努尔哈赤祖父、父亲，与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下了可能是十分友善的关系。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曾经断言：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就使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努尔哈赤进入辽东总兵府的时间，肯定比大清朝官方史料中所愿意承认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也要长得多，很有可能在他十九岁分家出来独立生活后不久就开始了。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僮、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这些记载，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凭空捏造。

在众多记载中，都曾经谈到过努尔哈赤逃出总兵府，投奔叶赫贝勒的故事。其实，这段故事的真实情形，很有可能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因为血气方刚的努尔哈赤犯了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在男女关系上出轨，有了生活作风问题。

在斑驳庞杂的史料和传说中，我们大体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李成梁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祖父、父亲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

在这朝夕相处中，他可能受到了一位美丽多情的汉族青年女子的青睐，而努尔哈赤对这位女子也并非毫无感觉。据说，这位女子不但青春年少、美貌如仙，识文字、通经史，而且慧眼识英雄。总之，中国男人对女性的一切梦想，她都具备。不幸的是，这位女子偏偏是大明帝国辽东总兵、伯爵李成梁将军最宠爱的第六位如夫人（如夫人，即妾）。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就很像那些不入流的电视连续剧了——

这位女子不仅仅给了青年努尔哈赤两性间的男欢女爱，也不仅仅熏陶培养了他对于《三国演义》的热爱，她可能还在努尔哈赤自

己都没有意识到之前，就洞悉了这个女真族小伙子的雄心与才干，于是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心上人脱出了险境。最后，好汉起兵造反，并终于成就了一个中国式英雄的光荣与梦想。

这就是在东北地区流传甚广的关于“紫薇夫人”的故事。

据这个故事说，由于上天的启示，李成梁曾经一度对努尔哈赤动了杀机，这位“紫薇夫人”用自己的生命，帮助努尔哈赤脱险。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努尔哈赤成了大金国的天命皇帝之后，曾经莫名其妙地册封一位不知姓名的汉族女子为“歪梨娘娘”，原因是这位女子为了保护并拯救努尔哈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梨树上。今天，在辽宁省北镇市，有一位广受崇拜的神灵“歪脖老母”，香火极盛，前去朝拜者络绎不绝。有人坚定地证明说，这位“歪脖老母”极其灵验，以至于有人已经将朝拜她的号召，制作成巨大的招牌，矗立在连接关里关外最重要的高速公路旁。我们知道，李成梁时代与努尔哈赤早期的大明辽东总兵府并不在辽阳，更不在沈阳和抚顺，而恰恰是坐落在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这几件事情中似乎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这个故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这里说出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白日梦中的主要内容。

这种事情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笔下和民间并不罕见，因此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毕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些不是那么神圣崇高的字眼。李成梁不会感觉愉快，努尔哈赤也会觉得有愧于老长官。因此，这些富有人性意味的事迹便常常被大清朝权贵和史官们刻意掩饰和歪曲，变成了神话故事，以证明天意的不可违和造反、叛逆的正当性。

在关于汗王的传说中，这个故事变得已经很不浪漫，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天命说教和神灵鬼怪。在那里，努尔哈赤“脚踩红色七星”，贵不可言，惹得脚踩黑色七星的李成梁妒忌如狂、杀性大起；而那位美丽的如夫人则成了天命的捍卫者，立志要为肩负上天使命的异族青年去死，且死得其所，死得毫无悬念，死得心甘情愿，莫名其妙。于是，本来就缺少人文情怀的中国文人的白日梦，一变成了基本

没有人性的最高统治者及其奴才们的意淫，再变则成了恨不得全国人民都为他们去死的政治教化，变成了大清朝意识形态工作者神化自家领袖、表达自己对领袖热爱程度的一项努力。对此，我们应该并不陌生。

这一事迹，在《清史稿》中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可能是关于那位“紫薇夫人”的传说过于广泛，或者是说明这一点有助于增加努尔哈赤形象的辉煌，于是在《清史稿》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故事的一点影子——

翻开四十八本《清史稿》的第一篇，先是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整体介绍：该人“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沈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大意就是此人仪表堂堂，志向远大，深有谋略不外露，且声若洪钟，过目不忘，与人交往时度量很大。接下来，说到努尔哈赤在他的祖父、父亲被误杀时，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于乱兵中被抓进总兵府，然后说到努尔哈赤脱出李成梁的总兵府时，该书记载道：“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清史稿》卷一，本纪一，太祖本纪）就是说，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妻子惊异于努尔哈赤的相貌，于是背着人悄悄把这个家伙放跑了。

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记载，显然让人有理由做出更加符合逻辑与常识的猜想。

比较起来，倒是上述英雄传奇好像更加可信一些似的。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以后，万历皇帝从不上朝开始，逐渐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余年的消极怠工，被他的臣子公开批评为“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皇帝。而此时的李成梁也年过花甲，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然而也就是从此，从谎报军情开始，和自己的皇帝一样，进入了几乎是不可逆的葬送帝国辽东事业的末路生涯。

这件事情并不大，发生在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当时，一股敌寇侵入辽阳、沈阳、海城、盖县一带抢掠。李成梁秘密派遣一支奇兵出塞袭之，结果遭遇埋伏，战死一千余人。按理说，胜败

乃兵家常事。常胜将军打了一次败仗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何况这是历史记载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成梁第一次失手。然而，李成梁却在报告战果时，隐瞒了战死的人数，只上报杀敌二百八十人的战功。此时此刻，帝国上下大约已经习惯了将军的神勇，于是没有什么人深究，将军自然受到了表彰。我们知道，那些中国官场上的坏事，但凡开了头，就会如同从山上飞滚而下的巨石，不到能量耗尽便极难停下。有了这第一次之后，从此我们在史书的记载上，便只能心情黯淡地一再看到，李成梁一发不可收拾，谎报军情战功之事屡屡发生。

在此期间，一些与一代名将并不相容的事情，也开始在李成梁身上出现，且愈演愈烈。《明史》记载，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年，师出必捷，威震绝域。不但他的子弟，就连他家里的仆人都成了高官显宦。他的九个儿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五人当上了总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四人官居参将。他的四个兄弟和两个侄子也都官居参将或副总兵。他的部下有几位甚有出息，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他家中的奴仆也颇有几位既富且贵者。

贵极而骄。李成梁父子居住的铁岭卫，曾经只是一个相当于小小县城的卫城，如今那里修建起了大片大片高大豪华的亭台楼阁，歌台舞榭之胜号称甲于一时。一时间，弦管夹道，灯红酒绿。据说，这小城内，光是娼妓就有二千多人，莺歌燕舞，煞是好看。

此时的李成梁不但谎报军情，而且开始杀良冒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乃至于最后，整个辽东的商民利税都被他一个人所侵吞。然后用这些钱财贿赂各级政府官员，笼络对他有用的中央机关干部，使宫中朝上的权贵机要人物被他喂饱后，为他奔走卖力。史书记载的原文是：“全辽商民之利尽拢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

当时，对于边疆军功的封赏十分优厚，不但立功者可以受赏，就连他的上级、同事、部下也都可以一同受赏。大捷时，赏赐可

能是晋级升官，也可能是封妻荫子，最大的可能是两者同时都有；小胜时，经常的赏赐为增加工资，顶不济也能够得到奖金鼓励。《明史》李成梁的传记中记载，后来情形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李成梁每打一次胜仗，捷报传来时，内到中央政府的内阁、五府、六部，外到当地各级官员都可以一起领受封赏。而一旦出现了掩败为胜，或者杀良冒功时，通常不用李成梁做什么，下到地方长官，上至五府、六部乃至内阁，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帮助李成梁遮掩。若有人不识趣，各位老大和三老四少就会一齐使劲儿，高度默契地将那家伙挤兑出局。

曾经有几位监察官员准备弹劾李成梁，都被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给压了下去。另外一些监察官员抓住人证物证后，交章抨击的结果是：李成梁安然无事，这几位监察官员却分别受到了上级的斥责处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万历三十六年。当时，先后几位监察官员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廷弼，一起弹劾李成梁，奏章交到了皇帝的手上。许多人都以为这一回李成梁恐怕是罪责难逃了。谁知，万历皇帝高度赞赏李成梁的军功，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根本不予理睬。那些报告被无声无息地“淹”了。（《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成梁）

李成梁再也不是那个受人尊敬与爱戴的一代名将了。在本质上，他此时所做的一切，与他所对抗的那些敌寇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他的作为比那些明火执仗的敌寇，具有更加巨大的杀伤力和损害。

在此期间，适值而立之年的努尔哈赤，英姿勃发。他将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到李成梁家，成为李成梁二儿子——后来大明辽东总兵李如柏的如夫人。种种迹象显示，他可能同样满足着李成梁在物质上的需求，譬如，定期不定期地将数量想必不算少的牛羊、马匹、人参、貂皮、东珠、银两和奴隶等，输送进大明辽东总兵府。孟森先生评论道：“太祖（努尔哈赤）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从而有效地令李成梁将军至少在对待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放弃了职守。

就这样，在镇守辽东的几乎所有时间里，李成梁纵容或默许了努尔哈赤发展实力，使这个最初只能凭借十三副盔甲、十几条枪起家，军力、财力、人力各方面势力都很有限的地方土酋，得到了长达三十多年扩充的时间，使他的实力几乎遍及全东北，最后囊括了外兴安岭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当时，这块土地地广人稀，远不像今日这样人满为患。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年时间方才统一女真各部，至少表明：其一，他的实力甚至能力远不像他的后代愿意让人们相信的那样强大；其二，可能表明了当时东北地区各种势力间极度错综复杂的关系，如蒙古各部、女真各部、其他土酋部落、朝鲜和大明帝国等等。

此时，李成梁若想灭掉努尔哈赤，应该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很有可能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尤其是在起初若干年里。李成梁似乎从来没有动过这种念头。相反，他或在许多方面主动帮助、关照着努尔哈赤。

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李成梁曾经多次出兵征剿当地蒙古部落和其他女真部族，那些势力强大、有能力和努尔哈赤相抗衡的女真部落，或多或少地遭受过李成梁的军事打击。这种打击在史书中经常被形容成是“犁庭扫穴”，表明了该种军事行动的摧毁性力量。对于李成梁来说，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有这种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却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李成梁运用大明帝国国家机器的力量，帮助努尔哈赤发展起来了个人势力，或者至少是为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我们不难发现，假如帝国有能力制止其官员们丧失责任感，并使他们不敢突破道德底线的话，那些胡作非为的豪强是没有可能发展起来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数千年帝国史中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机制。从那些官商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是，李成梁所给予努尔哈赤的支持，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

李成梁前后两次镇守辽东，时间几近三十年。

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李成梁以军功晋升副总兵，

三年后，晋级为辽东总兵，到大明万历十九年，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在此期间，努尔哈赤对其他女真部族进行了频繁的征讨攻伐，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没有得到帝国的重视。在李成梁的庇护和默许下，努尔哈赤渐成气候。

随后，六十六岁的李成梁，离开辽东总兵位，以帝国伯爵的勋位来到北京享受富贵荣华。此后十年间，辽东总兵八易其人，辽东局势糜烂。李成梁以七十六岁高龄，被帝国重新任命为辽东总兵，再次主持辽东军事。其时，他和他的亲族部下全部功成名就，富贵已极。在他们中间，贪赃枉法已经成为常事，史称“暮气深重”。从一般情形判断，这样一批人，能够不给帝国帮倒忙已属万幸。后来发生的一切显示，帝国的确没有这样的幸运。

从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到大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1—1608年），李成梁再任辽东总兵的七年间，努尔哈赤的羽翼基本丰满。就是在这一年，因为放弃辽东六堡这一重大举措，李成梁受到熊廷弼等人的弹劾。年逾八十的李成梁申请退休，得到皇帝批准。至此时，他本人算是安全着陆了。而他做的这件事情，却对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不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有人将此举看成是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二人的“亡明之举”。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万历三十四年底（公元1606年）。当时，年逾八十即将退休的李成梁，突然上书皇帝，请求万历皇帝批准，准备主动放弃宽甸六堡及其周边的八百里国土，将其事实上让给努尔哈赤。

这六座堡垒分别是：孤山堡、宽甸、长奠、双堆儿、长岭、于散，位于今天的辽宁省宽甸、凤城、本溪境内。这些堡垒，向南为辽东卫所的前沿要塞，向西则可屏蔽辽沈腹心地带，向东与朝鲜遥遥相望，向北成为抗御蒙古骑兵的第一线。

这六座城堡，地势险要，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本来，这六座堡垒早已存在，后来由于维护不善，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堡垒要塞的作用。三十多年前，刚刚在辽东崭露头角的李成梁极力主张修复整

治这些堡垒，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于是在做了一些规划和调整后，重新整治好了这些国防线上的要塞，环卫土地八百多里。随后，设粮仓、建学校、开关市，致使各地无地农民纷纷前来定居，最后竟多达六万多户，在捍卫祖国边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也是李成梁当年的诸多功绩之一。

如今，正值努尔哈赤渐成气候，对大明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之际，李成梁却以和当年主张修复时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放弃这些军事要塞。理由是这些要塞孤悬难守，得不偿失。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边疆土地，尺寸是宝，哪里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偏偏万历皇帝几乎是无条件地欣赏和信任李成梁，竟然问也不问就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个计划。致使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八百里土地，并自动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与威胁。

当时，在这些堡垒的环卫下，六万多户人家——差不多有二十多万人口安居乐业于此。迁徙令一发，这些人民立即变成了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如果说，在此之前，李成梁曾经多次对敌人“犁庭扫穴”，从而捍卫了国家尊严的话，那这一次，他是在对自己的祖国人民实行“犁庭扫穴”了，而这些人民本来应该是由他来保卫的。

史书记载，李成梁出动大军，强迫这些居民撤退到辽东腹心地区。时值冬季，被捣毁了房屋的百姓于东北的冰天雪地中被强制迁离。许多青壮年人口不堪忍受，愤而投奔努尔哈赤，为他增加了许多宝贵的人力资源。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做了这件事情的李成梁，竟然以招徕民众的理由，向中央政府报功。而令人加倍无法理解的是，皇帝居然就此下令，对李成梁及其他一干有功人员予以高级别的嘉奖。

遥想当年，努尔哈赤得到李成梁这些动用军队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无比珍贵的礼物时，想必是欣喜若狂，必定在内心深处对李成梁充满感激之情。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帝国高级官员，在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情况下，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丧心病狂地把国家利益转化为私人交易。

很快，辽东弃地的真相传到了北京。监察官员开始上疏弹劾李成梁欺君误国，行同通敌，并正确指出：这些要塞的放弃，必将成为未来之大患。万历皇帝看到这些弹劾奏章后吓了一跳，连忙下令调查核实。都察院派遣熊廷弼前去调查。

四个月后，熊廷弼的报告出来了，和监察官员的弹劾奏章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谁知，报告递上去后，便泥牛入海再无消息。其他人为此继续上疏，仍然是没有下文，后来，竟就此无声无息了。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这样，李成梁的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即便当初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被他误杀，如今他也真的算是对得起努尔哈赤了。或者李成梁也许会在心中这样说：够了，我为这个国家做得已经足够多了！既然皇帝除了搜刮财物，根本就不愿上朝理事，不拿天下当回事儿，何必皇帝不急急煞太监呢？现在，该轮到我了……

当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腐烂程度过深时，一定是因为其最高决策者出了问题。舍此，任何其他理由都可以被视为扯淡。

就这样，在李成梁前后两次镇守辽东的三十年岁月里，努尔哈赤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成长为一代枭雄。如今，巨祸已经酿成，大明帝国一步一步走到了风雨飘摇的前夜。

李成梁是在八十三岁时离任的。此后，老将军一口气活到了九十岁，直到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死去。在此期间——从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起兵，至今三十三年，努尔哈赤不受打扰地几乎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李成梁死后仅仅一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就正式建立后金国，自称天命汗。三年后，从容拿下抚顺，正式拉开挑战大明帝国的大幕。

他用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拿天下当回事儿。譬如，眼前就有一位，他——努尔哈赤。

第三章 万历皇帝与最怪异的战争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

四月十四日夜半时分，大明辽东抚顺关外，一阵呜咽的胡笳声，打破了仲春夜晚的宁静。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动地。大明帝国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在震惊之中，迎来了一个信使。来人告诉将军，努尔哈赤率领数万大军包围了抚顺，先头部队已先期混进城中，如今已经占据各个要害之地，须臾之间，便可里应外合攻破城池。如若投降，可保一城生灵之性命，将军也将享有荣华富贵；如果抵抗，抚顺城将玉石俱焚。李永芳望着一城烽火，听着满厢鼎沸，决定开城投降。

第二天，十五日清晨，努尔哈赤大军里应外合，拿下抚顺。李永芳衣冠乘马，出城来到努尔哈赤大营，举行了交出武器的投降仪式。

这是后金与大明之间第一次正式交战。努尔哈赤的战果是：掠夺人畜三十万，奴隶降民一千户。李永芳成为大明帝国投降后金的第一位高级军官。不久之后，成为努尔哈赤的孙驸马。

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其怪异之处在于，战争其实早就开始了，事实上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而作为战争的被打击一方却浑然不以为意，没拿这场战争当回事儿。

实事求是地说，三十年间，曾经不断有人向大明帝国决策层发出警告。遗憾的是，这些警告全然没有发生作用。李成梁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作用，则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元首——万历皇帝身上。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我们的皇帝便以各种理由减少自己上朝的次数。此后，皇帝不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最后，这位活着的祖宗神灵索性就不再露面，时间长达近三十年。



近三十年！不踏出紫禁城一步！纵然里面千娇百媚，毕竟也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凭这一点，我们的国家元首已经创造出足以轰动世界的人文奇观了。

宫中传出的消息是：长时间以来，皇帝每日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痛骂或痛打身边的工作人员。可见，皇帝心情不好。

皇帝心境如此之糟的原因，可能与张居正令他的感情遭遇重大创伤有关。

据说，还有一个因素，导致皇帝的心绪更加恶劣：

皇帝爱上了郑贵妃。两人爱得真挚，爱得动人，已经进入海誓山盟、心醉神迷之中。我们知道，在我国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的皇宫里面，皇帝可以随意发泄性欲，唯独不可以发泄爱情。于是，当皇帝露出希望立自己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的意思后，立即遭遇到了群臣的坚定抵抗。臣子们反对的理由神圣而堂皇，那就是行之至少已达千年以上的宗法制度和大明帝国祖宗家法。原因是，此子非皇长子。

就此，皇帝的爱情受到普遍质疑，那位很有可能十分可爱——至少在皇帝心目中应是如此——的郑贵妃，在宫廷内外，成了类似褒姒、妲己一类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受到普遍的憎恨。

除了郑贵妃，皇帝的一肚子柔情蜜意，全然无人理会。他怀有满腔爱情，却全无心机手段，只能以束手无策对峙满朝文武的义正词严，时间长达十五年。最后，就连心爱的郑贵妃也失去了耐性，撒娇时，搂着皇帝的脖子称呼他为“老妈妈”。

皇帝柔弱敏感的心灵受伤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从张居正时代开始，受伤的总是自己？

从此，他再也懒得搭理自己的臣子，懒得打理帝国的事务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中央部门的文书报告，进入宫中，便十有八九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用当时的术语，这些文书报告被“留中”——留在宫中，也就是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了。

有一位可怜的帝国内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首相或副首相——名字叫沈一贯，曾经充满惆怅地诉说道：辅政已经十三年了，自己总共只见过皇帝三面。以至于满朝臣子不论如何努力，都想不起来当今圣上的尊容。

一位名叫叶向高的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心灰意懒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今，一事之请，难于拔山。

而我们的皇帝更加心灰意懒，就连一个叫雒（luò，音同“洛”）于仁的司法官员公开斥责自己“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时，皇帝都懒得理他，只是下令将他撤职后轰出京城了事。

最后，大学士李廷机，在自己被任命为首席内阁大学士那一天起，就开始辞职，并且不接手处理任何政务。两年多以后，在他呈交了一百二十多封辞呈并搬出北京城以示决心之后，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江山如同女人，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可惜，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江山远远没有他的女人那么重要。事实上，两千多年来，类似的情形与皇帝并非绝无仅有，或者也可以说，像万历皇帝这样或比他糟得多的人渣皇帝，在我国历史上几乎触目皆是。总体上，中国人对于朝这种皇帝山呼万岁早已心平气和。因此，他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抱怨自己在一次次朝代更替轮回中所遭遇的苦难。

然而，毕竟在我国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朝代像大明朝中晚期一样，有那么多的皇帝对于他们手中的万里锦绣江山如此漫不经心、如此满不在乎。

其情形，恰如最坏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面对那些已然弄到手中的美丽女子——她们已经令人厌倦，让人完全丧失了激情。如今，公子哥儿们正在思考着怎样才能体面地用这场艳遇，去换取那些还没有体验过的刺激与欢乐。

面对锦绣江山，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稳扎稳打，正在将其一步步夺取到自己手中。

当他远非那么雄心勃勃地开始他的铁血生涯时，他最初的目



标可能很简单——血亲复仇，或许还包含了他对几位美丽女性的向往。他感情强烈、专注而且执着，具备了实现这种追求的许多要素。

但是，要成就大事业，仅仅这些显然还不够，他还需要更多条件。这些条件，有些他已经具备了，譬如军事才能，有些则恰到好处地出现了，譬如运气。

最初事业的顺利发展，除了他本身的素质与训练之外，对手缺少素质和训练可能帮了他很大的忙，这里主要指的是他那些女真族的同族同种兄弟。而给他最大帮助、为他带来最大好运气的，则毫无疑问来自他最为强大的敌人——大明帝国的皇帝与皇帝的臣子们，来自李成梁和万历皇帝。如上所述，在他们手中，大明帝国的江山已经日益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事实上，早期努尔哈赤的最大成功，并不在于他有多么伟大或有什么雄才大略，而是在于他在李成梁和大明帝国的帮助下，成功地将这场战争变成了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场极为奇特的战争”。

我们知道，当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时，所有伙伴中包括他自己和他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在内，只有十几个人。同年，当他带领十几二十个人前去寻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晦气时，预先得到消息的尼堪外兰，其反应是携带妻子儿女远逃外地。这表明努尔哈赤早期的敌人似乎并不需要雄才大略方能对付。其情形大约和黑社会流氓群殴或者农村常见的打群架、打冤家、械斗差相仿佛。

翻检中国历史，秦末天下大乱时，刘邦用了六年多一点的时间建立了大汉帝国；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从起兵到成为大唐天子全部用了十年时间；宋太祖赵匡胤的情形有些特殊；而努尔哈赤的敌人——大明帝国天子的祖先朱元璋则前后费时十六年，建立起大明朝。即便是努尔哈赤的正宗祖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从公元1113年抗命于辽开始，到公元1125年灭掉立国两百多年的大辽，再到公元1127年两次扫荡大宋帝国的半壁江山，也只用了十四年。如今努尔哈赤用了三十六年时间，尚未完全统一女真各部，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政治、军事才能产生双重怀疑。也使人有足够的理由发问：假如不是因为大

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努尔哈赤能赢吗？

事实上，这种怀疑有道理，却也有失偏颇。譬如，说努尔哈赤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超人的个人素质、意志力和韬晦忍耐精神，大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早期的努尔哈赤时常带领或派出一二十人、几十个人征伐敌人或对抗来犯，战斗与战役规模很小，证明关于群殴、械斗的说法不是望风捕影。但是，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努尔哈赤的勇力和胆量十分惊人。此人魁梧强健、弓马娴熟，使用的兵器长大而沉重，远超出常人，且勇猛不怕死，常常身先士卒地冲锋陷阵，气势豪壮先声夺人，令敌手很难抵挡。他当年穿戴的铠甲，收藏在今天沈阳的一座寺庙里，要由四个健壮的小伙子才能举得起来。他显然具备了冷兵器时代成为英雄的几乎所有重要素质。

努尔哈赤壮大自己力量的情形，酷似《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情节。

在一次攻城作战中，努尔哈赤冲杀在第一线，身中两箭，其中一箭伤及颈静脉，血流如注，几至昏迷。身旁的人要来搀扶他，他说："你们不要靠近我，别让敌人发现我受伤。"然后，自己从容撤下。后来，该城被攻下后，那两名射伤努尔哈赤的壮士全部被俘，众人准备对二人施之以乱箭穿胸之刑。努尔哈赤说："这么勇敢的壮士，就是战死沙场都很可惜，哪里可以因为伤过我而杀之？"然后，亲手为他们解开捆绑的绳子，置酒压惊，授以官职。二人与众将咸服，从此死心塌地地跟随努尔哈赤打天下。

据说努尔哈赤曾以四个人对抗过八百人。

当时，他身边共有八十人，其中的几个人吓得弃兵解甲，准备逃跑。努尔哈赤予以痛斥，然后与其他三人一起，弯弓搭箭，射杀对方二十多人。于是，对方惊惶失措，争相逃命。对此，努尔哈赤很满意，总结说："以四人而败八百之众，此天助我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二卷）这段传奇，有些类似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暴喝，吓退曹操二十万大军的故事。如果不是想象或夸张的话，就只能

说明一个问题——努尔哈赤的这些敌人，可能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

明王朝对于边疆地区长期实行分而治之、钳制平衡政策：一个部族如果稍许强大起来的话，就会立即扶植另一个部族与之抗衡，或者同时扶助几个力量，在其间挑拨离间，以收相互制约之效。因此，这些边疆部族很少有机会扩张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哪怕很简单的军事训练，都有可能招来大明帝国军队的打击。在李成梁的长期纵容下，努尔哈赤的情形大约是极为特殊的事例。

有记载说：努尔哈赤身长八尺，智力过人，曾经在李成梁麾下，每临战事，必定奋勇当先，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一卷）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在“有大将才”的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良好的军事熏陶与训练。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不论是在以往冷兵器时代还是在今日，对于军事行动来说，是否受过这种熏陶与训练，结果会完全不同。在努尔哈赤的早期军事行动中，他的那些敌人们时常会出现溃不成军、一哄而散的局面，可能就是上述说法的逻辑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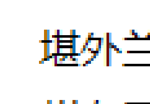
与李成梁的关系，对于努尔哈赤的意义肯定比这些要重大得多。

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之后，对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其一，将努尔哈赤祖父、父亲曾经享有的三十道敕书——贸易特许状全部转给了努尔哈赤；其二，奏请中央政府批准，由努尔哈赤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务。

从此，努尔哈赤有了虽然很小但却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

事实证明，祖父、父亲的被误杀并没有影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亲密默契，在努尔哈赤对付尼堪外兰事件中表现得意味深长。

本来，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李成梁一直在扶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曾经出钱出力派人帮助他修筑甲版新城。如今，新近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努尔哈赤要为祖父、父亲报仇，但他轻轻放过祖父、



父亲死于李成梁部下之手的事实，一口咬定是尼堪外兰主谋杀死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且不依不饶。于是，尼堪外兰只好逃进李成梁帮助自己修建的甲版城，听凭努尔哈赤带着一二十个人大闹图伦城。李成梁的反应则是不理不睬，作壁上观。

我们找不到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与尼堪外兰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证据，尼堪外兰是否真的主谋或挑唆杀死了他们二人也很难考证。但努尔哈赤对于尼堪外兰的确表现出极度憎恨。据《满洲实录》等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曾经为了追捕尼堪外兰，只身一人冲入敌群，乱矢中胸贯肩，被创三十余处。后来，听说尼堪外兰已经逃进李成梁部队的防区，受到明军保护时，他愤怒如狂，一口气杀死当时能够找到的十九名汉人，并将箭镞重新插入六名身中箭伤的汉人伤口，命他们去报信，索要尼堪外兰。结果，李成梁的部下撤除了尼堪外兰逃命的阶梯，将他置于努尔哈赤部下的刀锋面前，最后，尼堪外兰自然丢掉了性命。（《满洲实录》卷二）

想象一下：尼堪外兰本来是受帝国政府扶持的，在正常情况下，向他开战，事实上就可以被视为向帝国开战，对于任何一个强大而正常的政府与军队来说，这常常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借口。由此可以认定，如果没有大明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的默许，就算借一百个胆子，努尔哈赤的部下也不敢这么干。

努尔哈赤心领神会，投桃报李。一方面不停地四处攻伐，扩张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相当诚恳地向帝国政府表达自己的谦卑恭顺。有时，这种谦卑与恭顺显得特别可人疼。

譬如——

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生了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本国内顺风顺水，于是，在自我感觉极佳的状态下，发出了征服明朝，到亚洲大陆上走马的宏愿。他于当年五月登陆朝鲜，两个月后，汉城与平壤相继失陷。朝鲜国王奔向中、朝边境城市义州，请求大明帝国予以援助。帝国表现得很有担当，立即组织抗倭援朝大军杀进朝鲜。此后，双方互有胜负，

各自死了不少人。

其间，发生了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一次外交错误”——

大明帝国君臣认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为了安抚战败者，在全然不知道日本还有一位天皇的情况下，派出使节前往日本，准备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则以为明朝使节是在自己的重大胜利面前屈服，前来求和或者求降的。结果，直到面对大明帝国皇帝陛下的册文时，他才愤怒地发现，自己已经被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必须承担向中国皇帝纳贡的义务，并保证绝不再对朝鲜进行侵略。而丰臣秀吉原来以为作为胜利者，自己最低可以分割朝鲜、接受一个朝鲜王子为人质，并使一个大明公主成为自己众多妻妾中的一个呢。于是，被臣下稀里糊涂蒙在鼓里的中、日两国最高决策者，只能调兵遣将，再打一架。

最后，稀里糊涂持续了七年的战争，由于丰臣秀吉病死而稀里糊涂地宣告结束。

战争的结果则是中、朝、日三国分别宣布自己取得了伟大胜利，并分别载入了上述三国的史册。

在这场开打时莫名其妙，打完时依然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努尔哈赤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一再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允许他带领自己的部下，参加战斗，为天朝和皇帝陛下效力。虽然最终被婉转谢绝，却也给帝国君臣留下深刻印象。

更加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努尔哈赤获得李成梁的支持，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兼并。如今，李成梁离开辽东第一线，到皇帝身边享清福去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丰臣秀吉竟在此刻入侵朝鲜。在将近七年时间里，大明帝国全神贯注地对付丰臣秀吉，辽东地区军事重心完全转向抗倭援朝方面，主力部队入朝作战，辽东地区防务空虚，没有人关心那个努尔哈赤在忙些什么。上天仿佛特别眷顾努尔哈赤，自李成梁之后，又一次给了他千载难逢的良机，使他可以从容地巩固建州女真的势力。同时，一面向大明帝国表示效忠和友好，

一面向其他女真部族发起挑战。

如我们所知，朝鲜是明王朝最为亲密的盟友。甚至被大清征服以后，在朝鲜君臣的私下谈论中，还将大清朝称之为奴虏。努尔哈赤懂汉语，但对汉字的认识程度可能十分有限。在范文程之前，帮助努尔哈赤书写汉字文书报告的，是一位来自江浙一带的破落汉人。此人的汉字水平也很难恭维，在朝鲜现存的文史资料中，我们有幸读到他代努尔哈赤起草的一份信件。这份信件是写给朝鲜国王的，很好玩，意思也很通俗易懂。其文曰：“我屡次学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古作“于”）里边疆。”信件后面很郑重地加盖了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印。（《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正月丁酉，三十三年七月戊午）从各种史料中，还可以看到类似的表示。诚如我们所知，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父母叱骂不走正道的孩子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汇就是“不学好”。

从史料中，我们很难找到此阶段努尔哈赤对大明帝国表示不满的言论。至少在他给帝国官员的印象里，此人是颇为“学好”的。譬如，一位大明蓟辽总督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就曾经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奴儿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六年二月癸未）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时常将违犯大明法律的人捕捉起来，移送交还给大明；也时常把女真人掠走的汉族人交还回去。有一次，女真木扎河部落酋长克五十，率众掳掠柴河堡，并杀死了明军指挥刘斧。努尔哈赤知道后，立即斩杀了这个酋长，并将其首级送到明军查验，表现得积极主动，恭顺热情。

在此期间，他先后八次亲自来到北京朝贡，除了表达对天朝繁华的艳羡渴慕之外，还用金钱铺路，结纳帝国高官。三十六年间，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头脑清醒者，曾经不断提醒帝国君臣警惕努尔哈赤。这些警告，在努尔哈赤对帝国高官们的殷勤工作中，均告失去效力。

有一个未经考证的说法：有一次大明辽东总兵举行操典，努

尔哈赤恭逢其盛。他满面惶恐畏惧，连声赞叹“天威赫赫”，并一再表达自己“愿充天兵中一小卒”的强烈愿望，致使大明帝国军事将领对于自己的威慑力与感召力极感满意。

万历时期，皇宫失火，几个著名大殿被焚毁，此后在全国征集工匠修复。有文书中记载着一个说法，说是早已经在今天新宾县附近称王的努尔哈赤，甚至化装成民工，来到帝国的心脏地带共襄盛举。这个说法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他对帝国由里到外的腐烂程度有着透彻的了解，则是不必怀疑的。

就这样，三十六年间，努尔哈赤在得到大明帝国中央政府崇高奖励的同时，身经百战，先后用兵征服了下列女真部族：

建州女真五部：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

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里舍部、讷殷部；

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四部：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

乌苏里江流域野人女真三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

在此期间，他于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的费阿拉城称王。当时，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四个年头，他的势力范围约方圆二百里，也就是长约十公里，宽约五公里，相当于今天北方小一点的乡镇。与其他土酋不同的是，有记载说，努尔哈赤建设王城时，可能还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派来的设计师与工程师躬逢其盛，一道参与了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这里面，大约可以看成是渗透了李成梁对他的爱护与支持。这很正常，想想看，他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当时，被理解成为国殉忠，他本人又如此忠诚国事，努尔哈赤没有理由不受到帝国政府的格外看重。

因此，两年后，即大明万历十七年，李成梁第一次离开辽东前线之前两年，帝国中央政府下令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相当于军区司令助理的级别。有证据显示，此时，他手中掌握

的敕书由当年的三十道猛增到五百道。

六年后，即大明万历二十三年，正值抗倭援朝战争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大明帝国中央政府以努尔哈赤“保卫边疆的重大功绩”，晋升他为正二品龙虎将军，成为建州女真人中第一个得到如此崇高职衔的酋长，并享受中央政府每年八百两白银、十五匹绸缎的政府特殊津贴。

就这样，在三十余年时间里，努尔哈赤一方面不停地向朝廷表达谦恭与忠诚，另一方面，则以卓越的军事才华和勇猛绝伦的武力兼并女真各部族——“以韬光养晦示朝廷，以衔枚疾走创业绩”，使朝廷始终把他看做无足轻重的疥癣之疾，以为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和小流氓一样的“属夷首鼠常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以至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努尔哈赤将大东北地区除辽东明军防区和女真叶赫一部之外的地方，囊括到自己麾下。他所控制的区域，包括今天远东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于是，这场早在三十六年前就已经开始的战争，愣被努尔哈赤主导着打成了世界上最为奇特的一场战争。三十六年之间，大明帝国作为战争的一方，不停地为另一方加官晋爵，帮助他壮大力量；三十六年后，当这另一方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将锋利的矛头真正对准被打一方时，后者方才恍然大悟：那一切原来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们真的以为战争今天才刚刚开始。

此中情形，令人扼腕叹息。帝国制度确如一架没有制动装置的过山车。当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具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所向披靡。当它滑向错误的道路时，其破坏性能量同样无人能够阻挡。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是明清关系史上重要的年份。大明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年五十六岁。他和他的臣子们，终于用近三十年的荒怠和没完没了的党争、倾轧与争吵，迎来了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岁月。

命中注定，帝国要在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开始为自己以往的苟且、自私、贪婪、短视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未来的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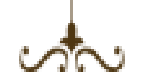
月里，将千百万人民送进水深火热的同时，将王朝送上绝路。

此时的努尔哈赤则已逢花甲之年。这位比万历皇帝大四岁的老英雄，在他六十岁时，老当益壮生机勃发，似乎刚刚进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段。正月，在他那并不辉煌甚至称得上是简陋的汗宫内，六十岁的老汗王断然宣布：“我决心已定，今年要出征。”他不再掩饰，将锋芒直指大明帝国。未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正是在即将开始的八年里，他将自己的人生事业推上了顶峰。

三年前，李成梁以九十岁高龄死去。转过年，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即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立后金国，建年号为天命，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正式切断了与大明帝国的通贡关系，并开始推行他那著名的八旗制度。而由于李成梁和万历皇帝主动放弃宽甸六堡，努尔哈赤一下子增加了八百里的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大明帝国基本丧失了钳制努尔哈赤的前进基地，变得甚至连努尔哈赤究竟在干什么，他还想干什么都难以察觉。以至于就连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汗国的消息，大明帝国朝廷可能都是在朝鲜国王派来的使节那儿知道的。

此时，努尔哈赤兵马强劲，疆域不可谓不广大，称得上今非昔比。但是，对于他来说，总体的战略态势并不是很好。在他的南部，是大明帝国的亲密盟友朝鲜；北部和西北部是虎视眈眈的蒙古部族与受到大明支持的叶赫部；西部与西南部则是庞然大物——天朝——大明帝国。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除了东北方向是他寒冷荒芜的后花园之外，其他三面全部被他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封死，他向任何一个方向突进，都有可能受到来自侧后翼的包抄，从而被截断后路，四面受敌。

此时，他偏偏将剑锋指向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表的、极其大胆也极其高明的决定，可能是努尔哈赤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冒险，一次将身家性命全部赌上去了的孤注一掷。不管是亡命徒性格使然，还是他真的洞察了大明帝国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这场豪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胜之则打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失败就会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努尔哈赤的思路是，如果能够重创大明，使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指手画脚，那么收拾两翼的叶赫部与朝鲜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否则，自己可能永远都会腹背受敌。对于他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是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很了解大明帝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但是，无论如何，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都使努尔哈赤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草莽枭雄，上升成为不同凡响的英雄。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汗王宫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

这是一篇将重大原则立场和鸡毛蒜皮杂糅在一起的、很可爱的政治文告，很像我国民间那些招呼乡亲们拿起锄头去打冤家、吃大户的传单揭帖。这份文告语言质朴而富有煽动性，对于唤起那些满腹委屈的底层群众同仇敌忾，其作用想必不小，却也表明了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凶猛的战士在政治上的见识程度。

比如，其中的第四大恨就很有意思，说的是明朝为叶赫撑腰，导致叶赫部落将努尔哈赤早就订婚的一位女子改嫁给了蒙古，遂成为努尔哈赤的心头大恨。

这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耻辱和愤恨的女子，就是东哥。

本来，东哥的故事与明朝没有太大的关系，明朝的皇帝与地方文武没有参与抢夺这位美女已经很不错了。努尔哈赤则坚定相信，如果没有明朝的支持，叶赫部断然不敢如此胡来。于是，这件事情也就成了他七大恨中的一恨。



其实，这是一件发生在将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为此，该流的血早就已经流过，努尔哈赤一直因为时机与实力的缘故隐忍不发。如今，这位女子韶华已逝，成为时人口中的“叶赫老女”，偏偏又被努尔哈赤拿出来说事，表明这位女真英雄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作为，编造或者寻找一些理由。

后来，努尔哈赤的后代们有点不好意思，在进军全国、统治全国的进程中，不停地对这七大恨原始文稿予以修饰，令那不忍卒读

的文字通顺了许多，最终成就了一篇我们今天勉强能够看得下去的东西。

虽然如此，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却周密而完善。该文告发布的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次日便一举拿下大明辽东重镇抚顺。统兵三千人的抚顺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后来成为努尔哈赤的孙女婿——额驸，就是我们熟知的驸马。

一周后，率兵驰援抚顺的广宁总兵及其所部一万余人全军覆灭，生还者十二人。史书记载：消息传来，“举朝震骇”。（《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张承胤传）

这时，大明帝国天子万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才知道：战争开始了。

此时此刻，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兵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却没有人主持工作。原因是，早在两个月前，代理国防部长的那位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崔景荣，曾经屡屡上书皇帝，请求退休，却被居深宫数十年不露面的皇帝置之不理。于是这位代理部长便封存好国防部大印，自说自话地退休回老家了。就此，导致帝国国防部迄今无人主持工作。

据说，皇帝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补充各级各地政府官员的缺额了。有统计数字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缺额已经达到70%，而地方省、市、县各级官员缺额也达到50%。之所以如此，有人认为是因为这些缺额官员的工资俸禄，可以由皇帝收归大内。

八个月以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大明帝国才终于将讨伐努尔哈赤的各项事宜，大体上安排到位，就此，发生了影响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之战”。

大明方面的前敌最高统帅名叫杨镐，是一位很难准确界定其胆识才略的方面大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年那场抗倭援朝战争，就是在此人领导下打得莫名其妙的。如今，帝国再也找不出更加合适的统帅人选了，情急之下，请他出山。另外一位次重要人选——新任辽东总兵官，则由李成梁将军的二公子李如柏将军出任。而恰恰

就是这位李如柏将军，娶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于是，辽东人民只好无可奈何地传唱歌谣曰：“奴酋女婿作镇守，不知辽东落谁手？”

出征之前的誓师大会，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其情形令即将奔赴战场厮杀的将士们心情郁闷。

象征大将之威的屠牛刀根本没有开刃，使本来应该挥刀就能斩断的、用来祭天的牛脖子竟然再三再四地割不断；驰马试槊是这种典礼中必有的古老节目，意在宣扬武威鼓舞士气，谁知，一位将军跨上骏马刚刚挥舞起来，那槊头就在已经朽烂的槊杆上折断坠地。

最高统帅的军事部署则更加令人绝望。出征前，大明帝国号称调集了四十七万全国精锐部队，准备以泰山压卵、牛刀杀鸡之势，一举割断努尔哈赤的喉咙。实际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则大约为十四万左右。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兵马，这已经占据了人数上的压倒优势。谁知，我们的大军统帅可能在说给别人听的宣传中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指挥的是四十七万大军。于是，置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基本道理于不顾，下令化整为零，将十四万人分拆为四路大军，分进合击。结果，自然变成了努尔哈赤在每一路大军面前，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努尔哈赤也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采用了完全符合现代军事理论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争进程大体如下：

截至二月中旬，明军陆续集结到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四个地方的部队约为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余人；此外，还有朝鲜军队一万人左右，叶赫部一万五千人，共计十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再加上其他土司、镇道的游兵散勇，明军总体上有十四万人上下。相对努尔哈赤的六万人马而言，这仍然是一支压倒性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些部队仓促集结在四个地点，而这四个地点散布在一个长达四百里的扇面上，各点之间山高水长、地形极其复杂，彼此很难相互呼应支援。此时，万历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不管千里之

外的实际情形，每天只是用最高一级信号旗——红色信号旗催促进兵，于是，前敌最高统帅只好命令四路部队分头前进，在宽甸、辽阳、沈阳、开原铁岭间的四百里扇面上齐头并进，向兴京—赫图阿拉做球心状运动式攻击，希望能够达成分进合击的战役目标。

这四路大军是：

南路由辽阳总兵刘綎为统帅，于宽甸经由董鄂路即今日之辽宁省桓仁县，北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东南侧。此路明军人数约一万人，号称四万，一万人的朝鲜军也划归此一路。后来，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坚定相信，这一路就是有四万多人。

中路右翼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统帅，由皇帝亲自点名任命。此路由辽阳出发，经清河东向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正面。此路大军人数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六万，战争结束后，努尔哈赤宣布战果时，也认为该路敌军为六万人。

中路左翼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统帅，集结于沈阳，沿浑河河谷出抚顺，经由苏子河河谷，会同中路右翼军李如柏，共同攻击兴京—赫图阿拉之正面，此路大军兵力约三万人，号称八万。

北路以开原总兵马林为统帅，约一万人，加上叶赫部落的一万五千人，兵力约二万五千人，号称四万人，任务是集结于开原铁岭之间，出三岔儿堡——抚顺东北九十里处，进入苏子河流域，攻击兴京—赫图阿拉的北侧。

约定各路部队于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由各自集结地同时出发，三月二日中路左右翼两军会合于二道关，又名尚间崖，然后，四路大军以炮声为号，齐头并进攻击赫图阿拉。

当时，据说是为了在心理上起到恐吓的作用，大明军队号称四十七万，并且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保密工作，致使努尔哈赤对明军在行军路线、行军时间、部队统帅人选等方面了如指掌。因此，当杜松所率领的中路左翼大军，从沈阳出发，沿浑河河谷经抚顺进入苏子河河谷时，努尔哈赤已经知道这是一支号称八万、实则三万的部队，于是，努尔哈赤调动全部六万八旗部队，将第一次打击对准了杜松所

部。

三月一日，杜松于漫天大雪之中，饮酒赏雪，并大醉，然后乘酒兴渡过寒冷刺骨的冰河，导致携带辎重的大部队没能过河。杜松遂兵分两路，一路大部队留在河对岸萨尔浒山下，扎下大营，渡过河去的一部分部队由他亲自率领，前去仰攻界凡山上的吉林崖。当日晨，努尔哈赤率军由兴京—赫图阿拉出发，下午到达萨尔浒山以东、界凡山以南地区，将杜松的两支部队从中间隔开，使双方的联系完全中断。然后，努尔哈赤也兵分两路，一路为六旗兵马，约四万五千人，前去攻打萨尔浒山下约两万人的明军大营；另一路为两旗兵马，前去吉林崖，援助并夹攻杜松率领的部队。是时雨雪交加，明军携带的枪炮火器受潮后无法使用，在八旗铁骑的攻击下大败。入夜时分，萨尔浒山下的大营已经全军覆没，努尔哈赤随即将得胜后的六旗兵马全部调到界凡山下，围攻杜松所部。杜松率军拼死激战，终于多处负伤后，力战一夜而死。大明中路左翼军就此全军覆灭。

同是三月一日，大明北路军马林所部已经到达尚间崖。他下令兵分三路，成品字形扎下营盘，以便互为犄角。三个营地相互间隔约三四华里。当日入夜，马林的侦察兵报告他，杜松正在相隔十五六里地的吉林崖苦战，马林没有前去救援，只是下令各营严密防守，直到杜松全军覆灭。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来到尚间崖下。他先割断了马林大营与一个犄角的联系，然后倾力攻打这个犄角。最后的结果是：这三个本来应该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犄角，不光是不支援友邻部队，他们自己相互之间也是谁也不呼应谁，谁也不支援谁，最后，自然被努尔哈赤一个一个地各个击破。

与这一路大军同时行动的叶赫部一万五千兵马，则根本没有投入战斗，马林所部全军覆灭后，这一万五千兵马悄悄离开前线，回家了。

当晚，努尔哈赤收拢大军回到界凡山，得到侦察兵报告，知道刘綎所部之南路军已经到达桓仁，而李如柏所部之中路右翼军也到

达虎栏。努尔哈赤立即命几员重要将领星夜驰回兴京—赫图阿拉，以便防守大本营。

此时，明朝四路大军的最高统帅部并没有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前移，最高统帅留在沈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指挥协调大军行动。导致四路大军之间既不互相联系，更不协调行动。当时，努尔哈赤的全部主力部队都在战场上，兴京—赫图阿拉的大本营里只有不到四千兵马在守卫。在杜松和马林与努尔哈赤苦斗时，刘綎和李如柏若能够对赫图阿拉发起攻击的话，后来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结果，直到三月二日夜里，杜松与马林两路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刘綎和李如柏还完全不知道友邻部队的命运，他们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心等待攻城的信号——炮声。

三月三日，努尔哈赤下令杀牛宰羊犒劳部队。

三月四日午时，经过一昼夜休整后集结起来的八旗军，与刘綎部在赫图阿拉城外的阿布达里山冈上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和整个夜晚，到第二天凌晨，即三月五日凌晨，刘綎及其部下将士大都战死。跟在明军后面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覆灭的惨状后，放下武器，全军投降了努尔哈赤。

而李如柏则停留在虎栏。他既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按照炮声的信号前去攻城，也不去支援苦战中的刘綎，他只是停留在虎栏，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据说，从努尔哈赤向明军发起第一波攻击时开始，挡在李如柏大军前面的，就只有二十名努尔哈赤的骑兵。而率领数万大军的李如柏始终没有突破这二十个骑兵组成的防线，始终没有前往赫图阿拉城下，直到从最高统帅那儿接到撤军的命令为止。而努尔哈赤似乎也从来没有准备要攻击李如柏，只是在李如柏撤退时，象征性地追杀了一回。双方默契的程度之高，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蹊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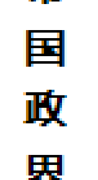
战场上实际发生的状况也印证了誓师大会上不好的预感：冷兵器时代，头盔的作用可能比今天的钢盔要大得多。有记载说，有一路大军主帅是一位凶猛的著名战将，谁知他从兵器库中领到的头盔已

经锈蚀，结果激战中被敌军一箭洞穿。一路大军主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即身亡。

这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萨尔浒大会战”。

战后，明清双方的战略态势完全逆转。努尔哈赤占据了战略主动地位，大明帝国进入全面防守。

就此，不再需要更高一点儿智商，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战争真的开始了。



第四章 广宁之战惊天下

大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出兵进逼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广宁，即今日辽宁省北镇市所在地。

人们习惯上认为：萨尔浒之战导致了大明帝国与满清之间战略态势的完全逆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战后，努尔哈赤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得到了一切可能中他想要的最好结果，完全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八旗铁骑如狂飙般横扫辽左，天下为之震撼。

大明帝国从此处于艰辛的堵截防守之中。

而帝国最高决策层的混乱，则在这场战争之后变得更加混乱。

与前线战事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权力争斗中的利益格局。是否对国家有利，变得不再重要，是非对错于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排除在决策者们的考虑之外。怎样做对自己更有利，是否是自己人，日益成为他们进行重大国是判断和决策时最为优先考量的指标。

这种情形，势必使战争最前线的艰辛变得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分子的数年心血，常常会在一念之间或者一夜之间毁于一旦，付诸东流，成为泡影。

翻检中国历史，我们知道，这已经是常见的、典型的乱世征兆。

如果说，萨尔浒大战对于辽东局势具有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广宁失守，对于双方民心士气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熊廷弼便是这种情势的第一个牺牲者。

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结束。二十三日，朝廷起复在湖北江夏老家罢职闲居的前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左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这个职位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最

高法院院长助理兼中纪委委员，再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巡视辽东。熊廷弼接到任命，立即以日夜二百里的速度，星夜兼程赶赴北京。谁知，赶到北京后却没人理他，他被晾在驿馆，就是政府招待所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原因是，此时的皇帝又缩回深宫，不大理会外面无奈的世界了。

六月十日，经过三个月休整的努尔哈赤，开始实施“速取开铁，进逼辽沈”方略，率四万八旗精兵，昼伏夜行，奇袭明、蒙、满物资集散地与战略要冲开原。他们五个夜晚驰驱三百里，于十六日凌晨突袭攻城，中午时分，开原城陷。总兵、副将、参将、守备等全部阵亡，八千守军中五千战死，其余三千人成为战俘，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死。三日内，开原所属城堡尽数失陷。

败报于六月二十一日传至北京，二十二日，万历皇帝下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经略一职，又称督师，始设于万历年间，其地位、权力高于总督与巡抚，是执行国家级战略任务的超级方面大员，全部由文人担任。

七月七日，熊廷弼带着皇帝赐给的尚方宝剑， “独赴艰危” ，奔向辽东。

七月二十三日，来到山海关后，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努尔哈赤已率重兵移师铁岭。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夜袭而来的五万八旗兵马在努尔哈赤指挥下，猛攻铁岭，明军一员参将开城投降，其余将士大部战死。

熊廷弼出关后，面临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以霹雳手段斩杀临阵脱逃与克扣军饷的将领，弹劾不称职的边关大吏，招抚流移，力图重振民心士气。在几个月中，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此时，努尔哈赤趁着熊廷弼整治混乱、无暇顾及的机会，突然发兵攻打叶赫部。

叶赫部就是曾经出过美女东哥，后来出了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的那个部族。长期以来，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女真部落中，叶赫部可能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一支，并得到了明军的全力支持。明军

在协助叶赫部防卫时，甚至将视为秘密武器的火炮都部署在叶赫城上。此役中，努尔哈赤所部伤亡惨重。这是一次殊死战，双方加上协防的明军全部进行了拼死搏斗。最后，叶赫部落覆灭。

此次战役中，在一位游击将军带领下协助防卫的一千名明军将士，除战死者外，其余被俘者全部被努尔哈赤下令杀死，无一生还。

叶赫部的覆灭，促使熊廷弼加紧了辽沈防务。史书记载说，熊廷弼曾经两次派人到沈阳、抚顺一带了解敌情，这二位一个吓得没到沈阳就跑了回来，另一位则大哭着根本不敢去。于是，一个冬日的深夜，熊廷弼于雪夜奔赴抚顺关，去做近敌侦察。左右将佐怕出意外，坚决劝阻。熊廷弼笑曰，这种冰天雪地，他们不会想到辽东经略敢轻身前往，遂轻骑而去。在抚顺关口，他看到努尔哈赤以木石堵绝山口，便笑着对身边的亲兵说：看来努尔哈赤也有畏惧之处，这是怕我出兵奇袭呀。

熊廷弼没有想到，恰在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人携带友好结盟的“誓书”，前往蒙古部落缔结同盟条约去了。此举意义重大，一举将联明反后金的蒙古喀尔喀五部转为联后金反明，在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侧后翼蒙古部落的威胁。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从拿下叶赫，到西抚蒙古，努尔哈赤已经形成了对于大明帝国辽东控制区域的战略包围态势。他收敛兵势，开始静静地等待时机。

此时，熊廷弼在辽沈一线苦心经营，构筑起了相当坚强的防御体系。他希望站稳脚跟，再图进取。然而，北京城中发生的剧变，使他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全部化为泡影。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大明在位时间最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终于度过了他那漫长的四十八年皇帝生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皇帝在最后一年里，有两件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一，他死死把住皇宫中堆积如山的金银不放，在前两年间

已经加征过赋税的基础上，于本年三月，下令每亩地再次加征赋税。

其二，此时，皇帝早已恢复了对全国文书报告不理不睬不批复的状态。帝国文武百官再次犹如被爷娘抛弃的孩子，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数十位文武大臣忍无可忍，在吏部尚书的带领下，来到文华殿，跪在地上，坚决请求皇帝接见群臣，以便商讨国是。皇帝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命人告诉他们：天子身体不舒服，速速退下。其中一位大臣痛苦万状地致书皇上：等到努尔哈赤率领他的骑兵来敲门时，皇帝难道也准备以身体不舒服答之吗？皇上很宽厚，没有计较这厮的出言不逊。

随后，四月一日，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方从哲请求皇帝召见，亦被拒绝。初九日，孤独的方从哲大学士万般无奈，来到皇宫思善门前放声大哭，皇帝这才允许他晋见。据说，在谈到辽东局势时，皇帝闭上双眼，只说了一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国榷》卷八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丙辰）

我们的皇帝所言，真的称得上是切中时弊的至理名言。可惜，说完就没有下文了。并且，这句话一语成谶，魔鬼般预示了熊廷弼的命运。

努尔哈赤按兵不动，等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快就让他等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龙驭宾天。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这位朱常洛很不幸。当太子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支离，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皇帝有关。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皇帝的宝座上只坐了整整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帝国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帝国政治秩序陷入混乱。终于，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

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朝历史上唯一不识字的文盲皇帝。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欣喜地报告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于是，全国军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

熊廷弼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七）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谈到“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有大才干，史称“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具有极强的执行力，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李世民的时代，大约能够成为凌烟阁上的千古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的大明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帝国朝堂之上，党争激烈。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晚期的帝国政治舞台十分好看。

当时，朝中大权基本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史称“众正盈朝”，意思是朝堂之上满是正人君子。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

遭到熊廷弼拒绝。此时，这位姚宗文便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首轮进攻。随后，熊廷弼受到了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列举了熊廷弼的无谋八罪、欺君三罪，认为不罢熊廷弼的官，“辽东大事必不可保”。熊廷弼眼花缭乱，只好三次上书，请求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的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极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

努尔哈赤一年多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号称辽东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却不懂军事的官员。临自杀时，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绝不贪生怕死！”

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努尔哈赤大为感动，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场所。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

人！”最后，张铨死于他昔日的办公室内。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只有看到了这些仁人志士，我们才会明白：当一个政权腐烂透顶时，将会是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忠贞的儿女！

不过，中华帝国臣民们的很多作为，也确是时常出人意表。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仿佛曾受过良好训练般，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清军铁骑踏进帝国首都北京时和一路杀进南京时，这种情形均曾再现；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这些来自寒冷北方的骑士，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致使他们大惑不解地回忆起征服朝鲜时的景象。据说，那些朝鲜女子宁死也不肯让他们接近自己。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

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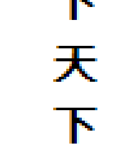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而今，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

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而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明白了这些才能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此时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

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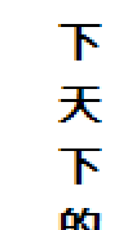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

熊廷弼到北京后，提出了三方布置的复辽方略，大意是：其一，以广宁兵马对垒辽河岸边，因应地理条件形成形格势禁之势，以阻止并钳制敌人主力；其二，海上于天津、登州、莱州设立水师就是海军，乘虚登陆金州、复州、海城、盖县一带，动摇辽南人心，迫使努尔哈赤分心、分兵内顾，以便收复辽阳；其三，于山海关特设经略，总控三方，协同战守，在努尔哈赤腹背受敌之际，全线进击，将其击溃之后灭之。基本方针是强调防守，积蓄力量，再图反攻。

这的确是一个即稳健又扎实可行的方略，从防守，到相持，再到反攻，气魄宏大而又富有战略眼光。但是，这样可行的战略，却必须有一个坚强有为的皇帝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方才可行。而熊廷弼面临着的局面是：当他拼命以兵马、钱粮、器械等军务催促兵部、户部、工部时，他的皇帝，可能正在皇宫庭园里满头大汗地雕琢木匠手艺呢。中央政府的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叶向高，则根本不认为熊廷弼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些六部尚书，大约宁肯做亡国大夫，也不愿看到他熊廷弼的成功。

此次，熊廷弼的方案一经提出，皇帝便迅速批复，同意此方略，命熊廷弼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并在熊廷弼离京赴任时，为他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然而，对此王化贞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熊廷弼这个人，不喜欢这个方略，不喜欢他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更不喜欢他有可能夺去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权威与军队。而熊廷弼也对王化贞的某些布置不以为然，于是，二人开始了唾沫横飞的口水战。然而，皇帝表态说支持熊廷弼的主张，搞得王化贞好生没趣，心中快快不快，于是，



报告皇上说：您特别看重熊廷弼，他对辽东事务又轻车熟路，成竹在胸，必可一举灭敌。熊廷弼一听，顾不得其中的醋味，赶快请求皇帝警告王化贞，不要借口经略负有责任就坐失时机。就此，经、抚不和开始公开化。

然而，虽然在理论上讲，至少在辽东军事布置上，王化贞应该接受熊廷弼的领导，但实际上，比较起来，王化贞的底气却比熊廷弼要足得多，根本就没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种状况是由下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王化贞是现任东林内阁首席大学士即内阁总理大臣叶向高的门生。在历史上，这位叶向高口碑不错，人们时常愿意替他遮掩在此事上的错误。但，叶向高的确错了，在辽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上，这位东林内阁首辅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叶向高本来就讨厌熊廷弼，如今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认为朝廷应该全心全意支持王化贞，言下之意是，任命熊廷弼这么一个经略根本就是多余，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兼老师的身份，袒护王化贞对抗熊廷弼，令王化贞有恃无恐。

另一位关键人物则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最高军事长官也是东林党人，他不但讨厌熊廷弼，而且早在一年前，就曾经因为军饷问题与熊廷弼大起冲突。如今，他甚至在调动辽东兵马时，都不愿劳神知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熊廷弼询问他时，亦不屑作答，搞得熊廷弼怒火高万丈，却又无从发泄。更有甚者，张鹤鸣甚至或明或暗地指示王化贞，在辽东军事上可以自作主张，不必理睬熊廷弼。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促成了王化贞对熊廷弼的蔑视。

王化贞与当时尚称强大的蒙古察哈尔部落的林丹汗打过交道，双方感觉都不错。此时，这位蒙古酋长不知是喝酒喝高了还是谈得投机口滑，拍着胸脯口无遮拦地告诉王化贞，他可以出四十万骑兵，帮助王化贞干掉努尔哈赤，把那个什么鸟后金国彻底在地球上抹去。我们知道，这种许诺对于急于建功立业或一夜暴富的人，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就是如今，许多董事长之类也是在类似情形下被人

牵上沉船的。他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可能是王化贞太想让熊廷弼闭上嘴了，于是，想也不想便将此上报朝廷，并列入自己的作战计划。而且，他还真的为此出兵进攻，直到确认那位蒙古酋长不会出现，才慌忙撤退回家。

最后一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抚顺叛将、如今努尔哈赤的驸马孙女婿李永芳暗中联络上了王化贞的心腹将领孙得功，说是他愿意做内应，帮助王化贞与孙得功一举干掉努尔哈赤。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通过李永芳答应这位孙得功，只要能够生擒王化贞并献出广宁城，孙得功就会像李永芳一样成为努尔哈赤的驸马并得到高官，双方就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疑，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九万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他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卷十六，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

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建立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到处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的消息，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万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率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说：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

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偏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

熊廷弼被抓进监狱后，真的做了一件蠢事：他拜托一位能量极大的江湖人士，说是准备送魏忠贤四万两白银以求雪冤。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听说了此事，又没有拿到银子的魏忠贤恨之入骨，发誓要早日看到熊廷弼的死。两年多以后，已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终于将熊廷弼和几位根本搭不上关系的东林党人扯到一起，愣说一位极受人尊敬的东林党人接受过熊廷弼的贿赂，将他们一起干掉了。

熊廷弼的死说来令人心酸，我们不说也罢，就此打住吧。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出现，使辽东局势又添变

数。对于大明帝国来说，晦暗不堪的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亮色；对于努尔哈赤来说，眼前又现强敌。这个人就是时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

孙承宗的另外一个身份也让人不能不心存敬畏：他还做过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使那位即位之前比文盲强不了多少的少年天子，多少读了几本书，懂得了一些道理，也知道了要敬重老师。

孙承宗能文能武，清廉刚正，威望素著，后来以帝师、内阁大学士的身份担任辽东经略。这些，可能是他在经略辽东的职位上坚持三年之久，令努尔哈赤在三年多时间内只能相持、始终不敢轻动的主要原因。

可惜，随着朝中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这位被视为东林党人的中流砥柱式人物，坚持不下去了，他只能退休回家。天启皇帝死后，在崇祯皇帝冤杀袁崇焕时，他曾经再次出来收拾危局；待局面稍有好转之后，便再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撤换掉了。若干年后，清军大规模入关，打到他的家乡河北高阳，年事已高的孙承宗坚决不肯屈膝，他指挥家人、族人、乡亲与清军展开巷战，直至殉国。

孙承宗离任之前，还做过一件对于晚明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情：数年之间，他高度信任、欣赏、重用了一个人，从而，为这段惨痛的历史抹上了一道极为耀眼的亮色。这个人就是在晚明前清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袁崇焕。以拿下广宁达到人生事业巅峰的努尔哈赤，其一世英名就是折在了这个人手上。除了孙承宗和袁崇焕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导致努尔哈赤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之内不再西向进逼。那就是由于他血腥的种族歧视政策，后金国后院不稳，到处都在发生汉族民众的反抗与暴动。

前一年，即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简单讲，就是根据男人数目分配田地、服兵役、出徭役、公差等。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原因是，许多女真人本来并不从事农耕，如今

所有男人均被平分田地，这些女真人包括他们的女真族奴隶都得到了土地，然后，将掳掠来的汉族农民变成奴隶为他们耕种。而汉人的许多土地则被当作“荒地”无偿征收，用来分给女真族人。努尔哈赤还同时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这种暴动竟有数十起之多，几乎遍及辽东各地。

为了平息这种动荡不安的局势，努尔哈赤又发昏招，公布了“按丁编庄”汗谕。据说，这道汗谕是为了完善计丁授田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编在一个村庄中居住，借女真人监视汉人，明令禁止汉人制造、携带、收藏刀剑、弓箭等。于是，发生了汉人房屋被强占、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凌辱等事件，更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对此，努尔哈赤一以贯之的做法大体上就是灭绝性镇压。

三贝勒莽古尔泰在镇压镇江，即今天的丹东暴动中，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单是俘获来做奴隶的汉人，就有一万两千多人；大贝勒代善负责镇压复州地区暴动，镇压结束后，复州城里的成年男子全数被其杀光，全城已经找不到男人；努尔哈赤那位孙女婿、大明叛将李永芳负责镇压辽西十三山暴动，据说该地区原有十万余汉族民众，此次镇压中，除七百余人逃进觉华岛——今日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之外，其余全部被杀光。

事实上，从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以后，努尔哈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辽东汉人大体上实行这种种族灭绝政策。譬如，萨尔浒之战后攻取开原、铁岭时，允许军队对汉人斩尽杀绝。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不再见到汉人就杀，但基本是在实行不同程度的屠杀后，将剩余的汉族人口掳掠起来，作为战利品分配给女真军人为奴。到了晚年，这位在清朝官吏和当代某些学者口中号称雄才大略的大汗似乎杀心愈盛。他认为，后金国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安宁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

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阅读那些史料时，常常令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位努尔哈赤身上，似乎笼罩着某种血腥的宿命，战争与杀人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英雄的梦想、女人、财富和对汉民族的仇恨，成为这个宿命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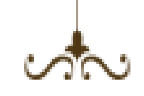
平心而论，汉民族中历朝历代出产的人渣不少，他们荼毒自己同类的本领常常出人意表，令人叹为观止；对待异族，则更加全无顾忌，遭人痛恨之处实在可以车载斗量。从努尔哈赤的不少言论中判断，他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代上天恭行天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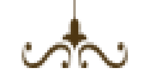
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这位努尔哈赤的确善于审时度势，韬光养晦，不利时作低服小、细致入微，得势后凶残暴虐，十分残忍。而若要找出此人在政治上如何雄才大略，如何是位伟大政治家之类的证据，实在很难。因此，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事实上，只要翻一翻史料，就不难注意到，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国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才会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国，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

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清军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的未知数。

面对动荡不安、此起彼伏的反抗，努尔哈赤必须先稳住自己的后花园。时年已经六十四岁的努尔哈赤，一直以善待时机取胜；此时，他仍然在等待或者叫善待时机。他对于敌人阵营中的优秀人物，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识别能力，从不在这种敌人面前轻举妄动。





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

大明天启六年，是为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正月二十三日，宁远城下，炮火惊天撼地。努尔哈赤指挥他那勇猛的八旗将士，猛攻宁远城。在袁崇焕周密布置的猛烈炮火中，八旗军队遭遇重挫，伤亡惨重。

四十余年纵横天下的努尔哈赤，排山倒海般的脚步，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八个月后，努尔哈赤去世。

在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相抗衡的大明帝国诸多人物中，袁崇焕可能是表现得最为特殊的一个。他给后金汗国父子两代汗王带来的烦恼，比其他所有大明帝国君臣加在一起的还要多。

然而，他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和一切努力，他的辉煌与悲惨，仅仅能够证明：大明帝国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前途。

袁崇焕，字元素，又字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史书说他：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谈论军事，特别喜欢与那些从边疆退伍回来的老兵畅谈边关情势，自认为是治理边疆军政的一把好手。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大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汗国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具有重大影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一年。

三年前，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如果不是怀有特别的仇恨，努尔哈赤应该不会使用这个国名。因为，他长期和汉族官员打交道且身边有汉族工作人员，他应该知道，大金国曾经给中原地区人民带来过深重苦难与屈辱，如今仍然使用这个名字，显然包含了对于中原人民民族感情的完全轻蔑。

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有“七大恨”，誓师伐明，并顺利打胜对明战争第一仗——抚顺战役。

袁崇焕考中进士的这一年，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萨尔浒大战以大明帝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告结束。

这些，对袁崇焕的刺激想必不小。

史书记载说，他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特别喜欢和那些退伍老兵谈论边塞上的事情，一有机会便要了解辽东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

有一次，他本来要去做考官阅卷子，谁知他却招来一个从辽东退伍回来的老兵谈起辽东战守来，结果一份卷子也没看。史书中说他“好谈兵”、“以边才自许”，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按照帝国制度，袁崇焕来到北京参加“大计”，就是接受三年一次的文官政绩考核。当时，有一位名叫侯恂的御史发现了袁崇焕的这个特点，他认为袁崇焕“英风伟略”，才堪大用，建议皇帝不拘一格地破格使用。这位侯恂就是在著名的《桃花扇》中，与更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好的那位侯方域侯公子的父亲。后来，他还发现并保护了一位折腾出不少事儿来的大将——左良玉，据说是唯一能够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将军信服的文人。和袁崇焕一样，侯恂御史可能也是一个“肝肠颇热”的人物。

就这样，袁崇焕被留在京城，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当时，兵部有四个司，最重要的就是武选司和职方司。武选司负责军官的升降，职方司则负责军政管理。职方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与从七品或正七品的知县比较起来，的确算得上是破格任用了。

袁崇焕来到兵部任职之后，十分关心辽东局势。结果，他十分沮丧地发现，与后金汗国开战已经近五年，整个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里，竟然找不到具有军事价值的关于辽东地理、地形、地貌等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方面的资料。现有的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就是许多年前的产物，如今大约已经具有了古董般的文物价值。整个国防部——兵部里，既没有人具有这种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获得这些知识。派人出山海关外去收集，得到的信息则在道听途说与模棱两可之间，甚至收集情报的人是不是真的到了山海关外都不得而知。

当时，正值广宁陷落，熊廷弼和王化贞放弃辽西大片土地，一口气撤进了山海关。北京城里一片混乱，除了再次宣布戒严，满朝文武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多数人主张彻底放弃辽东，集中兵力扼守山海关。

在这种情势下，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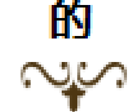
他没和人打招呼，便一个人单人独骑到山海关一带实地考察去了。兵部的同事们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他的家人也搞不清楚他的确切行踪。袁崇焕失踪数月后返回，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纵论辽事，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曰："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守住那片地方。"

那时，人们相信，非常之时，需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能成非常之功。在举朝惶恐之际，袁崇焕此举不同凡响，确有慷慨伟丈夫之古风。于是，朝野上下奇其才。在孙承宗的推荐下，朝廷再一次不拘一格，破格任用，将袁崇焕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宁前道道尹、兼山海关外监军，这是一个五品阶级的官职。所谓宁前道，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县治地方，主要包括了今天山海关外前所、前卫、绥中、沙后所到兴城一线。这一年，袁崇焕三十八岁。

袁崇焕到任后，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孙承宗当时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相当于内阁副首相兼国防部长，他在推荐了袁崇焕的同时，还推荐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即接替熊廷弼的新任辽东经略。这位新任辽东军政最高首长的治辽方略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放弃辽东地区，然后，在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外八里铺的山海之间，再加筑一道雄关，叫作"重关设险"，以保证山海关固若金汤。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否则，今天山海关的景致想必会好看许多。

该计划没有实施的原因是，袁崇焕等一批中高级官员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了孙承宗的支持。

努尔哈赤拿下广宁后，并没有在那儿长期待下去的打算，也未乘胜进击山海关。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从广宁撤退进了山海关，他们为了坚壁清野，避免资敌，实施焦土政策，放



火烧毁沿途的城镇村庄。努尔哈赤见此情形，下令退回广宁，并继而退回沈阳。结果，从广宁到山海关之间的近五百里土地，平白落到了出没其间的蒙古部落手里。

袁崇焕出任新职位时，皇帝曾经拨下二十万两白银，让他用来相机收复被蒙古部落占去的那些土地。说白了，就是要用钱把丢失的土地赎买回来。而事实上，那些蒙古部落在拿到这么一大笔真正从天上掉下来的银子后，也确实陆陆续续把那些土地还给了大明帝国和袁崇焕。

在袁崇焕担任的三个新职位中，有一个虚职，就是那个山东按察司佥事；两个实职，即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有了这些土地，袁崇焕的两个实职才算落了地，他才能在这块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新任辽东经略的计划实施了的话，袁崇焕等一大批山海关外职衔的官员立刻就成了待业青年。

从个人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项保守的计划。

从辽东大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从大道理上看，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难道丢失的辽东地区从此就不要了吗？那如何面对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从眼前来看，广宁到山海关，四百多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即便单纯从军事上看，守关当守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

结果，皇帝和内阁首席大学士云里雾里地不知听谁的是好。于是，这道难题便摆到了孙承宗面前。此时，孙承宗不但是皇帝的老师，是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而且眼前争论的双方，还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才担任了目前的职位，因此难题只能由他来解开。

孙承宗来到山海关，很快选择了支持袁崇焕。据说，为了说服那位辽东经略，孙承宗与他连续恳谈七天七夜，他坚决拒绝接受孙承宗的看法，并且很动感情地谈道：与国家安全比较起来，个人身家

性命微不足道。过去的失误就在于帝国过于轻佻：抚顺之战失之于轻敌，萨尔浒之战失之于轻进，沈阳辽阳失之于轻战，而广宁则失之于轻逃。一个轻字，导致帝国的辽东覆亡。时人有言：自辽东战祸以来，从未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如今只能慎重于固守山海关，方是君子务本之道。

最后的结果是，孙承宗无法说服他，只好回到北京，告诉皇帝：这位仁兄担当不了捍卫帝国边疆的重任，请皇帝把他官升一级，调到南京去担任兵部尚书，明升暗降地冷冻起来算了。历史没有给当事者本人机会验证他所说的一切，只是令他安静地度过了晚年的官场岁月，却也在史书上留下了胆小怯战的丑名。不久以后，随着山陕地区的农民暴动，帝国很快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知是否可以算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判断。在激昂慷慨的感性情绪中，诉诸崇高得无法辩驳的真理，以此令论辩对手闭上嘴，是从官场到民间历久弥新的利器，哪怕由此导致了无数惨痛的后果，虽九死而其犹未悔。

孙承宗则自请接替辽东经略一职，皇帝欣然批准。于是，孙承宗以帝师、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职衔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成为辽东战事以来权位最高的一位督师。

袁崇焕就是在这位督师的指挥和支持之下，完成了他在山海关外监军和在宁远城的布置。其间，他在整顿部队时，又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儿。

当时，军队中军官喝兵血、冒军饷、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一个校级军官犯这种事儿撞到了袁崇焕的手上。袁蛮子根本不管自己是否有权限杀人，也不请示报告，便自说自话把一个级别不比自己低多少的中级军官行军法干掉了。孙承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将袁崇焕招来痛骂了一顿，差一点儿就祭起尚方宝剑把这个袁蛮子也行了军法。

但不管怎样，他们毕竟在风雨飘摇的辽东前线，以宁远城为中心，以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处为前锋，以山海关为后盾，建立起了一个具有战略纵深、多层次相互呼应的防御体系。在仅四年时间

里，他们先后修复山海关以外的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了十五个战车、火器等多兵种兵营，制造军械数百万具，拓地四百里，屯垦田地五十万亩，年收入达五十万两白银。辽事整体上迅速向“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目标迈进，努尔哈赤在此期间内一直停留在辽河以东，没有越进辽西一步。在孙承宗被迫辞职后，这个防御体系成就了袁崇焕和宁远城的光荣。

孙承宗的离职令人黯然神伤。

就在他和袁崇焕等一班人苦心恢复辽东局势时，朝廷中的局势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

大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奸大恶之人魏忠贤，逐步走向九千岁的辉煌。天启皇帝则躲在偌大的皇宫院落里，专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艺，雕凿出了不少极富创意、精巧绝伦的好玩意儿。每当全身心投入那富有创造性的、心爱的工作中时，除了身边伺候的人之外，皇帝特别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劳作。于是，魏忠贤就会时常在这种时刻，适时前来请示军国大事，皇帝通常的反应是：我知道了，你用心去办罢；或者是亲昵地斥骂：连这点儿事儿都办不好，要你这奴才作甚？

到大明天启五年下半年，魏忠贤已经牢牢控制住了整个国家的政治中枢。前一年，一大批东林党人及其领袖人物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或被迫退休，或被开除公职，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而全线溃败。孙承宗功勋卓著，被认为是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却也是公认的东林党人，或至少是东林党的亲近分子。当时，宁锦防线已经相当稳固，孙承宗和袁崇焕等计议向前再推进二百里，直到锦县东部的大凌河畔，然后就可以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可以谈论恢复辽东了。为此，孙承宗报告朝廷，希望速拨二十四万两军费，以便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战略转折作准备。德高望重的孙承宗甚至在报告中乐观地写上了大功可以“告成”一类的字样。

此时，正值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最为动荡不安的时刻。由于努尔哈赤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数年间辽东地区的汉人暴

动此起彼伏。努尔哈赤则采取了近乎丧心病狂的铁血手段予以镇压。其直接后果，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就是出现了辽东开战七年以来，双方战略态势逆转的最佳时机。从这个角度观察，孙承宗的乐观的确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结果却真的令人扼腕叹息——皇帝看到孙承宗的报告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拨给这笔军费。谁知，皇帝的命令却被这几个有关部门卡住了。兵部、户部、工部的几位领导就此协商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这笔钱可以答应给，但不能真的给。原因据说是，他们担心孙承宗有了足额军费之后，会胡作非为。于是，在这几个部门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公文往来过程，以便将此议拖成不了了之的局面。官场亦有专门术语用来称呼此类做法，曰：淹。

我们找不到证据能够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做，最后，只能找到唯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可能不希望孙承宗成功。因为孙承宗倾向东林党，不是他们自己人。孙承宗的成功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好处，甚至可能还有坏处，因此，没有理由让他成功，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让他得到这笔钱。这种解释符合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每当到了即将亡国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这种根本无法理喻的乱象。人们时常用一个术语来归纳这种现象，那就是——亡国之兆。

随后，孙承宗不断发来催促的报告，于是，这些人在皇帝面前将他们的担心解释成：双方已经将近四年没有打仗了，孙承宗轻启战端，恐怕会惹来不可测之祸。因此，他们正在想办法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此时，天启皇帝已经培养起了对于木匠手艺的高度热爱。在数年一心一意钻研这种技艺的岁月里，皇帝可能真切地感受到了和平时光的宝贵，感受到了不受战乱消息烦恼的舒心可贵，于是，欣然同意关于战端不可轻启的说法。就此，真的就把那位帝国前敌最高统帅的战略规划给“淹”了。

很久以后，皇帝大约想起了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教导，想起老师如今可能也不太容易，于是下令派遣一个宦官带着十万两白银前去

犒劳前方将士和自己的老师，还专门给老师带去了一笔特殊的赏赐，作为拒绝了老师战略规划的一种补偿。翻检史料就可以发现，类似情形已经成为这位泱泱大国君主及其臣僚们的行事风格，从中大体可以窥见当时的大明帝国何以如此不长进、不争气了。

到此，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头。

那位前来慰问的太监，还在魏忠贤那儿领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向孙承宗转达魏忠贤的致意，看看双方是不是能够亲密携手、共同发展。孙承宗威望太高，魏忠贤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谁知，满腔热情的太监到来后，孙承宗除了接受皇帝的诏书和赏赐之外，一言不发，使这位肩负特殊使命的太监，根本就没有机会向孙承宗推心置腹。魏忠贤由此知道，孙承宗这个人看来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此时，魏忠贤在帝国朝堂之上大展拳脚，朝局风生水起，和几年前孙承宗离开北京赴任之时已经截然两样——晚明时节著名的“六君子案”已经结束，六个名气极大的正人君子全部无声无息地冤死在魏忠贤手下；熊廷弼也被杀死，那死不瞑目的头颅正在帝国万里边境线上巡回示众，当时的术语叫作“传首九边”；而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则正在酝酿之中，没有人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孙承宗郁闷到了极点。作为皇帝的老师，孙承宗很清楚，这位皇帝并不坏，还时时会让人觉得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得可爱。可是，如果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大国领袖如此单纯，如此整日陶醉在木匠作坊里，任由魏忠贤之流摆布，也真是令人为之气结。孙承宗知道，自己如果为此给皇帝写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皇帝手上，于是，决定借巡视蓟州、昌平防务的机会，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返回北京，当面向皇帝奏报机宜，扭转时局。

孙承宗手握重权重兵，威望崇高，而且还是皇帝的老师，魏忠贤深切忌惮甚至恐惧孙承宗返回京城。于是他向皇帝报告说，孙承宗拥兵自重，打算带重兵入朝清君侧。天启皇帝起初根本不信，无奈

魏忠贤绕御床哭诉再三，不由得皇帝不为其所动。最后，皇帝叹口气，下令内阁拟旨，旨曰："没有皇帝命令擅自离开特命职守，非祖宗之法，违反者决不宽恕！"然后，连夜开紫禁城禁门召来兵部尚书，以三道飞骑前往孙承宗处传旨。据说，孙承宗当时只带了一个助手、一个警卫员、一个仆人，一行四人已经到了北京附近，接到皇帝圣旨后，遂长太息而返。

至此风云变幻之际，另外一个因素肯定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努尔哈赤。

研究明清战争史的学者曾经注意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军事才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发动谣言战、心理战和间谍战，为此，不惜花费巨资派遣特工、收买间谍，形成了一支效率极高、作用特大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工作任务大体是：收集情报，接近并收买帝国权贵、太监和各级各类官员，制造与传播各种谣言，动摇人心意志，策反，战时内应等等。仔细翻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明作战的战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上述方面极为成功的运作。

此时，针对孙承宗，后金汗国派至北京的特别部队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是：

告诉各种官员，孙承宗信任的某将领冒领了多少兵饷、经略本人贪污了军费若干，从而有效增加了孙承宗领取军费时的困难。

告诉太监们，孙承宗如何痛恨厂臣魏忠贤，预备率兵回京实行兵谏以清君侧。

同时，利用军人亲属的家书，向孙承宗所部将士传播魏忠贤窃权误国、欺蒙皇帝、玩弄大臣、克扣军饷、贪暴残民等等事实，用以制造前线将士对后方中央政府的疑虑和不满。

在魏忠贤说服皇帝禁止孙承宗入京之后，京城中广泛流传的消息则是：孙承宗率领的部队实际人数只有五万人，而领取军饷的士兵名额是十二万人，一大半军饷被孙承宗及其亲信们集体贪污了。

另外一则消息与此密切相关：孙承宗之所以要到山海关外

去，进军锦州、大凌河等处，是因为害怕朝廷派人清点部队人数；关外土地并不值得守，努尔哈赤根本就没想要那些地盘儿，孙承宗故意到努尔哈赤鼻子底下挑衅，是为了激怒努尔哈赤，挑起战争，以便大量虚报伤亡数字，弥补贪污之空缺。

最后一则消息最骇人听闻：孙承宗最为信任的一个将领打了一场败仗，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残害异己将士、虚报伤亡数字、掩盖贪冒军饷而故意所为，云云。于是，帝国言官——监察官员们真真假假地群情激愤，排炮般弹劾孙承宗。当年十月，帝国辽东前线的最高统帅、经略辽东近四年、令努尔哈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孙承宗，终于经受不住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抨击，被中央政府三下诏令召回北京听候处分。据说，弹劾孙承宗的各级各类官员达数十人之多，孙承宗遂挂冠而去。

袁崇焕耳闻目睹了全部过程，对此他心中做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几年后，当他陷入类似的境遇并再一次临危受命时，从他写给皇帝的信中，可以看出孙承宗的遭遇曾经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与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比起来，孙承宗算得上是太过幸运了。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在当年三月将后金政权首都由辽阳迁到新都沈阳。孙承宗刚刚离开辽东前线，努尔哈赤立即秣马厉兵，开始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他似乎根本就没把大明帝国接替孙承宗的新任辽东经略放在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做得完全正确。大明帝国前来接替孙承宗的督师，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确不配受到敌人的重视。

新任辽东经略名叫高第，据说深得魏忠贤赏识与支持。他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将孙承宗花费巨资的三年布置、三年心血大体废止——下令将山海关外四百里土地全部放弃，命令所有关外军政人员、物资、百姓人等全部撤退关内。

后来的情况表明，除了那个出身广东东莞的袁崇焕之外，高督师的命令得到了很有效率的执行。两个月后，到大明天启六年（公

元1626年）正月，军事要塞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等已经撤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宁远城，孤悬关外二百里处，里面驻扎着不足二万守军，以及孙承宗四年心血中硕果仅存的一个袁崇焕，准备“独卧孤城，以当大敌”，誓与宁远城共存亡。

宁远，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兴城县，与锦州一样，坐落在北面是山，南临大海的狭长地带上，守住这两座城池中的一座，便锁住了东北通向山海关的咽喉，辽西走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今，锦州守军已撤，剩下袁崇焕，冒着被高第尚方剑诛杀的危险不肯撤离，表明了他过人的胆识与性情。

之所以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情，与朝廷中剧烈的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是带着两个坚定信念来到山海关的。

其一，他坚定相信孙承宗率领的所有山海关及关外部队总人数不会超过五万人。以前孙承宗申请领取的十二万人粮饷，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肥己，因此，自己有责任让他和他的亲信们把吞进去的钱粮，怎么吞进去的，就要怎么吐出来。孙承宗是一位威望崇高的东林党亲近分子，魏忠贤与东林党不共戴天，孙承宗既然不为己用，就必须把他干掉。高第的此种坚定信念，来自朝廷中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势。

其二，高第坚决认定，山海关外土地辽阔，地形平坦，根本不可能长期防守，防线就应该放在山海关。

为了确认部队准确人数，以坐实孙承宗的罪行，高第一到山海关便立即下令：关外所有大小防守据点一律撤除，所有部队、官民人等统统移入山海关内。

命令下达后，前线将士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无法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耗费千万军费钱粮，历尽千辛万苦才收复回来的土地，建设好的城镇与军事设施，安居乐业的黎民百姓，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说不要就都不要了？国家经得住几次这样的退守，人民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颠沛流离？普天之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败家子？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乱命，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和抵制。面对怀疑、不满和抵制，高第越发认定：这些官吏将佐之所以不愿执行命令，就在于集体贪污了空额兵饷之后，害怕撤回关内清点人数，暴露了罪行所致。于是，高第态度更加强硬，并且以尚方宝剑相威胁，严厉命令上述战略据点统统撤离，就连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前屯二城也要一并撤除。对于不听命者，他准备祭起尚方宝剑，来试试那剑锋锐利否。

高第的举动，惹恼了那个著名的、连皇帝都知道其蛮的袁崇焕。袁崇焕看到自己这位顶头上司恣意胡为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便索性以在高第看来同样不可理喻的态度，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宣布说：“我是宁前道尹，官职就在宁远和前屯卫二城所管辖的地面上，官于此就应该死于此，我肯定是哪儿都不去的。”

高第大怒。据说，他派人仔细查阅了职官录，发现那袁崇焕确实兼任了宁前道尹。

一般说来，在此种情形下，若没有皇帝发话，还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不过，此时的高第可不能一般看待，他手持尚方宝剑，是皇帝辽东军事上的最高代表。在理论上讲，他有权力对巡抚以下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下的军官先斩后奏。此时，袁崇焕的三个官职分别是山东按察司佥事、宁前道尹和山海关外监军，文职够不上巡抚，武职没达到总兵品级。他这个道员的职级恰好在高第可以请出尚方宝剑诛之的范围内。倘若不是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中国历史上很有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袁崇焕的英名了。

据说，就在高第准备搬出尚方剑诛杀袁崇焕时，却意外地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袁崇焕逃过了这一劫。

这个小道消息来自北京，来自皇帝的身边。

此时，我们帝国的皇帝早就已经将自己的工作重心实行了全面转移，从治理国家转向了木匠手艺。他高度热爱这项事业，并在光着膀子、大汗淋漓之中，发现了自己才华和兴趣之真正所在，从而心醉神迷。偏偏有一天，在工作之余暇，有人和皇帝谈起了宁远的事

情。于是，我们天才的木匠皇帝于凡事迷迷糊糊之中，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宁远是山海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确应该加强防守。这是大明天启皇帝朱由校七年皇帝生涯中，所说过的为数不多的明白话之一，遂载入史册，并使手握重权的辽东经略高第，悻悻然收回了那柄大约已经出了鞘的尚方宝剑。

就这样，山海关外的所有官民部队全部撤进了山海关，就留下了一个宁远城，“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处”。就此，几乎为努尔哈赤一口气让出了四百里作战空间。

高第不知道，他那收回去的手，成就了一段历史，成就了袁崇焕的英名，也使努尔哈赤的一世横绝，在小小的宁远城下戛然而止。

高第可能同样没有想到，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原因是发生了一个除孙承宗外，可能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部队撤进山海关后，清点人数的结果，完全出乎高第的意料之外——整个撤进关内的部队，已经超过十万人，如果加上跟着袁崇焕“独卧宁远城中”的二万人，其总数已经超过十二万。就是说，孙承宗和他的部下们，不但没有冒领军饷，他们可能还在往里赔钱。这一下子高第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他不但在朝廷上言之凿凿地认定孙承宗们贪冒军饷，更糟糕的是，为了加强自己说话的力量，新的军饷他也信誓旦旦地只向朝廷申报了五万人的份额。如今，他深悔孟浪，懊恼得恨不得抽自己嘴巴。

最后，这厮想出了一个所有坏主意中最坏的主意，给士兵发饷时，按照对折之后再打一个对折的标准发放，就是说，每个战士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的军饷，结果，引起了官兵们普遍的愤恨，许多人逃离部队，自谋出路。于是，高第以此惩治这些逃兵的长官，说他们冒领粮饷、贪污舞弊。就此，这个真正的混球把一个坏蛋在军队中当了官儿后所能做的坏事，差不多算是做到头了，由此引发的怨毒和憎恶可以想见。据说，当时的部队中，有不少人放出狠话，说是愿意一命换一命，和自己的最高统帅同归于尽，就是“与汝偕亡”的意思。

这样一来，又吓着了我们的辽东经略。史书记载：由此“高第大惧，始稍敛迹”。就是说，那些要找他玩儿命的家伙，把他吓坏了，于是高第有所收敛，并且，对袁崇焕也开始改变态度。

以前，高第可能是很想看着袁崇焕出洋相，看看他如何在努尔哈赤的八旗铁骑面前“独卧孤城”。如今，对于那些申请调到宁远去的人，不但批准，还会嘉奖他们。到后来，看到袁崇焕因为“独卧孤城”而名声大盛、深孚人望的景象，这高第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突然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盛赞袁崇焕有勇有谋，应该再行升迁。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是想明升暗降，通过升官，把袁崇焕的实权剥掉，然后再把他弄出宁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高第对袁崇焕享有的崇高威望很是眼热，自己也颇想尝试一二，于是使出了这个招数。

谁知，朝廷不但欣然同意给袁崇焕升官，将他任命为按察使，还同时让他兼任宁前道尹，使关外诸官吏将佐如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们，一下子都成了袁崇焕的部下。袁崇焕在山海关外俨然自成一军，高第有苦说不出，更加拿他无可奈何了。

当此时，袁崇焕召集全军将士，当众刺血，写下血书，誓与宁远共存亡，并郑重地给将士们下跪，为国家为生民请命。将士们泪流满面，发誓愿效死命。据说，当时全城官民尽皆遥遥下拜并挥泪宣誓，愿与袁崇焕共生死，场面至为感人。

随后，袁崇焕分兵几路：一路动员城外百姓迁居城内，以便坚壁清野；一路严密盘查奸细内应，准备将计就计；一路筹备守卒食粮；一路准备战守器具。然后，传令宁远以西的前屯卫守将和山海关守将：“凡有逃到这里的宁远将士，一律斩首示众。”

就此，宁远城中已是众志成城。

努尔哈赤则全然没有把宁远城和袁崇焕放在心上。因为，在以往的岁月中，他已经得到了太多蔑视大明帝国的理由。如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对宁远城与袁崇焕格外高看一眼。

论城池高大坚固，宁远城远远不如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中的任何一座，与那些辽东名城比起来，宁远城是什么？一个在此之

前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的弹丸之地。

论起官爵高低，袁崇焕虽然当上了副省级的按察使，若和辽东经略比起来，可还差着好几级呢。这些年，直接间接死在努尔哈赤手里的大明辽东经略已经不止一个。

论起实战经验，据说这个袁崇焕从来没有亲临战阵打过仗，更不要说身经百战了。在横行天下的努尔哈赤眼中，“何物袁崇焕？”——袁崇焕是什么东西？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罢了。

此外，论兵力、论军备物资、论财力等等，袁崇焕和努尔哈赤以前的对手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

因此，开战之前，努尔哈赤志在必得，几乎是出动了倾巢之兵。据说，他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直下山海关，然后与大明帝国以山海关长城为界，正式划定疆域。

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高第尽撤关外诸城没几日，努尔哈赤便带重兵席卷上述各地，并于二十三日直奔宁远城下。

此刻，努尔哈赤最忧虑的不是拿不下宁远，而是担心开战后袁崇焕会率军跑掉，增加了山海关的防守力量。于是，当他率领十三余万大军来到前敌时，所做的布置不是攻坚，而是跨过宁远城五里扎下营寨，将宁远通往山海关的大道拦腰截断。意思很明白：防止袁崇焕跑掉。显然，努尔哈赤对自己和自己指挥的军队充满信心。

应该说，努尔哈赤有理由这样做。

后金军队已经快四年没有教训大明帝国了。在那个庞大的国家里，帝国的官员和将士常常具有卓越的学识与才能，可是，由于身处一种愚不可及的制度之下，在这些人身上，便时常只能看到过多的傲慢、自私、贪婪与怯懦。那些试图表现杰出才华与品行的人，如熊廷弼与孙承宗，很快就会在他们自己人的争斗中被淘汰出局。努尔哈赤的部下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只要具有足够的勇敢和才能，他们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财富、女人、权力与荣誉。

史书记载说，女真人“出兵之日，无不欢呼雀跃，士兵们的

妻子儿女也都欢天喜地，祝愿她们的父兄丈夫们能够多立战功，多得财物。如果兵士家中有四五个奴仆，便都要争抢着希望和主人同赴前敌，全都是为了可以抢掠财物的缘故”。

这部史书的书名叫《建州闻见录》，作者是朝鲜人李民寏，曾经当过女真人的俘虏。

他继续写道：努尔哈赤的部下聚会时，面部或脖子上带伤疤的很多。因为，敢于冲锋者有功，退缩者为罪，而脸面或脖子上的负伤者，是兵士最高的战功，可以受上赏。这种军功通常所受的奖励，包括女人、奴婢、牛马、财物等，有罪者则或者杀头，或者没收他们的妻妾、奴婢、家财，或者受到肉体刑罚。

另外一位朝鲜派到后金国的使节这样记录自己目击到的情形：

战斗行将开始时，每支后金部队都会派有一位押队——大约相当于后来的督战队——该人携带着前端涂有红色颜料的箭矢，遇有违犯统一指挥、战场纪律或临阵退缩者，便以该箭射之。战斗结束后，一一查验，凡身上带有朱痕者，不问轻重一律斩首。所有战利品，全部分给所有部队，立战功多的人可以分到加倍的一份财物。（《光海君日记》第一六九卷，十三年九月戊申）

有人曾经注意到了一个刺眼的对比，在兴高采烈分享胜利成果的同时，也有人抱着战利品挥泪如雨，乃至号啕大哭。原因是，他们父子兄弟常常在一个牛录中并肩作战，此时领到的财物中，可能便有他们战死的父子兄弟那一份。

史书中，谈到后金国作战失利、伤亡惨重时，常常会记载他们大哭而去。这种记载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故意矫情，很有可能是实际情况。这种由血亲、宗族纽带连接起来的军队，具有一种血腥的宿命，每当遇到这种情形，便会遭遇双重的打击，亲人战死在战场，而自己和家人又得不到战利品的慰藉。

这种情形，可能是努尔哈赤特别喜欢采用混进敌人城堡、里应外合、奇袭、偷袭、夜袭、长途奔袭等战术，较少采用攻坚战的原

因之一。

事实上，从熊廷弼和孙承宗接任辽东经略，锐意进取，渐次恢复辽西走廊以来，努尔哈赤便两次按兵不动，在先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相持相望，从不相逼相侵，可能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其中。

由于上述缘故，后金军人在战斗中有进而无退。

有进无退的军队，当然应该所向无敌。

然而这一次，身经百战的老将努尔哈赤真的错了，他忘了兵家最简单的一条真理：骄兵必败。轻敌和不能知彼知己互为因果，形成双重的兵家大忌，导致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世盛名，折在了小小的宁远城下。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努尔哈赤的特别部队此次没有能够发挥作用。非但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这一次发挥的根本就是反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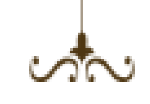
在以往的战争岁月里，努尔哈赤最为得心应手的战法是，每次开战之前，先将一批被俘的敌方军民放回城里去，里面掺杂着他的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和先期潜伏的人员会合，开战后，或策反，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袁崇焕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传递方式，给努尔哈赤发出了错误信息，使努尔哈赤误以为内应已经成功，大功即将告成，遂指挥部队轻身接近宁远内城，整个进入了袁崇焕预先设计好的、遍布地雷和红衣大炮有效覆盖范围内的诱敌之地，结果遭到地下埋置的地雷和城头设置的大炮的猛烈轰炸，后金汗国部队伤亡惨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就曾经对这些红衣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事实上，宁远保卫战，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使用西





方进口的红衣大炮所进行的第一场后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攻防战。这种大炮，射程约两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武器。战争史家形容说：这种大炮，“一炮发出，即开出一条血渠”，其威力远远超出了冷兵器时代英雄努尔哈赤的想象。

有战争史学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土石飞扬，火光冲天，无数努尔哈赤的战士与战马被炸上了天空。后金军大挫而退。

努尔哈赤率部从宁远城下撤退时，状极仓促：皇太极率其所部为中军，护送努尔哈赤所乘之辇车先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各率其所部，分别为左、右、后部护军，就连派往觉华岛的部队，都来不及通知，便连夜朝沈阳方向撤退。派往觉华岛的蒙古吴纳格部和满洲八旗一部，听说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在已有斩获的情况下，来不及扩大战果便也急速北去。这种情形显示，必是后金汗国军队内部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故，方才会在出动倾巢之兵、对山海关志在必得的时刻，如此草草收兵。以此推断，努尔哈赤受伤不轻的说法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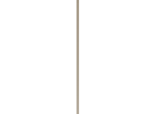
退兵途中，袁崇焕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和信札前去为努尔哈赤送行。信中说：“老将军纵横天下已久，如今败在一个后生小子这儿，大约是气数使然吧。”

努尔哈赤表现得也很有风度。他回赠给了袁崇焕一份礼物和一匹名马，相约再战。

名将风采令人悠然神往。

回到沈阳后，身经百战、从未如此惨败过的努尔哈赤，十分愤懑。

史书记载说，已经六十八岁的老汗王忧思重重，他时常问自己：“难道我的心已经倦怠，不再留意治国之道了吗？难道国家安危百姓疾苦，我已经不能明察了吗？难道正直有功劳之人没有受到正当对待吗？我的孩子中间真有人能够效仿我，一心一意为了国家吗？大臣们真的能够勤奋稳健地对待政事吗？”



这是许多手握重权的人行将就木时都会发出的怀疑。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这种问题的提出本身已经表明：提问者所从事的事业一定是个问题多多的事业。

此役中，努尔哈赤本人身受炮伤的可能性很大。一般说来，一方最高统帅受伤，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影响巨大。届时，一个措置不当，弹指间就可能引发兵败如山倒的后果。假如不是身受重伤，努尔哈赤应该不会在倾兵而来的情况下，两天攻城不下便仓促退兵。很有可能因为他矫情镇物方面的超人功夫和保密工作的出色，方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就凭这一点，努尔哈赤也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了。

努尔哈赤，这位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在这个时刻走进历史深处，应该算是恰到好处。

第六章 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不久，岳托和他的三弟萨哈廉，一起来到他们的父亲大贝勒代善府邸，谈起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治形势。他们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汗王之位不宜久虚，应该早定大计。这两位年轻人对父亲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受老汗王努尔哈赤器重，大家对他也都心悦诚服，应该由他速继大位。代善同意他们的看法，然后，亲自出面去和其他几位大贝勒沟通。史料中，找不到任何人对此发出不同声音的记载。第二天，后金汗国所有位高权重人士一起联袂推举，由此，汗王权位在一片安详平和中顺利转移到了皇太极身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清史稿》太宗本纪一等）

岳托是镶红旗旗主，代善是正红旗旗主，萨哈廉则是议政贝勒。当时，皇太极只是镶白旗旗主。论起实力，代善和岳托父子三人的力量显然比皇太极大。他们没有凭借实力争夺权位，却联合其他人，一起推举了皇太极。

他们可能谁都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之间，他们已经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极为辉煌的纪录。一个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在众人的和平推举下，产生了一位最为优秀而称职的领袖，成为到那时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了不起的一次权力转移。他们的名字理应载入丹青史册。

后来，这件本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愣被涂抹得乌七八糟、七扭八歪。一部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得不是个东西，在皇太极继位的话题上，表现得特别充分而又典型。

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一年，开年就不好。正月里，老汗王努尔哈赤亲自领兵西进，结果在小小的宁远城下伤亡惨重。有传说，连老汗王本人都受了炮伤。

他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烈的老人，如今更加乖戾。这个横绝



一世的人，变得有点儿像祥林嫂，时不时就要回忆自己一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光荣历史，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怎么就会败在宁远城下，有时，又会叹息自己身心倦怠，打不起精神，要不然就不停地咄咄自恨，觉得事事好像都无法顺心如意，仿佛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放心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努尔哈赤的死讯。在一片愁云惨雾中，王公贝勒们从四十里地以外的叆鸡堡，把老汗王的遗体抬回了沈阳城里的汗王宫。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前后，传出另外一个消息，和硕贝勒们转达努尔哈赤遗命，让大妃为老汗王殉葬。大妃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是努尔哈赤众多妻妾之中的首席夫人。六年前，阿巴亥曾经受到了努尔哈赤下令离弃的严厉惩罚，后来，努尔哈赤又把她接回汗王宫，直到死后让她陪伴自己于地下。

大妃认为，努尔哈赤去世前五天，自己一直随侍在旁，大汗并没有流露过让自己殉葬的意思。

无奈四位大贝勒众口一词，四位小贝勒包括大妃的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也没有异议。须知，在其当时，十四岁的女真人已经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成年人，后来，也是大清皇帝亲政的年龄。这表明，此时此刻，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可能确实听到过努尔哈赤有此遗命。于是，大妃只能在他们恭而敬之却又寸步不让的坚持之下，悬梁自尽。多年以后，多尔衮抱怨过皇太极夺了自己的汗位，却从未提到过皇太极逼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大妃阿巴亥的三个亲生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继承了正黄旗与镶黄旗的家产。过去，两黄旗一直由努尔哈赤自己亲自掌握。按照八旗制度，只要成为一旗之主，就不仅仅代表着崇高的地位，还意味着拥有了在其名下的土地、人民、军队、牛羊、财富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这些权力所能够支配的力量，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层面上，至少相当于后金全部国力的八

分之一。这就使努尔哈赤的遗产继承变得颇为耐人寻味。

按照中国人的皇权制度与传统，国家权力的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皇帝名位的继承，谁继承了这个名位，谁就拥有了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得不到这个名位的人，也就自然失去了一切。在那里，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权力与制度设计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继承权总是笼罩在血雨腥风中的根本原因。

努尔哈赤死时的后金汗国，则不是这样。在那里，至少从理论和当时实际情况上看，汗王的名位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继承这个名位的人，需要由八旗旗主即八位和硕贝勒推举产生，假如这位汗王的工作与为人得不到八位和硕贝勒的认可，他还有可能被轰下台去。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在努尔哈赤死的时候，后金汗王的实际地位，与任何一个八旗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努尔哈赤临死时一直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却始终没有为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

女真人源于游牧渔猎生活的文化与农耕社会的汉族文化差异极大，完全不可以用帝王政治和儒家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特别是前清时代的情形。许多出自汉文化训练的文人，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得牛唇不对马嘴，原因端在于此。

仔细考究起来，我们会发现，女真人和在我国境内生活过的以及世界上众多游牧渔猎部落一样，有过许多相同或类似的习俗——

譬如，他们习惯于迁徙，习惯于追逐水草丰美的地方。努尔哈赤的祖先曾经多次移居迁徙，努尔哈赤多达五六次迁移首都，便可以看成是这种习俗的遗风。这和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显然不同。楚汉相争时，刘邦的根据地定在关中，就再也没有改变过；元明之际，朱元璋的大本营扎在南京后，便牢牢地钉在那儿不动。

这些游猎部落习惯于以小核心家庭的方式分散生活，于是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便由大家来推举那些勇敢、聪明、公正的人物，将人们召集并组织起来。他们之间由习俗而产生的约法简单而严



厉，不能严守这种组织约束的人，常常要受到死刑的惩处。他们的司法制度看上去粗暴简单，却十分有效。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常设的监狱，即便有，里面也时常是空的。八旗制度——从牛录到甲喇到固山八旗再到后金汗国便是在这种培养基上生长与发育起来的。

而那些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将他们强力整合或组织起来的人，就成了他们天然的领袖——单于、可汗、王等等。

这种整合或组织与他们原有的游牧渔猎生活并不吻合，因为在那广阔得几乎无边无际的草原山林、雪野戈壁上，要想将他们组织起来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整合后的军事行动必须具有下列两种情势方能长久持续：其一，军事行动战果显赫，能够得到比游牧渔猎更高的经济利益；其二，整合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或正在被神化。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不停地告诉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王族有一个来自天上的祖先，或王本人曾经接受过某种神秘的授权。努尔哈赤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天上的仙女，努尔哈赤的脚上长着贵不可言的红色七星，满族人不吃狗肉并爱护乌鸦因为狗曾经受神灵指派，掩护了努尔哈赤，而乌鸦则衔来朱果，使仙女受孕生下努尔哈赤的祖先等等传说，即属此类。他们的领袖必须是得到上天护佑的半人半神才行。

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是：尽管他们差不多都是从一个首领和一群情同手足的战士开始其英雄传奇的，比如，从努尔哈赤起兵时就跟随他的著名五大臣，但最后上天仅仅保佑首领一族，政治权力的继承，全部为王族所独占，其他部族不能侵犯这种神圣的权力。这就是以王族血统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传承制度。

困扰大汉三百多年的匈奴，困扰大唐盛世的突厥，使大宋烦闷不安了一个多世纪的契丹辽国，横扫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如今的女真黄金种姓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族，只要一一解剖就会发现：这些游牧渔猎民族都在恪守上述原则。在他们那里，国家万世一统，以王族的开始为开始，以王族的结束为结束。从来没有发生过王朝在国家内部被推翻更替的事情，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落到过王族之外。这是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帝王梦寐以求数

千年而不可得的一个梦想。

最后，与王族血统主义继承原则相配合的，则是领袖推举制原则。从秦汉的单于时代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两千多年时间里，这一原则一直坚定地在我国上述几乎所有游牧渔猎部族中发挥着作用，与王族血统主义相表里，成为一个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这一根本制度的含义有二：其一，部族国家的元首只能在一个受到上天护佑的、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王族中产生；其二，元首必须在有资格的王族成员中经过推举产生。

这种制度顽强不息的生命力，必定与下列情形有关——

分散的游牧渔猎部族与农耕社会之间，有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要分散得多、动荡得多也险恶得多，他们之所以能够被组织起来，甚至整合成为国家，一个普遍的原因是出于战争、抢掠财富等与军事相关的动机。

本来，这些游牧渔猎部落的人们并不关心农耕社会里发生的一切，但是农业社会和城市文明所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唤醒了他们对物质文明的最初欲望。那里的金银珠宝、铜铁器具、绸缎布匹、粮食茶叶无不可以有效地改善他们动荡的生活。于是他们学会了通过贸易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为此他们时常需要忍受对方的欺骗、敲诈、傲慢无礼和有时真正的背信弃义、下流无耻。当天灾人祸降临时，情形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当他们忍受那些屈辱却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物资时，战争就将无可避免。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淳朴豪迈的牧人猎手，如今变成了极为勇敢又能干、凶狠而剽悍的战士，而且这种转变，似乎不需要跨越任何障碍。这种军事冒险，常常能够给他们带来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得多的财富。于是在不同的游牧渔猎部族中，这种同样的冒险行动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同时也是地地道道孤注一掷式的赌命，在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远比游牧渔猎和贸易大无数倍的危险。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缺少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获取这些收

益、抗拒这些风险；同样，没有了出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游荡在山林草原上的人们，也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够得到那些巨大的财富与收益。

这种收益与风险，对于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过重大。

因此，当他们接受了首领家族成为王族的神圣地位时，王族和支持自己的那些凶猛战士之间，就必定要有一个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加上某种程度民主主义的妥协性考虑，那就是：肩负部族国家生死存亡重任的权力继承者，必须将那些体弱多病者、胆小鬼、懒虫、酒鬼、笨蛋、贪心不足的守财奴、心术不正的坏蛋、不孚众望者和年幼者排除出去，只有那些智勇双全，富有生命力、才干和王者风度的人，或者简单说，就是那种众望所归的人，才有希望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候选人，通过众人公正而挑剔的审视目光后，被推举为王，成为他们新的领袖。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那些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首领，许多人常被冠以“勇猛”、“贤明”之类美名，在漫长的世代里，受到族众的热烈爱戴，这就是原因所在。

从大名鼎鼎的匈奴首领冒顿时代，一直延续到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这种氏族长会议、部族长会议、大人推举会议和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帝国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直到努尔哈赤生前所定的八王议政、八贝勒推举汗王制度，全部贯穿着上述思想与原则。不但最高权力的传承需要靠这种会议推戴、认可，而且重大国是如战争与军事行动、大型宗教仪式、财富分配与赋税等等也要在这种会议上获得通过或决定。不幸的是，这种制度从来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机制，以便防止不适当的欲望、野心和阴谋，防止滥用权力、武力乃至暴力等等。不论是中原帝制王朝，还是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们，谁也没有能够走出这最后一步，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无论如何，在那几乎广大无边的山林草原上，没有人愿意拿自己与族人的生命，跟着一个没有名誉的坏蛋或者没有本事的笨蛋去冒险。但凡出现此种情况，届时这些部族国家便会飞快地滑向解

体和衰败。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流星般飞快地消失在历史夜空深处，盖源出于此。

只要能够不带偏见地仔细审视努尔哈赤死去前后的后金汗国形势，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几乎一模一样。由此，我们也就会大体靠近皇太极继位的真实情形了。

在未来的岁月中，在关于大妃阿巴亥和她儿子多尔衮的故事里，我们将会知道：她的死是情势注定，很有可能与皇太极没有太多的牵连。将皇太极硬扯进去，想象出种种阴谋与毒计，其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一种思维惯性所致，皇太极九泉之下有知，大约会深感委屈、郁闷。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幸运，之所以没有流星般消失在历史深处，大体上是由下列两个因素决定的：

其一，他死后的权力传承，基本上是在上述制度与原则的框架内正常进行的。因此，他的子孙中最为优秀的一个——皇太极被推戴成了后金汗国汗王。

其二，皇太极死后，努尔哈赤另外一个优秀儿子多尔衮，虽然改变了上述制度与原则的表面形式，却辗转腾挪、十分奇异地在一种特殊情形下贯彻了这些制度与原则，避免了大清国祸起萧墙、过早衰败的命运。

说来说去，努尔哈赤的幸运，的确与他拥有这样两个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大有干系。

对于皇太极来说，事情可能就远没有此时说来这么轻松了。

女真人与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如契丹辽国和成吉思汗蒙古一样，在财产继承上实行一种很重要的“分家子与未分家子”制，其核心是“幼子守产”制度。根据这种“幼子守产”制度，成年后的儿子们应该立即分家出去，单独成家立业；而将年幼的儿子留在家中继承父母的遗产。这种制度和汉族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精通中国宫廷政治的

汉族学者和专家，时常会把汉族人的思维定势硬安在别人头上，要不然就把财产上的继承制度和政治上的继承制度当成一回事儿，于是屡屡产生强烈的错觉：不是认为皇太极要阴谋诡计，抢了他哥哥代善的班，就是说他一箭双雕，逼死大妃，夺了他弟弟多尔衮的权。

这种说法，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厢情愿地忽略了一种异质文化中的根本制度和原则；说得难听一些，则大体可以这样形容：用汉民族政治文化中最肮脏的部分，愣去强奸了一种不同政治文化中最美好的成分。说来说去，都把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扔到了一边：在游牧渔猎部族国家里，经济上的“幼子守产”制度和政治权力传承上的推举制度不是一回事儿，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是在不同领域里同时发生作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因此晚年努尔哈赤特别喜爱大妃乌拉纳喇·阿巴亥是事实；他特别喜爱大妃所生的三个“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也是事实；他将自己亲自兼任旗主的两黄旗作为遗产留给了这三个“未分家子”还是事实；甚至他还像成吉思汗晚年考虑让“未分家子”——幼子拖雷继承汗位一样，考虑让自己的“未分家子”多尔衮继位，然后让长兄代善辅佐多尔衮，这同样可能是事实。

但所有这一切重要而明显的事实，全部都没有另外一个事实更简单、更明了，也更重要，那就是：努尔哈赤服从了他们文化中的根本制度与原则，在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上，制定并实施了基于八旗制度的后继汗王的推举制。根据这个制度，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汗王这个位子，不可能有虚岁十五岁实则差一个多月才满十四岁的多尔衮什么事儿。在经济上，按照“幼子守产”制度，他可以和一兄一弟继承努尔哈赤的两黄旗遗产，但在推举制之下，他若想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就只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培养起足够的功业威望来才行。努尔哈赤死得太早，使十四岁的多尔衮没有来得及培养起足够的才能与威望，他需要假以时日，在皇太极当政的岁月里，实现这一点。

事实上，皇太极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实行得相当彻底的推举制，他的胜出，正是这种制度的胜利。

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是后金汗国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努尔哈赤先是下令处死了他的嫡长子褚英，然后正式编定八旗制度，正式设置了听讼理政五位大臣。这五位帮助他治理国事的国务大臣，都是跟他一同起兵的老弟兄，可能和他还有过结义兄弟的交情。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亲弟弟舒尔哈齐被幽禁并杀死后，同生共死打天下的人，只有这五个人资格最老，最为功勋卓著了。他们分别是何和礼、额亦都、扈尔汉、费英东和安费扬古。

在编定八旗时，完全贯穿了王族继承的血统主义原则。八旗旗主分配如下：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领两红旗，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努尔哈赤的嫡长孙杜度领正白旗，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领镶蓝旗。那五位开国老臣可能比上述任何一位王族子弟的功劳都大，但他们全部与八旗旗主之位无关。我们知道，八旗制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而是将后金国的土地、人民、军队、财政、司法、民政等等全部一分为八，成为一旗之主，就意味着当上了后金国八分之一的主子。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后金汗国实际上已经被分成了八个小国，八旗旗主就是国主。

上述五位“开国元勋”被设置为国务五大臣，大约是努尔哈赤对他们多年出生入死的补偿。事实上，此时的旗务由八旗旗主为最高裁决者，五位国务大臣在崇高的名义和荣誉下被边缘化了。

五年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汗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这一年三月，努尔哈赤的继妃衮代被控有罪，努尔哈赤下令将其离弃。随后不久，衮代被她的亲生儿子杀死。这个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恶棍，就是后来的四大贝勒之一莽古尔泰。应该说，没有努尔哈赤的暗示或者默许，即便这厮再混蛋，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恶行。而杀死自己的母亲后不久，莽古尔泰便被努尔哈赤指定为共主国政的四大贝勒之一，人称三贝勒。

九月，努尔哈赤表达了想在子孙中立八人为王，称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将汗王置于八和硕贝勒的监督之下的想法。

次年二月，努尔哈赤便指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

为四大贝勒，协助自己“佐理国政”。四人按月轮值，一切军国机要事宜，由当月轮值的贝勒负责处理。（《清太宗实录》卷五）

一年后，努尔哈赤以《汗谕》即国家元首文告的形式，宣布了以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以推举制传承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与原则。

于是，八和硕贝勒会议成为努尔哈赤之后的最高国家权力之所在。

和硕的意思是“四方之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贝勒，则是满语中“老爷、大人、主子”之意。按字面意义理解，和硕贝勒是“一方之主”的意思。在《满文老档》中，和硕贝勒也经常被称为固山贝勒，即旗主贝勒。这表明，和硕贝勒其实就是一旗之主，是后金汗国中仅次于汗王的、最为崇高的一个等级。现在，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的八位王爷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其中，阿济格以下的四位贝勒年纪太小，譬如，多铎只有八岁，多尔衮刚刚十岁，于是，此四人被称为四小贝勒，他们在理论上具有的权力，由他们年长的兄长四大贝勒替他们行使。

努尔哈赤的这篇文告，是一篇被引用频率极高，但主要精神时常被忽视或者歪曲的历史文献。努尔哈赤认为：一个人纵然很有知识，到底不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规定：今后继承汗位的人，就在这八个和硕贝勒里面选，选择的标准不是强而有力者，而是德行好且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人。此人当了汗王后，假如不能接受不同意见，而且不干好事的话，八个和硕贝勒有权换掉他，挑个好的来接着干。

关于八位和硕贝勒，规定大体相同，要是一个人说出的话对于国家有好处，其余七个人就应该共同赞成之；如果自己没有才干，对别人好的东西又不能支持，尸位素餐，就应当立即换掉这个贝勒，在子弟中挑个好的让他来干。

努尔哈赤义正词严地问道：“不管是换汗王还是挑贝勒，如果他不愿意听从众人的意见，做难看的脸色给人看，难道就要让这个

不贤之人得逞，让他为所欲为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八卷）

为了使不贤之人无法为所欲为，努尔哈赤规定：诸贝勒不许私下交往私议国政，不许一两个人去见汗王，有事必须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商讨。汗王和八和硕贝勒在一起时，要并肩共坐一处，同受国人朝拜。每年大年初一，汗王要一拜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的神庙，二拜神仙，三拜叔兄，然后升御座，与八和硕贝勒并肩一处共坐，接受群臣叩贺。也就是说，汗王不但是大家选出来的，大家也有权弹劾罢免他，而且在身份上、礼仪上与八和硕贝勒是平等的，甚至在新年庆典上，他还要居于这些叔兄之下。

显然，在这里，汗权与旗权是并列的。就是说，在政治上，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主仆之分，而旗主与旗主、旗主与汗王之间则是平起平坐、平等平行的，大家共同裁决军国大计，各自分治自己的旗务，彼此并无君臣体统，没有上下之分、主仆之别。

在最为敏感的财富分配即经济上，则是这样规定的：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要八家平分；占据的所有土地，要八家平分；但凡得到的任何财富，都必须八家均分公用，不许分外私取。即使一人寸土，也须八分，汗王与贝勒之间完全相等，彼此无需相让。在这八分之外，若有人私自贪匿财物，贪一次，则罚一次应分得的份额，贪两次则罚两次，贪三次，则永远革除其应得之份额。这就是在清朝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八分”一说的来历。从此以后，“入八分”和“不入八分”，形成大清亲贵身份识别、权力地位与福利待遇的不小差别。

在军事上，至少在皇太极继位时，八和硕贝勒所将之兵大体上势均力敌，皇太极并没有越过其他旗主指挥其军队的权力，因此才会有如下感叹：皇太极空有“一汗虚名”，实际上，无异于一旗之贝勒。

八旗并立，八王议政，八分天下，八和硕贝勒推举汗王，遂成为后金汗国八旗制度的核心。显然，到目前为止，这套制度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历史上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制度，在精神上大体相

同，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创意。（《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八卷；《满文老档·太祖》第三十八卷）皇太极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被八和硕贝勒推举为后金汗国大汗的。

当时，八位和硕贝勒中，大贝勒代善四十六岁，心地厚道，不善心机，六年前，在与大妃的暧昧传闻中被弄得灰头土脸，可能是自动退出了对汗位的竞争；二贝勒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虽属王族，但系旁支，在资格上天然不具优势；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五儿子，凶猛能打仗，但声名狼藉。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把自己的妈妈杀死，以取悦努尔哈赤。结果，虽然取得了努尔哈赤的欢心，但是这桩恶行把他的名声弄得坏到了极点也是真的。四大贝勒中，唯独这四贝勒皇太极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污点。

时年三十五岁的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征战已近二十年。在一系列重大战役，如萨尔浒大战、辽沈战役、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等，他都独当一面，且身先士卒。当时的观察家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率领的将士都是精锐。

据说，努尔哈赤正式挑战大明帝国的抚顺之战，就是采纳了皇太极的建议，以智取兼偷袭获胜。萨尔浒大战中，四路明军有三路全军覆灭，皇太极全部参加了对这三路明军的战斗，且冲锋陷阵、指挥若定，有上佳之表现。后来每临战事，努尔哈赤都要特别叮嘱皇太极，不要到第一线去冲杀，以免意外。努尔哈赤认为皇太极就像是自己的眼珠子一样重要和宝贵，以至于爱如心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而且，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儿孙中，当时可能只有皇太极懂得满、蒙、汉三种语言和文字。这种情形表明，在文才智略、勇力武功上，皇太极可能都是最出色的一个。

当时的四小贝勒显然都远远无法和皇太极抗衡。

其中，阿济格时年二十二岁，据说除了厮杀打仗之外，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包括汗位皆无兴趣，在才能、智略、武功上都和皇太极相去甚远；多铎只有十二岁，得到一旗旗主的地位与财富，已经是游牧渔猎部族幼子守产制度的体现，应该没有更多的想法；济尔哈

朗则是阿敏的弟弟，同是舒尔哈齐的儿子、努尔哈赤的侄子，年龄虽长，却无竞争的优势。这里面，只有一个多尔衮，搅出了众多是非口舌来。而那么多的是非口舌其实大多是在入主中原前后，受帝王政治、儒家文化影响和心理因素所致，眼下暂且按下不表。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九月一日，皇太极在八和硕贝勒推举下，继位为汗。

在推举继承人时，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很轻易地就做出了选择。

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是青年一代将领，军功、才干、影响力都不低，岳托是掌管一旗的旗主贝勒，萨哈廉的地位同样很高，是议政贝勒，不可等闲视之。此二人认为皇太极“才德冠世”，“大家都很心悦诚服”，因此建议他们的父亲推举皇太极尽快接替汗位。

代善表示，自己早就有这个想法，“人心正合天意，不会有人反对”。于是，亲自出面找到二贝勒阿敏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征得他们的赞同后，代善又立即通报诸兄弟子侄。可以肯定的是，被通报的人应该主要是和硕贝勒们，自然也包括了多尔衮三兄弟。第二天，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劝进书，推举皇太极继位。有记载说，皇太极因为父亲没有立自己为继承人的遗命，而坚持拒绝。结果，双方从卯时，也就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一直折腾到申时，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了，皇太极终于同意继位。（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

对此，有无数流言、推测，历史典籍中也有诸多互相矛盾的记载和评论，主要就是指皇太极为了防止多尔衮在母亲大妃的支持下和自己争夺汗位，串通了其他几位贝勒，假造努尔哈赤遗言，逼迫大妃悬梁自尽，以此夺了自己弟弟的汗位；此外，则是追溯到六年前，认为努尔哈赤那位侍妾控告大妃与代善关系暧昧，根本就是皇太极一手策划和主使的，意在一箭三雕，将庶母大妃、哥哥代善和弟弟多尔

衮一举打掉等等。

这些说法，几乎没有任何史料的支持，基本出于极其富有想象力的臆测，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最为阴暗之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应该不仅仅是编造这些东西的文人心理阴暗与龌龊所致。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为此种想象提供了过于丰富的材料和过于肥沃的土壤；其二，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社会精英已经没有能力想象出以下情景，领袖人物可以通过众人推举产生，而不一定必须经过阴谋与暴力。

平心而论，对上述说辞，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有一个故事，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断章取义——

在力主皇太极阴谋夺位一说的学者那里，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说是皇太极好用权术，甚至布置阴谋准备取大哥代善的性命，逼得代善跑到努尔哈赤面前，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以求避祸。

乍听上去，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真实，觉得皇太极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连自己的大哥都要被他如此算计。殊不知，翻翻书就会发现，事情的原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大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一位来到后金的朝鲜使臣满浦佥使郑忠信记录过这个故事：

努尔哈赤有个从弟名叫阿敦，此人有勇有谋，在努尔哈赤部下诸将中表现突出。有一次，努尔哈赤私下问他：“你看哪个儿子可以接班？”阿敦回答说：“知子莫如父，别人不好说话。”努尔哈赤动员他：“唠嗑而已，但说无妨。”阿敦说道：“当然是智勇双全，人人都夸的那一个啦。”努尔哈赤说：“好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当时，他们两人指的都是皇太极。代善听说后，心里不可能感觉愉快。谁知，等他见到这个阿敦后，感觉到的就远远不仅仅是不愉快了。原因是，这个阿敦告诉他：“皇太极伙同莽古尔泰和阿济格，正在准备干掉你。时机紧迫，你应该有所防范！”就这样，发生了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的一幕。

可以想见，努尔哈赤必定是觉得难以置信。他立即将三个儿

子召来询问，三人也理所当然地否认此事。于是，怒火满腔的努尔哈赤把这个阿敦痛打了一顿，然后戴上镣铐，关进监狱，并罚没了全部家产。

就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在某些学者那里，除了代善跑到努尔哈赤面前痛哭之外，其他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一概黑不提白不提，然后一口咬定是皇太极阴谋陷害代善的铁证。甚至做出了皇太极为夺取汗位，阴谋策划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断言。我们知道，皇太极是三十五岁登上的汗位。按照这种说法，他应该在十九岁时就生活在阴谋策划之中，准备着干掉自己时年三十岁的大哥了。平心而论，做学问若是做到了这个份儿上，也的确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

从常识上判断，上述事情若真是皇太极所为的话，此人的确就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兼阴毒狠辣达于极致了。其大匠运斧不着痕迹之处，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深受其害的代善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联合所有的和硕贝勒们推举他来继承汗位。

须知，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已经成为后金国里资历、行辈最高者，他和他的儿子岳托分别掌管着两红旗，而当时的皇太极只是镶白旗一个旗的旗主。将代善的作为理解成害怕皇太极的报复是有些勉强的。何况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哥哥，他们二人各领一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分领两黄旗。他们任何两方联合起来，都比皇太极的实力强大。除非他们都是白痴，否则怎么会众口一词，将皇太极这么一个谋兄弑母的角色推上汗位？

这种说法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

如果代善多年受到皇太极的阴谋迫害，他那些拥有重兵重权不亚于皇太极且战功卓著的儿子，首先就应该愤愤不平才是，怎么反倒是他们先出来推举皇太极？

如果皇太极当年曾经串通莽古尔泰图谋过代善，如今又主导伪托努尔哈赤遗诏，串通其他三位大贝勒逼死大妃阿巴亥，并且杀人灭口，将当年在他指使下控告大妃的那个小妃子一起殉了葬的话，则必定形成他政治上的致命伤。阿敏是一个烧杀抢掠成瘾成性的家伙，

莽古尔泰则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敢亲手杀死，这么两个凶狠暴劣的人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情况下，当时他们每个人的权势差不多都与皇太极势均力敌。然而，当后来皇太极直取他们的权位名利时，居然手握利器却束手就范，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如果皇太极阴毒狠辣到如此登峰造极之地步，为什么又如脑子进水了一样，连斩草除根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在十七年执政岁月里，和他有杀母之仇、夺位之恨的多尔衮及其亲兄弟阿济格、多铎，偏偏受到了他的多方关照、栽培与重用。这条威胁最大的祸根被他扶植得树大根深，以至于在他死后，多尔衮有能力把他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摆弄得完全没有脾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推上皇位。

很难想象，一个靠阴谋和残忍夺取了汗位的人，会不明白这些已经涉及了最最根本的皇权继承问题。

晚年的皇太极身心交瘁，曾经多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表示忧虑。他执政十七年，有十一个儿子。除三个夭折之外，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漫长的执政岁月里，他曾经有意识地培养、扶植自己的哪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包括比多尔衮年长三岁，战功、实力、地位、威信都足够崇高，且事实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长子豪格。

除了推举制原则之外，对这一切，的确很难找到更加强有力、更能够自洽的解释。

面对这些，上帝很有可能在微微发笑，因为只有他老人家才知道，皇太极和持上述看法的人士究竟是谁的脑子进水了。

当然，文学艺术作品应是不在此列，因为这些作品的天职就是虚构和想象。

也许换一个角度思考，说不定更接近实际情况。譬如：在一些处于上升期、朝气蓬勃的团体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一种锐意进取、顾全大局的气象。从许多迹象判断，后金汗国应该说是具备此种气象的。努尔哈赤确立了推举制原则，皇太极又的确优秀，于是出现了这种局面。



中原士大夫们没有过这种理论与实践，想要他们准确理解并正确评论这种完全陌生的什么推举制之类的玩意儿，是挺难为他们的。于是对于皇太极继承汗位怀有最大善意的人们，也只能采纳如下解释——

当时，蒙古部族经常为王子起名叫王台吉，或者黄台吉、金台吉等，据说就是模仿汉语中“皇太子”的谐音。这“皇太子”三字，在女真语中发音便是“皇太极”。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天意早已预定；也有人认为，生下皇太极时，正值努尔哈赤最为宠爱皇太极的母亲之际，于是为他取了这么一个预示未来的名字。

也有人包括大清朝官方史书认为这些说法根本就是扯淡。姑且存疑。

事实上，上述说法是否正确，对于我们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皇太极已然被推举成为后金汗国的第二代汗王，他把自己的年号定为天聪，从第二年正月初一开始使用。

皇太极的即位典礼很有意思，证实前面曾经谈到的一些规定，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譬如，拜祭堂子——大清皇家萨满教神庙之后，拜神、拜天等等，一切如仪。然后，大家分别对天盟誓。皇太极盟誓的内容，主要是继承遗志，敬兄弟爱子侄，多行正义云云；代善等三大贝勒盟誓的内容大体是：合谋一致，奉皇太极继位，若心怀忌妒，损害汗位，将不得好死等等；其他兄弟子侄则发誓要谨遵父兄教诲，恪尽忠诚之类。

最富有特殊制度与文化意义的情节是：焚香盟誓之后，皇太极率领所有弟弟、子侄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行三拜大礼，表明彼此之间身份平等，并无君臣之别。最后，八和硕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百官群臣的叩贺。

至此，大礼成。

从此，我们就要称呼皇太极为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了。后金汗国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世代。

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

诚如一位明清史权威人物所说：创建大清朝的女真——满族，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们特别善于学习，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能战斗。至少在他们入主中原以前和入主中原之后很久一段时日里，的确如此。因此，曾经有人感叹：假如他们学习的不是明王朝的那一套，假如他们入主中原之时，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十七世纪前期和后来中国的面貌可能就会全然改观。

这只是感叹，假设对于历史毫无意义。

历史事实是，他们后来几乎全盘照搬了明朝的制度。其学习过程的认真程度，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

根据王族血统主义和推举制原则，皇太极顺利继承了努尔哈赤留下的后金汗国汗位。如今，他叫天聪汗，或者天聪皇帝。继位前后，皇太极做了几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可能都是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规定或交代的，看上去，却又很像是努尔哈赤的意思。

一件事情是，按照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皇太极提出，在推举新任汗王时，八大贝勒应该和参与议政的青年一代大臣将领共同协商。此议立即得到这批少壮派的拥护。这是一批在近些年的战争中，与皇太极一起冲杀在第一线，陆续脱颖而出并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正是这批人坚定地支持着皇太极的事业，使皇太极在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的相互钳制中，力量加大了许多。

努尔哈赤很有可能希望自己死后，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钳制平衡之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否则，很容易按照他的《汗谕》中所说，被弹劾撤换掉。但他临死时，只是将自己亲自带领的两黄旗人口、土地、财产、牛录分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他们兄弟并没有接任两

黄旗旗主。其他各旗的调整也没有进行。皇太极适时地提出，让三兄弟立即接任旗主，使这三兄弟十分喜悦。以前，皇太极本来只是镶白旗一旗旗主，如今，他模仿努尔哈赤自将两旗的做法，将两白旗全部拿到了自己手上。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史家语焉不详，以至于只能说“挟威独得”云云。推测起来，也许是援引努尔哈赤在世时汗王一人独领两旗的先例，把杜度所领的正白旗，收到了自己的手里。我们知道，杜度是褚英的儿子。而褚英之死与受到大家的一致厌恶有关。

这样一来，八旗旗主的格局演变为：皇太极一人独领两白旗，代善、岳托父子领两红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三人领两黄旗，阿敏与济尔哈朗哥儿俩领镶蓝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代善父子全力拥戴皇太极，阿济格除了厮杀打仗，对其他事情全无兴趣，多尔衮、多铎兄弟年纪尚小，显然，皇太极的声威立刻就大为不同了。

与前一件事情相关，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在不变更人口、土地、财产等任何东西的条件下，获得诸贝勒默许，也得到了三兄弟同意，用他自己的两白旗旗色，将努尔哈赤按照“幼子守产”制度留给自己的“未分家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两黄旗旗色，换到自己手中。

与前一件事情比较起来，这似乎是件小事，其实，却有深意在焉。据说，黄色是“汗”色，“黄衣称朕”，黄色乃皇家专用之色。皇太极重用汉臣，在历史上似有定论，更在近年被颂为一大功德。很有可能，这就是他重用的汉人谋臣在他继位后，为他谋划的第一个主意。

中国人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皇太极名分已正，颜色哪里可以不正？颜色不正岂不就是言不顺？言不顺不就事不成了吗？显然，关于颜色所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在我们祖先那儿早已明了，今日发明此学说的欧美人的祖先那时说不定还在树上呢。

汉人谋臣的智慧，若只能停留在这种纤芥毫末上，就太委屈

他们的才华了。有证据显示，在此后诸多军国大计的制定与实施上，都活跃着他们脑力劳动的成果。

继位后，皇太极面对的各方面情势，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

譬如，西南方向，袁崇焕一夫当关，号称独卧宁远孤城，挡住了后金汗国通向山海关、走进大明朝的道路。宁远保卫战一役，袁崇焕脱颖而出，成为帝国东北方向的擎天一柱，令大明帝国东方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露出了鼓舞人心士气的霞光曙色，甚至导致后金汗国战略与外交全线陷入“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原因来自他的两个最重要邻居——朝鲜和蒙古各部族。

东南方向的朝鲜，是大明帝国最可信赖的盟友，多年来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明朝一边，态度强硬得仿佛孪生兄弟一般。一次，朝鲜国王派了一个使臣到后金来，努尔哈赤问那使节：“你们口口声声管我叫贼，到底是为什么？”那使节很机敏地反问：“你有盗天下为己有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众人大笑而罢。（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十一）

朝鲜对后金汗国始终保持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要不然就是苦口婆心地劝告努尔哈赤向明朝低头认错等等。假如不是害怕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导致腹背受敌的话，努尔哈赤可能早就跨过鸭绿江去了。

如今，宁远之役结束后，朝鲜国王已经又一次与明朝默契配合，屯兵鸭绿江边，似乎随时准备将手抚到后金汗国的背上来。北部和西北方向，则是时好时坏、时和时掰的蒙古各部族。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虽然已经没有了乃祖的风范，却时常聚啸成群，来去如风，不论是对大明帝国，还是对后金汗国，统统构成了一股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

比如喀尔喀五部，本来和后金汗国早就结下盟约。如今，一看努尔哈赤吃了败仗，幸灾乐祸之余，很快就和察哈尔林丹汗和解，又靠到明朝那边去了。当年，努尔哈赤拿下广宁时，王化贞和熊廷弼扔下关外数百里土地，一直退进了山海关。努尔哈赤投鼠忌器，无论

如何弄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他担心战线拉得过长，竟然把到手的广大肥田沃土同样弃之不顾。结果，这些蒙古部落乘虚而入，用这些土地从大明朝和袁崇焕手中换了大笔银两。

据说，努尔哈赤活着时，对此就曾经后悔不迭。如今一想起这些，皇太极的心可能仍然还在流血。若不是父汗过于谨慎，当初一步走错，宁远城应该已经是后金汗国攻打山海关的前进基地了。

这些，虽然令人寝食难安，却还不算心腹大患。

对于皇太极来说，真正麻烦的不在外面虎视狼顾，强敌环伺，而是在自己的肘腋心腹之间，在后金国内部。

皇太极对他的臣子说：“治国之道，就和盖房子是一个道理：打牢基础，再选用好材料，就一定不会早早倒塌，子子孙孙且住着呢。要是偷工减料，凡事凑合，不塌才怪。”（《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皇太极所说的地基，大体上说的就是民心民意；所谓好材料，则可以理解成是人才和制度吧。

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比例，汉族人口大约占90%左右，女真、蒙古族、朝鲜族等占10%。努尔哈赤占领辽东首府辽阳以后，曾经对当地人民发布训令说：“你们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我们只是暂时占领，这是妄想。要是真这么想，你们就是自取灭亡。”（金梁《满洲秘档》）基于此种理念，努尔哈赤打完萨尔浒大战，于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历次大型战役之后，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种族灭绝式屠杀。而且，那些刀下逃出性命的人，也被当作战利品，“分配给披甲人为奴”——就是给八旗将士们充当奴隶。

按照努尔哈赤“编汉为奴”政策，每十三个成年汉族男子编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的80%供应这些人自己食用，20%上交官家。然后，按照满族官员的级别分别将这些庄子赏赐给他们，就连最低的备御，即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牛录，其职权大约介于今天的营连长之间，也都赏赐一庄。于是，这些庄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据说，在他们的主子面前，这些庄丁很惨，大体上处于予取予求皆听凭主子的地步。



当时的汉官处境也相当凄惨。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范文程，虽然满腹经纶，却也只是混到了汉语办事员的样子，如偏房弃妇般备受冷落，远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愿意相信的那般被待若上宾、言听计从如诸葛军师一样，这种可悲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皇太极继位。

有资料显示，这些汉族官员被分配给各贝勒大臣管辖，极少有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的机会，因为除了努尔哈赤等少数几人之外，太多的满族王公大臣听不懂汉语。于是，这些同样听不懂女真语的汉族官员，便时常需要面对满洲主子们的嘲笑、臭骂和殴打了。有一种记载甚至谈道：他们的财产时常被管辖他们的人强行索取，他们的马匹不能由他们自己骑用，而要交由满族官员骑用；他们的牲畜可能被满族官员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他们死后，妻子儿女便要入满官家中为奴；而他们生前，粮食经常不够吃，要靠出卖家产、典当财物糊口。（《清太宗实录》卷十七）

从一些记载中判断，当时，汉人乃至汉官成年的女儿和年轻些的妻子，可能没有身心不受到暴力侵犯的权利。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吧，就是说：如果八旗勇士强奸了汉人的妻子女儿的话，在努尔哈赤当汗王的十几年时间，甚至再长一些时间里，是可以不受惩罚的。这种情形之悲惨，已经将深受孔孟之道、礼义廉耻之类熏染的汉族士大夫们的廉耻心，都剥得干干净净。

于是，就连皇太极都发出过如下感慨：这些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

同样，此种情形不可能不引发切齿痛恨。满族人聚居地方的水井被投毒；吃的咸盐当中被掺拌毒药；有的则把猪毒死后，将肉卖给满族人吃等等。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了不止三次五次，最后严重到了要由后金汗国的国家元首下令：所有店铺的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店铺前面，凡满族妇女购买食物时，要将店主的名字记录下来，以便出事之后搜索。

于是，事情开始起变化。

当时满族人经常遭到袭击。凤凰城（今天辽宁省丹东市）治下，一个满族人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不知被谁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当场毙命；某牛录中的两个人到盖州，就是（今天辽宁省盖县）去出差，莫名其妙被杀死；有三个满族人去广宁（今天辽宁省北镇县）办事，也死在光天化日之下。

于是，努尔哈赤又下令：从今以后，不许单身行走，必须十人以上结伴而行，否则罚银子若干。同时，严厉处置肇事汉人，常常牵连杀死的不仅仅是肇事者一人而已，而是成家成族地处死。

就这样，努尔哈赤终于用他的铁血政策，促使辽东地区人民开始了接连不断的大面积暴动。本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造不起反来的意思。如今，从天命六年开始，到努尔哈赤死掉的天命十一年，先是金州（今天辽宁省金县），偏偏是两个最胆小怕事的秀才，聚集了十个人“合谋作乱”。（金梁《满洲秘档》，爱塔建功）然后数年间，干柴烈火一样：镇江（今天辽宁省丹东附近）、复州（今辽宁省复县）、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汤站、险山、鞍山、首山、十三山、彰义等至少十余地发生暴动。

努尔哈赤的反应，则是格杀勿论。

到天命十年十月，就是此人临死前十个月，他更是下令：备御一律要严密搜查各自的村庄，对于那些叛逆之人，一经发觉，他们有权立即斩杀，特别是那些明朝革职在家闲居的旧官吏、读书人、秀才、乡绅等，煽动闹事的可能就是他们，因此，对于上述人等，要一律处死。这项命令，直到努尔哈赤死去时，可能还依然在被执行之中。

显然，这种政策大体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通过杀人来自杀的政策。其愚蠢其严酷其残暴，必定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全都痛苦不堪。

到公元1627年春天，也就是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的春天，皇太极继位半年之后，努尔哈赤铁血政策的恶果已经彰显

无遗。

暴政和战争一样，最先消灭的必定是一个民族中最优秀、最精华、最富于进取精神与活力，而且最健康的青壮年部分。为了避免悲惨的命运，这些青壮年人口开始大量出逃。逐年累积的结果，则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而天灾也在此时适时而至。于是后金汗国“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一斗米卖到了八两白银。

用不够精确的算法折算下来，这个价钱，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大米卖到了160元人民币一斤。

就这样，一向堪称富庶的辽东地区出现了“人相食”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偷盗风行于世，凶杀、抢劫也已见惯不怪。当时，有人建议皇太极采取严厉手段予以镇压。皇太极叹息道：“老百姓要饿死了，所以才偷才抢啊。”（王先谦《东华录》）因此，他一再下令，不许使用暴力镇压，而是要推行民族和解政策。平心而论，在我国数千年帝王制度下，如此明白事理的皇帝并不是特别多。

皇太极采取的措施温和而又坚定。他派人丈量土地，把各处多出来的土地归公，不许再立庄田，然后，下令将原来编为一庄赐给一个牛录——备御的十三个汉族壮丁加上七头牛，改为八个壮丁加上两头牛。将其余多出来的壮丁编为民户，安置到那些丈量后多出来的土地上去，恢复了他们自由农民的身份。再然后，则是派遣汉族官员前去管理，减少了种族间的荼毒与仇恨。（《清太宗实录》卷一）

与历史上匈奴、突厥等游牧渔猎部族一样，女真的后金汗国同样依靠战争和抢掠为其获得奴隶与财富的主要途径，这也是这些部族成不了气候的主要原因。历史记载显示，“后金国开国之初，俘掠的辽东之民，全部变成了满族的奴隶”一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昭梿《啸亭杂录》）而化奴为民、化解种族间的仇恨、逐步加大自由民的数量、减少编民为奴的人口，越来越严厉地限制满族人歧视、荼毒其他民族等等政策，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实行的。此后，在他执政的十七年间，其国政大体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若没有这一条，后金汗国想发展壮大，最后走进中原，可能

就会像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统一东北一样，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表明，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他执政的中后期，史料中已经开始颂扬："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因为皇太极的这些政策，辽东汉人安居乐业，大家开始传颂这儿是一片乐土了。

在选拔和使用汉族人才方面，皇太极做得就不是一般的好了，他的作为可以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帝王比肩。

譬如范文程，他的先祖是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经写下过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使一篇《岳阳楼记》成为千古绝唱。范文程的曾祖父高居大明兵部尚书之位，祖父和父亲在辽东为官，这才落籍当时的沈阳县。

范文程是在抚顺战役后来到后金国的，或是第一个既有大明官僚家世背景，又有学历背景，却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知识分子。这十分不容易。

当时，在大明帝国君臣眼中，努尔哈赤是十恶不赦的叛逆，是跳梁小丑，失败了之后是要凌迟处死、诛九族的贼酋。假如不是富有胆识魄力，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并且看透了大明帝国的腐烂，从而彻底失望的话，很难想象这么一个读了一肚子诗书的人，竟然会去投了贼。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这简直比一个沉鱼落雁、冰清玉洁的女孩儿，偏偏死心塌地爱上了一个小流氓，还要令人惋惜，还要不可原谅，还要令人怒不可遏。



范文程来投之后，据说努尔哈赤很高兴，当场对大家说："他是名臣子孙，咱们要好好待他。"于是，一时间，诸王贝勒竞相优待有加。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令范文程着实混了一副好下水。可是，时间一长，这帮子只有在马背驰骋、刀头舔血和女人肚皮上才会感觉快乐的凶猛战士，包括努尔哈赤，可能觉得和这位名人之后在一起厮混，实在无聊乏味得很，于是，就把这位满腹经纶、不用出家门便知天下事的秀才安置在一个章京的位子上，一放就放了八年。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

搞得范文程在八年时间里，大约都好生无趣，相当寂寞，直到努尔哈赤死后。

皇太极继位后，很快把范文程找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

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称之；每逢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会问：“此事范章京知道否？”臣子的奏议若有不当之处，皇太极便会建议他：“何不去找范章京商量商量？”倘若奏事大臣回答：“此事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会立即批准按照范章京同意的去做。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皇太极对于范文程的信任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史书中记载了不少这一对君臣之间知音默契的事迹，的确十分动人。据说，皇太极时常将范文程召进宫中议事，这种议事经常长达几个时辰。我们知道，一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一对君臣时常会在一起商讨事情达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有时，范文程深夜时分方才离开宫中，回到家中刚刚歇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入宫议事。在我国历史上，皇帝若能白天正常工作，已属帝国臣民之万幸。君臣如此夙兴夜寐，除了皇太极的死对头崇祯皇帝之外，国家能够不兴旺发达的，倒是不太多见。

有一次，皇太极为了犒劳范章京，让范文程陪自己吃饭，饭菜极为丰盛，有不少“殊方珍味”，可以理解成是很罕见的地方土特产、山珍海味等等。范文程迟迟不动筷子。皇太极一看，立即下令将这桌子美味撤下去，火速送到范章京府上，赏赐给范文程的父亲和全家吃。范文程则向皇太极拜谢如仪。

皇太极至矣尽矣。当年刘先主与诸葛孔明之间的际遇也不过如此。

一般说来，但凡正派和有出息一点的中国读书人，一生中都



在期盼的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的风云际会，头悬梁锥刺骨一生只为这一天。他们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头脑，没有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没有“天下王侯千千万万、贝多芬只有我一个”那种人类觉醒后的气概。他们之中的那些最优秀分子，讲究的却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讲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讲究若以国士待之则必以国士报之，讲究虽千万人吾往矣，讲究为酬答知己则生死以之……

作为大清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对于皇太极、对于大清国，也算是呕心沥血、肝脑涂地了。从后金汗国到大清国到入主中原，当时中国历史的每一步重大发展，似乎都能看到这位范章京的影子。袁崇焕的死，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但最初的那个反间计，可能就是他帮皇太极出的主意。皇太极死后，范文程在历史发展极为关键的时刻，给多尔衮写了一封信，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力，为多尔衮指明了方向。平心而论，这封信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恐怕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如果没有这封信，那帮大清贝勒、大人老爷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呢。

在努尔哈赤的铁血政策下，太多辽东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读书人为了逃避屠杀，隐名埋姓，沦为奴仆。皇太极下令，以科举考试的名义，在这些奴隶中选拔富有学识的人，并严令不许任何王公亲贵阻拦他们手下的奴隶参加考试。结果，数百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被充实进各级政府部门。其中，就包括了前清时代的名臣，如宁完我等人。

发生在祖大寿身上的故事则应该算是另一类典型——

与北宋末年出身于显赫的军人世家、自己也成为优秀军人的种师道一样，帝国著名将领祖大寿，出身于大明晚期的祖氏家族。这也是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帝国优秀的高级将领中，好几位都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来的。那位当时威名赫赫备受尊敬、后来名声坏到了极点的吴三桂，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军人，皇太极对祖大寿很欣赏，可能是惺





惺相惜，也可能是为了做给其他祖氏家族的军人看。

大凌河保卫战中，祖大寿弹尽粮绝，不要说军马，全城军民连草根、树皮、皮甲也都全数吃光、木头柴火烧光了，已经开始用死人骨头作柴、烧着吃老人和孩子了。为了保全追随自己的一万多军民，祖大寿硬着心肠杀死一位誓死不降的助手何可刚，投降了皇太极。然后，又欺骗皇太极，说是要回去招降自己的部下亲族，皇太极同意了。结果，祖大寿跑回明军防地锦州后，再无下文。十余年过去了，在松锦大会战中，祖大寿又一次弹尽粮绝，再一次落到皇太极手中，皇太极依然给予了这位虽然欺骗过自己但确是一位好汉的败军之将以极高礼遇。

当时，两次和祖大寿在一起的还有副将祖泽远。祖泽远面对皇太极，恐惧至极，因为他不但上次违背诺言，和祖大寿一起骗了皇太极，而且在后来两军对阵时，还曾经专门将炮口对准了皇太极轰击。皇太极对于惶恐得要死的祖泽远表现得挺大度，说："你明知道是我，还要对我开炮，的确是太对不起我，太过分了。不然我也不会说你。我对人有什么看法，总是要在心里反复掂量，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过去了就再也不存在心里。你年轻，以后好好干吧，就算是报答我了。"据说，祖泽远感动得泪流满面。（王先谦《东华录》）

这种事情，说说容易，口头上似乎谁都不难做到，若事到临头真的要去做时，可就并不那么简单了。

天聪四年、大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攻打永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时，大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捉，审讯后定为死罪。皇太极说："既然他不愿意留在这儿，就放他回原籍去好了。"结果，不但没杀他，还给了他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带着妻子家人，去他随便想去的任何地方。（《清太宗实录》卷六）

皇太极有一个极有东北或者中国特色的规定：凡有大明官员来降，八旗旗主必须轮番设宴款待，每五天举行大宴一次。届时，宰

牲设宴，觥筹交错，酒喝到一定程度，大家其乐也融融，以至于整个沈阳城都仿佛喝醉了一般，到处是摇摇晃晃的酒鬼，到后来，由于来降的汉官过多，一天之内常常要开宴会数次，并屡有赏赐：房屋、土地、牲畜、衣物、财帛等等。甚至发生过令满族官员腾出房子，让来降汉官居住的情事。他不止一次对王公贝勒们讲：朕对于这些汉官不吝赏赐，不厌其烦，就是为了让人心悦诚服，以图大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只有多得到人才才是最可喜的。金银珠宝都有用完的时候，要是得到一两个贤能之人，对国家有帮助，那带来的好处可就无穷无尽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七）有证据显示，当时，许多汉族官员所享受的待遇和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同级别的满族官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政策，皇太极制定法律，严厉惩处随意戕害汉人的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自杀害降民者，以死偿命；强取民物者，加倍赔偿。”（《清太宗实录》卷五）为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并当面告诉没有严格执行该法令的贝勒爷：若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将被视为作乱祸首，连同妻子一律处死，绝不姑息。（《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二贝勒阿敏之所以倒霉，应该说，和皇太极的此种思路不无干系。

仔细翻检史料，平心而论，找不出皇太极做这些事情时心理阴暗、龌龊的证据。他做得坦诚、磊落，其胸怀与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比较起来，似乎也不遑多让。倘若没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怀、雄心和抱负，恐怕是断然做不到的。与努尔哈赤比较起来，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的这些做法，的确令当时的许多汉官心悦诚服，甚至达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万一也”。（《清太宗实录》卷十七）话说得虽然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过，可能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特别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国崇祯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种的臣子如猪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则更加令人无法不感慨万千了。

观察历代国家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不承认，那种能够令近

者悦，令远者来的情形，是一种很高的治国境界。从史料中看，短短的时日里，皇太极还真的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继位之后，对内大力调整方针政策；对外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则是出兵朝鲜。

从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登极，到当年十月，一个多月时间里，朝鲜作为邻国，没有派人来吊唁亡灵，也不前来祝贺新汗登基，相反，接纳了数量可观的从后金国出逃的辽东汉人，据朝鲜史料记载，前后可能达到数十万人，仅价川一地即达三千多人。（《李朝实录》仁祖卷十四）这些人，在努尔哈赤编汉为奴的政策下从自由民变成奴隶，然后，不堪忍受而出逃，于是就成了前清极为有名的所谓“逃人”。为此，后金汗国和后来的大清国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力图以严刑酷法遏制他们逃亡，并一直蔓延到清军入关之后很多年，成为前清时代名副其实的恶政与恶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经在历史上特别声名狼藉，这些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时，后金汗国与朝鲜交涉，要求朝鲜将这些“逃人”一概驱逐回来。朝鲜置之不理，将这些逃过鸭绿江的辽东汉人遣送给了明朝。对此，皇太极感受到的肯定不仅仅是轻蔑，还有利益上的重大损失，因为这些人全部是满族人的奴隶，刚刚继位的皇太极在自己必须承受损失的同时，还必须承受这些满族人士的抱怨与压力。

以往，努尔哈赤时代曾经数次有过出兵朝鲜的动议，最后均未实施。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避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二是没有现实利益上的压力和考虑。如今，和袁崇焕议和，解除了战略上的顾虑；王公贝勒们又正因为“逃人”的损失怨气冲天，此刻出兵朝鲜，立即可以得到这帮家伙的好感与拥戴，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于我。大约这是皇太极将自己继位后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锁定在朝鲜的原因。而且据说努尔哈赤临死时，也曾经嘱咐那几大贝勒，要把解决朝鲜问题放在第一优先考虑。

另外一个原因，对于皇太极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长期以来，朝鲜国王一直允许明朝的军队驻扎在自己的领土上，并在物资、粮草、军事装备器具上很慷慨地给予支持。而后金汗国但凡想向朝鲜通融点什么时，朝鲜全都推三阻四。翻开历史地图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大将毛文龙率部所驻的皮岛，距离后金汗国简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龙不停地在东部侧后翼出兵袭扰，甚至时不时就会打到距离沈阳只有百十里地之处，打完后便登舟扬帆而去，致使后金汗国多年不敢专心致志地西向前进。（《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传）此次，皇太极重拳出击，就是希望一石二鸟"两图之"：既制裁朝鲜，又打击明朝毛文龙的部队，捎带着安抚笼络人心。（事见《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并用掠夺来的物资缓解经济上的窘迫局势。这一点，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战争结束后，双方已经约为兄弟之国。阿敏仍然纵兵在朝鲜大肆抢掠。其间，皇太极曾经给过他一封急信，表现出后金汗国对物资的极度需求。皇太极在信中殷切叮嘱阿敏，赶快清点抢来的粮食数量，以便派人前去搬运云云。可见，其经济状况已经到了不抢劫便很难维持的地步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继位四个月零八天，刚过完春节，皇太极就派遣三万大军，在堂哥阿敏率领下，征伐朝鲜。

此时的朝鲜，其内政不修的程度，和其铁哥们儿般的坚强盟友大明帝国差相仿佛。从打完萨尔浒大战开始，朝鲜国内的有识之士就预见：未来，朝鲜在努尔哈赤那儿会遇到大麻烦。无奈，朝鲜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开始时，朝鲜毫无准备，他们希望大明朝如三十多年前的抗倭援朝一般，再来一次抗金援朝。

殊不知，此时的大明朝早已不是彼时的大明朝，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力量照顾别人？其实，大明朝应该比谁都懂得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他们也应该比谁都清楚，没有人能够像朝鲜那样连自身安危都不顾，坚定地相信并站在自己一方，给予了后金汗国

极大的牵制。可是，他们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只有在经历过这种情势之后，人们才会辛酸地明白，一个残破而腐烂的大国，将会如何地对不住那些全心全意信任自己的兄弟。

而朝鲜自己，此时也腐败得可以。国王身边最亲近的大臣们，不是闻风而逃，就是称病在家，要不然就给自己找到了海岛、山城之类的差使，史书记载说：这帮家伙纷纷抢占了“便安自全”之地。而那位受命抗敌的大臣，则在接受任命，向国王辞行之后，走了七天，才走到离京城并不太远的开城。（《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

这场战争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没有什么悬念，大体上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之类词形容。朝鲜自己的史料以一种似赞叹、似犹有余悸的口吻记载道：八旗“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息之程”。（《李朝实录》，仁祖卷十五）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长驱直入，除了表明这个国家腐烂的程度之外，很难说明其他东西。

三月初三日，两国按照满洲习俗，举行了会盟仪式：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自装在容器里，然后焚香，双方各自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焚烧给上天，把祭品深埋入大地。誓约中，双方约为永远的兄弟之国，后金为兄，朝鲜为弟；朝鲜要断绝与明朝的关系；要将后金汗国的“逃人”如数送回去；春秋两季和元旦，朝鲜弟弟要向后金哥哥纳贡，后金哥哥则需给朝鲜弟弟回礼等等。

这个兄弟之约十分勉强，双方可能在盟誓时，就在想着怎样违背誓约了。但是过去，皇太极面对大明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朝鲜；面对朝鲜时，侧后翼便暴露给了大明。此时，通过这个哪怕只是徒有虚表，但却远胜于无的盟约，在面对朝鲜的一翼，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近十年无战事的时间。

当时，后金汗国的领兵主将阿敏烧杀抢掠已经成癖成瘾，明明双方已经结成兄弟之邦，他这个做“哥哥”的却以自己并没有亲自

参加该盟誓为理由，下令部队在“弟弟”的土地上大索三日，就是命令部队连续烧杀抢掠三天的意思。然后，带着“弟弟”的财物、牛羊、妻子女儿胜利返乡。回到沈阳后，阿敏把一个从“弟弟”那儿抢来的漂亮朝鲜女孩儿，送给了自己真正的汗王弟弟，过了没几天，又觉得实在舍不得，想跟弟弟要回来。搞得皇太极也觉得好生无趣，说：哪里可以因为一个女子而影响了兄弟情分？于是，下令把这女孩儿嫁给了一个作战勇敢的青年军官，弄得阿敏大发雷霆又毫无办法。

另一方面，朝鲜君臣则满腔悲愤，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好好对待过这个蛮不讲理又惹不起的大哥。八旗兵撤走后，他们似乎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哥哥”似的，既不遣返“逃人”，也没断绝和明朝的来往，纳的贡不是种类不全，就是数量不足。那一年，后金汗国是个灾荒年景，十二月，皇太极派人去朝鲜传达谕旨，要他们低价出卖粮食，帮助归降的蒙古部落度荒。朝鲜哼哼唧唧拖来拖去，费了极大的劲儿，最后终于平价卖出了一千石粮食。而在此前后，供给驻扎在朝鲜的明朝军队时，国王虽然也不是特别痛快，却也一次就无偿拿出了一万石。和皇太极结成兄弟之邦后，朝鲜国王照旧允许明军在朝鲜屯垦，拨给船只，供应粮食。而皇太极派来和国王商量借船借粮的使臣，连续三天见不到国王，直到最后，两样东西一样也没借到。后来，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在山东举兵叛乱，航海前来投奔后金汗国时，朝鲜竟公然出兵帮助明军截杀叛军。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大明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去，由于没有子嗣，他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当年九月，朝鲜国王就向刚刚继位的大明皇帝通报了与后金汗国盟誓的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形容成是“羁縻之术”，意思就是说：为了制服野牛，既要给它串牛鼻绳，也要给它喂饲料的意思。难为这一对难兄难弟，就连矫情做作的功夫都一模一样。

谁知，这位对自己臣子极尽锋锐刻薄的十七岁小皇帝，对盟国的元首倒是十分体贴。崇祯皇帝颁发谕旨给朝鲜国王，勉励他要畜

养威武，励节弥坚。就是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意思。

有了大明皇帝的支持，朝鲜国王十分感奋，继续坚持大明第一，后金第二，以明为君，以金为兄的外交路线，并在写给皇太极的国书中，差不多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他履行盟誓、与明朝绝交的要求。此后，两个兄弟之邦的国家间麻烦不断，从重大的原则立场，到鸡毛蒜皮，几乎没有一件是能够顺利解决的。皇太极烦不胜烦，差不多又要忍无可忍了。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汗国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二月，随着皇太极准备将大金国改为大清国，一批满贝勒汉高官和蒙古诸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请他派宗室子弟来沈阳，大家一起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一位特使为此率领一个一百七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来到朝鲜京城，希望不管怎样，只要能够让朝鲜承认皇太极的皇帝地位就好。结果，该代表团一进入朝鲜，就被监视起来，驻地周围也被军队严防死守，一出门，就要陷入围观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时不时就要挨几下砖头瓦块。代表团长绝望了，深知不但难以达成使命，恐怕就连基本的体面都难保住，遂率全团不辞而别。朝鲜国王既不劝阻，也不欢送，只是派人追上使团，命其将写给皇太极的国书带走，同时，下令全国动员，准备战争。

同年四月，皇太极举行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将国号的汉语称呼大金改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元年。从此，后金汗国的天聪汗皇太极成了大清帝国的崇德皇帝、清太宗皇太极。

据说，大金和大清只是汉字不同，在满文中是一个字，在满语中的发音也一模一样。有一种说法认为，皇太极志在天下，方有这中文的一字之变，以防止中原人民将对宋时大金国的深刻恶感，转移到如今的大清国身上来。为此，皇太极还在写给大明帝国皇帝的信件中，专门申明自己和当年的大金是两回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又据说，在整个盛大典礼中，所有外国来宾和使节中，只有朝鲜使臣拒绝参拜，不行大礼，为此，甚至和皇太极负责礼宾的部下们撕扯起来。急于表现对皇帝无限忠诚的礼宾官员们推搡殴打这些外

国使节，揌着他们的脑袋，强行让他们下跪。这些朝鲜外交官“衣冠尽破，虽或颠仆，终不屈腰”。就是说，他们的衣服被撕坏，人被打翻在地，却始终不肯屈膝。这些朝鲜使节公然宣称：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大明皇帝，不知道还有其他皇帝。为此，皇太极切齿痛恨，曰：“朝鲜国王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由此，下定了再征朝鲜的决心。

此时，朝鲜国王殷切期盼大明帝国皇帝能够像当年鼓励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励节弥坚之后，出兵干掉大清国。可惜，大明皇帝只是给他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帮助他视察防务，共同制订防御战略，并给他带来了许多鼓励的言辞。除此，没有一兵一卒。

当年十二月一日，改大金为大清、正式称帝半年多的皇太极，御驾亲征朝鲜。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朝鲜军民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仍然拼死抵抗，用鲜血和生命坚持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朝鲜都城被围困四十七个日夜，京城附近和京城以北之各道、州城全被践踏破碎，变成废墟。蒙古八旗攻取咸镜道，一路死者遍地，房屋尽毁为灰烬，数月之后，犹不闻鸡犬之声，三年以后，方才又见人烟。最后，朝鲜国王宣布投降，并经受了极大侮辱。

当时，皇太极要求朝鲜国王必须举行投降典礼。于是在京城郊外的汉江边上，背山面水筑受降台。正月三十日，朝鲜国王在满城痛哭声中，出西门，来到受降台下的后金大帐。从大帐直到受降台边，两旁站立着数百名身穿艳丽服装的朝鲜美女，泪眼婆娑地注视着她们的国王亦步亦趋走向受降台，向皇太极行君臣大礼并谢罪。

和上次战争一样，早已没有了袁崇焕的大明帝国这一次也是毫无作为，毫无悬念。战争进行的时间表也差不多，正好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所有军事、政治、外交行动。

不同的是，这一次，朝鲜被后金汗国彻底征服了，双方由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还有一个不同是：皇太极下令班师回銮时，朝鲜国王率群臣出京城十里跪送。

朝鲜这回真的成了大清国的附属国。从此，大明帝国的忠实



属国，变成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信得过并给予自己有力支持与援助的朋友了，哪怕是声援都没有了。非但如此，那只顾自己、置朋友于危难之中而不顾的巴掌，现在必然地打回到了自己的脸上：在未来大清对大明的战争中，朝鲜每次都要出兵、出军马钱粮帮助大清来打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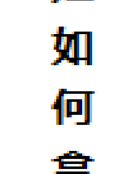
战争结束后，朝鲜几位力主抗金的大臣被交给了皇太极。这些大臣坚贞不屈，至死不向皇太极屈膝下跪，并口口声声称后金汗国使臣为“胡差”，称后金汗国为“贼奴”，称后金汗国的书信为“虏书”，甚至称皇太极为“贼酋”。他们在皇太极面前侃侃而谈，坚持认为只有大明朝才是天朝，只有大明皇帝才有资格称为天子，后金汗国不过是寇虏、是夷狄之邦而已，哪怕就是入主了中原，也绝无百年气运。史书记载说，皇太极盛怒，将这几位志士斩之；然而，气却不能不为之所夺。

战后，皇太极命令汉军八旗和投降的朝鲜水师围剿留在朝鲜的大明军队，战斗进行了数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此役，驻朝明军全军覆没，战死者共计四万七千余人，被俘者约三千人。这些战俘最后全部被朝鲜军队杀死，而且据说杀戮得极其惨烈。

史书记载，当时受刑者大呼：“我大明天朝有什么对不起你们朝鲜，你们这么对待我们？”行刑者告诉他们说：“朝鲜对大明朝忠贞不贰，仁至义尽；而大明朝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实乃猪狗不如。”

就此，大明帝国，终于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了。

只是，不管朝鲜变成了什么，大明帝国已经都顾不得了。事实上，此时大明帝国皇帝的苦恼，决不会比朝鲜国王的更少。他一再痛苦地发现：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自己摆脱那恼人的境地。



第八章 袁崇焕炮轰皇太极

平心而论，努尔哈赤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他向大明帝国挑战时，他和他的敌人都不知道，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实际上是差了整整一个时代。努尔哈赤和他的战友们使用的全部是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国已经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近代意义上的枪和炮。努尔哈赤的幸运之处在于，掌握这些枪炮的是大明帝国军队。否则，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火器的政府和军队的话，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对付美洲土著那样，努尔哈赤们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从现有资料判断，西洋枪炮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纪年则大约为公元1510年前后。时人称之为佛郎机炮，原因是这种火器由葡萄牙人传入，当时中国人称呼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不久，荷兰人又带来了红夷大炮，当时广东福建一代沿海民间称呼荷兰人为“红毛番”，写成文言谓之“红夷”，他们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红夷大炮”。后来，中国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进口了一批西洋人制造的这种大炮，被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披红挂绿宣示于人，就被北方民间亲热地误称为“红衣大炮”。这些大大小小的枪炮和倭寇带来的鸟铳枪，大体上都属于西洋火器之属。

到努尔哈赤发起抚顺之战、正式向大明帝国开战的1618年，西洋枪炮引进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翻检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在袁崇焕之前，偌大的一个中国，似乎只有三四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这种将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武器。这些人是戚继光、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中相对详尽地研究了那些当时最为重要的枪炮火器。这些枪炮火器在后来的世代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烦恼。而透过戚继光的这些研究，我们则

大体上可以窥见这位常胜将军面对这些先进武器时也曾经有过的无穷烦恼。

譬如，由于帝国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觉和一言难尽的管理制度，这些先进武器的制造过程，时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之中。其制成品在材料使用、枪身长短、口径大小、枪管薄厚、内壁光滑与否等等技术指标上，没有统一标准，基本是各行其是：

——选用材料时，没有统一的质量要求，来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坏，由验收的官员决定。如果这位官员觉得好，从地方上解运东西来的人便可以顺利交差；如果这位官员认为不好，来人的麻烦就大了，其损失可能是多方面的，从时间、金钱，到政绩、仕途。于是，彼此心照不宣，东西好坏是次要的，只要能够搞定这位官员，将东西顺利入库，便大家都是好东西，从而万事大吉；

——制作过程则大体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着差不多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据工匠工作时的情形决定，如心情好或者坏，工作时正巧想认真做点儿事情或者刚好没有心情做事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上述的技术质量等等指标；

——制成品的验收入库则由专门的太监机构负责，其运作原理和前面谈到的材料选用大体一致。只是这里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员变成了宦官太监。

制作的随意使这种杀人利器在实战应用时的效果大成疑问。其最显著的后果是，使用这种武器的士兵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会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记载说，为了对付努尔哈赤，天启皇帝在位时，曾经郑重其事地督促有关部门，仿造西洋样式制造了一批枪炮。制作成功后，专门举行献宝典礼向皇帝报喜，并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结果，为保证一次试射成功而千挑万选出来的枪，在天启皇帝兴致勃勃地注视下，轰然爆炸在那位射击的战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枪身的手立即被炸飞到了天上，一时间，血肉模糊。

徐光启是大明帝国晚期名臣，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位大科学



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是由他推荐给崇祯皇帝，并从而进入中国历史的。天启皇帝在位时，徐光启官居礼部侍郎，崇祯皇帝继位后他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贸工作的内阁副首相。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徐光启发挥过重大影响，同时，他极力主张引进西洋枪炮并大力吸收发展之。为此，他和他的学生孙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动最新技术的引进。他曾经黯然神伤地谈到过：由于时常受到工匠们的欺瞒，有关部门督造的枪炮经常炸膛，事故发生时，每每伤害极惨，使之变成让人闻而色变的危险物件。

同一时期，还有更加让人悲伤的记载：在帝国官场的倾轧角斗中，有人将制作试验这些火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利器，为了加害政敌，故意制造或留下隐患，在试枪试炮时引发枪膛或者炮膛爆炸，从而，有效地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转化为虽然不知道敌人之所在，却无比阴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烟和充满血腥气息的战争。

在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一干人的坚持努力下，帝国终于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式引进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枪炮，结果，在外籍军事人员试射时，发生炮膛爆炸，当场将帝国聘请的外国军事教官和数名助手炸死。帝国决策层中对于是否引进这些武器装备和技术，发生激烈争论。好在这种争论没有得出愚蠢的结论，于是又先后两批引进这种大炮。而第一批一起进口后、试射炸膛余下来的大炮，则由皇帝敕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然后全部被孙元化督运到了宁远，在袁崇焕的手中，于著名的宁远保卫战中发挥正常且威力巨大。（《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三月；《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九，天启六年三月甲子）后来，一直有人认为，那门试射时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为讨厌天主教和徐光启的政敌做了手脚所致。

就这样，引进了一百多年的一种先进武器和技术，竟然在帝国制度下被运作成了这副模样。在这个悲惨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种开始时无需理喻、后来无法理喻、最后变得无可理

喻的制度下，把喜事办成丧事就是这样成了一种状态，而如何将丧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国官员们所必备的技艺与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继光的时代已经是普遍现象，到袁崇焕时，几十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不止一种史料包括戚继光的著作中都有记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些枪炮会不会炸膛和在什么时候炸膛，因此使用它们的士兵们便只好尽可能地离那玩意儿远一点。譬如，本来应该双手将其托举在胸前，瞄准后施放，但为了减少危险，只好用一只手抓住离枪膛尽可能远的部位，然后，扭过身子，将枪朝后远远伸出去射击。至于是打到天上还是落到地下，已经无法顾及。

这些早期铳枪只能单发，临战阵时填充弹药是个麻烦。因此，典型的西洋战法是：枪手排成方阵，第一排采用卧姿射击，第二排为跪姿，第三排为立姿，射击后迅速与后排战士交换位置，退到后面填装弹药，如此轮番射击，形成密集的杀伤火力。与此时代相差无几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这种战法杀进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为帝国文武自我感觉过好的缘故，似乎从来没有成建制、成系统地引进过这些，在零星引进这些武器时，也没有同时引进与之配套的军事理论。于是，这些武器与诸葛八卦阵杂糅起来，自然成了一团乱麻。结果，本来是对付骑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却变得还不如烧火棍。因为一排枪放完后，大家乱糟糟地填充弹药时，旋风般的骑兵已经把马刀挥舞到枪手头顶上了。那时，这些铳枪就真的没有烧火棍顺手了。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

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因此，戚继光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枪炮质量问题。事实上，这已经是帝国制度层面的问题了，远非一个戚继光或者张居正所能解决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万状、从而只能扼腕叹息的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所谓十三副遗甲起兵，同时，因为清算张居正的缘故，张居正的亲密战友与部下戚继光被调离蓟门，冷处理、边缘化到了广东；

大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长白山脚下的偏僻小镇费阿拉称王，同时，戚继光在郁郁寡欢中默默无闻地死在岭南。

在后来近四十年岁月里，当努尔哈赤先是持弓仗剑、后是率领八旗铁骑横行天下时，戚继光在蓟门练兵中证明对付骑兵最为行之有效的这些战术思想，却被废弃和遗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欢张居正和戚继光，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是此时政治文化中的两大传统，除了皇家的尊严和权力，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不认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是值得珍视的。

就这样，戚继光死后没有几天，在偌大的大明帝国里，很快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将屏障、火炮和铳枪组织起来后，经过训练，是可以有效地将骑兵大兵团打趴下的。

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明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携带并使用过枪炮——火器，但是，似乎并没有给努尔哈赤造成过什么困扰。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战中曾经缴获过大批火炮和铳枪，好像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者，他说不定还很奇怪，不明白大明军队千里迢迢地带着这些笨重家伙是什么意思。于是，双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谁都没有意识到彼此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明军将士显然没有认为，在武器装备上，自己比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对手是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崇焕的出现。

袁崇焕是否直接受益于大科学家徐光启，我们不得而知，但他肯定受到了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极大影响。

当年，袁崇焕坚持帝国防守应该在宁远而不是在山海关时，就得到过孙元化的鼎力支持，后来，在孙承宗经营辽东期间，孙元化与袁崇焕都是孙承宗的部下，他们差不多是同级别干部。孙元化专门负责各个军事要塞包括宁远炮台的建设，宁远枪手和炮手的组织、训练与他都有密切关系。后来，这两个人的命运很相像：辽东巡抚袁崇焕惨死在崇祯皇帝的手中，两年后，登莱巡抚孙元化也是在没有特别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被崇祯皇帝杀死。随着孙元化的冤死，他的老师徐光启也在第二年黯然离世，师生二人矢志编练一支近代化新军的理想，亦随风而逝。否则，我国编练现代化新军的历史，可能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之时，至少向前推二百七八十年。

但不管怎样，他们活在世上时，确实曾经在宁远保卫战中，充分发挥了西洋枪炮的威力，令努尔哈赤吃了一次不小的苦头。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则大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经与戚继光之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只要向前再走一步，他就尽得戚继光思想之精髓。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情势可能会变得如戚继光在世时对付蒙古骑兵一样：凭借屏障的保护，大明帝国军队将八旗骑兵变成了大炮和铳枪的移动靶子。

可惜，命运没有给袁崇焕留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这一年，在后金汗国悲喜参半的同时，它的死敌——大明帝国那儿，也发生了许多让人一惊一乍一喜一忧，从而令历史无法忘怀的故事。

宁远城头的大炮在令后金汗国一片愁云惨雾的同时，也给大明帝国带来了多年未有过的欢乐。对金开战八年以来，这是大明帝国第一次在战场上，而不是在皇帝诏书、文书报告中获得的胜利。本来，当努尔哈赤倾全国之兵进逼宁远城时，帝国朝野内外，除了袁崇焕和宁远城里的一伙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宁远城能够守得住。兵

部尚书为此召集紧急御前军事会议，讨论宁远战守局势，讨论结果是既无善策，亦无对策，只能听天由命。辽东经略高第和总兵拥重兵于山海关上遥遥观望，不敢出关门一步前去驰援。就在举国上下惶惶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时，宁远前线却突如其来地传来捷报，一时间举朝举国大喜过望，袁崇焕被立即擢升一级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即时成为举国瞩目的中流砥柱。高第和那位拥兵关上的总兵则被撤职查办。

到此时，情况似乎很好，而其实并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原因是，此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掌控了帝国权力中枢。前一年，魏忠贤的助手们已经干掉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东林名臣如杨涟、左光斗等，酿成史称“六君子案”的著名政治谋杀案。如今，就在袁崇焕激战于宁远城头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同样著名的“七君子案”已经拉开序幕，并在苏州、常州激起大规模民变，有消息说，魏忠贤甚至一度准备在上述二地大开杀戒。

进入三月份以后，开始对宁远保卫战的有功人员实行封赏：袁崇焕官升一级，任命巡抚辽东、山海。据说，这场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魏忠贤运筹帷幄、调度有方所致，又因为他是太监，帝国制度中没有偌大的官职和爵位可以赏赐，所以他的一个侄子被封为肃宁伯。此后一路封赏，到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的八九月间，魏忠贤的这位侄子已经由伯爵晋为侯爵，又晋为宁国公爵，累计共进九级；魏忠贤本人则晋爵为上公。

当年八月，就在努尔哈赤死去的同时，大明帝国浙江巡抚请求中央政府，鉴于魏忠贤对浙江人民的深恩厚德无法报答，因此请求允许当地人民出钱出力，在杭州为魏忠贤修建生祠。意思是，在这个去了势的东西尚且在世时，为他修活人纪念堂，以资感念恩德并祈福。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皇帝还亲自为这座魏忠贤纪念祠堂赐名曰：普德祠。

该祠堂坐落于西子湖畔，位于关帝庙和岳飞祠中间。据说，这是一座壮丽无比的纪念堂。与这么个被阉过的破玩意儿比邻而居，

而且让他位居中间之上位，不知那英雄一世的关公和岳武穆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

此后，为魏忠贤建生祠、立牌坊蔚然成风，春风般吹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如火如荼的景象，人们争先恐后地向魏忠贤表达着敬爱之情。就连刚烈的袁崇焕，都要在众人的劝说下，挤出本来就不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还活着的去了势的太监各建一座纪念祠堂。

最后，帝国知识分子们出面了。他们很恳切地认为：魏忠贤的功德与孔老夫子差相仿佛，即便略低于孔老夫子，但肯定略高于孟老夫子。因此，应该在帝国首都北京的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祠堂，并比照大成至圣先师的祀典，于春秋两季予以祭祀。帝国天启皇帝朱由校立即批准了这个郑重的请求。并且在此前后，从皇帝开始，没有人再用魏忠贤这三个字称呼叫这个名字的人了。此时，人们叫他："厂臣"、"元臣"、"上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九千九百岁"等等。

从上述情形中，人们大体可以知道帝国制度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政治怪胎、帝国官场与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的程度，也大体应该知道，当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们普遍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面貌时，在生机勃勃的后金国面前，这个国家是否还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当年五月，大明帝国首都还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件事在历史上不算大，在当时却绝对重大——就是王恭厂大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在大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就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一点之间。已是仲夏时节的北京城，天气应该有些热了。突然，从京城东北方到西南角涌起大团灰黑气，并响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北京城暗无天日，白昼如夜。王恭厂一带地方房屋倒塌一万多间，男女死亡三千余人，炸起的破衣烂衫一直飘到了西山上面。当天夜里，北京和附近州县还发生了地震。

这是一次至今无法解释清楚的爆炸。当时，被人们看成是灾祸降临之前的天象示警。一时间，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心浮动。



此后不久，八月份，陕西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次很小的暴动，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拿它当回事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此刻距离掀起淹没帝国的滔天巨浪，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距离李自成成为闯将，还有不到三年时间；距离张献忠自称“八大王”，还有不到四年时间。

不过，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们，应该在皇帝过于热心地钻研木工手艺、太监拥有过于庞大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们过于失去廉耻感上，感受到历次亡国之前都会充斥在空气中的不祥气息。这时，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悠游岁月，全无惶惶不安之感的话，大约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眼前境遇实在太过美好，或者就是天性真的很迟钝。

天下大乱就在眼前，哪怕是白痴弱智，都应该觉出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而且问题还不小。

此时，皇太极继承的后金局势同样糟糕。努尔哈赤多年推行的愈来愈严厉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在此时显示出日益严重的恶果：

辽东汉族士绅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一变而沦为满洲军人的奴隶，不堪忍受时，再变就沦为“逃人”。原来主要依靠汉族人耕作获得的粮食，如今，随着“逃人”的日益增多，土地被大量撂荒，粮食棉布等等已经明显出现短缺。女真人游牧渔猎的传统产品，如貂皮、人参、东珠之属，也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危机：一是青壮年大多从军打仗去了，一次出征抢掠回来的财富，可能比一年游牧渔猎的收获还丰，致使人们对于深山老林里的渔猎生涯已经开始渐渐失去兴趣；其二，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那些珍贵的土产已经没有大明朝的商人前来收购了，若换不来金银、布匹、粮食的话，那些东西固然珍贵，却是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的。

此时，后金汗国的军队总数，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人左右，需要填满这十五万张嘴的粮饷，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支军队和历史上所有游牧渔猎部族国家的军队一样，必须依靠不断地打胜仗，才能通过战争掠夺，取得高于游牧渔猎的收益，才能既维持住本身高昂的士气，也维持住那些归顺过来的蒙古部落的忠诚。要知道，在任何

时代、任何地方，这种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游牧渔猎部族的士气和忠诚，全部需要定时、定量并不断加大的赏银，方才能够维持长久。这是后金汗国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两代人手上，需要不断发动战争，并且特别难以承受战败后果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宁远城下的战败，对于努尔哈赤来说才变得特别难以接受。

现在，筹措这些人吃马喂的粮饷，已经成为难度颇大的工作。辽东汉人此起彼伏的暴动，驻扎在朝鲜境内的明军毛文龙部队的不断骚扰，加上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后金汗国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后世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此时的后金汗国远比大明帝国危险，一个措置不当，分崩离析之势将会立至。

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七日，皇太极继位之后的第七天，袁崇焕派来的代表团到了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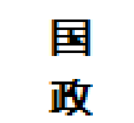
以前，大明帝国将后金国视为叛逆，除了征伐之外，连知彼知己方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识都忘到了脑后，致使任何与后金国互通音讯的举动，都变得充满难以预测的凶险后果。首鼠两端，已经不仅仅是可笑。如今，袁崇焕竟然派来了一个三十四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据说是前来吊唁老汗王的死，并祝贺新汗王继位。

皇太极当然知道，袁崇焕不是来上香，而是来气老和尚的。于是，针锋相对。你不是想来收集我的军政情报、摸我的底吗？好，我热情款待，慷慨大方，好吃好喝好招待，让他们每个人都嘴巴光光肚儿圆圆。足足吃了一个多月，玩儿了一个多月，让他们参加自己的大军凯旋仪式，参观自己的军容之盛，赏赐给这代表团的头头儿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临走，还派人携带丰厚礼品，前去回访袁崇焕。

由此，彼此其实已经都很清楚，情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双方都不是那么好惹的。从此以后，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在拿自己开涮，却又都一本正经地把游戏玩得跟真的一样。

原因对于这二位一模一样：他们两人都实在太需要时间了。

皇太极需要稳住袁崇焕，好腾出手来，去收拾那个一直冷冷



地站在自己后面的朝鲜。前有强敌，片刻不敢松懈；后面，又总是被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后脑勺。这样的感觉实在太糟，皇太极已经忍无可忍。

袁崇焕则需要赶快在单薄的宁远城外，把蒙古人还回来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杏山、连山诸要塞真正变成城堡，变成具有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只要互为犄角、结成相互呼应的网状体系，袁崇焕就真的不怕这个皇太极了。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能完全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但他们各自都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时间，也做完了各自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和袁崇焕才一拍即合，开始了充满尔虞我诈的和平谈判。

由于双方各怀鬼胎，因此，皇太极接待袁崇焕的使团时，表现得特别热情。史书记载说：大明使团吊唁时，后金汗国“诸贝勒皆叩首谢吊”，并盛情款待。同样，当后金汗国答谢使团来到宁远时，袁崇焕也表现得煞有介事。史书记载说：后金汗国使节在袁崇焕面前极为恭顺，就像昔日入贡受赏时一样，行三步一叩首之礼，跪拜如仪之后，再口呼“老大人”，跪呈书札。整个情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被打服了前来低头认错的属夷。皇太极需要的是时间，袁崇焕需要的同样也是时间。于是，以来书行文不合规矩的名义，将使节打发走了。第二次使节来访时，袁崇焕又以语言称呼不合规矩的说辞，将来使又一次打发回去。在此期间，皇太极已经完成了所有进军朝鲜的准备工作，并开始大举进攻；而袁崇焕则迅速出兵恢复了对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与右屯四城的控制，并加紧施工，抢修上述四城被毁掉的城防工事与设施等。

不久，朝鲜国王和驻朝明军毛文龙部双双告急求援，朝廷命袁崇焕出兵救援。袁崇焕派水师往援毛文龙，并派遣朱梅等九将官率军九千来到三岔河即今日辽宁省盘山县西南边境线上，虚张声势，以为牵制，实际并未投入战斗。随后，朝鲜臣服，这支部队便撤回原地。就此，帝国朝臣猛烈抨击袁崇焕连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顾，坐视

朝鲜和毛文龙遭受攻击。袁崇焕上书抗辩，清楚表达了他利用和谈之机，抢修锦州、大凌河、右屯、小凌河四城的战略规划。他表示：这些城池的修筑是必需的，只能趁后金汗国攻打朝鲜的机会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即便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只要三座城池修建完毕，那时的战守就远在山海关外四百里以外了，如此，山海关金汤益固矣。

平心而论，我们很难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评说袁崇焕此举的利弊得失。譬如，说袁崇焕缺少战略头脑和大局意识，导致大明帝国在后金汗国侧后翼失去了朝鲜这个极端重要的钳制力量和最坚强的盟友。这的确没有错，可能也真的是事实。但是，换个角度，从袁崇焕的视角看过去的话，想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此时，袁崇焕手中可以直接指挥的山海关外的部队大约有六万人左右。皇太极派去进攻朝鲜的部队大约为三万人，后来陆续增援的部队约一万五千人，留守在沈阳周围的部队约十万人。就算袁崇焕想打一次抗金援朝战争，他是否有这个实力也实在是大成疑问。他需要投鼠忌器的地方太多太多——比如，魏忠贤掌控下的中央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他接手不到一年的六万军队，能否对抗皇太极的十万铁骑？凭坚城用大炮打败了努尔哈赤，若远离坚城，和八旗骑兵野外作战是否能行？等等。此时此刻的大明帝国已经从上到下都失去了从容调度、指挥若定的风采，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袁崇焕就是有心杀贼，他也无力回天了。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三四月间，出师朝鲜的大军凯旋之后，在沈阳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会上，皇太极方才得到情报，知道在对付朝鲜期间，袁崇焕修城筑堡、屯垦自给、选将练兵的计划进行得卓有成效，显然志不在小。事实上，袁崇焕所做的一切，已经对后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皇太极很快决定，趁明军在凌锦地区立足未稳，立即准备出兵扫荡明军新近抢修的大、小凌河右屯和锦州，消除这一威胁。然后再趋宁远，为老努尔哈赤报一箭之仇。

就这样，从去年九月至今，袁崇焕利用和谈，总共为自己争

取到了半年左右时间。而在这来之不易的半年里，帝国朝局已经又有变动——

如今的魏忠贤，已经从千岁进到九千岁，再进到九千九百岁；帝国省级官员中，他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干儿子；那些有幸能够见到他的帝国官员，有人开始在他面前行三拜五叩首之礼，这是仅次于朝见皇帝时的大礼。

这时的袁崇焕可能自我感觉太好了，毕竟几个月以前，他还被视为帝国东北部的擎天一柱，而受到帝国官场和全国人民的景仰。他不知道，几个月之后的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在帝国官场的带领下不再景仰他，而是更加热烈地去景仰魏忠贤了；同时，他大约也实在太忙，顾不上了解为魏忠贤抢修生祠已经从省级城市，扩展到地市县级小城了，他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意味。最后，他手中的军费可能的确有限，使他不敢在皇太极的眼皮底下，将这经费从城防设施中，抽调到那个太监的纪念堂上去。于是，魏忠贤和朝堂中的官员们，陆续开始不耐烦对他假以辞色了。在他们看来，天下国家是什么？除了自己手里的权力，其他的鸟都不是。什么国家柱石，什么有盖世之才且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只要不顺从他们，根本统统就是扯淡。

就在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发作时，皇太极的兵马又一次逼到了袁崇焕的面前。没有人能够想到，宁锦之战，将成为皇太极戎马生涯中，指挥得最为窝囊的一次军事行动。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挟朝鲜战争得胜之师，于沈阳誓师出征，渡过辽河直薄辽西。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挥军完成了对锦州的合围之势。为了围点打援，皇太极派遣一支部队，越过锦州，向西逼近宁远。然后，皇太极像以往努尔哈赤作战时一样，将一大批俘获的百姓和官兵驱赶到锦州城下，里面夹杂着准备混进城去里应外合的部队，总计约两千多人。谁知，锦州守城将士坚决不开城门，令皇太极的计划落空。皇太极只好派人对守城主将赵率教实行诱降，没有结果。于是，从西、北

两个方向向锦州发起猛攻。

史书记载说，在明军炮火矢石之下，八旗将士伤亡甚众，然冒死冲击，坚不退却，并一度几乎攻破城西北角。战斗从辰时即早晨七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戌时即晚上七八点钟。战斗结束后，锦州城下堆积着许多后金兵尸体，损失相当严重。当夜，这些尸体被他们的战友们拖到明军修城时的砖窑里焚化。皇太极则将部队后撤五里安营，并派人连夜赶回沈阳调取援兵。

第二天，八旗兵显然是被大炮炸怕了，远远地环城而行，却不敢靠近城池。皇太极连续三次派遣使者，试图劝说守城将领放弃抵抗。明军守将赵率教站在城头，回答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根本不让皇太极的使者进城。皇太极希望制造战机，引诱明军出城野战，明军不为所动，按照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坚守不出。搞得皇太极极度郁闷，又毫无办法。

就这样，连续半个月，皇太极在锦州城下无计可施。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留下部分疑兵继续围攻锦州，自己率军转攻宁远。当时，袁崇焕已经派出水师和陆军准备驰援锦州，在背后夹击后金军。见到后金军后，援兵退回宁远城下，收缩在城外护城壕堑的保护圈内，布置战车炮火。皇太极见此情形，知道不利于骑兵冲击，遂下令后撤，再一次企图引诱明军追赶，以便在旷野施展骑兵的威力。结果，锦州城里的明军不上当，宁远城下的明军也不上当。他们只是在城下静静地严阵以待。

最后，焦虑中的皇太极终于失去了镇定，下令发起攻击。当此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人全都认为明军离城太近，不适合硬攻。皇太极喊道："去年皇考攻不下宁远，今天我又打不下锦州。现在要是连野战都不能打，我们八旗还有什么军威？"随后，怒吼着命身边的近卫军冲锋。史书记载说，各大小贝勒见此情形，"感到羞惭"，连铠甲都来不及披挂，便跟在后面，向宁远城下疾驰冲击。

这回，皇太极错尽错绝。

袁崇焕的大炮射程在两千米开外，明军则是在护城壕里面列



阵，距离都在一千米之内，大体在炮火射程的有效保护下。皇太极督率大军一冲，恰好全部冲进了那些红夷大炮的覆盖范围之内，结果宁远城上城下的大炮一起轰鸣，八旗军又一次遭遇了猛烈轰击。以至于八大贝勒之一的济尔哈朗以及代善的儿子、曾经和岳托一道发起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议政贝勒萨哈廉等高级将领身受重伤，其他高级将领战死或者受伤亦见诸史册。就连皇太极的龙旗和御用帷幄都被大炮炸碎。八旗军队再一次在宁远城下遭遇重挫。后来，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萨哈廉年纪很轻就死去，令皇太极痛惜不止，可能就和此次受伤有关。

值此之际，宁远城下的明军趁势杀出，两军战成一团。这是辽东战事开打十年以来，明军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主动与后金军展开野战。双方激烈厮杀到傍晚方才收兵。据说，除在大炮下伤亡者之外，是次野战，双方互有死伤，约略相当。对于大明帝国军队来说，此举意义重大，因为八旗铁骑在野战中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了。

当天夜里，皇太极接到锦州方向军报，锦州城里的明军突然出城袭击后金军营。皇太极遂撤军，重新围困锦州。每天以万名骑兵环城巡行，断绝出入，夜晚则举火擂鼓，彻夜呐喊，以期动摇城中军民之意志。

六月四日，皇太极亲自督战，对锦州再次发起攻坚。经过一日激战，实在看不出任何斩获的可能。就此皇太极悻悻然退兵，返回沈阳。

宁锦之战从五月六日开始，到六月五日结束，前后正好一个月时间。其间，大战四次，小仗无数。明军坚持“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导致后金汗国军队遭受严重伤亡。

堂皇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是在乾隆年间最终完成的。当时，在乾隆皇帝主导下，正是文字狱最为严酷、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文字工作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家惨遭杀害。有一种说法，在撰写努尔哈赤一败于宁远、皇太极再败于宁锦这两段历史时，当时史学工作者所遵循的原则是：完全避免“不良、不敬、不恭、不谀”的

字句。于是，真实的资料大多遭到淹没或阉割，而在袁崇焕传里，却保留下了“大捷”的字眼，总算给后世的阅读者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在战场上，袁崇焕肯定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胜利。不过，在官场上，他可就举步维艰了。捷报频传之后，帝国朝野的反响似乎大不同于宁远保卫战之后，不但没有那时热烈，反而不断传来冷言冷语。

一些帝国监察官员坚持认为，假如不是因为袁崇焕部下的几员大将死战不退，英勇顽强，很有可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作为辽西战场的最高统帅，袁崇焕不但无功，而且不无微罪，比如敌人败退而不知乘胜进击，再比如皇太极攻锦州、宁远不克，返回去再攻锦州时，袁崇焕不肯率兵前去救援，表明他已经暮气深重，没有了气壮山河临敌必胜的豪情壮志，等等。

这些指责，概念微妙，应用常识不太容易理解其中的逻辑。比如为什么一场战争打胜了，胜利一方的前敌最高统帅却是有罪的，等等。必须使用官场特殊的解读技巧并对事件整体背景全面把握，方能明白其中之奥妙。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代表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和万岁天启皇帝向袁崇焕发出不满和警告。譬如，天启皇帝起初对于袁崇焕总是要和皇太极和谈，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反感，到后来开始频频指责，“袁崇焕轻率遣使议和，动出非常，茫无实效”云云。（《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六）至于说“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兹至”，表明已有不少人开始非议袁崇焕。“暮气深重”一词，是帝国官场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的一句术语，一般用来指责别人或自己已经不堪造就。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就是居功自傲，意志衰退，不思进取，该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回家玩儿去的意思。

随后，七八月间，京师举行了盛大的庆功活动。京城内外由于宁锦战功受到升迁、赏赐的人，多达数百人。许多和这场大战毫无关系的人受到官升数级的奖励，其中，以魏忠贤的那位侄子累计连升九级的军功为最高。袁崇焕及其战友们仅仅加衔一级。以至于魏忠贤的一个名叫霍维华的同僚都有些看不过去，提出把自己受到的奖励转



给袁崇焕。天启皇帝斥责道：“袁崇焕议和这件事，所误不小。我不惩处他已经不错了，你少在这儿卖好。”（《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史书记载说，经同僚们点拨和苦劝，刚烈如袁崇焕幡然悔悟，上书中央政府，挤出本来就不很宽裕的军费，在英雄的宁远城和锦州城里，为那个去了势的太监建纪念祠堂。

即便如此，袁崇焕受到的指责也并不比以前更少，由是，袁崇焕知道自己已经不能见容于那位九千岁了，于是再上书请求辞职，回乡养病。几天后，请求被批准。当年七月初二日，这位“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能守住国门”、独卧孤悬山海关外二百里之孤城的慷慨男儿，心情黯淡地离开了那座英雄的城市，那座由于有了他而富有了传奇色彩的城市。

可以想见，此番回乡，乡亲邻里、退伍老兵们大约要听他慷慨激昂地畅谈塞上故事，纵论边关风云了。

第九章 袁崇焕一生中的最大错招

大明天启七年，后金汗国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整个一年风云变幻、波诡云谲。

正月初八，登基四个月的皇太极借朝鲜正在内乱、乏力抵抗之机，出兵朝鲜；

两个月后，三月三日，朝鲜国王与后金汗国代表签订了约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极出兵辽西，继父亲努尔哈赤一年前败于宁远城下之后，在锦州和宁远城下再败于袁崇焕之手；

七月初二日，刚刚第二次重创后金汗国的袁崇焕在魏忠贤与朝堂官员的挤对下，不安于位，辞职回乡；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尔哈赤死后整整一年时，大明帝国二十三岁的天启皇帝缠绵患病后死去；三天后，在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一年之际，天启皇帝朱由校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皇帝位，是为崇祯皇帝。

三个月之后，崇祯皇帝开始修理魏忠贤；

十一月初，曾经势焰熏天的魏忠贤自杀，阉党星散。

帝国朝局为之一变。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袁崇焕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先是崇祯皇帝下令恢复了他的官职名位，随后又派人前去他的家乡召他还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离职一年之后，袁崇焕又在崇祯皇帝的召唤下意气风发地衣锦回朝了。此时，他的职衔是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负责整个辽东第一线针对后金汗国的军事指挥。

从此以后，袁崇焕在帝国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错之后便步步走错，再也没有了全身而退的机会。

说起来，袁崇焕走错的第一步，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几句话而已。只是，这是几句关乎帝国命运的话，是几句出于帝国前敌最高军事统帅之口，入于帝国国家元首之耳的几句话，于是就变得重大无比。假如袁崇焕置身于一种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环境之下的话，事情可能还不至于变得如此之糟。可是，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变得惨痛无比。

袁崇焕来到北京后，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于平台，听他谈论平辽方略。

十七岁的小皇帝朱由检见了袁崇焕，先是慰劳备至，然后发问："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经十年矣，土地沦丧，生灵涂炭。卿不远万里响应召唤，忠勇可嘉。你有什么方略想法，不必顾忌都可以谈谈。"

袁崇焕说："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经都写在给皇上您的报告里了。"

皇帝说："报告我会仔细看，你先谈谈你的主要想法，比如边关什么时候可以平复？"

时年四十五岁、久经战阵的袁崇焕，一谈起边关仍然便会心潮激荡，遂慷慨陈词，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顾信任，要是皇上能够给我全权的话，五年之内，一定可以平息这个祸害，恢复全辽。"

小皇帝一听之下，大喜过望，也随之慷慨激昂，曰："五年灭寇，就是方略！到那时，赏千金封万户侯朕都不会吝惜。你要努力好好干，解除天下的倒悬之苦，你的子孙也会有福啦。"

袁崇焕顿首拜谢。

心潮大约同样激荡不已的小皇帝，高兴地转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参与召见的同僚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你

有把握吗？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袁崇焕答曰：“也没什么具体想法，我看皇上很焦虑，就那么一说，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这位同僚一听急了，警告袁崇焕说：“皇上英明过人，你怎么可以随口许诺？五年以后，皇上要是让你兑现承诺，你怎么办？”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顿时感到“抚然自失”。片刻，皇帝转回来，他赶紧报告说：“辽东的事情很不容易解决。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为难而推托。臣估计大约要用五年左右时间。但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须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钱粮，第二器械，户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顺手才行。”

皇帝将目光转向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两位尚书赶快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继续报告说：“吏部和兵部任用什么人，罢免什么人，调兵遣将等等，总要朝中和边疆事事相应，才能得心应手。”

皇帝将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书，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里敢不尽心尽力？”

袁崇焕顿首叩谢，曰：“以臣的能力，收拾辽东有余，调剂众口不足。一旦离开朝廷国门，立刻就如万里之遥。嫉贤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时时处处都会存在，他们害怕皇上法度威严，即便不敢用权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见来扰乱臣的方略。”

史书记载说，崇祯皇帝站起身，侧耳仔细倾听，片刻，谕：“你的报告一条一条历历在目，无需疑虑，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钱龙锡、刘鸿训等人也盛赞袁崇焕：“肝胆义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时，距离崇祯皇帝灭掉魏忠贤及其同伙们，只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实事求是地说，崇祯皇帝的确是在没有军国重臣的支持下，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的这一点。当时，人们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贤权势的无比庞大、显赫与令人畏惧，时常忘记他只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帝身上

的一个寄生虫这一事实。因此，帝国臣民对于十七岁的崇祯皇帝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魏忠贤，显示出了由衷的景仰与赞叹。天纵英明、乾纲独断、宸机独运、深谋远虑、雄才伟略等等是人们谈起这一事件时，特别普遍使用于皇帝身上的词汇。

从其一生行事判断，崇祯皇帝本人肯定同意这些赞美，并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伟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话，他实在应该对于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设计的帝国制度，充满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事实上，正是那样一个制度，才能够在短短六七年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在帝国中枢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庞然怪物；同时，又在更加短促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如此简单地帮助崇祯皇帝除去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时的崇祯皇帝心情舒畅，自我感觉绝佳。如今，他也觉得袁崇焕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真正的大将之才，因此给了他极高的礼遇。为了统一事权，在大学士们的建议下，崇祯皇帝收回了赐给其他边疆文武的尚方宝剑，专门只赐给袁崇焕一人，并明确允许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将决策权管理权全部下放给袁崇焕，允许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实际情况独立做出决定。

从此，“五年复辽”这个颇为轻率的承诺，就成了真正的梦魇，沉甸甸地压在了袁崇焕的心头。后来，他做了许多努力，试图为自己体贴皇帝而导致的失言拓展出一点回旋空间，结果他的每一个努力，都变成了新的绳索，将他束缚得更加牢固，无从理喻的帝国制度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袁崇焕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辽东前线之际，他曾经与熊廷弼有过长谈；他更加熟知孙承宗的境遇，几乎是耳闻目睹了孙承宗从高峰到低谷的全部过程。知道了这些之后，和熊廷弼一样，袁崇焕实在不该轻信皇帝的真诚，不该轻易陶醉在皇家那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宠爱与眷顾之中，不该再次回到这个无比险恶的帝国政治迷局之中来。在几千年政治文化传统中，皇家本来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倾斜到了皇家权益一

边，对于民族中那些出类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从来都没有在制度上观念上予以保护的设置与设计，于是，打压与残害便成了他们时常需要面对的处境。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儒家三纲五常那一套意识形态是一种真正混蛋透顶、狗屁不通的说教，我们就可以视那些维护此种说教的人为真正下贱的贱骨头和民族心灵之戕贼，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像正人君子。因为，我国历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剧，几乎全部与此深有干系。

对此，袁崇焕并不是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一年前，临近被迫去职之际，袁崇焕曾经给皇帝写过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谈道：

勇猛无畏地进击敌人，则敌人必然仇恨；奋勇当先地屡立功勋，则众人必定妒忌；任劳必然召怨，蒙罪才会有功；怨不深，政绩就不显著；罪不大，功勋就不能成；对于那些功臣能臣，诽谤信装满了皇帝的抽屉，毁他的谣言充斥了皇帝的耳边，这一切，自古以来无不如此呵。

袁崇焕所说的所有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历时数千年地存在于我国的政治历史之中。这一次，袁崇焕在应该可以理解的状态下，不那么慎重地做出承诺之后，再一次给皇帝写信，信写得同样中肯而痛切：

帝国辽东事业，在渐进而不在突进，在务实而不在虚张声势。用人与被用之人，掌握在皇帝手中，怎样才能够用而不贰、信而不疑是其关键。驾驭边疆文武和驾驭朝中诸臣大不相同。原因在于，边疆乃多事之地，一日数惊是为常事；军中可惊可疑之事更是特殊地多，故请求皇帝能够只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瑕疵；责任重大，造成的冤家就多，于是，所有有利于封疆大事的，都会不利于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何况被逼急了的敌人，也会从中实施离间之计，因此，做边疆之臣实在很难。本来陛下爱臣知臣，臣可以不必这么疑惧；只是其中关系重大，我不敢不让您知道呵。

袁崇焕仿佛一语成谶。他所说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一一应验，而且惨烈了不知多少倍。

到了辽东前线之后，袁崇焕才知道，在他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辽东前线已经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老样子了。就如熊廷弼、孙承宗当年面对的一样，一切都在重复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老故事：大明帝国军队里的军官们又开始公开喝兵血、贪冒军饷，士兵们经常无法领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干脆就根本领不到饷，民心士气又一次散掉，花费巨资修建的锦州、杏山、高桥等地城防，也都先后陷入后金汗国之手，并再一次被毁掉。

袁崇焕刚刚来到山海关，连续四个月领不到军饷的宁远士兵便发生哗变，着实给了他们的老长官一个下马威。袁崇焕星夜驰往宁远，一边平息哗变，一边向朝廷请求足额按时调拨军费，并开始着手整顿部队。

据说，崇祯皇帝看到袁崇焕申请军费的报告后，其反应是：“带兵的人对士兵如果真能像家人父子一样，他们自然就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是因为畏其威；不忍叛者，是因为怀其德。怎么就会发生哗变呢？”（《烈皇小识》卷一）皇帝所言，固然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却也透出了一股浓浓的、让人觉着很不好惹、伴君如伴虎的那股味儿。那话里话外的意思仿佛是：看来，袁崇焕也是个俗人，除了要军饷没什么新鲜的。他对袁崇焕恩宠备至仅仅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的小皇帝似乎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道理，很有点质问袁崇焕何不率领将士们在精神上食肉糜的意思。最糟糕的情形是，他甚至可能觉得袁崇焕是在以兵变为借口，向皇家勒索军费。

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上，袁崇焕的确没有做错什么。

袁崇焕真正做错的，是诛杀毛文龙。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他再次回到帝国官场。后来，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死时，诛杀毛文龙是其重要罪名之一。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袁崇焕罪有应得——别说他勾引满洲鞑子到

北京来杀人放火，就凭杀死毛文龙这一条，袁崇焕就死得不冤。再后来，袁崇焕被皇太极设计冤杀的内情大白于天下之后，人们又为袁崇焕感到痛惜。为了替他遮掩，于是再努力把毛文龙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政治文化传统，造就了乖戾而无体面可言的历史学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实，毛文龙既没有当初人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后来大家说得那么坏。只是，对于大明帝国和后金汗国来说，他的存在与否非常重要。因此，袁崇焕将他杀死，实在是熔九州之铁都无法铸就的大错，是令亲者痛、令仇者快、令历史嗟叹不已的大错，其影响称得上既深且巨。

毛文龙字镇南，祖籍山西太平，父亲行商于浙江钱塘时，生下毛文龙，是故，以浙江为其籍贯。据说，此人少小不喜欢读书，爱好谈兵。后来出走投奔叔叔，承袭了叔叔百户的职位。早年，在辽东明军中服役，曾经是李成梁的部下。萨尔浒大战之后，就在努尔哈赤颇有席卷辽东之势时，毛文龙毅然领命，带领不多的几个部下，深入努尔哈赤的敌后，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他们活动在今日之朝鲜以及我国吉林、辽宁相接地区和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旅顺等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骚扰得努尔哈赤一年数惊，日夜不得安宁。随着努尔哈赤种族歧视政策的愈演愈烈，毛文龙的部队也日益壮大，很有可能达到了几万人的规模，并在皮岛上建立起了军事基地——东江镇。“时时袭击建虏，有所斩获。”（谈迁《国榷》卷九十）

皮岛就是如今朝鲜的椵岛，据说之所以被称为皮岛，是因为“椵”字在朝鲜语中发“皮”音，又在很长时间里驻扎着明朝军队，于是在明代史籍中便被记为“皮岛”。翻开地图，可以很容易发现，这皮岛紧挨着朝鲜海岸，海上距离辽南地区近在咫尺，由此出发，或翻山，或跨海，骚扰起努尔哈赤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并将首都迁往辽阳、沈阳之后，皮岛和毛文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头之患。毛文龙曾经率部一直深入到努尔哈赤大后方的老

家附近，将敌人生产、生活、战斗之物资变成自己的物资，然后取道鞍山，翻过摩天岭，在距离辽阳和沈阳只有百十里地的地方再骚扰一番，一旦感觉疲劳或见势不好，便安然退入海中，扬帆远去。毛文龙屡屡得手，故极为嚣张。

这种情形对努尔哈赤刺激很大，因为毛文龙经常出没于图们江流域的延吉、辉春、图们、汪清一带地方，这里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家。只是努尔哈赤化家为国之后，家乡的青壮年人口已经大部分跟着他出来打天下了，留在那里的都是老幼病残，努尔哈赤很难抽调出兵力去防守那空虚的后方。而八旗铁骑又是典型善骑的北兵，对大海完全找不到感觉，因此长期以来，后金汗国基本都拿毛文龙毫无办法，努尔哈赤之所以不敢放心大胆地向西进攻，和毛文龙伸手就可以抚到自己侧后背上有着绝大关系。因此，大史学家谈迁才会记载下这样形容毛文龙的一段话：就像努尔哈赤身上的虱子，打不得又捉不到，虽然伤不了筋骨，却能够令人日夜不安。这也可以算是对游击战的经典描述了。

努尔哈赤曾经派人对毛文龙大谈明朝的腐败，并许以高官厚禄诱惑毛文龙，结果被毛文龙严词拒绝。因此，毛文龙在时人的眼中颇有抗金志士的声誉。毛文龙的苏浙大同乡、大书画家董其昌曾经向朝廷报告说：“国家若能有两个毛文龙，则努尔哈赤便可灭，辽东便可复，那些投降了努尔哈赤的我国叛逆便只能束手就擒。”（《明史》卷二五九）当时，毛文龙确有胆略，其声望之高，远在早期的袁崇焕之上。由于这些不算小的功勋，毛文龙屡受嘉奖，官居总兵，挂将军印，授左都督，赐尚方剑，在皮岛开镇设将军府，规制如同内地，成为当时地位崇高且极为重要、受到朝廷特别重视的一支力量。

袁崇焕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越来越不能容忍毛文龙，以至于必欲杀之而后快者，大约和下列情形有关：

可能是因为晋商、浙商善于经营理财，这毛文龙同样生财有术、天资不凡。在战火纷飞之际，这厮突然做起生意来，而且做得规模极大，使这位抗金志士不但成了位高权重的帝国重臣，还成了富可

敌国的巨大富翁。

皮岛是朝鲜进入渤海湾、交通中国的海上要冲，也可以控制辽东半岛到山海关内的海上运输，两岸三地之间满载货物之商船乘风破浪经过此地者甚多。忽一日，毛文龙突然下令，对过往船只，不论大小，一律征收通行税。然后，更在军事重镇皮岛之上开设市场，以优惠政策召唤八方客商四处"逃人"前来贸易，以便征收货物税。结果，把一个他来之前荒无人烟的八十里皮岛，经营得熙熙攘攘、红红火火，据说常驻与流动人口达到了十数万人。

当时，大明帝国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汗国土特产品是为非法，致使内地那些渴望用人参补养的有钱人，对那生长在辽东深山之中的植物根系望眼欲穿，价格高涨得超过了黄金。于是市场意识与嗅觉极其敏锐的毛文龙，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将从后金汗国前来避难的"逃人"组织起来，成立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分批次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于努尔哈赤起家的发源地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平价收购之，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乃至于京师间发售，一时间，毛文龙立成一方巨富。于是，昔日之志士，如今的富家翁，于皮岛之上，号称海上天子，以海上王自命自居自娱自乐。从此，文龙不思进取矣。

毛文龙对自己的作为理直气壮。原因是，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二十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话说得多了，可能后来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确实有二十万名部下了，遂使朝廷万分难过。

此时，毛文龙的路数和他的老长官李成梁晚年时差相仿佛，精通社会财富再分配之原理，深知天下钱财不是一个人能赚得完的，他大把挥洒银两于京师权贵、政要、太监门下，致使在封疆大吏中就有好几个干儿子的魏忠贤，对袁崇焕可以丝毫不假以颜色，对他却要格外高看一眼，内阁大学士们也都仿佛是他的孪生兄弟一般。

如今，魏忠贤倒台，内阁也几经变动，再加上这一年年的银两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比朝廷正常年景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都

多，即便加征了辽饷，也不够填这么多大张嘴的狮子之口。于是，难过之余的朝廷重臣中开始颇有烦言，最后决定派人前去核查人数。来人虽然受到毛文龙有如招待国王一般的款待，却仍然没有办法将其部下人数核定为二十万，只好以十万人上报。按照当时的朝廷建制规定，皮岛又称东江镇，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管辖与输饷，这登莱道衙门十分较真，核查来核查去，只查对出了两万八千人。于是，坚信自己有二十万部下的毛文龙，为自己一直以来广开财源，自谋生路的不凡手段找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特别充足的理由。

此外，驻扎在人家领土之上，毛文龙不认为自己应该感谢东道主，反而觉得自己应该受到东道主的感谢，于是就以协助东道主保家卫国的名义，时常向东道主索要钱粮，搞得朝鲜国王不胜其烦。那努尔哈赤是何其厉害的角色，他很快就派人联络朝鲜国王，重申友好结盟之意，以图共同对付明朝和毛文龙。毛文龙探得消息后，立即飞速报告朝廷，并且要求朝廷委派自己为朝鲜监督，意思就是想由自己来当朝鲜国王的太上王。不要说崇祯皇帝，就是那三十年不见朝臣的万历皇帝、如痴如醉地迷恋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再加上一个主意比谁都多的魏忠贤，也没有谁敢下达这样的指令。于是，毛文龙顾不上骚扰努尔哈赤，反而要对大明朝最好的盟邦朝鲜严加戒备了。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令袁崇焕切齿痛恨的话，毛文龙自说自话，把自己放在和袁崇焕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不太拿督师放在眼里，不听招呼，就让袁崇焕很难容忍了。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袁崇焕个性强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其自说自话，不听招呼似乎比毛文龙有过之而无不及，史籍中关于此方面颇有些记载。在此之前，朝廷曾经将袁崇焕的两个高级同僚调离，原因也是因为袁崇焕无法与他们共事之故。同性相斥，他无法容忍同样秉性的毛文龙也在情理之中。这大约是袁崇焕对毛文龙痛下杀手在性格、情感上的部分原因。

还有部分原因，可能就和袁崇焕对皇帝"五年复辽"的承诺有关。

从袁崇焕到达辽东前线后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看出，那个

承诺的确使他感到了巨大压力，使他特别急切地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整合麾下的所有力量。譬如，为了减少可能产生掣肘和扯皮的环节，他将山海关内外的统兵权裁撤合并到三员大将身上，将锦州和宁远合并为一镇，由祖大寿总领其事，加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协助祖大寿驻守锦州；将赵率教从蓟门移驻山海关，袁崇焕则坐镇于宁远。他和上述三位大将立誓，五年平复辽东，届时如果达不到目标，袁崇焕将亲手杀死这三员大将，然后砍下自己的头颅以谢天下。上述情形报告给崇祯皇帝后，皇帝曰：可。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在皇帝面前的这个承诺，其严重程度根本就等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立下了军令状。为此，皇帝和帝国政府对他一路绿灯，差不多满足了他所有要求，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届时交不了差，那个在不动声色之间干掉了魏忠贤的青年皇帝，对他是否会比对魏忠贤更客气，是可以成为一个疑问的。因此，袁崇焕必须把他权限范围内的所有力量尽快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在他的指挥下如臂使指地指向后金汗国，决不允许有不听招呼的情形出现。

这些力量中，包括了蓟、辽、登、莱、天津的所有军事单位和与军事有关的单位，其中，毛文龙的皮岛东江镇当然是重要的一支。

宁远兵变时，袁崇焕请求朝廷按时下发军饷，皇帝不高兴，一位大学士迎合皇帝说：若是士兵一闹就发饷，那其他地方的军队有样学样怎么办？对于袁崇焕来说，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要是毛文龙不听招呼，自己没有办法修理他，其他那些力量不听招呼怎么办？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届时，自己拿什么去兑现那“五年复辽”的承诺？

毛文龙有勇有谋有胆魄却不听招呼并非自袁崇焕始。当年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时，毛文龙并不买账，只听其老上司王化贞的指挥，令熊廷弼气恨难消。多年前，袁崇焕第一次赴任辽东之前，曾经与熊廷弼有过很是投机的长谈，或许那时，他就在熊廷弼口中知道了

毛文龙的嚣张难制。

宁远保卫战之后，袁崇焕晋升为辽东巡抚，为了协调各方力量一致行动，曾经因为毛文龙是连接朝鲜牵制后金侧后翼的桥梁，所以奏报朝廷，准备给他那里增调精兵良将，以加大努尔哈赤腹背受敌的力度，谁知，毛文龙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挠，并连连上书批驳袁崇焕，搞得就好像袁崇焕垂涎于他那地盘似的。最后，终于把袁崇焕的计划无疾而终地给“淹”了。因之，在袁崇焕心里，可能会认为毛文龙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怎么看怎么像奸商海盗加发国难财的割据军阀之流人物。

这就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之间的不同所在。这两个性格有些相似的人物，品格的差异却很大。

或许毛文龙对帝国朝局的认识比袁崇焕透彻，但其品格却比袁崇焕远为低下。因此，才选择了一条保存实力、积蓄钱财，甚至虚报兵额、冒领军饷、走私贩私的道路。如果政治清明，他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封疆大吏，若大环境相反的话，其合乎逻辑的发展轨迹，必定是指向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乱世之枭雄。可惜，帝国政治给他提供的是后一种环境。

袁崇焕则可能是个胆汁质的热血男儿，一个饱读圣贤之书、充满家国情怀、有勇有谋、有为有守、急功好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一类人物。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下，除极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袁崇焕的命运，大体上是绝大多数时代中这一类人物的标准结局。譬如五百年前的岳飞，譬如本朝百多年前的于谦，譬如前不久的熊廷弼。

只是，无论如何，此刻的毛文龙不管他像个海盗奸商也罢，像个割据一方发国难财的军阀也罢，他毕竟还只是“像”那玩意儿，而不是已经“是”那玩意儿了。他毕竟还是帝国东方一路前敌大军的统帅，毕竟在朝鲜已经成为后金汗国兄弟之邦的情势下，他还坚持在那里，形成着敌人侧后翼巨大的后顾之忧，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毕竟他手下的数万将士是跟着他一起在战争中冲杀出来的。而

在帝国制度下，最重要的是——毕竟他是皇帝才有权力处置的帝国重臣。在这种种情势之下，袁崇焕痛下杀手，如何能不构成一个影响巨大而深远的错误！

袁崇焕与毛文龙这两个强人之间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事实上，在袁崇焕此次奉召赴京时，一位同样讨厌毛文龙的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就曾经到袁崇焕住所，和他探讨怎么样对待毛文龙的问题。袁崇焕表示：毛文龙能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一）

赴任之后，袁崇焕曾经给兵部尚书写过一封信，其中谈道："皇太极屡屡想和我讲和，朝廷重臣中也有人主张谈和。毛文龙若和我同心协力，我当然对他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效提刀之力。"（谈迁《国榷》卷九十）这封信实际透露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皇太极作为袁崇焕与毛文龙的共同敌人，可能在促使袁崇焕举起那柄诛杀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时，产生过绝大的作用与影响。

皇太极继位后第一次出征朝鲜时，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希望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扫除大明帝国驻扎在朝鲜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指的就是毛文龙的部队。在皇太极召开的出征朝鲜誓师大会上，誓词中明明白白地写道："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当征讨。但此行不是专攻朝鲜，明朝的毛文龙就在朝鲜近海海边，不停地招降纳叛，因此，我们才要行此天谴。"（《清太宗实录》卷二）在与朝鲜约为兄弟之邦的谈判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要朝鲜断绝与大明帝国的关系。不料，朝鲜口惠而实不至，虽然签订了盟约，实际上却并不执行。大明帝国军队照样在朝鲜领土上驻扎、屯垦、做生意，威胁后金汗国的侧后翼。而皇太极没有水师，没有船只，八旗铁骑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则完全找不到北，是故，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对毛文龙基本束手无策。

因此，皇太极和努尔哈赤一样，也让大明帝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李永芳劝诱毛文龙投降，这种劝诱过去在大明帝国官员与将领身

上多次发生效力。但此次仍然被毛文龙拒绝，毛文龙将此事报告了皇帝。于是，李永芳建议皇太极："兵入中国，恐怕毛文龙会截断后路；最好是给袁崇焕写信，假装答应归还辽东给他，条件是必须杀掉毛文龙。"皇太极按照李永芳的建议做了，袁崇焕则秘密回复，同意这一交换条件。（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当初，袁崇焕为辽东巡抚时，曾经派人前往建州和谈，后离职，没有结果。此次再次出山，为了完成五年复辽之承诺，乃再一次谋划和谈。皇太极的答复是：'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就拿毛文龙的脑袋来换辽东土地。'崇焕信之。"

据说，袁崇焕两次主持辽东前线工作，哪怕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与皇太极和谈时，皇太极必定始终坚持一个条件，就是和谈可以，也可以把辽东失地还给大明，但是，"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石匮书后集》卷十，毛文龙传）我没法相信你，除非你拿个盒子把毛文龙的脑袋装来。因此，此次袁崇焕复出之后，便"一门心思地想着杀掉毛文龙，用他的头颅换回辽东失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显然，皇太极的这种做法，和他五百年前的祖先对大宋皇帝赵构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要想和谈，讨回陕西、河南两省失地可以，条件是必须杀掉岳飞。

偏偏那毛文龙，砍头的刀已经架在自家脖子上了，他还在那儿折腾事儿。可能是出于挑拨离间的考虑，存心让袁崇焕与毛文龙掐起来，因此，皇太极一方面与袁崇焕和谈，另一方面又派人去和毛文龙和谈，使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更有资格成为和谈的主角。毛文龙不知是出于真心主战，还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重要，以便索取更多的军饷，他立即将皇太极找自己和谈的消息报告给了皇帝，并说了不少大话，核心意思就是灭掉后金不是什么难事。同时，对于把自己部下兵额核定为二万八千人，大为不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请饷甚急"。

毛文龙的这种态度，特别容易得到皇帝的赏识。自从主战的岳飞被冤杀之后，在我国官场与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态度越强硬，越容易被认为是忠

诚的，是岳飞的战友，哪怕偏激一点都没有关系；反之，是秦桧的同伙，哪怕纯粹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则可能是有问题的。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明崇祯实录》卷二）

袁崇焕满心希望乘一败努尔哈赤、再败皇太极之余威，以军事上的严阵以待加上外交手段，即“以捭阖纵横之计”收回那辽东失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宁锦战守）为此，他不顾人们包括皇帝的看法，坚持公开和秘密地与后金汗国进行和谈。而且，他很有可能没有将和谈的详细情形，特别及时地向皇帝请示报告。显然，他和毛文龙的不同表现，在毛文龙被他杀死之后，十分有助于加深皇帝对他的疑虑，令皇帝更加相信他与皇太极之间是别有默契。此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所以，大史学家谈迁评论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国榷》卷九十）信哉斯言。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就和自杀一样啊。

促使袁崇焕最终下决心干掉毛文龙的，可能是下列两件事情：

其一，鉴于毛文龙一再在军饷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暗指袁崇焕有意克扣，袁崇焕上书皇帝，请兵部派大员为毛文龙打理军饷事宜。毛文龙又是一阵矫情，和以前连连上书反对袁崇焕为他增派精兵良将一样，如今他连连抗疏痛驳袁崇焕，反对朝廷派人为他理饷。至此，这毛文龙真的就像一根搅屎棍和滚刀肉，不但逼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拿他没有办法，就连袁崇焕也一样，被他逼得杀心大起，只能是杀之而后快了。

另一件事情则是件小事：袁督师到任后，其属下应按制度前来谒见。不知道袁崇焕出于什么心理，是要试试毛文龙对自己的态度，还是尊重毛文龙的功勋地位，反正在毛文龙谒见时，袁崇焕不是以上级接见下属的礼节对待毛文龙，而是待之以宾主之礼。而毛文龙这厮作为下级，居然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对自己的上司还之以宾客之礼。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毛文龙忘了自己姓什么，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于是有史家认为，就是在那一刻，

袁崇焕下定了除去他的决心。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六月，袁崇焕以犒劳部队的名义，泛海来到双岛，邀毛文龙相会。史书记载说，二人见面后，袁崇焕对毛文龙慰问备至，二人经常宴饮到半夜。六月六日，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在山上搭设帐篷，令甲士埋伏下来，除毛文龙身边将领之外，其余人等全部被挡在外面。

袁崇焕对毛文龙施礼曰："您在海外担当重任，请受我一拜。"毛文龙连忙还礼。袁崇焕又询问那些将领的姓名，回答大部分都姓毛。毛文龙解释说："这些都是我的儿孙。"袁崇焕笑着说："你们在海外为国家效力，也请受我一拜。"众人慌忙顿首答谢。

大家落座后，袁崇焕随即指责毛文龙不法情事，毛文龙抗辩不屈。袁崇焕立命将毛文龙剥去衣冠，绑于堂下，并列举其十二款大罪，款款该杀。譬如，说他专制一方，耗费国家钱饷无数；杀难民冒功；口出狂言，说是取南京易如反掌；擅自开通马市，交通外番；部下数千人姓毛，滥予官职；抢掠商船，强夺民间女子；重金行贿京师，拜魏忠贤为义父等等。袁崇焕问他带来的那些部将，毛文龙是否该杀？那些将领惊惶失措，有的说"该杀"，有的则说毛文龙多年抗敌，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等等。

袁崇焕大义凛然训斥曰："毛文龙以一介布衣，如今官居极品，满门富贵，国家给他的酬劳算是足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如此悖逆？"遂请出尚方宝剑，顿首请旨，曰："臣为了整顿军纪，今天要杀掉毛文龙，诸将领中若有人想效法毛文龙，全部杀无赦。异日如果臣不能成功，请皇上用杀文龙的剑杀臣。"请旨毕，崇焕命自己带来的一位海军军官赵可怀，以尚方剑将毛文龙斩于帐前。（《明崇祯实录》卷二）随即，袁崇焕对毛文龙部将宣布：只杀毛文龙一人，其余人等无罪。

第二天，袁崇焕以大将之礼安葬毛文龙。祭奠毛文龙时，袁崇焕泪流满面，曰："昨天杀你，是出于朝廷公义；今日哭你，是出

于同僚私情。”随后，拿出十万两白银，给毛文龙的部下每人发了三两，将皮岛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崇祯皇帝听说帝国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就这么着让袁崇焕给杀了，着实吓了一大跳，惊骇莫名。他可能知道袁崇焕素有蛮子之名，却大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生猛到如此程度，竟然敢于杀掉只有自己才有权处置的一路大军统帅。

崇祯皇帝继位不久，毛文龙就曾经给皇帝上过一个奏疏，言辞激烈地痛陈自己有五大不平，请求皇帝另选贤能来替代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伎俩，是明朝官员们的拿手好戏。因此，皇帝鼓励他说：“文龙孤悬海外，备尝艰辛，屡建功勋。如今正值辽东局势危难之际，岂能说退就退？你要再接再厉，多方牵制，以舒解皇帝我的焦虑。”（《崇祯长编》卷二）

如今，这毛文龙没有说退就退，却被这袁崇焕说杀就杀了。据说，仅仅因为正在倚重袁崇焕，所以皇帝没有指责他，反而通令嘉奖袁崇焕，并将毛文龙的罪行收集起来，通报全军。当时，有些人认为毛文龙是被冤枉的，因此在京师奔走，为毛文龙鸣冤。崇祯皇帝将这些人一概归入毛文龙亲信死党，下令捉拿严办，以安抚袁崇焕。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

毛文龙罪不当死，特别是不当这样的死法。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本来就是错误的，不光是崇祯皇帝“意殊骇”——特别惊骇，而且，史书记载道：“天下闻之，诧为奇举。”（谈迁《国榷》卷九十）没有人能够理解袁崇焕此举的真实意图，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如今皇帝也糊里糊涂加入战团，企图以权势压人，毫无疑问是错上加错，君臣制造了一起令人无法心服口服的悲剧。

悲剧的后果，不久便显现出来了。袁崇焕显然没有用诛杀毛文龙在皇太极那儿换来他承诺过的任何东西。仅仅过了三个月多一点，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的皇太极便大举进军，他绕过袁崇焕严防死守的宁、锦、山海关一线，深入大明帝国京畿地区烧杀抢掠，时间长达七个月。这是双方开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标志着战祸已经从辽东

地区蔓延到了帝国腹心。

此时，皮岛已无毛文龙。统帅在没有太大说服力的情况下被杀，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善后与后续工作，人心士气一下子就散掉了，没有人具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指挥那几万大军，从而差不多是自动解除了对于后金汗国侧后翼的威胁。就这样，坚持多年的一块敌后根据地，基本丧失了战略价值。

而袁崇焕也在一步走错之后，步步走错，除了穷于应付之外，似乎完全没有了曾经有过的英气与灵气，直到被崇祯皇帝逮捕入狱，直到八个月之后，死于皇帝的酷刑。

三年后，悲剧的恶果进一步加剧扩展：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等，必定是对朝廷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先是在山东登、莱地区掀起大乱，皮岛驻军守将陈有德也在皮岛杀死另外两位守将，率部响应。随后，他们携带大明军队最新引进的红夷大炮和工匠技师等浮海投敌。

加上同是毛文龙部下的尚可喜，大清朝册封的四位汉族亲王，有三位是当年跟着毛文龙，令努尔哈赤一年数惊、寝食难安的骄兵悍将，如今则成了皇太极和多尔衮的急先锋，构成了皇太极组建汉军八旗的主体。他们杀进自己的故国家园，大砍大杀，几乎所向无敌地从大东北一直打到南海之滨，打到云贵高原的千山万壑，打到大清朝天下太平之后。平心而论，仅仅将他们斥之为汉奸、卖国贼、叛徒之类大约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他们和最后加入进来的吴三桂一道，成为大清朝需要被清除的异姓藩王，演出了受到后代直到今天热烈赞颂的“平三藩”悲喜剧。

第十章 岳飞以后的最大冤案：袁崇焕之死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三个多月后，终于摆脱了多年来侧后翼威胁的皇太极开始大规模西进，对大明帝国发起了一次极为大胆、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在以往的晚明前清历史研究中，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事实上，这次行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面全部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几乎称得上是促使晚明社会全面解体的行动。

对于战争史研究者来说，这次军事行动具有极高的军事想象力和超人的创造力，在作战意志、战略战役战术指导、军事行动上均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超、卓绝、豪迈之境界。仅仅凭此一战，皇太极就远远高出了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军事人物。

从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挑战大明帝国的抚顺战役起，到大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经过十一年战争，大明帝国与后金汗国的边界，已经由抚顺、清河、瑷阳、宽甸一线，移到了松山、杏山、宁远、锦州、大凌河一线。这一带地域，东起医巫闾山，西到山海关，北靠松岭山脉，南部面向渤海，天然形成了阻山绝海、自北斜向西南的狭窄走廊，是东北平原连接华北平原的唯一通道，号称咽喉要道。这条辽西走廊，不论对于大明还是对于后金，都具有极高的战略地理价值，实在是双方必争之地。袁崇焕和孙承宗坚持固守宁远和锦州，显然比大明朝的满朝文武都要高明得多。

而对于进攻者来说，这里的地理形势根本就是一个介乎山水之间的大峡谷，对于冷兵器时代的大兵团进攻形格势禁，阻碍重重，极难发挥战力而有功效。最初，皇太极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在乃父努尔哈赤受重挫于宁远之后，自己又来到这里，在同一块砖头上再绊上一跤。这一跤摔得极痛，促使皇太极仔细打量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们父子两代双双打翻在地。结果，他一下子发现了三样东

西、一个人。那三样东西是：坚城、大炮和辽西走廊的地形，那一个人就是袁崇焕。

八旗铁骑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于是皇太极就不来攻坚，明军喜欢用大炮，那么皇太极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大炮。他提供优厚待遇，招揽汉族工匠，为自己造枪造炮；结果仅仅到天聪五年，后金汗国军队就有了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红衣大炮。大明帝国在武器装备上领先后金汗国一个时代的优势，在几年之内便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皇太极需要对付的，是挡在狭窄的辽西走廊上的那个袁崇焕。

经过治理整顿，袁崇焕将锦州、宁远、山海关、蓟门、登州、莱州、天津的兵力与军事部署大体整合完毕。在他麾下，共有四镇兵马，约十五万三千余人，战马八万一千余匹。粗粗看上去，袁崇焕的兵力已经和皇太极的满、蒙、汉军总体兵力相差不大了。

在辽西走廊上，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当时已经皆为山海关外重镇，相互之间形成了网状防御体系，互为犄角，融为一体，似已牢不可破。在这幅员不到四百里的区域中，驻屯重兵六万四千七百多人。袁崇焕的确已经把这里经营成了铜墙铁壁。皇太极若想从这里杀进山海关，就必须在每一个要害处全部逐点攻略，全部面临坚城、大炮、辽西走廊的地形地势，然后再加上一个袁崇焕。那可能是一条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进军之路。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之后，进军之路变成了覆灭之路。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皇太极绕过辽西走廊，开始了不仅仅置袁崇焕一个人于死地的大手笔军事行动。皇太极后来曾经这样对部下将领说明自己的想法：“山海关、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坚固，攻之无益。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深入内地，夺取那些毫无戒备的城池。”（《清太宗实录》卷六）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皇太极亲率八万大军，绕道数千里，长途奔袭，杀向了大明帝国首都北京。

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出沈阳，西北行，渡过辽河、巨流河，经都尔鼻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彰武县，进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与东北蒙古军会合，然后继续西北行，到达青城，再与喀喇沁蒙古军会合。

这时，大贝勒代善和三贝勒莽古尔泰沉不住气了，他们连夜找到皇太极，坚持认为不能再向前走了，应该立即班师。

他们的担心在理论上全部能够成立——

大军劳师袭远，孤军深入数千里，若不能进入明朝边境，则人困马乏粮草短缺；若进入明朝境内，倘明军各路兵马合围环攻，则众寡悬殊；假如大军孤悬明境，明朝调动大军堵截于后、切断退路，那恐怕就要死得很难看，甚至于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最可怕的是，此次出兵，三个大贝勒倾巢出动，只有一个阿敏留守沈阳，力量并不强大。如果袁崇焕来一个围魏救赵，从宁锦出兵直捣沈阳的话，那后果就谁都不敢再往下想了。或者，即便袁崇焕本人不去，只是派一员大将，譬如祖大寿前去攻打沈阳的话，这八万大军不用别人来攻，自己就会变成一团乱麻散沙。

结果，这么坚强的理由，居然根本就说不服皇太极，双方遂争执起来。他们一直到吵到半夜，也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不欢而散，代善和莽古尔泰悻悻离去。这时，岳托等一大批青年贝勒等在皇太极的营帐外听候指示。岳托进入帐中，就见皇太极面红耳赤，神情极为恼怒，半晌，皇太极愤愤然道："让诸将都回去休息吧，我的计划既然通不过，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清太宗实录》卷五）然后，皇太极秘密地对岳托等在场者说了自己的计策。结果，岳托等青年将领全部支持皇太极的主张，赞成继续前进。

于是，十月二十日凌晨时分，在说服了代善、莽古尔泰之后，大军开拔，二十四日到达老哈河。皇太极"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济尔哈朗和岳托率领右翼四旗兵和右翼蒙古军进攻大安口；阿济格、阿巴泰率领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兵进攻龙井关；皇太极和大贝勒代善等率大军进攻洪山口。预定诸军会师于大明重镇遵化。二十六日深夜，后金汗国军队从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四处，捣破长城，蜂拥而入大明边境。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般。皇太极第一次从大东北打进大明帝国腹心地带，除了为会合蒙古部落而绕一个大圈之外，其选择打

进内地的进军路线是一条除山海关之外的最佳路线。从军事上讲，选择这条路线，不但出人意表，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殊优势，而且还有军事地理上的特殊优势。

从沈阳出发，向西，沿大兴安岭西南山脉的医巫闾山北麓，进入蒙古高原，然后，从营州即今日辽宁省之朝阳，经凌源到平泉，南下喜峰口；或者，经平泉、承德、滦平而西出古北口。这条路线贯穿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与宣化盆地之间，既是扼制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通道，又是控扼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宣化盆地的要冲。由北向南，前方便直指北京、天津之帝国腹心重镇。这条通道，既是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过渡地带，又具有经济和人文地理的过渡性质，由北向南依次从高原戈壁，过渡到草原牧场，再过渡到农耕田园。表面上看起来，这里遍布崇山峻岭，似乎难于跋涉。实际上，在山岭之间，到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河谷，特别适合军队隐蔽行进。而且，在军事上，由北向南还具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之优势。

历史上，把大宋帝国折磨得痛苦万状的大辽帝国，大体就是取这一路径直下中原的。北宋联金灭辽时，大宋帝国无力履行拿下燕京的承诺，于是金国骑兵也是经由这个区域，从古北口杀出来，三下五除二直下燕京，就是今日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后来，宋、金闹翻后，金国两次分兵两路杀到汴京，终至倾覆了北宋江山的“靖康之耻”时，其中一路大军也是由此进入中原地区的。

冷兵器时代，中原帝国如果建都西安，西北地区自然成为国防重心；若建都北京，这里易攻难守，便成了极难设防的柔软的下腹部，立刻就变成了中原帝国的软肋；到了明代，甚至成了命门之所在。不幸的是，皇太极一出手，便直捣这一软肋，从而捏住了大明帝国的命门。他先后五次遣大军绕道进入中原大砍大杀，将大明帝国整治得死去活来，令帝国元首崇祯皇帝生不如死，也大体都是居高临下由北向南，取的同一个方向。这种情形，如何才能不令人浩叹：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

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这里历来是大明帝国军事防守的重点地区。戚继光镇守蓟门十六年，为了严防死守，曾经在他的这一带防区内，沿着崇山峻岭的山脊与河谷地带，下绝大气力重新修建了长城与敌楼，其中包括今日为中国人赚取了大把旅游外汇的八达岭长城。后来，这一区域的军事防卫之所以变得支离破碎，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拜王化贞和当时的蓟辽总督、兵部尚书、东林内阁与天启皇帝之所赐。

在广宁之战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上述人等通力合作，才把那位号称有盖世之才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摆弄得百般无奈而气急败坏，直到在方寸大乱之后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王化贞与当时的蓟辽总督志同道合，坚定相信那位口无遮拦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能够在拥有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情况下，不去效仿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而是在他们二位人格魅力的感召之下，帮助大明朝灭掉努尔哈赤。于是，他们通过兵部尚书和东林内阁，为这位林丹汗每年提供八万二千两白银的财政补贴，期盼着这位成吉思汗的子孙、如今也自称成吉思汗的林丹汗，真的能像当年成吉思汗横扫完颜阿骨打的前大金那样，率领他的四十万铁骑横扫掉努尔哈赤的那个什么后大金。

于是，口气极大、实力和能力都不见得大的林丹汗，以帮助大明帝国消灭后金汗国的名义，大模大样地进驻到了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区域。经过这么一番玩弄，大明朝不但没有能够借助他的力量收复一寸辽东失地，每年白白送给他成堆成垛的白银，还实打实地丢掉了今日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把自己的命门之地拱手交给了一个并不那么靠得住的同盟者。

后来，努尔哈赤死后，这位林丹汗确实和皇太极交上了手。谁知这位口气大得几乎没边没沿的大汗，练了三招两式之后，居然带着老婆孩子撒开马蹄头也不回地就往西跑，一直跑到青海大草滩，其治下在今日甘肃省天祝县境内。于是，这片距离皇太极不足千里的中华帝国命门之地，就此落到了一些蒙古部族手中；而这些蒙古部族陆

续归顺了皇太极，这一大片在军事地理上极具价值的土地也就落到了皇太极与后金汗国手中。这就是皇太极和大清朝能够顺着这条道路一直打到北京的来由。

明白了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你还会感慨上天待大明何其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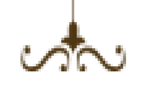
皇太极捣破长城和进入大明帝国境内的过程，简单得不成话。

十月二十六日深夜破城而入之后，他们的几路大军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向帝国首都北京的东部重镇遵化集结；十一月初一日，帝国首都戒严；初三日，皇太极率诸部会师于遵化城下。四日，他们拿下遵化的过程，同样简单得不成话。因为，恰在此时帝国遵化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政长官正在整顿当地驻军，那些被他裁汰下来的冗兵冗员，看看吃不成大明帝国的军粮了，便索性将遵化城的大门打开，迎接皇太极的后金汗国军队，似乎是想换一个东家继续混饭吃。于是那位致力于治理整顿的地方官，便只好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了事。

在这个过程中和未来的数月里，皇太极那几位后金汗国大首领的担心，无一成为事实，证明皇太极不管是根据什么，哪怕纯粹是出于直觉判断做出的进军决策，都无比正确。他们来到敌对十余年的庞大敌国里，就像回到自己家的后花园里一样，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们得到他们需要的粮草吃喝，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崇祯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袁崇焕同样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皇太极的兵锋指向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素有名将之称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极为倚重、靠他们立下军令状的三位大将之一，时为山海关总兵。他得到后金军捣破长城的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阻截。可惜他带来的兵只有几千人，与皇太极的兵马比较起来实在太少，他所能形成的力量过于单薄。这位无愧名将称誉的将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形下，与敌人周旋四昼夜后战死沙场，



他的部下全军覆灭。

皇太极超级大胆且富有创意的行动，对大明帝国形成全面挑战。帝国僵死的制度与决策机制面临着致命考验，皇帝的综合素质立即表现为整个帝国的综合素质。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朝朝代代都是一样：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大约相当于皇帝的同一水平。在呈常态分布的情形之下时，大多数时刻，整个国家的智商水平甚至远在皇帝一人之下。

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生长在深宫膏粱之中、太监与脂粉环绕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犯，他在惊慌失措之余，发出了一连串让人无所适从的指令。

——他下令全国兵马立即进京勤王，命令甚至下达到了遥远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等地；

——他先是命令星夜赶来的袁崇焕不许跨过蓟州防线，当袁崇焕跨过这条防线来到北京城下时，他将袁崇焕召进皇宫慰问备至，然后令他指挥各地陆续赶到的天下勤王兵马，却又禁止他带来的饥寒交迫的部队进入北京城稍事休息；

——满桂是一位出身蒙古族的勇猛战将，被时人视为帝国柱石般的一代名将，与袁崇焕素有嫌隙，当年袁崇焕镇守辽东获得宁远大捷之后，朝廷不得不将两位与他无法合作的帝国重臣调开，另行安排工作，这位满桂就是其中的一位。此时满桂也率领部下赶到北京城外，崇祯皇帝立刻下令让满桂的部队进京休息，并册封这位职权远低于袁崇焕的将军为帝国侯爵，使其尊贵的爵位远远高出了袁崇焕；

——崇祯皇帝十万火急地将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孙承宗，从河北高阳老家召回北京，在命令袁崇焕指挥天下勤王兵马的指令尚未取消之际，又委托孙承宗去通州构建京东防线，然后又取消这一委托，命他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指挥天下兵马；

——孙承宗受命开始紧急安排城中防守事宜之后，皇帝又指派他还是到通州去为好，于是时年已经七十岁的孙承宗，又星夜赶赴通州。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明袁崇焕此时此刻的心境想法等等，也很难揣度他是否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在理论上讲，皇太极所突破的长城地段，归蓟辽总督管辖，袁崇焕并不需要对此负责。而且袁崇焕曾经专门就此地的防务严重警告过皇帝："蓟州地位至为重要，而兵力并不强，万一有人做向导，引后金军队由此进犯的话，则祸有不可知者。"（《明清史料》甲编，《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因此，他建议皇帝："蓟州太过单薄，应该派驻重兵。"（《满文老档·太宗朝》卷六）并且希望皇帝能够严厉督促当地诸军，加固工事，高度戒备，将此当成最最紧急的工作来抓。然而，对于袁崇焕是头等大事的，对于皇帝却并不一定那么要紧。事实上，皇帝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按照常规让有关部门研究研究，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明史》作者揣测说，"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很有可能，袁崇焕真是这么想的。他甚至有理由希望皇帝和朝廷百官通过眼下的危机，意识到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不知道情形严重的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程度。

种种迹象表明，皇太极在另一条战线的工作正在发生作用，他派到京城中的间谍特工与城外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极为成功地在北京城里制造出了漫天飞舞的流言蜚语，其核心内容大体指向了对于袁崇焕的怀疑：

坚决主战的毛帅毛文龙在世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敢于进入长城以南，因为毛帅会使他们腹背受敌。如今袁崇焕杀死了毛文龙，他与皇太极明来暗往，一力主和，皇太极才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长驱直入，一直杀到了北京城下。袁崇焕到底在干什么？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如今他和皇太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来到北京城下，他根本就是与皇太极串通一气，勾引鞑子来到了北京城，以战逼和，企图用迫使皇帝签订城下之盟来卸除五年复辽的责任。

此时，袁崇焕手下的一位将领，建议袁崇焕无论如何也不能

让八旗兵打到北京城下。事实证明，这位将军是富有眼光和见识的。原因是大明帝国皇亲贵戚、高官显宦、富家大贾们的庄园别墅、物业田产大部分都在北京城外的郊区。八旗铁骑一到，烽烟起处，首先是他们损失惨重。皇帝身边每天围绕着的都是这么一批人，他们的这口恶气如何才能不出在袁崇焕身上？嘉靖朝兵部尚书丁汝夔殷鉴不远，他就是为此身首异处的。

可怜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受过战乱流离的北京市民和朝廷官员们，在皇太极和满洲鞑子的烧杀抢掠面前，陷入了对袁崇焕真实的怀疑、恐怖和愤恨之中。以至于对袁崇焕“怨谤纷起”，皇帝“颇闻之，不能无惑”——皇帝听到了太多人对袁崇焕的怨恨，无法不感到疑惑。（《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事实上，无需这些飞短流长，崇祯皇帝那颗敏感多疑的心已经足以被眼前的一切所激动了。他一定也在无数次地问着同一个问题：袁崇焕到底想干什么？崇祯皇帝上述安排表明，即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他对袁崇焕的怀疑和恼怒已经很难改变了。“识人为哲”，崇祯皇帝不是哲，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势下，我们年轻的皇帝缺少那种识人的明哲智慧。如果说当初袁崇焕擅自诛杀毛文龙，会令皇帝惊骇其不驯的话，此时的一切，可能足以让皇帝疑虑他的不忠了。

仔细观察当时的形势，平心而论，袁崇焕闻变后的军事布置，不说是平庸，甚至说是有失水准的。后代的战争史学者在还原当时的情形时，认为袁崇焕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飒爽英姿。譬如，知道皇太极绕道破关进入内地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应该知道：此时的辽沈地区已经变成了皇太极的软肋，变成了后金汗国设防薄弱的要害部位，如果立即挥军直扑沈阳城下的话，效果将直如黑虎掏心，孤军千里深入明境的皇太极立即就会方寸大乱，让人根本无从想象他能怎样对付这一记漂亮的直拳，加上皇太极曾经与代善、莽古尔泰的争吵，他可能根本就无法收拾未来的局面。可惜，乱了方寸的不是皇太极，而是袁崇焕。已经成为军事艺术经典的围魏救赵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却

似乎没给袁崇焕留下什么印象。在皇太极的调动下，他走出了最平庸的一步——携大将祖大寿、何可刚率领数万兵马星夜驰援北京。

十一月初三日，皇太极率兵会师于遵化城下时，袁崇焕星夜兼程驰进山海关；初十日，他取山海关到北京最近的间道赶到了蓟州。此时，袁崇焕继续着平庸的军事布置——沿途分兵把守一路上的城镇——抚宁、永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迁安等，致使自己直接掌握的兵力越分越少。据说，唯有袁崇焕入援的速度令皇太极十分惊异，因为皇太极迟至十二日才来到蓟州。

按理说，袁崇焕既然星夜兼程来援，自然应该尽一切努力将皇太极堵截在京畿之外才对。可是提前来到蓟州的袁崇焕，却轻而易举地让皇太极绕过蓟州城，继续西进；袁崇焕则在另一条路上几乎与皇太极平行着向北京方向运动。

就这样，皇太极三天之内连下玉田、三河、香河三城，于十一月十五日长驱直入来到通州，袁崇焕则在同日来到香河南部、运河西岸，距离通州半日路程的河西务一带。

就在这时，那位将领建议袁崇焕，大军应该逼近敌人，不应该直入京师。他建议袁崇焕在通州一带寻找战机，易攻则战，不易攻找机会也要攻，无论如何也要在通州和北京之间建立一道防线，绝不能让皇太极无遮无挡地打到北京城下。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而袁崇焕却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导致后金汗国军队直薄京师城外烧杀抢掠，致使城中官民大恐慌，怨声四起，几乎所有人都无法理解袁崇焕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

其实，原因很有可能特别简单，那就是袁崇焕的兵力经过一路分兵，如今已经太过薄弱。加之十几天奔驰赴援，他的官兵已经疲惫不堪。此刻，随他来到此地的部队人数约有两万人多一点。这个数字与皇太极麾下的至少八万大军比较起来，实在众寡过于悬殊。因此，他希望能够进北京稍事休整，然后在皇帝的支持下，号令各地来援的勤王部队，与皇太极从容周旋。其中，很难排除他希望就此谈和的可能性。他是这样做的，证明他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挑出九

千精兵，亲自带领他们间道赶到了北京城下，其余一万多人则在后来开到北京城下与他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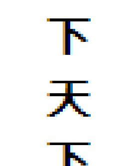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率军来到北京左安门外，京师戒严，他无法进城。当日夜，几乎与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同时，谍报驰奏后金军前哨出现在北京城东北角的土城关一带。一时间，京师大震，谣言四起，人们盛传袁崇焕召敌进京。同日，皇帝破格重用的一个类似今天气功大师的人物也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与五百年前“靖康之耻”时有些类似的悲喜剧。

五百年前的公元1127年，前金国大军打到北宋帝国首都汴梁城下时，北宋末代皇帝曾经听信一个气功大师的话，出重金让他以六丁六甲之大法，训练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男子演练神功。据说，训练完成后，可刀枪不入，灭金兵擒金将易如反掌。结果，这批据说已经神灵附体的神汉，在金国军队的金戈铁马面前，非死即伤，为首的大师趁机脱出危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壮丽如画的帝国首都则就此陷落。

如今的大师名叫申甫，据说曾经在云贵高原的深山密林中受神仙点化，能够驱使妖魔鬼怪前来杀敌立功、报效皇帝。崇祯皇帝听说有这等异人，立即召见，并当即授其为帝国副总兵，拨白银七万两，供他招募神兵神将，打造鬼怪作战时乘坐的战车。袁崇焕到达京师的这一天，申甫刚刚登坛誓师，然后率领在北京城中招募来的七千游棍浪人，驾驶着重金打造的战车，轰隆隆开出北京城。

后金汗国军队明明出现在北京城的东北角，大师出城后却径直向西南方向杀去。谁知这位大师不走运，偏偏皇太极派出了一支部队，在北京西南方向活动。结果申大师和他的七千神兵神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任何对手地杀到卢沟桥畔，刚刚以为可以松口气时，却迎头撞上了真正的凶神恶煞。最后，皇帝用七万两白银打造的一支神仙部队，据说顷刻之间便被宰杀得毛干爪净，连大师都被砍掉了脑袋。

此刻的皇帝，已经全然失去进行正确判断与决断的能力。在



着意抚慰袁崇焕的同时，将其他地方来援的部队放进城中休整，却坚决不允许袁崇焕带来的部队进城，致使袁崇焕只能率领疲惫的部下，与皇太极做殊死战。

平心静气地观察此时的情势，的确与五百年前岳飞被杀之前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当时，金国大军统帅兀术允诺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宰相秦桧，谈和可以，归还陕西河南失地也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杀掉岳飞。后来，经过淮西之战，在皇帝赵构的授意下，由秦桧主持，冤杀岳飞，双方便真的达成了和议。

以此反观今日之情势，在袁崇焕与皇太极的长期博弈中，皇太极对于和谈似乎总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同时一再以可以考虑归还辽东土地为诱饵，要求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如今毛文龙已死，袁崇焕可能真的认为通过和谈，可以收复辽东失地了。他不知道皇太极需要和谈与他袁崇焕需要和谈一样，是有自己的目的在，皇太极想要的应该不仅仅是毛文龙的脑袋，他的目标指向的其实正是袁崇焕自己。

此时此刻，大明帝国重臣中，出什么主意的都有，唯独没有人敢说出议和的话来。因为只要这话一出口，立即就将被看成是秦桧再世，可能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后世的史家中，始终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深谋远虑，在和袁崇焕的博弈中，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连环借刀杀人计：用归还辽东失地为诱饵，借袁崇焕的刀，杀死毛文龙；然后以此为契机，一步一步将袁崇焕推到一个百口莫辩的境地，再借崇祯皇帝的刀，杀死袁崇焕。

在后代的战争史学者那里，一个很大的疑问似乎也在佐证着这种看法。

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战争史学者们很难找到皇太极发起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动机究竟何在？他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在现有的史料中几乎全无记载。是为了抢掠物资？为了威胁明室京师？为了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这一主要作战通道？似乎全都有一点，又似乎全都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在悬师深入数千里，孤军奋战于充满敌意的

汪洋大海之中时，皇太极竟然能够于整日厮杀的百忙当中，从容展布，将其最大之杀父劲敌袁崇焕置于必死之冤狱，然后在敌人的土地上，优悠游走、予取予夺达七个月之久，最后意态雍容地全身而返。就凭这一点，皇太极的此次军事冒险行动已经足够在世界战争史上耀眼夺目，而皇太极本人也足够称为东方式政治博弈的绝顶高手了。

事实上，皇太极是不是真的如此深谋远虑，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实际发生的一切已经形成了和上述说法一模一样的线条，形成了对于皇太极来说最为有利的一种情势。据说，皇太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阅读大明朝的邸报，对大明帝国君臣瞒上欺下的一套了如指掌。在频繁的博弈互动中，皇太极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袁崇焕并没有将他与自己和谈的情形完全报告给皇帝。对于袁崇焕来说，皇帝授予了他处理辽东事务的全权，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而对于皇帝来说，虽然给了袁崇焕这种权力，却又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由此，皇太极几乎分毫不差地拿捏着帝国官场、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心理。最终，将袁崇焕送上了百口莫辩、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他那看似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简单一招中，包含了太多交手双方的社会心理因素。其中，诚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那样，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几乎汇集了所有在中国形成悲剧的基本要素。给皇太极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范文程。这个人实在是太了解中国官场中人的行事品格，太了解他故国的皇帝与臣子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太了解我们帝国的帝制传统和皇帝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等文武官员。史书记载说，袁崇焕将前来传旨的使者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小帽来到朝廷。习惯上，帝国官员只有戴罪在身时才会如此打扮。崇焕“先张皇敌势耸朝臣，冀成款议。见上亦然。上慰谕久之。崇焕惧上英明，终不敢言款。第力请率兵入城，不许”。意思是说，袁崇焕先是在群臣面前耸人听闻地渲染敌人的声势，意图在于促成和议，见到皇帝之后也是如此。为此，皇帝安慰激励了他很久。他害怕皇帝英明，始终没

有敢于把建议和谈的话说出来，只是坚持请求允许他率兵进城，皇帝不许。从后来发生的情形判断，袁崇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在，否则他不会把皇太极派到这里来跟他议和的使者带进京城。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再一次请求按照其他援兵的成例，允许自己麾下的将士进城休息，皇帝仍然不许。（谈迁《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丙午条）

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率宁锦铁骑与八旗铁骑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数次受伤，只因身穿重甲方才免于战死。据说，如果不是他的一个助手拼死格斗，一个八旗骑兵的大刀就砍到他的头颈上了。激战中，京营官兵据城观望，并不救援；而危急之中，那已经占了上风的八旗铁骑居然离奇地撤离了战阵。几天之内，在北京城下，这种情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而且都是发生在八旗军与袁崇焕所部交手之际。这时，袁崇焕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这其中的奥妙了。

当时，还发生了几件事，证实袁崇焕已经受到北京军民深重的怀疑：

袁崇焕的主要助手祖大寿和袁崇焕一起率军驰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他带来的部队和袁崇焕其他部下一样，被拒绝进城休整。而且城头上的守城军民痛骂他们是贼，纷纷抛石块袭击，结果砸死了几个战士。祖大寿派遣巡逻的士兵，也被守城军民当成间谍杀死。他手下的将士后来曾经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在北京城下驻扎时，城上军民一度用大炮轰击，炸死了不少战友。”

袁崇焕危矣。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激烈厮杀了一天的北京城下，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城头上刁斗声声；城外八旗兵营里，除了巡逻兵和偶尔传来的战马嘶鸣，一片沉寂。沉沉黑夜，似乎在酝酿着更大的厮杀与阴谋。

两个明朝太监，一个叫杨春，就是在许多史书上反复提到的杨太监，另一个叫王成德。他们本来在北京永定门外南海子皇家游乐场里工作，前几天被八旗兵俘虏，如今由汉军将领高鸿中、鲍承先、

宁完我负责看押。此时，看押他们的将领出去了，两个俘虏在恐惧中难以入睡。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他们赶快装出熟睡的样子。高鸿中、鲍承先走进军帐后，警惕地来到太监身边，仔细观察他们是否睡熟。随后，二人压低嗓音议论说：刚才汗王单独一个人走向敌营，和他们营里出来的两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现在才知道白天撤退是汗王的大计。看来，和袁崇焕的合约成功了，咱们马上可以进北京了。

两天后，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杨春与王成德趁敌人看守松懈，逃回北京。他们狂奔回皇宫，声称有重大机密要立即求见皇上。崇祯皇帝听完二人讲述后，认为与自己对袁崇焕的怀疑完全吻合，遂下定处理袁崇焕的决心，从而揭开了整个晚明前清历史上至为惨烈的一幕。（《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朱由检以议饷之名再次召见袁崇焕等一干文武。会议开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劈头责问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援兵逗留不进？为什么和皇太极几乎同时到达北京城下？为什么一再要求进入北京？为什么在袁崇焕的兵营里有皇太极的使者？袁崇焕事出突然，一时瞠目结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皇帝随即下令捆绑袁崇焕，交锦衣卫镇抚司监禁。一位大学士看到皇帝竟然如此处置袁崇焕，颇为不安，叩头请求皇帝慎重，皇帝道：“慎重就是因循姑息，有什么用？”

袁崇焕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史书记载说：随袁崇焕、祖大寿驰援京师的辽东三军将士，在北京城下放声大哭。

八个月以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子兄弟被流放到了边远地区。在皇帝为此下达的圣谕中，历数袁崇焕的罪恶，说他阴谋叛逆，欺骗皇帝，危害国家，为了获得敌人的信任而杀死大军统帅，导引大敌入犯京师，屯兵观望，暗藏敌人使者，坚请入城，居心叵测，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万恶之徒云云。（谈迁《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

袁崇焕从受到崇高而广泛赞誉、奉皇帝召唤出来重新工作，





到他被捕入狱，时间不到一年半，到他被凌迟处死的时刻，刚满两年时间，他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家人受到了同样野蛮而严厉的处置：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死，十五岁以下者，发配给功臣为奴。朱由检做出上述判决后，群臣顿首称谢。朱由检问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所有臣僚都认为：袁崇焕实在是罪不可赦。包括一年前那些给予了他崇高赞誉的人。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可怕的官僚机器。

从袁崇焕被捕入狱到被处死的八个月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他是冤枉的，没有什么人试图帮助他摆脱困境。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再到士绅民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切齿痛恨，认为他罪该万死，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直到后来改朝换代之后，在敌人的文件中知道了他的冤枉为止。

袁崇焕被杀前三十年，公元1600年，一个名叫布鲁诺的意大利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据说，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罗马人民纷纷向他投掷石块并向柴堆上添加木柴，大火燃烧起来后，这位人类科学的殉道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神圣的愚昧。"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

就这样，从大明天启六年、后金汗国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重创努尔哈赤起，到大明崇祯三年、后金汗国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止，在皇太极与袁崇焕长达四年的博弈中，如今终于分出了成败胜负。

平心而论，不管是行险还是行诈，皇太极胜得超越、豪迈、大气；而袁崇焕，其杰出的胆略与才华也确是不同凡响，他的失败实际是败在了皇太极、崇祯皇帝、他的同事和人民，再加上帝国制度与

政治文化传统联合绞杀的政治迷局之中。

袁崇焕的死和大明帝国的死一样，其内在逻辑无可回避。不同之处在于：袁崇焕的死令人扼腕叹息；而大明帝国的死，毫无值得惋惜之处，这个烂透了的政权早就该死了。

事实上，对于这个王朝死去需要扼腕叹息的地方，仅仅在于其死去的过程拖得太长、民族与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而已，而这可能恰好是大明帝国臣民所必须承受的。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反省。袁崇焕被捕之后，大明朝军队兵败将死，帝国腹心京畿地区百孔千疮，一片糜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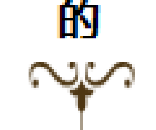
——除袁崇焕外，被视为帝国柱石的一代名将满桂战死，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大将赵率教战死，帝国军队中高级将领有三十多人战死、被俘、投降或失踪；

——后金汗国军队经过的地区，敌军未到便已经逃亡一空的有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家湾；城中一空而敌军并未进入的有霸州、三屯；投降数日后敌军方才姗姗而来的有玉田、迁安；军队先降而行政官员尚不知情的有遵化、永平（即今天之河北卢龙）；插上降旗而敌军并不理睬擦城而过的有顺义；敌军压城后没有反应不知是想降还是想战的有房山；敌军来后降、走后守的有乐亭、抚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党还醇良乡殉难）

上述情形明白无误地宣示出下列判断是有根据的：

——大明帝国不仅仅是在打一场完全缺少总体战略指导的战争，而且是在为以往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付出代价。这个帝国从此变成了一个正在解体中的帝国。

史书记载说，由于组织工作过于缺乏水准，这次来京入援的地方部队中，很多将士不但领不到军饷，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由此导致了不止一次的哗变。当时，陕西发生饥荒，盗贼蜂起。皇太极兵临京师城下后，延绥、固原、甘肃、临洮、宁夏五镇总兵全部率兵进京勤王，西北一带地方空虚，致使遭遇灾荒的当地饥民暴起为寇之后，迅速蔓延。而山西巡抚率领五千精兵驰援北京时，由于调动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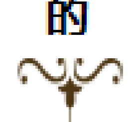


章法，将士疲于奔命，且没有粮饷供应，结果饥寒之兵抢掠民间以充军用。事发后，那位巡抚被捕，五千劲卒一哄而散，就这样西北援军纷纷溃散。许多证据显示，那些来自上述地区的哗变军人，烧杀抢掠着踏上了回乡之路，很快汇进了当地的农民暴动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暴动农民中的勇猛战士，有的还成为最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譬如，有记载说，李自成就是甘肃总兵杨肇基部下的把总，他就是在此次赴京勤王途中，走到金县时哗变的。（《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这个国家烽烟四起再无宁日，大体上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而亲身体会到了这一切的后金汗国将士，士气高昂饱满得似乎要爆炸。他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下令攻打北京城。皇太极意气风发，微微一笑，说道：

“现在拿下皇城里的那个傻小子，易如反掌。不过，他们疆土大，根基还在，不是旦夕之间就能垮掉的，得之易，守之难，不如练好我们自己的精兵强将，等着天意亡他那一天。”（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太宗伐明）具有这种头脑的一个人，他的确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对手——崇祯皇帝，那个自我感觉极好的“城中痴儿”——皇城里的傻小子。



第十一章 大明重臣洪承畴降清内幕

松锦之战，使大明帝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是大清帝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最后一次殊死战。这场大会战，是皇太极生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其判断和指挥称得上出神入化，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从此，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内外敌人了。

两年后，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大明崇祯二年、后金汗国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这一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蒙古奔袭大明帝国首都北京。就在这差不多同一时刻，西北山陕地区陆续发生了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暴动。

此后，大明帝国烽烟四起，它不得不在对抗大清铁骑的同时，费尽心机地力图遏制四处流窜的暴动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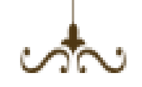
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皇太极，还是张献忠、李自成，均大受其益。他们结成了事实上的统一战线，成了素不相识、素无往来却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奋战于不同的战线，向他们备受憎恨的共同敌人大明帝国发起攻击。

就这样，大明帝国曾经强横无比，由于自我感觉过好而极度傲慢，如今受到了来自外部敌人和自己内部治下人民两个方面的憎恨。帝国无比艰辛地周旋于内外强敌之间，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腹背受敌、四面作战的窘境。

皇太极曾经和他的部下谈起过自己对于明王朝的总体战略：大明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要想一下子推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因此自己要带领他们砍伐这棵大树的枝枝杈杈、根根梢梢。等到这树枝秃根朽之后，轻轻一推，它也就轰然倒地了。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皇太极看着壮丽如画的北京城，不无轻蔑地说道，此时拿下那皇城中的“痴儿”，大约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攻之易而守之难，于是他放弃了攻打北京城。皇太极具有极强的定力，其战略思想显然是明确而一以贯之的。为此，甚至有部下认为他太过于瞻前顾

后，太过于谨小慎微了。

这一次绕道奔袭大明京师，皇太极获得重大战果。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又陆续发起了四次大规模的长途绕道奔袭，每一次都战果丰硕，大体上达到了下列两个目的：其一劫掠了大量人畜物资，其二极大消耗了大明的力量。此外，于有意无意之间，还在第二战场、两线作战的意义上，特别强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张献忠、李自成们的发展壮大。



松锦之战，则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他对大明这棵老朽的大树，完成了诸多砍伐工作后的最后一击。

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大将满桂，死了；号称一代名将、被袁崇焕倚为臂膀的赵率教，死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战死沙场，死在了抗击敌人的阵地上，算是死得其所。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死了；号称肝胆义气奇男儿的袁崇焕，死了。他们则是死在了自己的皇帝手中，死得惨烈无比，死得充满了负面的价值。而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孙承宗，也被皇帝不由分说地免去职务，黯然回乡了。

时人和后人谈到此时的大明帝国，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贿赂公行，党争剧烈，刑章倒错，宵小横行。意思是说，贪污受贿成了公开的秘密，帝国官场中不问是非善恶只看是不是自己人，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国家重用奖励的大多是些坏蛋，品行高尚才干卓越之士或者命运悲惨或者很快便被边缘化，而贪官污吏、宵小坏蛋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帝国堂皇的庙堂之上。在内外敌人和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大明帝国似乎在目不暇接的转瞬之间，便完成了从花团锦簇沦入百孔千疮的全过程。

速度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松锦之战发生在皇太极和洪承畴之间。

此时，偌大的一个大明帝国，如果说还有能够和皇太极抗衡的人物的话，或许就只有洪承畴和孙传庭了。他们之间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悲喜剧。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字亨九，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此人能

文能武，富有才干，曾经是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们的真正克星。

当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闯将时，闯王高迎祥就大败于洪承畴指挥的一次大战中，他本人也被洪承畴指挥的孙传庭所俘，并被送往京城处死。李自成成为闯王后，在与洪承畴的陕西潼关南原一战中，全军覆灭，李自成仅仅带领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恰在此时，皇太极发动了针对大明朝的军事行动。假如崇祯皇帝多一点点政治谋略和战略头脑，不是急吼吼地将洪承畴和孙传庭调去对付皇太极的话，李自成可能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可能会死在商洛山中，而不是后来的九宫山。当时的大诗人、大学者吴伟业认为，大明帝国“危亡之局，实决于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六）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意识到，这种见解的确有根据而且十分准确。

这件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冬天。这年冬天和后来发生的事情，充满黑色幽默，其情节之离奇，让人无法置信，可能足以令不管拥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小说家都要瞠目结舌。

洪承畴担任大明帝国陕西三边总督时，曾经专门负责平息关中地区的农民暴动，孙传庭是他极为得力的部下。孙传庭有大才干，治军严整，作战作风凶悍而富有谋略，在与暴动农民的周旋中，屡立大功。高迎祥死在他的手里，李自成也大败在他手下，一大批农民军首领都曾经吃过他的大苦头。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他似乎就没有打过败仗。《明史》作者认为他“沈毅多筹略”，就是深沉刚毅多谋善断的意思。（《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假如运气足够好，或者上天能够赋予他另外一种才能的话，他有可能成为大明帝国末年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可惜，他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上天对他还不够关爱，没有在赋予他处理军国大事之能力的同时，还赋予他帝国官场更加看重的才能，比如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乖巧一点，更讨人喜欢一点等等。结果，他性格和才能上的此种特征，导致他的顶头上司很生气，后果也就变得特别严重。

差不多就在他屡立大功的同一时间，崇祯皇帝特别着迷地宠

信上了杨嗣昌，几乎给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理军机大事的全权。偏偏孙传庭无法苟同他的诸多决策，并上书皇帝申诉自己的看法，导致杨嗣昌切齿痛恨之。在此前后，孙传庭还因为缺少投人所好的才能，把一位同样得罪不起的大太监高起潜也得罪得不轻。于是，孙传庭应该受到的奖励和晋级便多次被压在杨嗣昌手中，他的部下也自然受到了同等待遇。

潼关南原战后，李自成全军覆灭，只有十八骑随他逃遁到商洛山中。就在孙传庭和洪承畴准备彻底搜剿商洛山时，皇帝急急忙忙地命二人率部进京，前去保卫京畿并对付皇太极。就此，李自成获得了一线生机，而孙传庭则掉进了无边的噩梦之中。

孙传庭接到崇祯皇帝的调令，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赐尚方剑，代刚刚战死的总督卢象升对抗入侵清兵。当此时，孙传庭带兵来到了北京郊外。杨嗣昌和深受皇帝喜爱的大太监高起潜不愿意孙传庭见到皇帝，二人找了许多理由，证明孙传庭十分招人讨厌，说服皇帝下旨“切责”——痛斥孙传庭，并以京师戒严为名，不许他进京朝见。

恰在此时，洪承畴也赶到了京郊。皇帝不但派人来到郊区犒劳，而且命他即刻朝见天子，搞得孙传庭意兴阑珊，颇感郁闷。

随后，在杨嗣昌主持下，做出了一系列决策。此时的孙传庭还是没有学会看人脸色，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和杨嗣昌辩驳不已。他认为，不应该把陕西精兵长期调离山陕地区，以防发生不可测之后果。他说的一切被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一年之后，李自成就是在陕西部队被调走后，休养生息并东山再起的。然而，倒霉的是，预言家本人不但两个耳朵都聋了，而且在他的预言被证实的过程中，他只能在皇帝的监狱里苦熬时光。

关于孙传庭耳聋的经过，《明史》中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意是说，孙传庭坚决劝告杨嗣昌接受自己的忠告，“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表明他的耳聋与心境的极度焦虑郁闷有关。

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大体过程是：

孙传庭接受皇帝的调令时，曾经上书皇帝，其中谈道：“边疆事务败坏到这种程度，原因是决策失误；目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请求皇帝允许我当面商决大计。”（《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孙传庭）不久，适逢京师解除戒严，皇帝重新任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也就很自然地请求觐见皇帝。杨嗣昌知道后，大惊，以为孙传庭是要在皇帝面前对付自己。于是，将孙传庭派来投书的人拒之门外，并将给皇帝的上书一并退还本人。孙传庭大为恼火，立即上书皇帝，“引疾乞休”，就是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杨嗣昌一见，也立即上书皇帝，弹劾孙传庭，说他并不是真的聋了，而是以此为借口，发泄对皇帝的怨气。崇祯皇帝遂大怒，下令撤销孙传庭的一切职务，废为平民。然后，想想不过瘾，又派一位省级官员前去核实孙传庭那厮是真病还是假病，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这位官员核实后报告说：孙传庭真是聋了，不是托词。皇帝又大怒，索性把这位官员和孙传庭一起抓进了监狱。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

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

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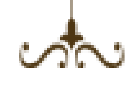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





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

令人不胜叹息的是，情况若仅仅是这样的话，还算是很不错了。大明帝国此时糟糕的景象，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达到了糟不可言的地步。

有一次，皇太极率兵来到明军城下，皇太极挑战说：“如果你们出兵一万人的话，我就只以一千人应战；你们要是出兵一千人，我就以一百人应战。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仗，你们也可以掩饰一下欺蒙皇帝的罪过，要不然，总是空口说白话地骗你们的皇帝，你们不觉得太可耻了吗？”这种挑战，皇太极做过不止一次，大明帝国军队从来没有人应战。（《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八月己卯条）

一位大臣告诉崇祯皇帝：山西崞县（即今日之原平），只有两千左右敌人，俘获了一千多当地男女，经过代州城下时，被俘的人

们与城头上的亲人遥遥相对哭泣，城上始终不发一兵一卒救援，任清军饱掠而去。崇祯皇帝听后，“顿足太息”，没有任何办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有一位兵部尚书，名叫张凤翼。清军攻破长城进入内地后，他担心皇帝问罪，于是，主动请缨，愿意率领各路援军抗击清兵。皇帝十分喜悦，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尚方宝剑，白银万两，赏功牌五百。于是，张凤翼很威风地率军出发了。此后不久，清军在河北地区攻城略地，我们的兵部尚书和当时的蓟辽总督梁廷栋仿佛送行一般，仅仅跟在清军后面转来转去，始终没有接战。

事情的高潮出现在最后。

清兵饱掠女子、玉帛、牲畜之后，决定回家了。他们选择建昌、冷口北撤。按照一般军事常识，撤兵时，应置精兵殿后，以防备敌人追袭。此次，清军大模大样地采取了一个很少见的做法——将大军主力放在最前面，将所有辎重和抢劫来的物资放在最后，大小车辆装满胜利的喜悦，一路逶迤而去。史书记载说，他们让所有抢来的妇女一律穿上鲜美的服饰，浓妆艳抹之后坐在车上，然后，鼓乐齐鸣地一副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为什么却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之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

太监权力很大，因为他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如火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迅速被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俗语的精当准确。

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天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

不幸的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就这样吧，让我们书归正传。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

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

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想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

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朝鲜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说：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大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起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

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兵部尚书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其二，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说：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兵部尚书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兵部尚书，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之夜扪心自问，想必阁下心中也会觉得不安吧？

皇帝显然觉得自己的兵部尚书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对步步为营战术的赞同，密令洪承畴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进兵。洪承畴没有办法了，他没有能够坚持住，他不敢冒违旨抗上的大风险，他只能奉命而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大明帝国决策层缺少统揽全局之头脑、眼光，缺少持之以恒的政略、战略原则立场，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任何奸臣的奸计和内外敌人的打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正是因为决策层素质的缺失，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局面。

当年，辽东战事初起时，指挥萨尔浒大战的大明前敌统帅，就是由于皇帝限期破敌的严厉指令，从而无法顾及天气、地形等诸多

因素，匆匆拟定战法，匆匆出兵而导致全军覆没；皇太极第一次兵临北京时，素有名将之称的蒙古族大将满桂，身受重伤，也是在皇帝一再催逼下，洒泪出战而战死沙场；蹲了三年大牢的孙传庭，出狱后，兵马没有训练好、粮草器械没有准备足，便在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下匆匆上阵，结果稀里糊涂地死在了被他多次打败过的李自成手下。如今，轮到洪承畴在这同一块石头上绊跤了。

在清军方面，情形却变得全然不同。此次，皇太极带领前来赴援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千人。十九日，皇太极到达前线后，登山观察情势，见明军布阵严整，曾经感叹着对部下们说："人言洪承畴善于用兵，真是如此。难怪大家怕他。" 随后，皇太极发现明军众多部队集中在前部，后面的预备队则稀疏简陋。于是，皇太极大胆分兵：一路大军于松山与杏山之间，由山至海，将大路拦腰截断，致使两地之间的饷道和信息完全被阻断；另派一路部队袭击明军驻在塔山的护粮部队，致使明军的粮草基地落入清军之手。

这两个布置干净利索，双方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明军既失去粮道，又于战守之间首鼠两端，只能收束部队，背靠松山城列阵。

皇太极则准确断定：洪承畴大军从宁远出发到松山，携带的粮草决不会超过五六日，届时，势必要向西运动，以图返回宁远就粮。于是，皇太极埋伏重兵于松山与宁远之间的各个要隘，邀截明军后路，同时增兵防守刚刚夺到的粮草基地。皇太极自己则率大军列阵以待。

八月二十一日深夜，明军果然向宁远突围。当时，各军轮番殿后，严阵迭退，秩序井然。谁知，数日战守失措，使部队心慌意乱，一路大军统帅率先夺路狂奔，导致全军大乱，争先奔逃。皇太极伏兵四起，到处截杀，明军全线崩溃。吴三桂等大将仅以身免，逃进了宁远。洪承畴等不到一万人被拦截在松山城中，明军阵亡五万三千余人，遗弃之枪炮火器数以万计，四位大将下落不明。而清军自称全部伤亡只有十人。

至此，锦州城中的粮草即将告罄，解围突围均已无望；大军

统帅洪承畴则困守松山，陷入清军重围。宁远诸军失去统帅，充斥了一城的残兵败将，完全丧失斗志。而皇太极则在到达前线之后，仅仅三天，便将战局彻底扭转过来。由此，皇太极达到了军事指挥生涯的辉煌顶端。

随后，皇太极挥军将锦州、松山团团围住，并掘壕堑、筑高墙以困之。大明辽东诸军，危在旦夕矣。

一个月后，九月十三日，皇太极秘密离开了松锦前线，经过又是六个日夜的昼夜兼程，急急返回了盛京沈阳。

据说，从沈阳传来消息，庄妃即后来孝庄皇太后的姐姐、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重，此时已是弥留之际。这位宸妃名叫海兰珠，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于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于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她的亲姑姑、位居清宁宫的中宫皇后哲哲。她可能是皇太极一生中真正倾心相爱的一位女子。这位多情天子扭转了战局之后，便扔下全军，悄悄赶回沈阳探病去了。

从松锦前线到沈阳的路程，大约为六百华里，皇太极在第六天清晨赶到沈阳。进城前得到消息：宸妃已经病逝。据说，为了赶路，皇太极昼夜兼程，六百里跑死了六匹马。

在这一个月里，他指挥部下将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明军大部击溃，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应是皇太极敢于放心离去的重要原因。

由此，被围困得密不透风的松、锦二城稍许透上了一口气，遂靠从天津海运粮饷至松山以济久困之师。而偌大的大明帝国风雨飘摇，已经再也没有力量派兵救援了。

第二年，大明崇祯十五年、大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洪承畴部下一个叫夏成德的副将投降清军，约为内应。松山城由此陷落，洪承畴等被俘。随后，皇太极命令将洪承畴解送沈阳，同时下令把几乎所有被俘官员、将领、士兵共计三千余人全部杀死。据说，在今天的松山，还有一个地名，叫“马失前蹄处”，就是洪承畴突围时，在此处被绊倒，继而被俘之处。

就这样，洪承畴的悲喜剧，还没有达到高潮就进入尾声了。原因是，由于大清朝官方史学工作者和汉族士大夫结合后，生下了一个怪怪的史籍怪胎，令洪承畴到沈阳后的遭遇变得高度扑朔迷离，读起来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功效，让喜欢较真的读者，会时常一头雾水地怀疑古人或者怀疑自己的智商。于是，我们只能拼凑各种史籍上的记载，尽可能地去还原当时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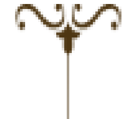
据说，还在松山城中时，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被承畴坚决拒绝。叛徒献城而被俘后，清兵将他带到主帅面前，强迫他下跪，他轻蔑地说道："我乃天朝大臣，岂能在小邦王子面前下跪！"在我国历史上，除非极特殊的情况，一般说来，战败者若敢于在胜利者面前说出这种轻蔑语言的话，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到沈阳后，洪承畴被关押在三官庙里。他决心一死，每天披头散发，赤着脚，骂不绝口，并绝食不进水米。皇太极和历史上那些禀赋极厚从而开创出大格局的如李世民、赵匡胤一样，器量、胸怀极大，一心想要收服洪承畴为己所用。于是，把沈阳城中所有能动员的人包括那些洪承畴昔日的同事全部动员起来，让这些大明朝过去的臣子现身说法。结果，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承畴的冷落、轻蔑或痛骂，闹得臊眉耷眼好生无趣。

范文程没有做过大明朝的官，自然就比那些挨骂的人从容了许多。《清史稿》记载说："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洪承畴披头散发光着脚跳脚骂人时，范文程不理他，慢慢地谈古论今，两人居然聊起天来。在这个过程中，范文程注意到，房梁上的尘土落到洪承畴的身上，洪承畴将其轻轻拂去。回来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肯定不会死，这种时候，他连衣服尚且爱惜，何况生命呢。"

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洪承畴投降的人，应该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在大清朝受到广泛尊敬与爱戴的庄妃——孝庄皇太后了。

洪承畴投降后，《清史稿》中记载了发生在皇太极与洪承畴



之间的一次对话：

皇太极问洪承畴："明朝前方将帅力战被俘或者力不能支投降后，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被皇帝下令杀死，或者沦为奴隶，这是过去就有的制度，还是新立的规矩？"

到此时，洪承畴似乎仍然不愿意说出对崇祯皇帝不敬的话，他答："过去没有这种制度。近年来，朝臣们一再对皇帝讲，才这样做的。"

皇太极叹息道："君昏臣奸，才会这么滥杀无辜。将士们力战被俘，应该拿出多多的财宝把他们赎回来才对呀，怎么反而要迁罪于他们的妻子儿女呢？残忍暴虐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未免太过分了。"

洪承畴泪流满面，说："皇上说的真是至仁之言。"

随后，皇太极命令设宴款待洪承畴，他自己回到了后宫，叫人带话给洪承畴："我的妻子刚刚去世，不能参加欢迎你们的宴会，你们不要介意。"（《清史稿》列传二十四，洪承畴）

揣度此时洪承畴的心境，他或许会想起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想起莫名其妙战死沙场的前任总督卢象升，想起自己的老同事与部下孙传庭，想起不久前被崇祯皇帝下令杀死的三十多位高级文武官员。这些官员中，确有罪有应得者，而多数则是无辜的，有的人根本就有功无罪。仅仅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指挥调度失误，需要有人做替罪羔羊，也需要平息皇帝的愤怒，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便只能走上刑场。

洪承畴的命运表明：当一个国家由于它的领导阶层失道失德失去理性而最终失去了人心的话，那么，哪怕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和最为严酷的非制度性惩罚都将失去作用。届时，由于社会性的不公正，将导致人们不再认为祖国与荣誉是值得珍视的，人类情感中最接近动物性本能的——诸如明哲保身、好死不如赖活着、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等等低级趣味，将成为人们最自然而然的选择，不论面临这种选择的人曾经拥有过多么高贵的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公正客观地说：兵力人数超过了皇太极的洪承畴，实在是败在了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敌人手中。

史书记载说，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极为喜悦，除赏赐了大量财物外，还下令“陈百戏”——大约就是举办盛大演出，以示庆贺。为此，贝勒、将军们很不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洪承畴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如今，却比俘虏了他的人们还要风光，这是怎么闹的？

皇太极问他们：“咱们栉风沐雨、出生入死，所为何来？”

诸人曰：“想打进中原呀。”

皇太极说：“对啦。咱们就像行路的盲人，现在，我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引路的，如何能不快乐？”史称：众人咸服。（昭梿《啸亭杂录》卷八）

两年后，清军大举入关。在平定中原、江南和西南地区的进程中，洪承畴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证明皇太极的心胸与眼光深邃远大，的确不同凡响。而洪承畴也为此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长久的鄙视。至今，对于此人仍然言人人殊，无法盖棺论定。

这位大明帝国与大清帝国的两朝重臣，是一位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的渊博之士。由此推断，对此，他应该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才对。

第十二章 皇太极入主中原，大清帝国登场！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期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媲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

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

久，便率兵攻打叶赫部落。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其中，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和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等等。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

大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这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也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不可小觑。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

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崇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

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瞩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以至于不可收拾。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

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是不胜枚举，称得上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郑忠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

固统治，是在皇太极的十七年执政生涯中奠定的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之《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如此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迹，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那么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就是



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道：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天聪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及范围极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宋、元、明、清，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其当时，汉字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

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为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

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其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

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

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赴援。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十五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

三天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六月

七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平心而论，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十一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是无中生有。皇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众人异口同声，以为应该处死阿敏。最后，皇太极下令将其幽禁起来。（《清太宗实录》卷七）

十年后，即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

接下来，轮到了莽古尔泰。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中，他能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显然与他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有关。莽古尔泰很早就与皇太极并肩作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度还很亲密。二人反目是在阿敏被幽禁的第二年。

大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十二日，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城，猛攻不下，伤亡甚众。第二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如今被差遣出去的精兵归还给他。皇太极说："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总是违误。"莽古尔泰说："一有差遣，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什么时候有过违误？"皇太极恼火道："果真如此，就是诬告，我会严加追究；如果揭发属实，就要把违误者绳之以法。"说完，皇太极红头涨脸地准备上马离去。莽古尔泰急了，说："皇上应该出以公心说明白，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因为你是皇上，我一切都顺着你，你却这么不知足！难道是想杀我吗？"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注视着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见此情形，忙打了莽古尔泰一拳，并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呀。"莽古尔泰怒骂道："蠢东西，竟敢打我！"说着，将佩刀拔出了半尺许，德格类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

回到营帐后，皇太极对诸贝勒将领痛骂道："他不过是个弑母邀宠的家伙，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看他拔刀，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大凌河战役结束后，当年十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五牛录。莽古尔泰也在事后表示，当时喝酒喝多了，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第二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掠大同、宣化的战斗，十二月，莫名其妙地死去。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参加了莽古尔泰的丧礼，直到后半夜才回来，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大哭了一场。（《清史稿》列传四，诸王三）三年后，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一个月，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牌印，遂削夺封爵，莽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六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入官。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最后，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

现在，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代善推举最力。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已经基本过世，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其声望远在阿敏、莽古尔泰之上，且性情宽柔得众人心，是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平衡器与稳定器。可能与母亲佟佳氏和哥哥褚英的遭遇有关，代善表现得谦退平庸，没有显示出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我们无法断言，代善究竟为什么自动退出汗位竞争，转而全力支持皇太极。有自知之明？为了六年前与大妃的暧昧传闻？顾全大局？皇太极众望所归？我们不得而知。从代善一生行事品格推断，也许是上述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所致。

一般说来，皇太极和代善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

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譬如，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争吵时，明明有可能是皇太极理亏，代善仍然气恨恨地斥骂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并在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并肩而坐，使皇太极顺利实现了“南面独坐”。（《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十五）

天聪九年，多尔衮远征察哈尔，获得传国玉玺，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从而士气大振。众人仿效当年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做法，纷纷立誓书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指示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可以免于立誓。代善不同意，主动要求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发下拥戴皇太极登帝位的重誓，表示，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汉译<满文旧档>》）

就这样，代善大体受到了皇太极的礼遇和尊重。不过，二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也很有意思，颇为意味深长。在代善，会不时地做一些令皇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表明自己的存在；在皇太极，则随着威权日重，也时不时对代善晓以利害，甚至丝毫不假以辞色。

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九年，事情是由皇太极的姐姐引起的。

据皇太极说，他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脾气暴躁乖戾，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进谗言搬弄是非，大约属于悍妇加长舌妇一类人物。因此，可能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姐弟二人关系就不好。这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大家迎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沈阳的路上，哈达公主和皇太极发生不愉快，赌气先走。路过代善的营帐时，代善叫他夫人把公主迎进帐，设盛宴款待，并赠送财帛礼物。皇太极知道后，震怒，除派人前去责问外，还不知会任何人，独自返回沈阳，并关闭宫门，不许任何人觐见。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倾

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这件事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十七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人口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大明，在人口上亿的中华帝国，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有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

书名	作者	360云盘下载地址	密码
[健康枕边书达人养生340例]	张尚国	http://yunpan.cn/cjGhiRt5xfjMj	1382
[你不可不做的爱爱101式]	王聪霖	http://yunpan.cn/cjGC6YFVPsWPH	385c
[时间：让时间增值的21条法则]	黄信 景志明	http://yunpan.cn/cjGCCUQ3HvWTG	3e53
[性吸引力私密教程]	埃德蒙	http://yunpan.cn/cjGaxpJkrRVQu	f9a1
[哑铃打造完美男人]	薛斌	http://yunpan.cn/cjGabFqG2bEtV	dcbf
[40岁后要懂的120个养生常识]	宇琦	http://yunpan.cn/cjGhqpVqcbsXb	0906
[男人！别说你懂健身]	闫文龙	http://yunpan.cn/cjGCrqghF8FrX	3321
[女医师教你真正愉悦的性爱]	宋美玄	http://yunpan.cn/cjGCvWPIw3Hn2	获取
[性福圣经]插图版	健康编辑部	http://yunpan.cn/cjGam5N6RZtAQ	获取
[瑜伽基础入门全图解]·全彩版	张斌	http://yunpan.cn/cjGa7pKCscvVk	获取
[不生病的健康智慧]	史荣新	http://yunpan.cn/cjGhMLw67YyPP	获取
[性心理学·彩图版]	(英)霭理士	http://yunpan.cn/cjGakSwUyFbDy	获取

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支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

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惊人，其腐败的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

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

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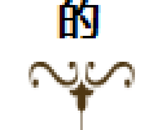
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努尔哈赤再暴烈，也没有这样干过。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



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九月丙午）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虽然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了“国本”——国之根本，但这二位——此前的努尔哈赤和此后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皇太极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



帝国政界往事

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终结版）

李亚平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引子 三次改变中国的女真人

“肃慎”，是女真族的远古祖先，在秦汉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国的典籍中。据说，在古老得不可考的尧舜时代，这个民族就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交往。《国语》中记载：孔老夫子周游列国，走到陈国时，遇到一群被木身石镞的箭矢射中的大鸟。这群鸟飞到国君的宫廷后死掉了。国君不知其故，派人请教孔老夫子。老夫子告诉他们：这种箭矢只有肃慎人才能制造，周武王时，肃慎人曾经进贡过这种箭矢。后来，国君派人调查核实，果然在收藏贡品的金柜里找到了孔老夫子说的那玩意儿，证实了孔老夫子确是博闻强记。此事表明在久远的年代里，这个民族在渔猎上面的本领就不可小瞧。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诸申、满洲等名称，是这个同一渊源的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这一民族被归入了通古斯族系。在中国历史上，女真人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作用，其冲击一次比一次剧烈，其影响一次比一次巨大，遂成为对于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

唐代的渤海国是由女真人的祖先靺鞨人所建，拥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于盛唐开元年间由大武艺开国，到后唐年间为辽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是当时中规中矩、有模有样的大国之一。

此为女真人第一次影响中国历史。

女真人第二次施加大作用于中国，是在皇太极之前五百年——



当时，他们的全部人口加起来可能还不到一百万，却以极短的时间凝聚成为一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一举将两个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均无数倍于自己的庞然大物——立国两百年的辽国和一百五十九年的北宋打翻在地，迫使辽国翻越大漠与雪山远逃西域，迫使自我感觉极佳、人口总数可能超过一亿的大宋帝国，只能屈居于东南一隅。

此后，女真人掀起的八旗旋风第三次席卷了中国的大东北，他们马上就要席卷全中国。

与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较，此时，女真人满打满算还是不足一百万人，他们的敌人大明帝国的人口则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而更加重要的区别是：他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顾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目光深邃远大，他们胸襟恢宏宽阔，他们富有政治智慧又有极其强大、令人不寒而栗的动手能力，他们所做的工作，甚至不亚于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

而此时此刻的大明朝，与自己五百年前的祖先比起来，虽然土地面积大了许多，然而，其腐烂发臭的程度却也远远超过了大宋帝国，曾经有过的精巧雅致如今早已变成了真正的愚蠢与恶俗。由此可知，大清朝入主中原已经具有了某种宿命的意味。

如同上面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工作是在皇太极的带领下进行的。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工作是如何在多尔衮的手中完成的。

可惜——

大清朝和以前的所有朝代一样，在统治层中继承和发展出了丰富的政治权术、狡诈和谋略，却从来没有在民族与国家的层面上，学会运用政治良知、理性与智慧。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学会和发展出更好的方式，于是只能采用阴谋、暴力和血腥的手段，用制造痛苦来削减痛苦。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帝制政治文化传统之中的一个基本元素。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为未来新的、更大的痛苦预留下了空间与地步。

想想二百多年以后这个国家所遭遇到的所有屈辱，这个政权所受到的切齿痛恨，我们对此应该不难理解。

第一章 多尔衮的恩怨情仇和权力游戏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十四日凌晨，多尔衮来到三官庙。当年，庄妃就是在这个院落里，说服洪承畴放弃绝食，归顺大清的。

到这时为止，皇太极已经去世五天。多尔衮要在三官庙里会晤皇太极生前最为信任的内大臣索尼与图赖。这两个人都是由皇太极一手提拔起来的，是两黄旗中最为重要的管理大臣。多尔衮约见他们的目的，是要探询两黄旗对皇位继承人的最后态度。

谈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是前清时代满族王公贝勒们的一贯作风，他们喜欢直截了当。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他们尚未完全学会汉人绕山绕水、云遮雾罩打太极拳般的说话方式。

索尼告诉多尔衮："先帝有儿子在，必立其一，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语气坚定，完全没有商量余地。

多尔衮没作任何表示就离开了三官庙。晨曦中，全副武装的两黄旗精兵已经把皇城内外围得铁桶一般。按照制度，皇宫警卫历来由皇帝自领的两黄旗护军担任。不同的是，今天拱卫的兵力显然比平时多得多，崇政殿沿途与四周也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里，平日是大清皇帝商讨国是的场所，现在是皇太极停放灵柩的灵堂，很快将在亡灵面前推举大清皇帝的继承人。

前清时代大清帝国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獾子，杂食性鼬科动物，严寒时冬眠，居洞穴中，性机警，喜夜间行动。獾子油是东北民间治疗烧伤、烫伤的良药。多尔衮的名字，在女真语中是"獾子"的意思。就其一生行状判断，他与獾子还真的有几分相像。

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多尔衮排行第十四，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十二的阿济格与第十五的多铎。皇太极是他同父异母的八哥。

有两件事情，可能对多尔衮的一生影响巨大：一件是他的亲生母亲、大妃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还有一件就是此次推举皇位继承人。

阿巴亥是在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嫁给努尔哈赤的，当时努尔哈赤四十三岁，已经有了六七位妻子；阿巴亥只有十二岁。史书记载说，阿巴亥丰姿俊美，颇有心机。老夫少妻，阿巴亥很受努尔哈赤宠爱。两年后皇太极的母亲即大妃孟古格格病逝，不久阿巴亥便被立为大妃。

大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发生了一件对后金政权影响深远的变故——努尔哈赤休弃大妃阿巴亥。当时，公开的名义是指斥大妃偷藏财物，实际上有很深的隐情。

这年三月，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德因泽，告发大妃阿巴亥允许贴身侍女将一匹蓝布送给情人。当时，女真人中有一项严格的禁忌：不经丈夫同意，女人若将财物送人，就是欺骗丈夫，若是送给男人，就会被认为是倾心于该男子。事实上，这样的禁忌即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可能仍然在发生作用。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曾经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一次给四贝勒皇太极。代善接受并且吃了，皇太极接受而没有吃。而且，大妃一日之内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不知道他们在谋划什么。大妃自己深夜出去也有两三次。”努尔哈赤命人调查，结果证实揭发属实。

令努尔哈赤更加恼怒的是：据说每当诸贝勒大臣在汗王家里议事或宴饮时，大妃阿巴亥都会浓妆艳饰，精心打扮，并且可能在语言眉目之间对代善颇多表示，使在场的其他人很尴尬，但谁都不敢声张，只能假装看不见。这一点，令努尔哈赤万难接受。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恰恰与女真人的习俗和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有关。

和我国境内其他游牧渔猎民族一样，女真人的财产主要由牲畜和猎获品构成，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他们的财产极容易荡然无存。因此，其财富的积累过程十分缓慢，从而导致相对的贫穷。他们



缺少形式多样的物质财富，缺少表现自己精神生活的艺术品、装饰品和宗教作品，他们崇尚力量，崇尚年轻，崇尚勇敢；重生轻死、贵少贱老是为风俗。显而易见，这些习俗全部与中原农业地区的文化是反着的。此外，他们坚定信奉萨满教，相信天地万物间充满鬼怪神灵，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去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所在继续生活。因此，杀人殉葬便成为一个古老的习俗，为族人所接受。他们死后的墓葬很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和绝大多数人口中采用火葬，将生前用过的东西、衣物等一起烧掉就构成了他们的随葬品。沈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陵墓中，埋葬的只是他们的骨灰和殉葬者，原因端在于此。

他们采用多种婚姻形式：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多夫一妻，外婚制，对偶制，嫂婚制，姐妹即连带婚制等等。这些婚姻形式的采用，同样与上述特定经济、财产条件下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联系。其内在逻辑指向，在于保证未来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保证经济状况和综合力量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在人性层面上，令未亡人在生活与感情上有所寄托。

因此，父亲死后，儿子娶没有血缘关系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子，弟弟死后，哥哥娶弟妹为妻便成为十分正常的、富有人性化的考虑。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哈达部王子康古鲁，在父亲王台死后，就与自己的继母、著名的叶赫格格温姐结婚。这位温姐，恰是努尔哈赤前任大妃孟古格格的姑姑。豪格死后，多尔衮、阿济格两人作为叔叔，各娶了自己的一个侄媳妇。皇太极的五位后妃中，两个妃子是亲姐妹，皇后则是这对姐妹的亲姑姑等等，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在汉族人士眼中，上述一切是标准的乱伦，他们会对此表现出真诚的痛心疾首与不屑一顾。殊不知，唯其如此，才在比较中显现出孔孟之道贞节牌坊之类文化中过多非人性的残忍与虚伪。

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述婚姻形态仍然通行于我国某些边疆游牧渔猎部族之中。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有可能对努尔哈赤死后的大妃殉葬、皇太极死后孝庄文皇后与多尔衮之间的关

系，具有某种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解。

在这种习俗之下，偏偏又有了努尔哈赤本人的安排。

有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曾想过指定接班人。他曾经为自己的嫡长子褚英做过类似皇太子一样的安排；褚英被处死之后，他又安排二儿子代善监理国政，并一度让他和自己一样，一个人兼任了两个旗的旗主。努尔哈赤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将深受宠爱的大妃还有年幼的子孙们托付给代善，（《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从而，一度使代善的权势极为显赫。这可能是那些贝勒大臣们看到大妃与代善眉目传情时，谁都不敢废话的原因之一。

如果仅仅从汉族士大夫和中原皇家政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将此理解成老皇帝在以名位后事交代继位者，但假如考虑到女真人上述事实上盛行着的多种婚姻制度的话，努尔哈赤的这番话则完全应该被理解成：自己死后，不但允许儿子代善继承自己，还希望他娶养无血缘关系的庶母——大妃。否则，这位大妃的举止怎么会如此荒腔野板，离谱得无法理喻？从她的一生行事判断，假如不是置身于这种嫂婚制文化氛围之中，这位史书记载“有机变”的大妃，应该断不至于会错意到如此程度才对。

倒是准太子代善，很有可能因为心智、性情上的平庸，厚道和缺少智略，身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再加上权势显赫导致的忘乎所以，才真的会错了意。在人性的层面上，他可能并不了解其父的真实想法与性情，于是，将努尔哈赤所说的、所想的和所要做的当成了同一回事儿，忘记了死后是死后，而现在活着是活着的道理。结果，真实的情形是：努尔哈赤痛恨自己还活着时就开始眉来眼去的大妃和代善。不久，努尔哈赤就将代善独掌的两红旗，分出去了一旗，交给代善的儿子岳托。从此，代善失去了父亲的欢心，被迅速灰头土脸边缘化，也害了那位大妃。



努尔哈赤的处理很有意思，他放出风去，说是要搜查大妃私藏的财物，大妃便慌慌张张把财物分送到各处藏匿，结果，全部被搜查出来，包括藏在阿济格家的三百匹绸缎。史书记载说：大妃阿巴

亥“虽然有机变，却终于为努尔哈赤的英明所制服”，可能就包括了这件事情。随后，努尔哈赤宣布：“该大妃奸诈虚伪，人所有的邪恶她全都有。我努尔哈赤用金银珠宝从头到脚地妆饰你，用别人见所未见的上好绸缎供着你，养着你，你竟然不爱你的汗夫，把我蒙在鼓里，去勾引别人，难道不该杀吗？”随后，将这位大妃休弃。当时，努尔哈赤另外一位蒙古族的小妃子也加入战团，揭发阿巴亥。史书中说，大妃阿巴亥好嫉妒，大约由此可以得到证实。（《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四卷，天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或许，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情意并未泯灭，不到一年又将她接回，继续做大妃。成书时间最早的清代官方史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由于大妃有机变且好嫉妒，使努尔哈赤觉得不快，“留下她恐怕身后会祸乱国家，于是预先给诸王交代遗言说：‘等我死时，必须命令她为我殉葬。’”后来，努尔哈赤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诸王便来向她转达努尔哈赤的命令，大妃支吾不从。诸王说：“先帝有命令，想不遵从是不可能的。”最后，在诸王寸步不让的坚持下，大妃阿巴亥自缢而死。也有史书认为，她是被人用弓弦勒死的。就此，阿巴亥之死遂成为前清历史上最重要的谜团之一，引发出无数猜想与争论。

母亲殉葬时，多尔衮虚岁十五岁，实则还差一个多月满十四岁。按照女真人的习俗，已经成年。他的哥哥阿济格虚岁二十二岁早已成年，弟弟多铎虚岁十三岁，也接近成年。由于兄弟三人全部名列共柄国政的八和硕贝勒，他们必定对母亲殉葬的内情有些了解，这可能是后来多尔衮独掌大权时，他们对此始终不曾发出过任何不同声音的原因。



按照当时的标准，多尔衮虽然已经成年，并与多铎最受晚年努尔哈赤的喜爱，但他当时没有尺寸武功，在皇太极跟随努尔哈赤驰骋疆场时，多尔衮还没有出生。按照努尔哈赤确定多年，且从无改变迹象的八旗制度根本原则来看，他没有可能被推举成继位的汗王。假如努尔哈赤要强行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因



为，那将意味着八旗制度中根本原则的改变，意味着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文化上的改变。我们知道，除非在特别特殊的情形之下，这种改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晚年最喜爱幼子拖雷，但拖雷终究没能当上蒙古大汗一样。因此，年轻的多尔衮只能得到旗主的权力与财富，却不能坐上部族国家汗王的位子，原因端在于此。

事实上，努尔哈赤死后，两黄旗虽由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继承，但是，多铎是正黄旗旗主贝勒，阿济格是镶黄旗旗主贝勒，多尔衮并没有实际掌握一旗。不久，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皇太极将汗王才能掌握的两黄旗旗色，交换为两白旗。从此，两黄旗由皇太极掌握，阿济格和多铎分别成了两白旗的旗主贝勒。

天聪二年三月，即皇太极继承汗位一年半之后，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征蒙古有功，被“赐以美号”，曰：“墨勒根戴青”，即汉文“睿智”的意思。据说，多尔衮和硕睿亲王的汉文爵位称呼就是由此而来。显然，皇太极对多尔衮的才智具有清醒的认识。同月二十九日，阿济格违犯制度，擅自为多铎定亲，被皇太极罚银一千两，并罢免了他镶白旗旗主的名位权力，多尔衮这才正式成为镶白旗旗主。此后，皇太极又任命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多尔衮主管吏部——这是权力很大的一个部门，号称六部之首——并多次委以重任，使多尔衮有机会建功立业。就这样，皇太极扶持着多尔衮一步步成长起来，从墨勒根戴青贝勒到睿郡王，到睿亲王，直至有能力摆平战功显赫的皇长子豪格，成为辅政王，再成为摄政王。

应该说，皇太极待多尔衮不薄，对此，多尔衮心知肚明。对于皇太极，他的感受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一方面，他曾经说过：“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另一方面，他也亲口对大小贝勒说过：“太宗之所以给予我特殊不同的恩情培育，超过了对于所有其他子弟，是因为他知道诸子弟只有靠我才能成就事业。我很明白他的意思，你们明白吗？”皇太极称帝时，册封了四大亲王：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应该说，皇太极在多尔衮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超过了对他的亲生

儿子豪格。

有证据显示，皇太极对多铎也不错。

多铎有“荒唐王爷”之称，除了能打仗之外，任侠率性、渔色猎艳的名声也不小。他甚至曾经将主意打到了大清朝第一位汉人大学士范文程的头上，并且可能对范夫人进行过严重的性侵犯，气得范文程范大人装病不上朝，在家里闭门谢客生闷气。假如不是多尔衮出面制止，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结局。《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道，经过皇太极的极力争取，多铎才分到努尔哈赤生前直接统领的十五个牛录四千五百人。

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谋害阿巴亥的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因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对你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

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说："你们赶快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不如不见。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第22页）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之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多尔衮"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蹄所到之处，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著名的大明总督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的。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





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战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并施展计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玉玺。玉玺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无法预料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汉化程度颇深，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

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豪格传）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王公贝勒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第22页）这其中，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第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帝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无法不顾忌的力量。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





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的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急。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大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掌管两红旗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

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首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



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得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大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友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密，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

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面前已经对天盟誓，但在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犯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留情地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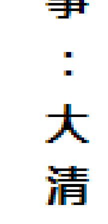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

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索尼传）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肯定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



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伤深痛。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遽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有人油然想起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济尔



哈朗和多尔衮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议决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摄政王。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能够得以善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



于仓促，来不及仔细雕琢。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几乎将四川人屠杀殆尽的“大西皇帝”杀死后，胜利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天下，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著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倏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



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

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为甲申年，按照生肖纪年，这一年是猴年。历书上说：该年“太岁方公，干木支金，纳音属水，九星五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李自成率领他那些饥饿的农民兄弟，杀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然后，势如破竹地开进了北京。

这一年，以崇祯皇帝吊死在皇家后花园（北京万寿山，即今日北京景山公园）为标志，大明帝国轰然垮台。

这一年，大清帝国几代人梦想了许多年的山海关，城门洞开，多尔衮率领大军在这里会合吴三桂，于一片石这个地方，打败声势浩大的李自成。从此，所向披靡地杀进中原，并迅速建立起全国政权。这个原来只有几十万人口、割据东北地方一隅的女真酋长土邦，终于成长为统治中国上亿人口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在那山崩地裂的时刻，主导着改天换地的人物，就是刚刚当上大清摄政王七个月、时年三十二岁的多尔衮。

而事情却要从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那风雨如晦的最后岁月说起。

在大明帝国的最后十几年时间里，明清之间的对峙，在个人层面上可以看成是皇太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之间的博弈。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九月一日继后金汗位，朱由检比皇太极晚一年，于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大明皇帝位。皇太极死于公元1643年即大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九日，朱由检比皇太极多活了半年多一点，死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二人在位时间都是十七年。明清之间的势力消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两位最高领导者之间角力的结果。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朱由检是一位有太多小聪明，却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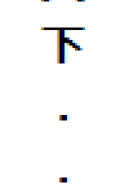
全局战略缺少总体把握和指导的皇帝。从个人品性上判断，他则是一位“图虚名而受实祸”的典型，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经典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直到为此丢掉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性命。

翻检现有明清关系史料，有一个明显的对比：明朝官方记载中几乎全部都是对清的战争，绝少有和谈的记录；而清朝官方史料里，则有大量希望双方讲和的实录，其中隐藏着特别值得玩味的玄机。

前清之际，东北地区地旷人稀，虽然富有人参、貂皮、东珠等珍贵山水土产，但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多数女真人不事农耕，因此，粮食布匹都不足以自给，必须依靠战争中俘获的汉人为奴替他们耕种，依靠明朝和朝鲜输入方能解决温饱问题。在辽东满汉互市有关贸易品种的记载上，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后金征服朝鲜时，特别注重抢掠与勒索粮食、布匹，也可以看出此种需求之迫切。自从后金与大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女真人衣食两大生命线立即受到威胁，因此，必须通过战争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明清之间每次发生战争时，清军都要大量抢夺人口、牲畜，以及粮食、布匹、铁器等物资，甚至要将战俘和俘获的百姓的衣服剥光，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皇太极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篇讲话，激励自己的战士们：

“你们诸将士一定要奋勇直前，何必去争抢衣物？就算是得到一些破烂衣服，还不够一年半载穿用。如果大家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不是和我们讲和，就是败在我们手下。那个时候，就可以长久得到吃穿供应，大家就能够早日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皇太极将大清多次对明发动战争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记载显示，皇太极曾经通过各种形式多次向大明帝国发出求和信息，至少十次以上。其中全部表达了希望双方罢兵息战，互相贸易，各安耕织，以享太平的愿望。经过多年战争，皇太极显然知道：通过战争抢掠，不如互市贸易；而通过互市贸易，不如迫使明朝输款供给。这是为什么明清之间每次战争都由大清挑起，皇太极又在

每次战争之后，不论胜负，都主动向大明求和的最深层之原因。为此，皇太极还曾经主动降低谈和的条件与门槛。应该说，这里面不完全是阴谋与策略上的考虑。

遗憾的是，大明帝国君臣接受了五百年前“靖康之耻”后宋金议和的教训，谁都不愿被看成是秦桧的同伙。于是，在百战百败之余，硬是不肯接招，哪怕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不行，特别是袁崇焕被杀时，私下议和是一条重要的罪名。随着张献忠、李自成们的日益壮大，帝国便日益陷入腹背受敌、南北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为此，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曾经建议崇祯皇帝，以议和安抚后金，集中力量解除内忧。从当时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对农民军作战的情形看，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不料，崇祯皇帝断然拒绝，严厉下令：胆敢言和者斩！满朝文武噤若寒蝉。

到崇祯十四年，张献忠攻下襄阳，杀死襄王。李自成则趁河南大饥荒之机，采纳李岩的建议，在起兵十几年之后第一次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结果，竟有数十万饥饿的农民踊跃加入到他的队伍之中。李自成军旋即攻下了河南重镇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叔叔福王朱常洵。李自成下令将这位福王杀死，剁其肉，与鹿肉煮在一起，称为“福禄宴”。就此，中原战场格局发生根本性逆转。

同年八月下旬，明清之间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松锦大会战”接近尾声，洪承畴被围困在松山城内。十一月间，辽东地区下了一场大雪，运输极度困难。皇太极看到围困锦州、松山的清军粮草不继，于是，再次派人与明军接洽和谈。兵部尚书陈新甲鼓足勇气对皇帝提出议和的建议。到了这时，万般无奈的崇祯皇帝仍然不肯放下身段，他先是痛斥陈新甲，“切责良久”，然后，仍然以天朝上国之天子自居，百般玩弄辞藻伎俩，在口气和做法上都使用了很是不屑一顾的方式，用以轻蔑皇太极，结果，终于导致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为此，晚明前清时期的历史学家全祖望评论崇祯皇帝朱由检说：“百战百败之后，而负气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则自取灭亡之道





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明庄烈帝论）

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清军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大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大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大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大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借此良机最大限度地谋求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特地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

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做些让步。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就是坚决反对和清讲和的意思。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大家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等，前后达数十封。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



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经过这一番波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讨伐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同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

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孙传庭担任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无奈，此刻的皇帝，一方面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似的，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曰：“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先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使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

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家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崇祯妻子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成了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薛国观在职期间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与薛国观一样倒霉的还有“奸臣”周延儒。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意思。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

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一出手就要力图置异己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的权限大受限制，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大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入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

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揭发出来。就此，周延儒在皇帝的心目中变成了一副怪怪的模样。

转年，即崇祯十六年三月，正是万物复苏水草丰美的时节。第五次打进关内的清军，创造了一天之内连破二十六座城池的纪录，并且就在山东莒州地区驻扎牧马。崇祯皇帝忍无可忍，他把周延儒等人招来，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周延儒慌忙劝阻，并表示自己愿意代替皇帝亲征。皇帝冷笑一声，说：“我刚算过一卦，此刻正是出师的良机。先生要是真的愿意去，就立刻出发。出宫门以后就往东走，一定不要向西转。”

周延儒的家在宫门西边，他离开皇宫后，连家也没敢回就亲征去了。

当时，共有四路地方部队赶到了北京，周延儒带着他们驻在通州。史书记载说，他们每天互相宴请，没有和清军打过一仗，却每天早晚各向皇帝报捷一次，并为“立功”将士请求封赏。一个月后，清军主动退出关外，周延儒胜利回京。据说，崇祯皇帝拉着他的手慰劳备至。

没有几天，周延儒谎报军情、欺蒙皇帝的报告便陆续送到了皇帝手中。鉴于周延儒的崇高地位，且长期任劳任怨为皇家服务，崇祯皇帝很给面子，只是将他罢免回家，还赏赐给他一百两白银的路费，他可以享受乘坐国家交通工具、免费在国家招待所中食宿的待遇。周延儒算是平安着陆了，他的儿子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



谁知，有一天，一个可能和锦衣卫有些瓜葛的官员，有意无意地点拨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皇帝在最宠爱的田妃宫中，看到了一双制作得异常精美的绣花鞋。拿起来一看，那鞋上用金丝工整地绣着五个字，曰：“周延儒敬献”。当时，崇祯皇帝勃然震怒，将田妃呵斥了一通，吓得田妃连连叩头请罪。崇祯皇帝拂袖而去，此后，连续几个月不再理睬这小女子。经过点拨，皇帝想起了这件事，认定周延儒不但欺蒙自己，而且还犯有“通内”大罪。于是，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周延儒从家乡抓回京城，勒令自尽。当时，骆养性前去传



旨兼验尸，他怕周延儒不死，还将一个大铁钉钉进了前首相的脑门。与薛国观比较起来，周延儒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皇帝当天就允许家属去收尸了。

据说，周延儒知道情况不妙，临被捕时，将家中的珍宝细软全部堆在阁楼里，放火焚烧。史书记载说，由于里面有不少奇珍异宝，大火燃烧时，火焰都是五彩的。

有一次，皇帝和一个臣子聊天，谈起了周延儒。皇帝恨恨地说："我就是恨他太使乖！"意思是说他恨周延儒太聪明、太乖巧。这位皇帝真的很难侍候。性情刚烈的袁崇焕他容不得，要杀死；性情乖巧的周延儒他也容不得，也要杀死。到周延儒死时的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我们的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人可用了。于是——

皇帝在宫中下达了一项严厉的禁令：严禁宫中女眷们玩一种叫做"掉城"的游戏。这种游戏就是在一块正方形的布上画出一个"井"字形，分为九个方格，中间的一格为上营，四边的为中营，四角为下营。然后，在一定距离之外用银球往上抛，抛中上营受上赏，中营受中赏，下营受下赏，是宫中女眷们消遣漫漫长日的一个乐子而已。皇帝看到帝国的城池一个个落到大清和李自成们手中，便认定与这"掉城"游戏有关，遂下令：胆敢再玩者，严惩不贷。此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个帝国了。

大明崇祯十七年的元旦，对于崇祯皇帝来说，真正是个黑色的日子。

今天以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这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建立民国后改的。以前元旦就是春节，春节就是元旦，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皇帝要在这一天清晨接受百官的朝贺。

谁知，崇祯十七年元旦一大早，从三四点钟开始，北京城便刮起了大风霾。古人文雅，用的词也准确，大风霾显然比沙尘暴更像那么回事儿。史书记载说，这天从凌晨开始，北京便狂风漫卷，"震屋扬沙，咫尺不见"，暗无天日，白昼如晦。崇祯皇帝早早来到大

殿，坐在那把龙椅上，等着群臣前来朝贺。谁知，上朝的钟声敲响后，久久看不到一个官员上朝。可能是风声太大，等在外面的官员们没有听见，误以为皇帝还没有起身。于是，皇帝命令再敲钟，不停地敲，并打开东西两侧大门。等了好一阵，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

大风霾，在古代的星相术士眼中，是边事刀兵大起的徵象，乃大凶之兆。元旦吉日出现这种景象，在漫天狂风沙暴中，把皇帝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偌大的宫殿里，推想起来，朱由检的心可能会凉透。为此占卜，占词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再占一卦，卦辞更糟，曰：“星入月中，国破君亡。”全都是大不吉之语，没有一句能够宽慰人心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风变地震）相传，崇祯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位长者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有”字。崇祯皇帝拿给大家看，众人都说是大吉大利之兆，主“大有”、“富有天下”之意。后来，有一个会拆字解梦的人告诉他：这个字很不祥，因为“有”字拆开，就是“大不成大，明不成明”，表示大明残破不堪的意思。崇祯皇帝黯然失色，不过，他没有怪罪那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此时此刻，假如他知道李自成正在西安城里为建立大顺国而忙碌的话，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真的不说也罢了。

当此时，李自成的势力在河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迅猛发展，出兵北京的计划正在落实之中。南方地区同样烽火连天。张献忠率大军由南昌南下，连续攻占长沙、衡州，江西、广西的许多地方也相继陷落。进入甲申年后，张献忠溯江西上，进入四川，击败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的著名女将军秦良玉，一举攻占了万县等地。

此时的朱由检万般无奈。他焚香沐浴后祷告天地，请求神灵指示。结果，扶乩之后神仙的回答是：“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崇祯皇帝看后，默默无言。

正月初三，崇祯皇帝招来一位名叫李明睿的官员，询问御寇之策。李明睿请他命所有人等回避，然后直截了当地建议他：值此天

下汹汹之际，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南迁。回到大明朝祖先开基创业的南京去。就当时的情形看，整个国家只有江浙一带还稍许平静一些。

朱由检沉思良久，说：“这件事关系过于重大，不可随便说出口。”然后，他用手向上指指天，意思是，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劝他当机立断，免得事到临头后悔莫及。朱由检说：“这事儿我早就想办了，可没有人赞助，所以拖到了今天。你的想法和我很吻合，外边不愿意怎么办？此事重大，你务必保密，切不可轻易泄漏出去。否则，你的罪过不小。”

到此时为止，这“南迁之议”或是朱由检唯一一个延缓大明帝国生机命脉的机会了。可惜，这位皇帝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重大缺陷又一次在这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作用。哲人曰：“性格即命运”，信哉斯言！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该人的性格与素质决定的。揆度朱由检的一生，便是这句名言最好的、毋庸置疑的注释。他的品性表明，把自己吊死在景山下的那棵树上，可能是这位皇帝最恰当的出路。而大明帝国这朱家天下的命运，也由于有了这位皇帝，就此成为命中注定。

朱由检的皇后姓周，是一位端庄稳重的美貌女子。史书记载，看到她的人，会“瞑眩不自持”，表明她的相貌光彩照人。她为朱由检生了三个儿子，二人的感情很不错。这位周皇后自幼熟读经史，与崇祯皇帝很有共同语言。但她从不干预朝政，也不为自己的娘家人谋取什么私利。值此天下大乱之际，有一天，她特别委婉地对皇帝说：“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呢。”没想到，朱由检立刻声色俱厉地追问她是什么意思？追问她听谁说要南迁？吓得皇后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张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皇后，是朱由检的皇寡嫂。这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知书达理，对小叔子很好，曾经帮助朱由检度过了继位之初的困难时日。朱由检特别敬重自己的这位嫂子。然而，她反对南迁，认为这将损害皇帝小叔子的形象。朱由检听说后，马上怒气冲冲地前去质问张皇后，听谁说自己要南迁？张皇后知道事关人命，

坚决不肯说出人名。崇祯皇帝再三逼问，最后，张皇后表示，如果皇帝一定不依不饶地逼问是谁说的话，自己可以自杀谢罪。朱由检这才悻悻作罢。

由此，给人造成了一个强烈的错觉，就是皇帝是坚决反对南迁的。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崇祯皇帝心里可能极度矛盾。一方面，他应该很清醒地知道，南京作为留都，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且有重兵驻守。在那里是有可能再图振作的。为此，他秘密命令在天津海边准备了两百艘海船和一千名精兵卫队，随时准备扬帆南行；另一方面，他特别害怕臣民认为自己怯懦，害怕丢面子，其中，可能也有害怕动摇民心的意思。为此，他犹豫不决首鼠两端。

随着李自成大军日益逼近北京，李明睿再也无法沉默，他公开上书皇帝，建议立即南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几天后，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皇帝自己留在北京，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崇祯皇帝犹豫不决。

见此情景，李邦华再退一步，请皇帝将两位皇子分封到太平、宁国二府，以便拱卫南北两京。崇祯皇帝还是犹豫不决。史书记载说：皇帝“拿着奏疏，绕殿徘徊，一边读一边叹气”——仍然是犹豫不决。

刑部尚书徐石麒提醒大家：“倘若观望狐疑，导致想走也走不了的话，后果就不忍说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六，徐宝摩小纪）



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位观点极端、忠君爱国、特别慷慨激昂的官员，此人名叫光时亨。他上书皇帝，激烈弹劾李明睿。这一来，皇帝又犹豫了，在朝堂上，他一反私下的主张，慷慨激奋地宣布：“国君死社稷，正也，我下定决心了。”

李明睿不理那一套，再次上书，请求一天都不要耽搁，立即南迁。光时亨也更加激烈，指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许多大臣觉得皇帝好像也反对南迁，于是纷纷附议，请杀明睿以安天下。

皇帝的表现则是在殿堂上，当着群臣的面，又一次说了许多颇动感情的、同样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话。退朝后，他却极度郁闷，懊恼透顶，对身边的近侍说：“光时亨真该死，我姑且饶他这一次。”这位总是在颠三倒四中杀伐决断的皇帝，偏偏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变得毫无决断。而经过他十七年的杀伐荼毒，如今，他的身边遍布贪渎庸懦、投机取容之辈，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挽狂澜于既倒。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最应该去的地方。

在此前后发生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从西安到北京，一千多公里。李自成在他进军北京的路上，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山西代州西面的宁武关，他遭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代州守将周遇吉杀掉前来劝降的使者，一面加强城防，一面出兵奇袭。在城内弹尽粮绝，城外绝无援兵的情势下，他退守宁武关，居然率兵连连重创李自成大军，李自成有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一万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最后，李自成凭借绝对压倒优势的兵力，经过真正的殊死战，才终于打通了这座关口。周遇吉战死，他的家人全部殉国。这使李自成十分震惊。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和忠诚无畏的战士。为此，他产生了返回陕西去的念头。因为，与这里比起来，前方许多险关要塞如大同、阳和、



宣化、居庸，都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全部都有重兵防守，若是这样打下去，恐怕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正当李自成已经准备退兵回西安时，镇守大同和镇守宣化的大明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李自成大喜过望，随后，阳和、居庸守军也开城投降。就这样，他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地开到了北京城下。到北京城下之后，李自成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话：“要是再有一个周遇吉，我就到不了这儿了。”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为了稳定人心，召见了三十三位考选官。皇帝询问他们“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之计”。史书记载说，召见中，皇帝忽而斟茶，忽而磨墨，忽而无缘无故地发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中途，一个太监匆匆走来呈给皇帝一封密信。皇帝看后，脸色大变，随即起身离去。那封密信中报告说，昌平已经失守。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早朝时，大臣们谁都不敢说话，有人站在那里只是默默流泪。崇祯皇帝显得有些神经质，时不时伏案写几个字，让边上的人看一眼，随即抹去，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反复写的是：“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此时此刻，他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些臣子都是在他十七年执政岁月中，被他培养、训练成这副模样的。

三月十八日早朝，只有三个官员前来朝见皇帝。大约，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在案子上写的字了，所以，大家谁也不敢来触皇帝的霉头。当日深夜，皇帝招来太子兄弟三人，他亲手为三个儿子换上了破旧的衣服，为他们依次系紧衣带，叮嘱他们：“今天你们还是皇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天亮以后，你们要忘掉自己的身份，隐藏好，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姓名。见到老者要叫爷爷，见到年轻的叫叔叔。万一能活下来，要为父母报仇，别忘了今天的告诫。”史书记载说，在场者泪如雨下。

随后，皇帝将周皇后等妃嫔招来。周皇后说：“我侍奉皇帝十八年，你从来不肯听人一句话，才会有今天。”朱由检默然无语。周皇后搂着三个儿子哭成一团，随后，命人将三个孩子送到外祖父家



去，自己自缢而死。朱由检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叫来，喊道："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随即以左手掩面，用右手挥剑，砍下了公主的左臂。据说，这位公主平素极为活泼可爱，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此时昏倒在地。朱由检手中的剑掉在地上，公主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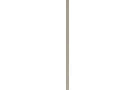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史载，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大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

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朝，就此走进历史。



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

一片石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位于山海关和辽宁省绥中县交界处不远的地方，南面几公里外就是大海，北面则是逶迤远去的燕山山脉。这里，差不多已经接近辽西走廊最为险峻的出入口。很有意思的九门口水下长城，现今是一处文化遗产公园，招徕了众多游人看客。风景区里有一个景观，名字叫藏兵洞，据说是当年吴三桂先是防御清兵，后是对抗李自成的军事设施。如今看去，依然透着一股阴森诡异。

那些快乐的看客中，应该有人知道：三百五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尸横遍野的大会战。这次大战发生在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之间。在当时，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三支政治力量。在一片石，这三种力量第一次交织缠绵在一起，搏杀演变，最后，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类发展史一再证明：任何战争的最后胜利，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就能够取得的。两千五百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部伟大著作的作者孙武认为，有五大要素决定战争胜负：“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大体上，第一条指的是天理人心，第二、三两条指的是天时地利，第四条指的是将领素质，第五条指的是谁更法令严明。他认为，只要看清楚这五条，就可以知道胜利属于谁。孙子认为，通过七个方面的计较，可以知道上述五大要素的具体情形：双方元首谁更有道？双方将领谁更有才干？双方谁更占据天时地利？双方谁更法制严明？双方兵众谁更强健？双方部队谁训练得更好？双方谁更赏罚严明？

在这“五事七计”中，“道”最为重要，永远是第一位的——交战双方谁更合乎天理人心，也就是民心向背。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亦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谓也。实际上，

讲的就是政治清明与否的问题。（李零《兵以诈立》第三讲，第61页）事实上，这一条根本就是灵魂。因为，它可以决定双方将领的优劣，决定法令是否严明，决定兵众与部队的训练，当然也直接决定赏罚是否公正。

应用这种理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为代表的三种力量在一片石博弈的结果——

历史气象研究证明，晚明时期全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导致世界范围内气候大面积、高强度的反常。在此期间，中国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极高。陕西、山西、河南等省份连续七年大旱，历史文献上记载：当地人民吃光草根树皮之后，争食雁粪，甚至吃观音土、青叶石充饥。这种矿物质用水煮之后，呈糊状，吃下去可以充饥。但几日后，便在肠胃里凝结成块，导致死亡。而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现象，也在南北方大量出现。翻检当时史料，很难找到政府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努力，而催征各种苛捐杂税的记录则比比皆是。甚至崇祯皇帝在死前一个月，还发出过一道诏书，命令各地官员加紧征收赋税。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皇宫大内搜检出三千七百万两白银，旧藏黄金四十余窖，约一百五十万两。在崇祯皇帝身边担任检讨的杨士聪著有《甲申核真略》一书，他记录并感叹说：“呜呼！三千七百万！拿出一个零头就抵得上两年加派了。”他很悲伤，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圣明的皇帝究竟在想什么？

帝国官场的景象也令人很难乐观。当时，北京城里有“饷不出京”一说。据说，发往各地的军饷有一半以上要留在京城。其中，20%到30%是给各级财政主管官员的回扣，另外20%到30%是打点各部门官员，以便朝中有人好升官。各种文献中，对帝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形有极多的记载，称得上数不胜数。有两句经典的设问，道出了当时的实情：“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明史》卷二百五十八，韩一良传）于是，官因为钱而升，升了官自然加倍搜刮地皮以补偿。人们普遍通过一个反问句式，确认着一个帝国时代的信条：若不能弄钱，当这个官干什么？





政治上的浑浊，可以天然滋生出淘汰庸能之士的机制。在我国历朝历代，这几乎成了一个铁打的定律。若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一个国家与社会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来自决策者的自私、无能与贪婪，来自对此缺少制度性约束的机制，外部敌人所能带来的损害永远是第二位的。诚如毛主席所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已，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温度永远不能令鸭蛋孵出小鸡，只有鸡蛋才行。这应该也是一条类似牛顿定律一般的铁律。

晚明时期，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崇祯皇帝曾经提高军功奖励标准，将杀死一名敌人奖励三两白银提高到五两。有证据表明，为了得到奖赏，帝国军队中普遍存在杀良冒功现象。譬如，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上报杀贼五十的军功，检验结果是：其中有三十五颗首级是妇女和孩子。崇祯五年，山西官兵追剿农民军到河南，领兵将领要当地县长为自己报功。县长说：“没有敌人的首级怎么报？”那位将领回答说：“这个好办。”很快命人送来了一千多个人头。结果，县长在其中发现了八十多个县学学生的脑袋。

那位当年推荐过袁崇焕的著名官员侯恂，曾经给洪承畴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了当时广为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显然，老百姓对官员和官兵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贼匪。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北京城里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北都崩溃情景）

决策层失道且无能，导致贪官污吏横行，法纪荡然无存，社会离心离德，在此情形下，轻动刀兵的结果，势必蕴含了不可测之后果，最终不可能不自取其辱。

崇祯皇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走向绝路；而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路所向披靡地走进北京城的。有记载显示，崇祯三年以前，李自成是甘肃总兵杨肇基手下的一个把总。崇祯二年底到三年上半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杨肇基奉命



进京勤王。在金县，李自成和他的弟兄们哗变，投入了暴动的农民军。（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

此后的十余年间，李自成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情形大约和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恰相仿佛。

崇祯十一年底，在洪承畴、孙传庭的打击下，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带着十八骑逃进商洛山中。此后，他的坚忍不拔、多尔衮大规模进入中原、崇祯皇帝的庸劣与河南严重的自然灾害，四者合一，帮了他的大忙。到崇祯十三年年底，在得到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帮助后，他第一次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并由李岩替他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歌词大意是：“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由此，与大明帝国形成鲜明对照，受到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

有证据显示，进入北京之初，李自成的部队军纪严明，并曾经处死过骚扰百姓的军士。可能是下列两个原因，导致了这支大军战斗力的衰减。

首先，李自成提出三年免纳钱粮的政治承诺之后，必须筹措大批量的粮饷以供给他那百万大军。这种财政上的压力，应该是他向原大明帝国官员们逼缴钱财的基本原因。假如考虑到大明帝国官员们的贪婪与腐败，这种措施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然而，却也具有很难遏制的传染性腐蚀力量，从而被追逼的范围，由旧政权官员迅速蔓延到了商户和普通百姓人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记载说，当李自成下令讨伐吴三桂时，他的部队中，许多官兵的脖子上挂着数量不等的金银项链，腰间携带着珠宝银钱，两只手臂上则戴着大约不止一个金银手镯。很难想象，这些将士会在心里想着如何奋勇杀敌。

另外一个因素则与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中“力比多”作用（指人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有密切关系。这种源自荷尔蒙的力量无所不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支胜利开进帝国中心的大军，曾经有效地控制住了这种冲动。

据文献记载，当时，大明帝国皇宫中有大约九千名宫女。其



中，纯粹为了追随先皇帝于地下的人数不是很多，有大约两三百人因为害怕受辱而自杀。其余的除留在皇宫中继续服役之外，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各级军官和战功卓著的人们。最多的可能分到了三十人左右，少的则三四人、一二人不等。

当时，发生过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姓费的宫女，据说是皇宫中最美貌的女子之一。李自成做主，命她嫁给一位青年军官。这位姓罗的将军可能是李自成最为欣赏的部下。不料，在新婚的当天晚上，这位费姓女子将酒醉的罗将军杀死后自杀。李自成震惊之余，很有风度地下令礼葬这位烈性女子。有人推测，这位宫女想要刺杀的目标，本来是李自成。

关于陈圆圆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流传极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大军第二号统帅刘宗敏身上，还有人认为故事的男主角应该是李自成。在学术界能够考证出权威说法之前，我们姑且存疑。不过，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想必不是无中生有。这种发生在军队最高统帅中间的事情，在对吴三桂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不可能对这支军队毫无影响。事实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献可以证明这种影响深重的程度了。譬如，有记载说，在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奸淫）据说，有些士兵是带着抢来的女子在城墙上站岗的，为了害怕被查哨的长官发现，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女子扔到城墙外面去。北京城墙的高度大约都在十米以上。

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率领部队开往山海关并投入一片石大会战的。此时的吴三桂，夹在李自成和多尔衮之间，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吴三桂，字长伯，江南高邮人，落籍辽东。他是武举出身，父亲吴襄曾经是锦州总兵。按照明朝的军事制度，吴三桂中武举后，承父荫授职都督指挥。后来，吴襄因为失误军机罪被捕入狱，吴三桂则因军功晋升总兵，负责宁远的防守。从年龄上推算，他的青少年时代应该是在与八旗清军搏杀的金戈铁马中度过的。



吴三桂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很深很长。据说，这道疤是他青年时代，为了救他父亲而落下的。当时，吴襄被敌人重兵团团包围，情形危殆。据守城中的吴三桂请求主将出兵救援，主将和其他将领谁也不敢出城。吴三桂遂带领自己的五百名部下，冲出城去，杀入战阵。救出父亲后，复杀出重围。就此，留下了这道伤疤。这件事情，令他一战成名，给他带来了光荣与尊敬。有史书形容他“勇冠三军”。这可能是后来即便声名狼藉，还有一帮子家伙死心塌地跟着他的原因。

崇祯十七年正月，吴三桂的父亲被重新起用，受命提督京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进入了帝国贵族行列，并成为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吴三桂应该是三十岁刚刚出头。此次晋封勋爵，应该与福临继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命令济尔哈朗攻打宁远有关。有证据显示，当时，济尔哈朗在宁远城下，曾经受挫于吴三桂之手。有人认为，吴三桂主要是继承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取得的胜利。也有人认为，吴三桂在野战中也颇有斩获。不管怎样，济尔哈朗确实曾经有些狼狈地退回了沈阳。为此，吴三桂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还觉得很蹊跷，不明白为什么一次不大的挫折，就会让济尔哈朗匆忙退兵。由此怀疑沈阳城里或许有内讧。济尔哈朗回沈阳后不久，便召开会议，主动要求诸王贝勒大臣向多尔衮汇报工作，并提出将多尔衮的名字排列在自己前面，可能也和这一次挫败有关。

在二十多年的反复攻守搏杀中，驻守在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明军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成为大明帝国军队中最为强悍的一支，素有“关宁铁骑”之称。刚过而立之年便成为这样一支大军的统帅，吴三桂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之所以在官方和民间记载中，很少看到关于他的正面记载与评价，显然和他后来降清又叛清、使自己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敌人有关。

事实上，在正月里册封吴三桂为伯爵时，崇祯皇帝可能就有了调他和关宁铁骑前来拱卫京师的意思，但皇帝瞻前顾后，不愿落下

将关外国土拱手让给清兵的骂名。于是，此事便一直搁置在那里。此时，皇帝缺少战略头脑、一再错失良机的恶果已经不断显现出来，他仍然毫无悔悟，在错误中继续不停地滑行着，似乎已经失去了进行正常判断的能力。

到二月二十八日，皇帝诏天下兵马入京勤王，并把几位大臣要求调吴三桂入卫京师的报告，交给两位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让他们拿出意见来。这两位大学士恍若呆鹅，谁都不敢应对。退出来后，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商量：“现在皇帝急了，想调吴三桂进京。若事情平定下来后，以丧失国土的罪名修理我们怎么办？”（《小腆纪年》卷三）最后，他们想出的主意是，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去说服皇帝：不必放弃关外土地，只要吴三桂回来就可以打败李自成。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六日，皇帝方才下定决心诏吴三桂入卫。这一天，李自成已经来到距离北京三百里左右的宣化。宁远距离北京八百里，山海关距离北京六百里。宣化、居庸关一线的明军必须能够坚守城池，有效迟滞李自成的行军速度，吴三桂才有可能赶到他的前面到达北京。

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宣化总兵张承胤和监军太监杜勋已经决定投降，只有巡抚朱之冯决意坚守。杜勋前去劝告巡抚不必做无谓的牺牲。巡抚指着杜勋的鼻子骂道：“皇帝如此信任你，你却通敌背叛。你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史书记载说：杜勋“笑而去”。当李自成大军来到城下时，这位巡抚下令开炮，所有士兵“默无应者”。他自己动手准备点火放炮，却被人在后面拉住了手。巡抚仰天大哭，南向叩头，给皇帝写遗书，建议皇帝“收人心，励士节”，遂自缢而死。（《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数日后，居庸关守军亦开城投降。

根据帝国惯例和皇帝的命令，吴三桂放弃关外土地西向入援时，需要把山海关外宁远一线的五十万人民迁入关内，这可不是一个

小工程。吴三桂选数千精兵随自己殿后，于三月十六日，护送那扶老携幼的五十万百姓迁移进了山海关。随后，向北京进发。如此算来，他的入援速度应该算是够快的了。

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吴三桂接到报告：北京已经陷落，昨日凌晨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就此，吴三桂无君可忠、无国可守，立即变成了一只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他返回山海关，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马上命令吴三桂过去的战友、如今献出了居庸关的原大明总兵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还有由牛金星起草、吴襄照抄的所谓亲笔信，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吴三桂收下了银两，表示愿意接受招降。随后，将山海关防务移交给唐通，自己率兵离开山海关，准备进京去见李自成。结果，走到永平（即今日河北省卢龙县）时，得到了关于自己的最新消息：他的家产已经被查抄，他的父亲被拘押拷掠钱财，他的爱妾陈圆圆被人霸占。

吴三桂大怒，拔剑击案，怒吼曰：“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大丈夫，岂肯降此狗子，受万世唾骂！”随即，他再次率军东返，向唐通突然发起攻击，一举夺占山海关。

同时，吴三桂以给父亲回信的名义，正式向李自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信中，吴三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其中的一些名句，堪称我国古代官样文章之经典。譬如：“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做孝子？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并发表了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其中有一句模仿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正统。”



李自成遂决定亲率大军讨伐。

就这样，历史在一个小小的拐点处轻轻一转，从此，一切都变得全然不同了。吴三桂可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转，给中国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与全新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遵循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被推翻或强力打断的帝制正统，必须由那种有实力、有能力又能编造出天命

所归之神话的强人以暴力来接续。这是中国政治与中国人真正不幸之所在，却也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此时的吴三桂是投降李自成，还是投降多尔衮，或者先拥戴一个朱家皇室子孙为号召、等到拿下天下后再换成自己，再或者索性他自己称王、称霸、称帝，至少在理论上讲，已经均无不可。端看他的本钱、本事和运气如何了。

——三十岁出头的吴三桂有本钱，不大，可也不算特别小，那就是他所统帅的四万关宁铁骑。关于关宁铁骑的人数，有许多种说法。有万人以下说，有四万人说，有六万人说，有十万人说。还有一种说法最玄，说是有五十万关宁铁骑，这可能是按照军户数，把男女老幼病残孕都加上了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可能有四万作战部队，再加上一些后勤保障闲杂人等。这已然不算少了。翻翻史书，中国历史上，有百八十个人拥戴就敢称王称霸、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的人，为数可是不少。

——吴三桂有本事，不小，可也不算特别大。这从他的结局里可以看出——年届六十起兵造反，最后身败名裂在二十岁的康熙小皇帝手中。平心而论，伴君如伴虎，没有人不怕那些权势者特别是帝王们的翻脸无情，“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吴三桂能够“冲冠一怒为红颜”，能够不甘心受人摆布，在六十岁了还要勉力放手一搏，应该说，算是条血性汉子。做这些事情时，他是否有、有多少为天下苍生考虑的因素，颇值得怀疑。私心与公义，情欲与理性，对于他似乎始终是个问题。他长于战阵，短于庙堂，显然不是个经天纬地的大才。总体上看，此人缺少政治上的器量格局，心胸眼光、谋略素养等等都显得不那么大气，似乎就是一个威风八面的大将军或者乱世之中割据军阀的材料。



——他的运气不坏，可也不算特别好。生逢乱世，偏偏那些有大才干的人被一一淘汰出局，令他们用心血才华加上国家大把真金白银锤炼出来的大军，稳稳当当地落到他的手里。被逼得不但保不住心爱的女人，连自家的脑袋都快保不住时，偏偏又碰到多尔衮正带着大军往山海关走。本想效仿申包胥哭秦庭[1]，在成就一番复国大业的

同时，顺便吐出堵在胸口的那一口恶气，偏偏形格势禁之中，那多尔衮又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弄得他只能乖乖就范，顺着人家画出的道儿往前走。好不容易刀头舔血、坐稳了云南王的宝座，偏偏那不依不饶十九岁的康熙小皇帝又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数得着的有为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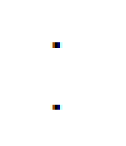
和多尔衮、康熙比起来，甚至和李自成比起来，这吴三桂只能算得上是个二流人物。九泉之下有灵，吴三桂大约很难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

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九日派人前去向多尔衮借兵。

当此时，仿佛上天特别眷顾吴三桂和大清朝一般，正当李自成的大军逼近山海关之际，多尔衮率领倾国之军也正行进在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我们将会看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多尔衮的政治军事才华被他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点。在中国历史上，多尔衮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七年左右，但是，就是在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动。

在极短时间内，对瞬息万变的局势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有如神助般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以霹雳手段准确而完整地建立起对一块广大而陌生土地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如果以区区七年这一时段计算的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汉高祖刘邦，还很少有其他人能够像多尔衮做得那样出色。

西楚霸王项羽曾经在六年时间里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但仅仅是在他那匹战马奔腾所到之处而已。在六年之内，没有什么人能够像项羽那样武功卓绝，辉煌耀眼。而他却也从来没有能够在更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长久的秩序。



多尔衮却做到了，做得干净利索。

应该说，这里面有明、清、农民军三方多年博弈所形成的大势使然，但多尔衮本人的素质决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判断能力，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意志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洞察力，全部称得上超一流。使他所做的所有工作中，有相



当一部分可圈可点，令人叹为观止。却也还有一部分，则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使后世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愿意正眼打量他。

本来，大清朝将大明帝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长期对峙。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试图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建立联系，以便联手对付大明帝国。福临继位，多尔衮摄政之后，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二十七日，多尔衮曾经派专人携带一封以大清皇帝名义写的信，前去寻找农民军首领，希望同心协力，并取中原，共享富贵云云。当时，多尔衮们甚至不知道这封信应该写给谁。（《明清史料》丙编，第89页，《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李自成开进北京时，多尔衮正在全力对付豪格。

四月初一日，豪格被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先后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大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当时，几乎所有大清王公大臣还都一片懵懂，没有人能够意

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帝国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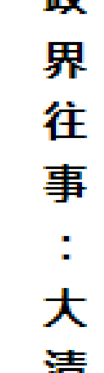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





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改用了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

多尔衮回复吴三桂的信，写得特别技巧老到，对于借兵这同一件事情，有着意味深长的另一种表述：“……至于今日，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安慰吴三桂，“过去，虽然你与我为敌，今天却不需要有任何疑虑。为什么？就像昔日管仲射齐桓公，齐桓公反而以管仲为仲父，终于成就了霸业。今天，你能给我写信，我深为欣慰。你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位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

这里，既没有把门关死，说的又和吴三桂是两码事儿。此后，双方信使往来凡八次之多，吴三桂坚持借兵，多尔衮坚持自己的表述。随着李自成大军的逼近，吴三桂在火里，多尔衮则在清凉的水边注视着吴三桂，观察着火候。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号称二十万大军开始攻打山海关。有记载说，城池的一角曾经险些被攻破。吴三桂终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夜，多尔衮则适时地来到了山海关外五里处的欢喜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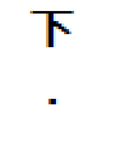
此时，在多尔衮面前，吴三桂已经大体上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在举重若轻、若有若无之间，多尔衮想必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就完成了主客易位——吴三桂由主变为从，而多尔衮则由客变成了主。事者，势也。吴三桂应该知道了身不由己、求人真难的滋味。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率关宁铁骑与李自成大军激战于一片石，多尔衮与八旗铁骑隐藏在侧，观察着战场形势。史书记载说，激战中，被优势兵力攻击下的关宁铁骑渐渐不支。突然，从海上刮起一阵大风，卷起漫天沙尘，咫尺不见人影。多尔衮指挥数万八旗将士齐声鼓噪，“声传十里”。据说，如此三次鼓噪之后，大风霾渐渐转弱。八旗铁骑遂在多尔衮之号令下，疾驰而出，向农民军猛烈冲击。一旁观战的朝鲜世子在给朝鲜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仅仅一顿饭的工夫，战场上便积尸相枕，弥漫大野。”农民军全线崩溃。吴三桂和阿济格二人率军一直追击到了永平。吴三桂派人提议以交出明朝太子为停战条件，李自成接受了这个条件，将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方才收兵。

这一仗打下来，对于吴三桂来说，一切就不太容易改变了。前方，是已经不共戴天的李自成；后面，是虎视眈眈的多尔衮；身边并肩作战的，则是只要一说起杀人放火抢东西就两眼放光、一脸色迷迷的阿济格。而这阿济格偏偏又是一员异常凶猛的战将。有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大战甫一结束，多尔衮立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这种说法可能不是事实。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封王是在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后。事实上，这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了按照多尔衮的旨意办事之外，吴三桂已经基本没有了辗转腾挪的余地。

后面所做的一切，多尔衮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进军北京的路上，他让吴三桂率关宁铁骑在前面开路，让阿济格以为中原人民复仇义兵的名义陪伴在旁，让范文程以自己的名字和汉官头衔发布秋毫无犯的安民告示。同时，再次重申动百姓一棵



草、一粒米者即为违犯军法，当处死，相关长官一体问罪。因此，有记载说，尽管清军食品短缺，“人马饥馁”，但从未发生骚扰百姓的事件，甚至有路过州县的长官拿着慰问品前来献殷勤时，多尔衮仍然下令“不受所献”。（《沈馆录》卷七，《辽海丛书》第四册）

一路上，吴三桂以大明“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的名义发布文告，准备拥立太子，复辟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附记野史）于是，在进军北京的六百里大路上，他们真个是如探囊取物一般轻松且神速——二十五日军次抚宁，二十六日到达昌黎，二十七日屯驻滦州以南，二十八日过开平卫城以西十里，二十九日到玉田，三十日至蓟州，五月一日来到通州西二十里，北京城已是近在眼前。遥想当年的艰辛，此时的多尔衮可能在睡梦里都会乐得直冒鼻涕泡。

李自成四月三十日在紫禁城匆匆即皇帝位，然后便向陕西撤退。临走时，按照他那狗头军师牛金星的主意，为了仿效西楚霸王的千古豪气，在凝聚了几百年民脂民膏的紫禁城中放了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烧了三天，除一座武英殿尚完好之外，其余大体残破不堪。

而吴三桂，则接到多尔衮的命令，让他绕过北京城继续向西追赶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进入北京。就此，吴三桂借兵复国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当时，北京城内外盛传吴三桂大将军已经夺回太子，将要拥戴太子回京登基。一批原明朝官吏准备了全套的法驾卤簿，出朝阳门五里前去迎接。结果，烟尘起处，大军浩浩荡荡蜂拥而至。只是，他们拥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大清铁骑终于在大明皇家仪仗的“迎接”下，进入了北京城。随着多尔衮踏进朝阳门，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代王朝——大清朝。

这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三日。这一年，多尔衮三十二岁。他比吴三桂年长约两岁。

两天后，五月五日，多尔衮发布了第一份政治宣言，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



今居此，为你们明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显然，这是一篇话里有话，伸缩余地很大的声明，似乎并没有入主全国的意思。此后，他发表的一些文告和谈话也保持着这种姿态，一再声称“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甚至放出了可以考虑和南京弘光政权“南北分治”的空气。（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北使事宜》条）这种谈话，一方面可以理解成是对全国、特别是对南方广大地区心中无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稳扎稳打的政治策略。

在此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入主中原而盘稳根基。他极为准确地抓住了那些最为敏感、最牵动人心的事项。

有一件小事，颇能表现他的作风：进京后，曾经调派三千名蒙古八旗将士协助守城。这些以军纪坏著称的大兵来到京城时，多尔衮命令他们把武器弓矢等全部包裹起来，运上城墙，以免惊吓百姓。据说，多尔衮住进武英殿之后，见到明朝人士时，曾经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们来作践佛地，实在是罪过。”（张怡《謏闻续笔》卷一）这种做派和朝鲜王室评价多尔衮温和有礼颇为吻合。记载这段故事的观察家是一位明朝官员，当时正在北京，他对大清并无好感，这样的记载或许是可信的。

多尔衮进北京时，有一个叫吴惟华的明朝侯爵首先出面迎接多尔衮，因此功劳，上朝时被排列在武将首席。据说，战乱中他收养了一些明朝勋旧子女。为了拍多尔衮的马屁，这厮从中选了二十个有姿色的女孩子，要敬献给多尔衮。多尔衮愀然色变，问那位侯爷：“明朝勋旧，不就和你我一样吗？把你我的子女送给别人做婢女侍妾，你会怎么想？”然后一个不留，下令为这些女孩子找良家子弟嫁之。（张怡《謏闻续笔》卷一）

崇祯皇帝死后，与周皇后的尸体一起被放在东华门外的施茶庵，允许明朝臣民前去祭奠，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后来被草草收葬。多尔衮进京后下令以礼葬之，并为其服丧三日。这种做法，对明朝遗民是个不小的安慰。大约就是在此前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

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认为洪承畴是个“特别清廉的好官”，予以重用。（《多尔衮摄政日记》闰六月十二日）同时，命令原明朝官员，一律以原有官职恢复工作，和满洲官员一道开始办公，从而，使中央政府部门的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有一个名叫宋权的官员，颇能代表当时这些明朝遗留官员们的心思。崇祯皇帝死前，这位宋权当过三天顺天巡抚。也就是说，他只当了三天河北省长，李自成就进了北京。随后，他投降李自成，并被任命为顺天节度使。李自成败走西北时，此人立即将京畿地区的留守农民军一网打尽，然后迎接多尔衮进城。据说，这位几个月间做过三姓家奴的人物曾经说得非常坦率：“我是明朝的大臣，大明亡了我无所归属，谁能为大明报仇，谁就是我的主子。”（宋国荣：顺治《归德府志》卷七，人物）无疑，这种情形肯定是多尔衮所欢迎的。

事实上，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表现得相当高明，使得帝国新官场呈现出了一派奇异的景象。他曾经说过：“凡我欣赏的人，花万金请他出山我都不心疼。”当时，在多尔衮的麾下，聚集了大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官僚队伍。这些人，在崇祯皇帝甚至更早的时代曾经分属各个不同派系，互相之间掐得仿佛乌眼鸡一般，彼此恨不得一口就咬死对方，令崇祯皇帝牙根痒痒，恨不得也把他们一个个全数咬死。如今，在多尔衮这儿，他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仿佛个个从来都是忠诚且能干的好乌眼鸡，其变化之大，会让熟悉他们的人们错以为见到了一个不认识的新人。他们彼此似乎也很少再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党派之争了，在三十二岁的摄政王面前，大家全体就像一群成年乖宝宝。

在经济政策中，多尔衮采取的措施简洁有力。当时，有人建议他按照明末的标准继续征收赋税。范文程坚决反对，认为按照万历年间的水平征收，已经害怕摧残百姓了，哪里可以按照崇祯多次加派过的标准征收。多尔衮立即支持范文程，同意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征收赋税，将所有加派的苛捐杂税全部取消，百姓积欠的税款全部豁免。并下令，若有巧立各种附加税名目加收加派的，一律按照贪赃枉



法处理。史书记载说，由是，“赋税负担一年减轻了数百万两白银，百姓的痛苦得以缓解”。（《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六月，多尔衮谕令官民周知，严禁行贿营私。命令中说：明朝之覆亡，皆由于贿赂公行，有钱财者不是个东西也能升官，不拿钱的虽然贤明也无用武之地。乱政坏国，罪莫大于此。因此，一经抓住，一定杀头示众。（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二，顺治元年六月丙子）当时的汉官认为：“摄政王新政比明朝好多了。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

从史书记载看，在大清王公贝勒中，围绕是否迁都北京，曾经有过不小的争论。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既然已经拿下了北京，就应该屠城，杀光北京人，杀他个痛快。然后，留下人驻守，大军回沈阳，或者退守山海关，这样可以万无一失。多尔衮搬出了皇太极，说太宗在世时曾经说过，拿下北京后就要迁都，然后再图统一天下。据说，兄弟两人为此吵得很凶。最终，多尔衮拍板决定迁都，并派人回沈阳去迎接小皇帝。

当时，北京城里流言四起，人们传说七八月间将要东迁，除了儿童，所有人都要杀光。为平息谣言，多尔衮下令加快将辽沈地区的人民迁往北京，并从沈阳提取白银一百余万两及各种物资运送至北京。京都局势趋于稳定。（《清史稿》卷一二八，多尔衮传）

就这样，多尔衮剑及履及，在几个月时间里，干净利索地把北京乃至北方地区换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真个是“大河以北，传檄而定矣”。由此，他很自然地开始谋取天下之大一统。

在向南方进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多尔衮及其指挥下的八旗军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保卫战之后的屠城、湖南湘潭争夺战之后的屠城等等。

前三次屠城，发生在顺治二年，大体上是由豫亲王多铎等人主导。这是三座江南名城，尤其是扬州，历来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是中国人的人生乐趣或目标之一。那是一座很早就拥有了百万人口的美丽都市。有记载说，连续十



天的屠城后，这座城市里剩下的人口大约不超过千人。

湘潭争夺战发生在大清朝定鼎中原四年多以后。当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第二次拿下湘潭后，下令屠城，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半个月后，一位名叫汪煇的读书人来到湘潭，看到的景象令他魂飞魄散——“但见尸首纵横满地”，“全城所余人口不满百人，受伤未死者数十人”。（《希青亭集》，汪煇《湘上痴脱离实录》）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小皇帝来到北京。

十月一日，举行第二次登基大典。前一次在沈阳，面对的是关东地区大清臣民；如今是在北京，面对的是全国人民。

晚明前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就这样大体完成。

---

(1) 申包胥为楚国大夫，为救楚国赴秦国求救，在秦国庭墙哭七日，终感动秦哀公发兵。



第四章 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

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庄妃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高兴，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如古人就曾说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和诸多皇帝出生时，都没有这种奇异的记载，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此一说，而且这两个传说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特殊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大清皇帝位，当时，他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和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

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断，想必是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是满族人特有的节目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之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准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或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役。

这是一个会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



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失误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准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

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根本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明朝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

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道：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在名位和实权上处于多尔衮之下。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管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此事恰恰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同样很难成立。原因是，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多尔衮曾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迎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多半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

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



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祀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从未有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换言之，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做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

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是在这件事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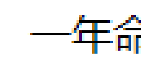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嫂婚制习俗的满洲人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8页）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壮观的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姑娘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容易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涉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象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如果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准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他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这时候的多尔衮，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那个多尔衮了。巨大的成功，权势的膨胀，心中的不平，声色犬马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没人敢碰的魔头。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适时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下在今天的河北省滦平一带），时年三十九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此后发生的事情，足以令帝国臣民们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

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小皇帝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

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示承认多尔衮缔造帝国的功勋。然而——

第二天便开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确定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其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掌帝国军政大权。这一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

一个月后，曾经是多尔衮最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出面控告多尔衮。内容是：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准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意思就是“显有悖逆”、“逆谋果真”等等。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淘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限，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头到尾地重演了一遍，铸就了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幕后的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据说，这位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做老师，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一冤案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承下来了。



多尔衮没有子女，其情形和《红楼梦》所言一模一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尔衮则不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位汉语名字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过一本著名的作品，书名叫《鞑靼战纪》。其中记载道：在皇帝的命令下，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



经过鞭抽棒打之后，砍下了脑袋示众。

五年后，监察官员彭长庚、许尔安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大家都有功劳，但多尔衮之功为冠"，要求为他平反昭雪。这两位勇敢的官员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学会尊重事实，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最后，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古塔。就此，多尔衮在大清朝定鼎中国时所立下的盖世功勋，大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重新翻腾出来。

无论如何，多尔衮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十三岁的福临开始亲政。

这个在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双重影响下长大的孩子，表现出了鲜明的双重人格：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上，他雍容俨然，颇有人君气象；退朝回宫后，则娇纵易怒，异常横暴。不止一种史料里谈到过这位小皇帝时常会失去控制，经常在暴怒中鞭打宦官和宫女们。史书上使用的形容词汇叫"龙性难撄"，就是这位小皇帝喜怒无常、特别不好惹的意思。在他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母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全部被搞得高度复杂，国事私情统统叫人一言难尽。

正月十七日，福临亲政后的第五天，群臣奏请皇帝批准，在二月份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小皇帝干净利索地批示："所奏不准行！"群臣立即被震晕。本来，请皇帝批准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桩婚事早已由孝庄皇太后和多尔衮确定。新娘子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皇帝的亲表妹，既有亲上加亲的意思，也有笼络蒙古的含义，还有皇太后加强自己娘家力量的深意在，哪里容十三岁的小皇帝不准行？！于是，经过几番波折，八个月后，大婚典礼举行。

谁知，两年多以后，顺治十年八月，未满十六岁的顺治皇帝突然下诏宣布废后，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福临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皇后是"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将矛头直指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皇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国臣民：自己和皇后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三年没有过夫妻生活，这个皇后根本就不具备母仪天下的能力与资格。据福临说：这位皇后虽然长得美



艳，但心地不端，特别崇尚奢侈，极度忌妒，见到容貌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就感到憎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猜忌防范，因此，自己就尽量不见她。而在此期间，其他妃嫔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康熙皇帝也将在半年后降生。

在群臣的竭力反对浪潮中，福临停止了对皇太后的晨昏定省之礼，不接见任何人，包括孝庄皇太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这位苏麻喇姑从小把福临带大，福临称之为姐姐，可能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

耐人寻味的是，孝庄皇太后起初一言不发，后来，在势成僵局之际，她主动出面说服诸王大臣，同意废后，牺牲掉自己的亲侄女，成全了儿子福临。实际上，皇太后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诏告天下，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十六岁的青年皇帝从此将军国大政的决定权牢牢掌控到了自己手里。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见诸史册的后、妃、庶妃十九人，没有生育而失载的不知凡几。他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第一个儿子在他十三岁时出生，生下后来的康熙皇帝玄烨时，他是十五岁。在他的后妃中，有五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是孝庄皇太后的亲族。不过，在福临的十三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这些后妃所出，这间接表达出了这位皇帝对自己母亲的态度。

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福临的外甥女，她是在第一位皇后被废的一年后册立的。到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刚刚过完春节，皇帝便下令“停进中宫笺表”，就是虽然保留皇后名位，但中止皇后管理内宫权力的意思。一年后，皇帝因为一件小事又下旨痛责孝庄皇太后的两个同胞哥哥，也就是自己的舅舅，并准备命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这两件事情最后全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皇帝发泄了一下对母后的不满而已，其实，其中隐藏着一段绝大的隐情——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从史书上看，福临对于他的后、妃、子女们的感情十分冷淡。前两位皇后备受视若无睹的折磨，临死时，他都不许她们前来见最后一面。对于子女，也是一样。临终安排接班人选时，他一度坚持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弟，而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其中，可能也都有这场爱情在发生作用。

董鄂氏原是福临的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博穆博果尔最小。他的母亲是麟趾宫贵妃，在皇太极的崇德五宫中，名位排在福临的母亲永福宫庄妃的前面。董鄂氏的父亲曾担任过内大臣，并且可能出任过江南苏州一带的地方长官。董鄂氏从小在富庶甲天下的人文荟萃之地长大，读过不少汉家诗文典籍，深受汉文化之熏陶，因此行为举止很有江南闺秀的温婉气象，在满族亲眷中颇被视为异类。

顺治九年，按照大清制度，十四岁的董鄂氏选秀入宫，被指配给博穆博果尔为妻。她的年纪比自己的丈夫可能大两岁。按照大清皇室规定，帝国勋贵们的妻子必须轮流入宫陪侍后妃。作为皇帝的弟媳妇，董鄂氏负责入侍的是孝庄皇太后。按照皇室制度，皇帝每天必须早晚两次到皇太后宫中请安，术语叫“晨昏定省”。于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媳不可避免地碰了面，并一见钟情，从此陷入死去活来的热恋之中。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年龄大约都在十六岁上下。

顺治十一年四月，奉皇太后懿旨，皇帝下令废止了勋贵妻子入侍的制度。显然，这与孝庄皇太后发现皇帝的出轨恋情有关。两个月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皇帝册封了第二位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在两代人之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在陷入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老年人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强力干预的结果，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陷入痛苦，就是以悲剧告终。如今的情形也是如此。

博穆博果尔继承了蒙古人与女真人好勇斗狠的遗传基因，从小就渴望领兵打仗，在疆场血战中建功立业。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下令册封自己这个时年十五岁、没有尺寸之功的弟弟为和硕襄亲王，



然后派他随军出征。结果，这小王爷不但没能杀敌立功，反而受到了真正的羞辱。

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史书记载得简约含混，欲说还休。好在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将种种说法综合起来，情形大约如下：

有一天，一帮军士聚在一起侃大山，说到这位和硕襄亲王时，人们颇为不屑，很是鄙夷地谈论着王妃董鄂氏红杏出墙，方才为小王爷挣来一顶崇高的绿帽子等等。兴高采烈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小王爷就在边上听着呢。这天璜贵胄、娇纵无比的小王爷哪里受过这种羞辱？他操起一把利剑就向那帮家伙杀来，一时间哀声四起，惨叫连连。随后，他返回王府找董鄂王妃兴师问罪。左右吞吞吐吐地告诉他，王妃进宫去了。博穆博果尔又发疯一般闯进皇宫大内。结果，据说被他的哥哥顺治皇帝，当众打了两个耳光。处于半昏迷半疯狂状态的博穆博果尔大声号哭，回到王府便上吊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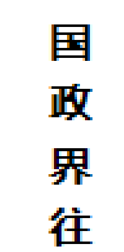
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当日，大清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了下列一行字：

“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一个月后，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被封为皇帝之贤妃；十二月五日，又下诏旨，正式册封她为皇贵妃。

从此，顺治皇帝福临有了一段幸福时光，而这皇贵妃处境之艰难之尴尬则可以想见。

进宫以后，董鄂皇贵妃在人际关系上如履薄冰，处理得十分艰辛。除了对皇太后、皇后丝毫不敢怠慢之外，就连对她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万分小心，年长的叫大妈，年轻的叫姐姐，想方设法增加其他妃嫔承受皇帝恩泽雨露的机会。如此，一点一点化解人们异样的目光。据说，皇帝批阅公文时，有时会让她帮助参考，她一概“固辞不可”，不敢干预国政。然而，每当秋天皇帝审决刑部报上来的死刑犯名单时，董鄂氏都会恳请皇帝谨慎小心，说是“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宁愿失之宽，不可失之严。由此，这位皇贵妃渐渐得到了人



们的谅解甚至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氏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多月后，这小皇子不幸夭折。偏偏就在这期间，孝庄皇太后身体不舒服，移驾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南苑养病，并命令后妃们前去侍候。这位产后不久且痛失爱子的皇贵妃只能在数九隆冬的冰天雪地之中，前去“朝夕奉侍，废寝忘食”。结果，种下病根，此后三年间缠绵于病榻之上，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汤若望记载说：顺治皇帝面对死者“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认为，南苑是皇家猎场，到了冬季便一派肃杀，那孝庄皇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在这种时候偏偏到那儿去养病，除非是她存着心想折腾什么人。因此，很难说这不是她为了报复董鄂氏所故意导演的一场悲剧。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写了一篇《董妃行状》，称得上字字血，声声泪。全文一千五百多字，酸辣兼备，处处话里有话，似乎就是为了讥刺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心机与伪善。据说，董鄂妃死前，虽然受封皇贵妃已经数年时间，她却绝无积蓄。临死时，她请求皇帝把所有人致送的葬礼礼金施散给贫穷人家。福临则在为董鄂妃举办治丧活动期间，下令追封皇贵妃为皇后，将董鄂妃宫中服役的三十名女官、太监、宫女全部杀死，为皇贵妃殉葬，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故意违犯皇家规制，将丧葬规格提高到了与皇太后、皇帝同样的等级。

据说，为董鄂妃——如今的董鄂皇后举行的大部分丧葬仪式，孝庄皇太后都率领众后妃前来参加。在那种情形下相见时，真不知这一对母子情何以堪？

遥想当年，有谁能够说清这场皇家恩怨的孰是孰非、孰因孰果？

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福临了无生趣。几乎是在此同时，他决心落发出家，遁入空门。他半是请求半是强迫，让南禅临济宗的一个和尚在万善殿中为自己落了发。然后，准备举行皈依仪式，正式出

家为僧。

此时的孝庄皇太后知道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她派遣人马火速赶往浙江湖州，召为皇帝落发那个和尚的师父来京。这个老和尚法名叫玉林琇，他深知，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后果有多么可怕。于是，他来到皇宫以后，并不去见皇帝，而是径直来到万善殿，命众僧徒把那个不知深浅、为皇帝落发的家伙捆绑起来，准备把他活活烧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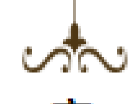
老和尚在庭院里搭起一座高台，下面堆满薪柴。就在他拿着火把准备点火之际，闻讯赶来的福临从老和尚手中夺下火把，答应蓄发，不再出家。

四个月以后，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出席百官朝贺的元旦大典。第二天，清代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上不豫"——皇帝龙体欠安。有众多资料显示，这一天，皇帝来到了位于宣武门外西南的悯忠寺，出席了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的仪式。这个吴良辅是个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太监，此次，他作为皇帝的替身，受命代皇帝出家为僧。皇帝死后，他马上被孝庄皇太后下令从寺庙里抓回来处死。理由是，他勾引调唆坏了皇帝，他要为皇帝生前的所有不当举止负责。

此后，到正月初六，先是说皇帝身体偶尔感到不舒服，随后同一天，便说"上大渐"——皇帝进入了弥留状态。当晚，到初七日子时，即初六晚上十二点，皇帝就死在了养心殿。他得的什么病？怎么治的？经过如何等等等等全无记载。然后，就是遗诏颁于天下。

就此，顺治皇帝之死成为大清朝的一个谜团。

有许多人坚信，顺治皇帝真的出家去了五台山，否则，对佛祖并没有那么虔诚的孝庄皇太后与康熙皇帝，不会三番五次地前去五台山烧香礼佛。情感丰富细腻的人们则倾向于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是在对董鄂氏的绵绵思念中郁郁殉情而死。最没有想象力的一批人，觉得顺治皇帝应该是染上了满族人最缺少抵抗力的天花，从而一病不起的。







顺治皇帝福临在位十八年，于国家治理上基本沿袭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方针大略，其他甚少建树。据说，福临十分倾慕汉家文化，曾经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甚至累得吐过血。

他能诗善画，很有汉族士大夫的风致，在融洽满汉之间的关系上可能起过不小的作用。在私德上，留给人们指责的地方不少。然而，孟森先生认为，这位皇帝“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9页）对他的个人资质评价不低。

可惜的是，在他母亲和多尔衮的摆布下，这位“天生福人”生活得实在是算不上幸福，他给自己帝国臣民带来的，也甚少福祉可言。若假以时日，或许能够做得更出色一些。可惜，在时年二十四虚岁的鼎盛之年便匆匆逝去。

呜呼！顺治皇帝！呜呼！清世祖福临！

第五章 “心计太后”孝庄：后宫藏针，魅力无穷

晚明前清时代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女性，她就是孝庄皇太后。她一生经历过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皇帝福临、康熙皇帝玄烨四代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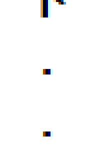
皇太极是她的丈夫，福临是她的儿子，玄烨是她的孙子。除了努尔哈赤时代，在其他三朝，这位女士曾经发挥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福临能够成为顺治皇帝，可能与她有绝大关系；玄烨成为康熙皇帝，她的意志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她对儿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顺治一生的幸福就葬送在这位母亲手里；她对孙子的教养却十分成功，培养出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贤明君主康熙，以至于这位皇帝多年以后还一再表示：没有祖母就没有自己的一切。

她是一位富有女性魅力、同时也懂得运用这种魅力的女人；她是一位心机极深、同时不断地运用这些心机的女人；她是一位对权力有着清醒认识、富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欲望的女人，却满足于躲在幕后，帮助自己的儿孙获取权力和行使这些权力。因此，在其当时和后世，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戴。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当时，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个人与家庭没有姓氏，部落的名称就是每一个人的姓氏。是故，人们习惯上称呼其为博尔济吉特氏。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如何将蒙古各部落化敌为友，始终是后金汗国的一个巨大问题。当蒙古各部落成为其盟友时，后金汗国的北部、西北部便没有了威胁，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大明。若不然，在对付正面的敌人明王朝时，自己广大的侧后翼很难设防，或者叫防不胜防。那种情形就太可怕了。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人中，他们本人和他们家族子弟中，迎娶的蒙古女子人数多达五十三人，占迎娶妇女总数的87%以上；从



后金天命二年（公元1617年）开始，到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为止，他们家族的嫡系亲属中，包括姐妹、女儿、侄女等，嫁给蒙古各部的女性共有四十三人。其中，迎娶与出嫁到科尔沁部的女子最多，迎娶来的为二十四人，嫁过去的为十五人，联姻对象包括了科尔沁所有部落和蒙古几乎所有重要部落的酋长。

这二十七年，正是后金汗国与大明朝激烈对抗的二十七年，也是大清完成全部入主中原的准备工作，并最终于一年后入主了中原的二十七年。

这种毋庸置疑的政治婚姻，帮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大体解除了来自北部与西北部的威胁。这是他们敢于与大明朝放手一搏的重要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建立尽可能广泛统一战线的极为成功的运作。翻开地图集，对此便可以一目了然。他们用这种婚姻，为自己建立起一道漫长而广大的安全屏障。

在皇太极著名的崇德五宫中，居住着他最重要的五位后妃，这五位后妃全部出身于科尔沁蒙古的博尔济吉特部落。位居中宫的是哲哲皇后，位居第二位的关雎宫宸妃海兰珠和位居第五位的永福宫庄妃，是一对同胞姐妹，二人同是哲哲皇后的亲侄女。

永福宫庄妃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她在娘家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目前，关于这个名字的准确含义尚有争议。有人认为和喇嘛教教义有关，含有“出世之人”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则认为，布木布泰是当时蒙古人用来装东西的大口袋，是很重要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用粗制毛线编织而成。从当时喇嘛教传播的情况和游牧渔猎民族的习俗上判断，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姑且存疑。

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是在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的二月初二日。当时，她虚岁十三岁。她的丈夫皇太极比她大二十一岁，时年三十四岁，按照周岁计算则为三十三岁。这时，皇太极早已有了一位正夫人，就是布木布泰的亲姑姑哲哲，此外，他还有三位侧夫人，如今的布木布泰则是第四位。

皇太极一生中共有二十五个子女，其中十一个儿子，十四个

女儿。他究竟有多少位妃嫔，目前尚没有人能够给出精确答案。为他生育过子女从而记录在案的有十五位。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是为他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出发，应该说他们二人的感情可能还不错。不过，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她和她的子女曾经给予过特殊的关爱与照顾。皇太极太忙，需要他瞻顾的军国大事太多，需要他关爱的女人及其子女也太多，这可能是他没有过多关照布木布泰的部分理由。

布木布泰的姐姐海兰珠则可能是另外的部分理由。在史书包括清代官方史书中，详细记载了皇太极对这位海兰珠用情极深的事例，在我国帝王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

海兰珠的情形很奇怪。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时十三岁，按照习俗，这是当时一般女孩子出嫁时的普通年龄。九年后，布木布泰的亲姐姐海兰珠却在二十六岁时，以处子之身嫁给了皇太极。在其当时，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毫无疑问已经属于那时的老姑娘或大龄女青年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缘由，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谜团。许多文献中谈到这位海兰珠时，时常使用的词汇是“贤淑”、“文静”等等。这可能是她进入皇太极妃嫔行列后，很快就突出地受到皇太极喜爱的原因。

海兰珠嫁到后金一年多一点，皇太极改后金为大清，正式登基成为大清帝国皇帝。他册封海兰珠为仅次于中宫皇后的东宫宸妃，并以中国第一首爱情诗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诗意，为宸妃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倘若没有足够的感情，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一年后，崇德二年七月，海兰珠生下一个儿子，皇太极为此采取了我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措施：下令大赦天下。从历史记载上看，皇太极是一个标准的工作狂，对待国事极为认真，在很小的事情上都精益求精，绝不马虎。据说，这是大清立国后的第一个大赦令，就连皇太极登基时都没有过。很难将这个举动看成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致。

始料不及的是，六个月后，这小皇子居然夭折了。这是皇太



极的第八个儿子。此后，永福宫庄妃生下第九个儿子福临，后来，皇太极的其他妃子陆续生下第十子、第十一子，皇太极均无任何表示。

大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皇太极在锦州、松山一线主持清军与明军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大战。八月十四日，为了扭转前线的危急局势，皇太极带着严重的鼻衄病，流着鼻血，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到达前线。一个月后，战局得到彻底扭转，沈阳却传来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于是，九月十三日，这位多情天子再一次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返回沈阳探病。据说，在六天之中，皇太极累死了六匹骏马。到达沈阳城外时，得到宸妃病故的消息。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极度悲恸，连续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并一度在恸哭中昏迷不醒。大丧期间，一个中央部门的承政，相当于六部尚书即部长的人物召文艺工作者吹弹歌舞，险些被处死。皇太极的弟弟阿济格等一批人也因为“戏舞鸣弦而歌”而获罪，一大批人受到极重的处罚。这一年，皇太极已经五十岁，两年后就去世了。一个百战归来的老皇帝，对于海兰珠如此深情并执着，在中国历史上确属异数。

史书谈到皇太极时，认为他“聪睿绝伦” ，从其一生来看，这种评价不算是拍马屁之论。这种情形，很有可能是皇太极对于布木布泰——庄妃没有给予过多关爱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位庄妃的心机太多也太深。从两性心理来看，一般说来，那种心智能力极强并日理万机的男人，很难从性爱的角度喜欢一个心智能力同样极强的女人，他们会因为双方太像而同性相斥。这种男人渴望在女性那儿得到满足的需求，会是一种更加女性化的东西。这可能是当年武媚娘在李世民身边只能是一个低级才人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性情柔懦软弱的李治身边，她才能成长为不可一世的武则天。

庄妃第一次表现出不凡的心机，是在福临出生前后。

蒙古、女真等游牧渔猎民族的王族神话，一般只出现在王族起源的远古时代。在动荡的游牧渔猎生活和战争岁月里，他们的领

袖，是在那些优秀的王族成员中推举出来的。因此，父子相承、兄弟相承、叔侄相承，甚至叔叔继承侄子事业的事情，都在可能发生、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编造关于这个孩子的神话。这是成吉思汗包括他的后代中很少有这种神话中人物的原因，也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包括他们绝大多数后代都没有这种神话的原因。

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度重复、极少变化，使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皇家权力传承也具有了同样的特点。这就是先秦乃至后来数千年中，我国历朝历代围绕着权位继承，有无数神灵鬼怪加入进来、搅成一团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已经知道，范文程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开始受到高度重视。有证据显示，他后来的很多时光，都是在皇太极身边、包括在汗王宫里度过的。有一个未经考证、但很多人愿意相信的说法是：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为老师，跟着他学习汉家文化。我们知道，古代汉家主流文化的核心是围绕着皇权展开的，而汉家皇宫中围绕皇位所发生的无数故事，也实在神奇，在二十四史之中，称得上史不绝书。我们无法知道，庄妃——孝庄皇太后是不是在范文程的教导点拨下，豁然开朗，从而开始编织属于她自己和儿子的美丽故事。她是在二十五岁即嫁给皇太极十二年之后，生下福临即后来顺治皇帝的。假如范文程曾经做过她的老师的话，这段时间应该足够教会她我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之精髓了。

大清朝皇室仅有两例围绕皇权展开的神话故事——发生在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出生时的神异——都与孝庄皇太后有关，这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神话，全部出自她本人和她的侍女之口。这种情形若被今天的人们看成是真实的、事实如此、天命如此，或者看成是偶然的话，也无不可，毕竟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装神弄鬼故事的数量已经足够庞大。“天生福人”——福临降生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庄妃——孝庄皇太后一再渲染这孩子出生前后的神奇特异，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除了给他起这个名字之外，皇太极曾经给予过他和他的母亲





任何特殊的关照。

庄妃——孝庄皇太后见诸史册的第二个举动，便是大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的故事。这段故事在清代官修正史中失载，在其他史料和民间则流传甚广，甚至不乏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亦予以采信。其中众说纷纭，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段发生在美女与英雄之间的佳话，足够脍炙人口；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似乎亵渎了他们心目中那位圣洁的皇太后。端看面对者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打量这件事情。

据说，皇太极为了拿下洪承畴，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将熟悉洪承畴的人找来，询问洪承畴的为人有什么特点？回答说：好色。于是，皇太极挑选了几位美貌侍女前去诱惑，结果依然碰了壁。最后，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就有了下面这个流传得极为广泛的故事。

史书记载，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面对墙壁，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对她不理不睬。她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最后，当洪承畴知道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始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徐徐曰：“先生不会冷了吧？”洪承畴瞠目视之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遂翻身下跪。

关于这段故事，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庄妃在三官庙中前后逗留了几天几夜，方才说服洪承畴投降；有人则认为庄妃是在一天一夜之间解决了问题。持上述看法的，不乏国内外重量级史学著作。还有人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儿，语言文字之间颇为激烈地认为此说荒诞不经。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段故事中出现的庄妃——孝庄皇太后，足够聪明机智，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应该算是没有辱没这位女士的智商。生活在三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人，是否有必要为此大动



肝火，似乎也还值得商量。在更强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姑且存疑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在两性关系上，世界上并没有特别多的民族像中国当代文人这样假模假式而又心理阴暗。实行嫂婚制的民族中，一位女性嫁给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甚至祖孙几代人，或者不同辈分的几位女性嫁给同一位男子的情形十分常见。距此三四十年前，在与女真习俗极为相近的蒙古部族中，著名的三娘子曾经嫁给过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部落酋长，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当地蒙、汉两族的友好和睦关系，成为世世代代受到赞美与怀念的伟大女性，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民间传说之中，受到崇高的尊敬与爱戴。

女真部族中大名鼎鼎的温姐，名气一度可能比东哥还大。她就曾经嫁给过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两代海西女真哈达部落的首领。这位温姐与皇太极的关系很近，是皇太极母亲孟古格格的亲姑姑，他们差不多可以算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一定以为这是件多么不得了的事情，从而需要假模假式地予以遮掩。在那些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部族中，如果一位女性能够把一个英雄收服过来的话，不但不会受到族人的鄙视，相反，她也会像英雄一样受到大家的爱戴与尊敬。这是明清之后，头脑与心灵被孔孟之道强力阉割过的汉族士大夫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文化习俗的不同，常常导致对同一件事情截然相反的评价。清朝入主中原后，面对汪洋大海般的汉族民众，做出了全面接受儒家教义的选择，因此，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百般掩饰讳莫如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若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正是那些汉族文人士大夫，特别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褒贬别人，一旦涉及了两性话题，便立即如鲁迅先生所言，具有了格外敏锐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却还要满嘴的冠冕堂皇。

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是这位庄妃——孝庄皇太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与发生在这位女性身上所有的故事一样，她与多尔衮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经过如何？结局怎么样？等等

几乎全部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

至少在史书记载上看，在她嫁到后金汗国之前，她和多尔衮恐怕是没有机会在一起青梅竹马的。在年龄上，她比多尔衮仅仅小四个月，差不多是同岁。她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成为多尔衮的嫂子。第二年，十四岁的多尔衮便迎娶了她的姑姑为妻，多尔衮又成了她的姑父。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与女真人中，这种情形十分常见。从实际情况判断，皇太极生前，她和多尔衮的交往可能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日，就是在她嫁给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没有继位为汗的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兄弟叔嫂、两个家庭之间有过交往应该是可以想见并十分正常的。至于这种交往怎样展开，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考证工作。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当时太无足轻重，史书上全无记载。但是，诚如我们所知，青年男女相互之间要建立起深切的好感乃至产生某种情愫，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特别长久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彼此之间建立起了很深的默契。

在满族王公贝勒中，多尔衮是除皇太极之外，文化素养最高的一个人，他对汉文化的了解大约在众多王爷中也是最深的。以他的聪明机警，当庄妃——孝庄皇太后散布出福临降生前后的神话时，他可能在第一时间立刻就明白了这位女士想干什么，从而，在与豪格的尖锐对峙中，退而求其次，做出了推举福临的选择。

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可能就会变得高度困难。这一点，从多尔衮母亲的遭遇中可以窥见一斑：她为代善送过几次饭，她的侍女经常去代善家，她本人深夜出宫两三次便受到控告，成为严重的罪名，可见后金汗国汗王宫中的男女之大防不可谓不严密。同样，皇太极继位之前，多尔衮的母亲被以努尔哈赤遗命为由殉死，在此期间，庄妃是否能够给予同年、并且已经结婚的多尔衮多方安慰，是一个很成疑问的话题。

因此，从皇太极继位到去世的十七年时间里，他们之间应该很难有私下交往的机会和可能。帝王之家历来如此，大约是不必怀疑





的。他们之间即便能够见面，想必也都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时间短暂而且正式，除非还有一种极端隐秘的方式。

有一种看法认为，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即多尔衮推举福临的前一天深夜，多尔衮曾经到过皇宫内院，和当时皇太极的哲哲皇后与庄妃有过密谈，从而确定了推举福临为帝的思路。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认可，其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按照大清制度，皇家的警卫工作一直由两黄旗担任。两黄旗直属皇帝所有，实力与地位都是最强有力的，他们的自我感觉自然也会与众不同。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嫌隙很深。这种失和状态最早可能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开始的。当时，皇太极以黄色应该由汗王拥有为由，将自己所有的两白旗旗色与两黄旗旗色予以交换。从此，皇太极的直属部队两白旗变为新的两黄旗，老的两黄旗则成了如今的两白旗。双方心中也就有了芥蒂。

皇太极死时，与两白旗素有嫌隙的两黄旗精兵统领图尔格，为此专门调动三个牛录的兵力加强皇宫的戒备，潜台词其实就是针对两白旗的。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他是否可能在如此敏感的情势下，深夜通过两黄旗的严密守卫进入皇宫内院去，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到过沈阳故宫的人应该知道，要想不被人发现地进入哲哲皇后的正宫居室或者庄妃的永福宫，不能说没有可能，却也是极度困难。当年，多尔衮的母亲深夜出宫两三次便被人举报，那时，后金汗王宫可能还没有皇太极生前的崇德五宫设计得那么严密，何况此时此刻这种高度敏感时期。

沈阳皇宫中，皇后和其他四位最重要妃嫔的五个宫室全部在一个院子里，就是著名的“崇德五宫”。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四合院，一套正房，加上东西各两套的四套厢房，住着这五位主子。透过窗子，其他房间的人员往来可以一目了然。北京故宫的情形与沈阳故宫截然不同。原因是，这北京的皇宫里，谱摆得太大，稍微重要一点的妃嫔宫室都是独立的院落，各成单元。关上门，可以把自己相对地藏起来，不像沈阳皇宫里那么没遮没挡。当时，庄妃与多尔

衮之间如果有过信息交换的话，也很有可能是极度隐秘，或者是通过庄妃——孝庄皇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进行的。而哲哲皇后——庄妃的亲姑姑曾经生育过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她对自己这个侄女想要做的事情，大约是心知肚明，并且乐见其成。对于多尔衮推举福临继位，她应该和自己的侄女一样，也是心怀深切感激的。

福临继位之后，多尔衮反倒有可能经常和此时已经成为两位太后之一的孝庄见面了。他以小皇帝福临名义发布的那些文告与命令，应该得到过这两位太后的鼎力支持。

到北京以后，情形又截然不同。

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不需要遮挡。进入北京后，他曾经住在皇宫大内的武英殿里。福临来后，他住进了自己的王府，据说这王府的辉煌壮丽在当时不亚于皇宫。他到皇宫内院来时，可能有很多禁忌，但这些禁忌对于他来说，都是理论上的。蜘蛛网可以网住昆虫，飞鸟却一冲而过。那些皇家制度是他同意制定的，他是批准这些制度的人，没有人能够用制度来对付他和像他这样的人。是的，没有人。在那时的中国，他名义上是摄政王，实际上，以他的功业、威望、权势，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行使的根本就是皇帝的权力。

此后，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之间，或有过一段蜜月期。这个时期是从多尔衮定鼎中原后，迎接小皇帝福临与孝庄皇太后们迁都北京开始的。



这种情形，很像那些在远方厮杀征战后满载而归的勇士，在他们妻子或者情人怀抱中所感受到的温柔与多情。多尔衮奉献到孝庄皇太后面前的，是那伟大的、女真人一代代梦想的、寥廓无际的万里锦绣江山。孝庄皇太后母子坐在沈阳的皇宫里，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这片大地至高无上的主人！世界上，有几个英雄，能为女人做到这一点？

史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按照礼部早已经安排的时间表，皇帝和太后一行应该在顺治



元年九月十七日到达北京。在通州只是迎入行殿短暂停留，更衣——皇帝大小便的委婉说法，然后便前往北京。但实际上，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百官迎接至通州城外五里处，进入行殿，百官叩拜如仪后退出，摄政王留下与皇帝、皇太后叙话。不久，百官接到命令，皇帝一行旅途劳顿，决定当夜驻跸通州，次日一早起驾进京。（《清世祖实录》卷八，第5—13页）有历史作家认为，就是在这一天，时年三十二岁的孝庄皇太后，开始以自己的满腔柔情来回报同样是三十二岁的大英雄多尔衮。

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第二次登基的福临册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年初，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这种层层升级的尊崇，必定与多尔衮威权日重有关，也无法排除他与孝庄皇太后之间感情不断升温的可能。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之后，大清藩属国朝鲜国王看着大清咨文，发问曰：“皇父摄政王是什么意思？”他的臣子回答说：“我专门问过大清使臣。他回答说，就是去掉‘叔’字，朝贺时的各种礼节与皇帝一样。”朝鲜国王说：“那就是说有两个皇帝了。”（《仁祖实录》二十年乙丑）

到了这一步，除了皇帝的名位，能够给多尔衮的已经全部都给了他。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孝庄皇太后对于多尔衮的报答也算是至矣尽矣。其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是：向全国臣民公开确认了自己与多尔衮的夫妻关系，也就此界定了多尔衮与皇帝的父子关系。在漫长的帝国历史上，围绕皇位的争斗千奇百怪、血雨腥风，唯独还没有父亲抢夺儿子皇位的故事。不管多尔衮怎么想，也不管阿济格、多铎如何不甘心，如何希望多尔衮拿下皇位，这条底线划出来之后，跨过它，就意味着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意味着不可能不留下骂名。

顺治八年二月，在清算多尔衮的疾风暴雨中，皇帝颁布煌煌诏书，指斥多尔衮的累累罪行，其中谈到了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等于公开承认了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事实上的夫妻关系。假如不是成了公开的秘密，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对于此类事情，皇

家一般都是能瞒则瞒，能骗则骗的。果然，到康熙朝修《清世祖实录》时，在卷五十三条中，这一段便被删去了。据说，关于太后与多尔衮大婚的诏书一直保留在大清官方的原始记录中。后来，到乾隆时代，纪晓岚在皇家档案馆中还曾经看到过，是他建议乾隆皇帝为了皇家脸面考虑，而彻底删除的。

当时著名诗人张煌言在他的《张苍水诗集》中写道：“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晋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是一位抗清斗士，诗中讥讽和不屑的意味不言而喻，却恐怕不能简单看成是无中生有或者蓄意捏造。这种情形表明，在其当时的社会心理中，在满洲人看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考虑了，而在汉族人那无数贞节牌坊来看，对于太后本身和新王朝形象的杀伤力却极大。因此，整件事才被弄得如此欲盖弥彰。若是今天还用这种思维看待此事的话，就不仅可疑，而且可笑了。

孝庄皇太后的这些做法，除了感情和报恩之外，一个最深切的动机，其实还是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可惜，这小皇帝的一切来得都太过容易，他既不懂得世事的艰难，也不了解人心的曲折，他根本无法体谅母亲的苦心，这一切反倒成了他憎恶多尔衮和自己母亲的心结。那些在富贵中一帆风顺长大的孩子，常常在人性层面上具有完全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体谅人的甚深的恶习，在小皇帝福临身上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

顺治六年年底，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刚满一年，他的王妃就去世了。一个月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纳娶了肃亲王豪格的夫人。当时，豪格死去不到两年。多尔衮死后，在汉族士大夫——甚至今天文人的笔下掀起了一阵喧嚣。核心意思是指责多尔衮用这种方式，继续报复已经死去一年多的豪格。



殊不知，这个指责可能仍然是驴唇不对马嘴。

多尔衮原来的王妃是皇太极正宫哲哲皇后的堂姐妹，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豪格的这位夫人则是多尔衮王妃的亲姐妹，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堂姑姑，而豪格又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侄子。在汉族



人眼中，他们整个一个乱伦。

实际上，在盛行多种婚姻制度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看来，这种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既考虑到了经济利益，又照顾到了未亡人的生活寄托，是再好、再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理解的倒可能是汉族人——什么三从四德！什么贞节牌坊！自己给自己的生活找了那么多麻烦和苦难，怎么还能自我感觉这么好？

当年，三贝勒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子分别由侄子豪格与岳托娶去做了夫人；努尔哈赤的第十个儿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子又嫁给了德格类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后，除了十四叔多尔衮迎娶了他的一位夫人之外，他的另外一个夫人则嫁给了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这些都堂堂正正地记载在清代官方史书中，是一种与汉民族农耕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文化现象而已。那些在孔孟之道熏染下，既缺少人文情怀，又缺少对异质文化研究了解的汉族士大夫，喋喋不休地用三从四德之类货色去评判别人，实在是令人讨厌。事实上，多尔衮在这里报复的恐怕不是已经死去的豪格，而是做给活着的孝庄皇太后看的。

我们无法知道多尔衮的这个举动，对孝庄皇太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影响。从常识和常情推测，她恐怕很难感觉愉快。如果她与多尔衮之间有夫妻之实，“皇父摄政王”又使二人有了夫妻之名，多尔衮却还要再娶豪格夫人为妻，显然对她的皇太后之尊是一种蔑视和伤害。假如多尔衮和她之间不是事实上的夫妻，她只是想通过“皇父摄政王”这个头衔给多尔衮这匹野马套上一个笼头的话，她就势必会在此举中感受到多尔衮深切的不满与敌意。因此，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件事，多尔衮身后就很难不受到清算了。孝庄皇太后也自然可以在这种清算中，保持住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多尔衮死后，对他的清算表面上是由顺治皇帝发动的。其实，当时福临刚满十三周岁，显然可以将孝庄皇太后看成是幕后主使人。清算的凶狠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憎恶与报复，在到那时为止的大清朝历史中，针对自己人，似乎还没有如此凶残过。何况还是像多尔衮这样，对大清朝立过盖世功勋的人。对死人的过度摧残与侮



辱，大体表现了这对皇家母子令人不齿的卑怯和变态。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很难找到福临与孝庄皇太后如此痛恨多尔衮的充足理由。因此，除皇家的个人感受之外，其中，大约有这位皇太后很深切的政治考虑在。这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成是：多尔衮在为自己生前的某些不恰当做法付出代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济尔哈朗和豪格的不公正。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胞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从小由努尔哈赤抚养长大，他是多尔衮的堂哥，比多尔衮大十三岁左右。从史书记载上看，他很早就跟随努尔哈赤冲杀在战场上，立下过许多显赫的战功。因此，深受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汗王的赏识，是努尔哈赤时期共柄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也是皇太极时代四大亲王之一。按照名次，他在四大亲王中还排列在多尔衮前面。

尽管拥有崇高的军功、威望和地位，但可能受父亲舒尔哈齐与哥哥阿敏命运的影响，济尔哈朗为人很是低调，远不像阿敏那样锋芒毕露。因此，福临继位以后，他主动要求将自己排在多尔衮前面的名次放到多尔衮之下，并要求诸王大臣商讨国事时，只报告多尔衮即可，不必报告自己。迁都北京后，他还率领诸王大臣主动要求在礼仪上，大幅度提高多尔衮的待遇。他做得应该算是足够了。然而，多尔衮为了满足多铎的要求，还是不肯放过他。当时，多尔衮的王府壮丽不亚于皇宫，却以济尔哈朗的王府超标为由，罢黜了他的辅政王，换上了多铎。这种仗势欺人、公然行私的行径实在太过乖张，不可能不引起济尔哈朗的痛恨，也不可能不引发人们的不平。

多尔衮对于豪格的处置，近乎丧心病狂，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尽管我们找不到多尔衮谋夺皇位的确凿证据，但这些排斥异己的举动，的确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不安。多尔衮的哥哥阿济格和弟弟多铎，可能特别希望多尔衮能够登上皇位。按照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王推举制度，他们的愿望并非毫无道理。可惜，斗转星移，时势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们的骄横和两白旗的威势，除了有效加深人们的恐惧与愤怒之外，令人对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很难产生什么更加乐观



的想象。

这一切，都是在小皇帝和孝庄皇太后眼皮底下发生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皇太后纵容和支持了多尔衮兄弟。事实上，为了福临的皇位，孝庄皇太后确实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无条件地支持着多尔衮，直到他成为“皇父摄政王”为止。因此，对于多尔衮所做的一切，皇太后不可能不面临人们疑虑的目光，从而陷入尴尬。她只有有效地将自己打扮成多尔衮跋扈和野心的受害者，方能摆脱这种尴尬。

顺治五年，代善老病而死；顺治六年，辅政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死。努尔哈赤时期的八大和硕贝勒只剩下了济尔哈朗与阿济格，皇太极的四大亲王则只剩下了一个济尔哈朗。

面对阿济格的桀骜不驯，面对两白旗将士失去最高统帅的惶恐，面对多尔衮留下的诸多不平与动荡不安，只有济尔哈朗具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摆平这一切，只有济尔哈朗能够让孝庄皇太后母子摆脱尴尬的局面。这应该是孝庄皇太后迅速起用济尔哈朗，杀死地位崇高却不得人心的阿济格，并将一切恶行统统推到多尔衮头上，以及严酷对待死后多尔衮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年同样三十九岁的孝庄皇太后，其心计与无情，远在多尔衮之上。在她的老辣、深沉、阴狠面前，多尔衮简直就像是个混沌初开的毛头小伙子。

十年后，孝庄皇太后的儿子顺治皇帝死时，他的遗诏是在孝庄皇太后的一手主持下定稿并布告天下的。这篇遗诏用皇帝的口吻，列举了福临自己生前的十四项罪过，基本可以看成是一份皇帝的罪己诏。

这位皇太后真够可以的。当年，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地位，她不惜降尊纡贵、自贬身价以取媚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为了儿子的皇位和摆脱自己的尴尬，她以中国历史上只有针对不共戴天之仇人才会采用的手段，清算了对他们母子恩德大于天的多尔衮。后来，在和福临闹得形同冰炭、几乎反目为仇的情势下，又在他死后，用儿子的口吻清算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一种政治文化让一位情人和母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行事的话，也真是够令人不寒而栗的。只有乖戾而没有

人性的皇家传统，才会造就出如此乖戾而没有人性的政治动物，让人夫复何言？

平心而论，这样的遭际，对于孝庄皇太后来说，也应是足够惨痛。这一年，她年近五十。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是一位老妇人。这种心路历程，可能促使她特别细心地呵护教养孙子玄烨，并终于培养出了一位足够出色的康熙皇帝。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孝庄皇太后在历史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恐怕就很难说了。

顺治皇帝福临临死时，可能确实想要报复自己的这位母后，因此，才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一再坚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某一个堂兄弟。这样，孝庄皇太后的地位，将会在新皇帝继位后立即被边缘化，为新皇帝的母亲所取而代之。这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此时，她很清楚，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就像顺治皇帝临死都不愿意看见出身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妃一样，他可能也同样不愿意见到自己的母亲。因此，皇太后命令皇帝生前最信任的满汉大臣们，轮番前去劝告皇帝改变心意，终无效果。于是，孝庄皇太后请出了深受皇帝敬重的洋神父——汤若望。

汤若望是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时发挥过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曾经以天文历算方面的精湛技艺，令帝国的同行们相形见绌，从而不但获准在帝国首都内城宣武门建起一座教堂，至今耸立在宣武门边，还荣任帝国钦天监监正。这个职位与今天国家天文台台长兼国家气象局局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需要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解释上天的意志，供皇帝在进行重大国事决策时参考。因此，他对皇帝的影响不可小觑。



汤若望曾经对大明帝国做出过特殊贡献——他奉大明皇帝之命，为帝国政府撰写过一本制造、维护、使用红夷大炮的小册子，因此，袁崇焕炮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辉煌业绩中，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

多尔衮进京后，不但没有人追究他当年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还和范文程成了好朋友，并深受多尔衮欣赏。多尔衮所颁布的第

一份大清历法，就是这位洋神父主持修订的。他在西医西药方面的知识，是他和孝庄皇太后与福临结下善缘的重要原因。据说，福临称呼这位洋和尚为“玛法”，在满语中，是“爷爷”的意思，晚上将他召入宫中，二人时常作彻夜谈。有一年福临过生日时，甚至将生日宴会摆在了汤若望的教堂里。

如今，在皇帝势将不起之际，汤若望前来问候。据说，他有效地打消了皇帝立堂兄弟为继承人的想法。按照这种说法，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被选择出来，汤若望也是功不可没。因为，当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询问哪一个儿子可以成为未来的皇帝时，汤若望回答说，应该选择已经出过痘、不会再害天花的孩子。

这个孩子恰恰就是玄烨——康熙皇帝。

就此，玄烨成为大清朝第一位由老皇帝临死前指定、而不是由诸王贝勒大臣推举产生的新皇帝。这个来自塞外的新王朝已经和中原帝王政治文化传统大体合流，其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的贵族共和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

从此，中国历史快速驶入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康熙皇帝时代。康熙继位之初，曾经有一个汉族秀才上书皇太后，建议她垂帘听政，被皇太后断然拒绝。在未来的岁月里，孝庄皇太后以她对康熙皇帝的成功教养，赢得了皇帝，并通过皇帝赢得了历史与后代的尊敬。

据说，晚年的孝庄皇太后自奉甚简。与明朝比较起来，皇宫中的开支与使用的太监、宫女数仅仅是明朝的一个零头，平均起来大约还不到其百分之一。而就是在这种节俭的开支中，孝庄皇太后还曾经多次将皇宫中积攒起来的银两，赈济给遭受自然灾害的灾区人民。她对康熙皇帝的教诲中，有一些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地方，这应该是她受到爱戴的原因。



据说，这位老太太在夏天避暑时，曾经去过多尔衮猝死的喀喇城，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承德市附近。这位饱经沧桑、已是暮年的老人，来到故人之故地，不知会有揪心的疼痛否？

公元1688年，即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夜时

分，孝庄皇太后病逝于北京紫禁城慈宁宫。去世前，她再一次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团：她叮嘱孙子康熙皇帝，不愿惊动自己奉安已久的丈夫皇太极，且眷恋儿子和孙子，因此，要求将自己葬在福临的陵墓附近。最后，终于安葬在位于今日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的围墙外，与今天沈阳北陵的皇太极昭陵相对，号为昭西陵，从而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七十五岁的孝庄皇太后，一生多姿多彩，却也无法不令人感慨万千：这老太太，可真不容易！





第六章 玄烨亲政，有人不服

不到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死了，死于天花。

天花又叫痘疮，是一种由过滤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终身免疫，却会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适合病毒传播，很少有这种传染病。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便整体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关后，凶猛的八旗战士常常会因为这种病毒的侵袭而死掉。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于天花。对于大清亲贵来说，天花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人们为了抵抗这种病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后，曾经下令北京市民不许炒豆，不许燃灯，不许泼水。据说，这是民间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后治疗的行之有效的习俗。在北京城里，一旦发现有人染上了这种病，会立即被强行驱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属也必须报告兵马司，然后，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绳子，围出警戒隔离线，不许进出。

这种应是足够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烨，使他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的这位三皇子，时年还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却在两年前已经出过痘了，且属于那种没有失去生命的幸运者。如今，他脸上那些浅浅的麻点，毋庸置疑地成了继承皇位的最重要资格与理由。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资格和理由实在是当时中国人与后来中国历史所能达到的最大幸运了。

康熙皇帝本人也足够幸运。经过他十四叔祖多尔衮和他父亲福临的十八年努力，到他继承下这一片广大国土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大体上统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续多年的噩梦成为过去，除了为数不多的明朝遗民还在深深隐痛中回忆前朝衣冠风景外，



更多的人已经对现实心平气和，他们在和平宁静中恢复着创伤，祈盼着好一些的未来。

七岁，他应该还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史书记载说，从五六岁开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负责教导他学习满语。后来，又增加了几位老师和师傅，分别教他学习满、汉典籍和骑射武功等等。据说，这小皇帝读书特别用功，所读过的东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诵的程度方肯罢休，“从来不肯自欺”，以至于他的保姆害怕他过于辛苦，时常要把书藏起来。

十一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宫中的规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宁宫，亲自抚养教导。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年以后的孝庄太皇太后“独嗜图史”，大约就是特别喜欢带插图的历史类图书吧，这种情形可能对玄烨影响不小。据说，孝庄曾经对孙子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当着群臣询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臣没有其他欲望，唯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见，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运的小皇帝想必应该渐渐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远远没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

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的。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别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此后，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其时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就愿意给人做奴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



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洲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一些绝望的逃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也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戊子）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入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大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殊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



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恶行，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已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得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只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能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其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代理，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承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

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明，清朝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厢情愿。在其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性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曰：“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

干预？”（《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第5—6页）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得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断，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大清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冒着枪林弹雨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守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



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他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大清与大明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以此反戈一击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中，屡立军功，旋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名次排在索尼之后，成为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特殊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之事可能就有他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申冤，因此重见天日。他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特别受信任，接连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

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役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他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特别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



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倾泻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大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悄悄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鑨（lóng）《明史》案。

庄廷鑨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鑨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洲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原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刊刻、参校、买书、藏书、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有关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七十人被处死，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鑨，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做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皇太后则难辞其咎。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特别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的咄咄逼人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滚滚人头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鳌拜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自己的弟弟穆里玛。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突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



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上书坚决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特别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是很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欢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户部尚书苏纳海、

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背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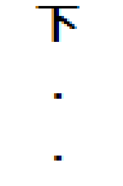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

康熙六年正月，玄烨虚岁十四，首席辅政大臣索尼领衔上奏，请求皇帝亲政。按照当时的习惯，十四岁已经是成年人。当年，先皇帝福临就是十四岁时亲政的。索尼老啦，更兼满身是病，看着鳌拜和苏克萨哈死掐，他是有心无力，只能用恳请皇帝亲政来表达自己对皇家的最后一点忠诚。当年六月，索尼病逝。



七月七日，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按理说，皇帝已经亲政，辅政大臣便自然应该辞去辅政之任。谁知，当三位辅政大臣提出归政的请求后，孝庄太皇太后却表示不同意。她说皇帝到底年轻，经验不足，几位辅政还要继续辅佐，过一两年看看情形再说。这老太太心机



太深，搞得所有人都一头雾水，不知道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结果，这种做法事实上变成了苏克萨哈的催命符。

经过几年的明争暗斗，苏克萨哈可能是深切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真的觉出这辅政大臣的差事实在不好玩，尤其是和那鳌拜一起玩儿，真是一点儿都没有意思。因此，他可能是真心希望快点把这烫手的山芋扔出去。如今，孝庄老太太来了这么一手，大出苏克萨哈意料，他一下子乱了阵脚。几天之后，他单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说是这两年身体越来越不好，无法继续给皇帝效力，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皇帝躬亲大政，乞求皇上让臣子我前去为先帝守陵，“以线余生，得以生全”。实际上，苏克萨哈的意思很清楚，就是以此逼鳌拜和自己一起解除辅政。他就差把这话明明白白说出来了。

万万没有想到，帝国官场上惯用的这种曲里拐弯的表达方式，居然把小皇帝蒙住了，形成了真正的鸡对鸭讲。他不明白，自己刚刚亲政，正是需要重臣扶上马送一程的时候，况且太皇太后也说过不许辅臣现在退出，这苏克萨哈偏偏此刻要去为先帝守陵，莫非是反对自己亲政不成？小皇帝很不高兴，立即给诸王贝勒大臣发下一道训谕，口气很不客气，曰：“不知苏克萨哈受到了什么逼迫？在这里怎么就活不下去？为什么守陵就是生路？会议具奏。”

鳌拜立即召集会议，结论是，苏克萨哈心怀怨恨，必须逮捕治罪。随后，列举了苏克萨哈不想归政给皇上的二十四款大罪，要求将他和他的大儿子凌迟处死，其余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侄子、三个同族一并抄家处死。

看到这个报告，玄烨这才明白苏克萨哈说不出口的苦衷何在。于是，康熙批示说：“此议不妥，不许所请。”

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鳌拜捋胳膊卷袖子，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声吼叫，折腾了足足一天，把个小皇帝吓坏了，最后，除了将凌迟处死改成绞刑之外，其他所有的都照准。结果，苏克萨哈一家人稀里糊涂地走上了奈何桥。两年以后鳌



拜被拿下，康熙立即给苏克萨哈一家人恢复名誉和原有官位，算是平反昭雪了。据说，苏克萨哈侥幸活下来了一个幼年的儿子，继承了这些名位，好歹算是没有断了香火。

康熙在七月七日举行亲政大典，苏克萨哈在七月十三日上疏皇帝请求为先帝守陵，当日，亲政六天的玄烨派侍卫米斯翰前去责问，七月十五日决定逮捕苏克萨哈等人，七月十七日公布了他的二十四款大罪，随后，便是皇帝被迫同意鳌拜的主张等等。从这些记载中，其实很容易发现一个蹊跷：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孝庄太皇太后在干什么？

假如皇帝和太皇太后都不同意鳌拜这种做法的话，让人很难想象最后皇帝会被胁迫着同意了对一个帝国重臣如此残酷的处置。我们知道，此时，大清朝已经完成了将八旗制度与大明帝王政治制度完整结合的全过程，这种制度对于皇家权益的保证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两年后，皇家并没有调动军队，也没有大动干戈，只是轻喜剧或闹剧一般就拿下了鳌拜。因此，曾经有人推断，当时，在对苏克萨哈的处置中，可能隐藏着其他不可告人的重大隐情。这个隐情，可以解释为什么鳌拜被记载了那么多大不敬的不法情事，拿下后却被轻轻放过、后来又相继为他平反的原因。

事实上，鳌拜被大清朝官方史料描述得越嚣张跋扈，这样的结果也就越可疑。这种重重举起轻轻放下、雷声巨大雨点微微的情形，不符合帝国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清代官方史书完全以皇家之是非为是非，在有新的证据发现之前，的确令人很难完全相信这种充满乖戾和诡异的大清官方解释。此后发生的事情很像是那些瞎编乱造的“戏说”情节。

从幼年开始，玄烨便每天下午练习骑射武功，到晚年，他曾经回忆过当时苦练杀敌本领的情形。苏克萨哈被处死以后，玄烨不动声色地召集了一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侍卫，每天和他们在一起练习摔跤扑击等武艺。据说，有时鳌拜经过这里，看到这帮小青年练得热闹，还会忍不住技痒，下场指点一二。

为了表现皇帝的大智大勇，史书记载说，有一天，鳌拜称病没有上朝，玄烨突然深入虎穴，前去探病。正在图谋不轨的鳌拜慌忙躺到床上装病。机警的侍卫在鳌拜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把尖刀，使在场者无不屏住呼吸，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只见十五岁的皇帝拿过尖刀，在手里掂掂，赞扬道：“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洲的习俗，不错不错。”于是，大家尽欢而散。

在此期间，康熙皇帝为了麻痹鳌拜，让他放松警惕，还不停地为他加官晋爵。每当有不利于鳌拜的奏章时，皇帝便会对上疏者痛加斥责，指斥他们“妄行冒奏，沽名钓誉”云云。帝国官场最高层之阴谋诡诈，由此可见一斑。

大清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669年），是被当时与后世热烈赞颂的一天。这一天，康熙皇帝将那些年轻侍卫召集起来，问他们：“你们作为我的左膀右臂，是怕我呢，还是怕鳌拜？”大家齐声回答：“我们只怕皇上！”皇帝深感满意。散朝后，鳌拜最后一个离去。当他屈膝向皇帝行礼时，这帮小青年一拥而上，把这位国家重臣摁倒在地，随即捆绑起来，关入监狱。其他如遏必隆等鳌拜的所有党羽亲信全部束手就擒。

据说，鳌拜被拿下后，举朝庆贺。随后，公布了他三十款大罪，群臣请求将他立即斩首。有一位名叫白晋的法国传教士记载说，在审判鳌拜时，这位战功赫赫的前帝国重臣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皇帝和所有在场的人观看他身上数不清的伤疤，他一一告诉皇帝，哪一块伤疤是在哪一次战斗中留下的，其中，还有他舍命救皇帝的祖父皇太极时身负的重伤等等。最后，皇帝下令从宽处理，将他幽禁起来。九名被认为是鳌拜死党的高级官员被处死，遏必隆最幸运，不但保住了性命，不久之后，还以公爵的身份继续宿卫内廷。



此后若干年，鳌拜，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大功臣，变成了鼻梁上涂着一大块白粉的小丑模样，实在也是丢尽了先帝和大清朝的脸面。

四十多年以后，康熙五十二年，早已在幽禁中死去的鳌拜被



追赐名号，由他的子孙世袭，等于是悄悄为他平了反。康熙死后，他的儿子雍正继位，又下令祭葬鳌拜，并恢复他的一等公爵，由子孙世袭；到康熙的孙子时，乾隆四十五年，再一次把这位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死人翻腾出来，命令将他的一等公爵降为一等男爵。

帝国政治之波诡云谲实令人如堕云里雾中，没有人能够弄清爽，这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到底藏了多少猫腻？

从康熙八年开始，康熙皇帝玄烨才算是真正亲政。他用小孩子闹着玩似的方式，轻轻松松地扳倒了似乎不可一世的鳌拜，令帝国臣民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有人认为，对于帝国政治来说，这有多么的不体面。人们把这一举动看成是有如天助，看成是神明一般，看成是小皇帝雄才大略的最初展现。人们有理由在皇帝的举动中，期待着美好的明天。

在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从康熙八年开始，帝国终于陆陆续续停止了圈地，投充和逃人也相继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康熙主政时代。

第七章 康熙来了：年轻皇帝的顶层设计

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后三日，云南竟然在隆冬时节“雷电雨雹风雪一时兼作”。按照古人的说法，这是千年罕见的灾祸之兆。

恰在此时，一个名叫查如龙的人来到云南昆明平西王府。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他呈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血书中说：“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王爷是汉人，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今天，夺取天下的关键就在王爷手边。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会响应。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上平西血书）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势的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平西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边，三十年忍辱负重为的只是这一天。他宣布脱离大清，建国号为“周”，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改穿大明军服，誓师直捣燕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灵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这种看法肯定是能够成立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们的文化素养、政治才干、心胸、眼光、意志力、对国计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诸方面判断，康熙皇帝玄烨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康熙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代，也不意味着玄烨本人就是一位无懈可击的政治家。学者王家范先生曾经准确指出：大清仍然循着大明的前辙旧轨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层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从心的难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尽管康熙皇帝曾经与困扰帝国之痼疾——贪官污吏们进行过坚定的斗争，但那仍然是一个贪官污吏层出不穷的时代。玄烨是一位具有相当高学识素养的皇帝，他的科学知识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执政的五十多年岁月里，并没有能够开创出一个科学昌明的伟大时代，并且，仍然制造过恶名昭著的文字狱。他对于国家安宁、人民福祉付出过真诚的努力，但从全国的情形看，当时人民生活远没有后世一些学者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好。

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祖国与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曾经根据江南地区的棉花、粮食产量，应用现代数理方法推算该地区乃至中国的生产与经济规模，甚至计算出了康熙年间的GDP与人均收入。在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进行这种计算尚且存在数据采集和计算口径上的诸多风险，对三百多年前混乱不堪的数据居然能够进行如此大胆的推算并得出更加大胆的结论，作者的勇气的确令人无话可说。事实诚如王家范先生所说的那样：假如初始数据是根据收成好的年景选取出来的话，这种推算即使不能说是一堆数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价值也实在令人怀疑，更不要说还有全国各地之间的巨大差异。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鳌拜之后不久，玄烨就命令户部，将直隶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前明废藩的土地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



勋贵、宦官们曾经在上述地区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现了京师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这种情形必定是以众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为代价。如今，皇帝一声令下，一千多万亩土地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烨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德政善举。

在此前后，满族人的圈地运动，包括几年前鳌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汉人被迫投充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恶政也陆续平息下来，并最终大体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御座边的柱子上，贴着一张条幅，上面大书三件事：三藩，治河，漕运。在其当时，这是摆在玄烨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实现国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恭顺王孔有德，他们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这个孔有德不走运，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干的将军李定国，结果在桂林攻防战中，不但额头中箭，城池也没能守住。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帝制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那些手握重兵重权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说法，韩信被吕后派萧何骗进大汉皇宫钟室就死前，说的就是这句话。一般说来，中国帝制传统下的君主，很难容忍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种人的存在，与帝王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时，为了刺激他们玩命干活，需要名位上的奖励；天下太平之后，这种人就成了威胁皇家利益、破坏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刘邦临

死前，之所以要和诸臣杀白马盟誓，不许再封异姓王，就是因为他已经勘破了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要说异姓王，到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时，为了削夺刘家子孙的王权，也都是在人头滚滚落地之后，方才实现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在全国各地。他死后仅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儿子朱棣便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从此，大明对藩王的权限作了极其严格的规定：只许吃喝玩乐，不许拥有军队，不许干涉地方事务，甚至不许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门等等。

大清朝立国之初，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姓藩王。

事实上，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这几位汉族藩王统率的军队，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说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应该不算过分。前面谈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孔有德曾经上书皇帝，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几次昏死过去。且自己生长在辽东，不习惯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归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许，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这位孔有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但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说，最后酿成三藩之乱，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嫌疑。如今，天下大体太平，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特别是吴三桂，远在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谈到吴三桂的历史，实在是头脑错乱、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应该感到尴尬的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这些骂声并非毫无道理。当人们把他骂成是“汉奸”、“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时，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罢了，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遗民，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若是出自当代人之口，问题就出来了。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时，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与民族利益扔到了脑后。道理很简单：假如吴三桂与李自成联起手来，将多尔衮与大清铁骑打回到山海关之外的话，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集，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大明帝国最大时，其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则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最大时曾经达到过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经过晚清时节的丧权辱国，中国国土面积仍然保留下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如果不是吴三桂打开天下第一雄关，有谁能够告诉中国人——那已经烂透了的大明朝、刚刚进入北京就开始烂的李自成，还有那位差一点就把四川人杀光了的张献忠等，还会做出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事迹来？

如果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挑战大明帝国，今天可以被颂扬成“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话，应用这种逻辑，吴三桂的功绩可能比他大得多。因为，这种讨论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而不是多重标准的胡扯八道。

其实，谈论吴三桂，可能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才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位并不是很了解吴三桂其人其事的女士，在听我介绍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直至最后身败名裂的故事后，沉默片刻，便断然评论道：“所有的女人都会渴望这样的爱情！”假如她的话真能够代表占人类总数50%的女人，我们就势必需要反省：以往，中国人在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是不是太缺少人性的考虑了？

当一种制度与文化，时不时就要把人逼到去选择是要自己合

法的心爱女人还是要父亲，是要这个女人与父亲还是要地位、前程与名誉，是要活着还是要死去时，需要批判和反省的难道不是这种制度与文化吗？或者换句话说，陈圆圆被人家抢走之后，一定要吴三桂去向抢人者致敬，并鞍前马后地做这个人的马仔，才是应该被肯定的吗？显然，对吴三桂的诅咒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吴三桂的问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冲突与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问题，吴三桂的矛盾挣扎，是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与挣扎。缺少解决这种矛盾的观念与机制，是酿成我们民族中许多出类拔萃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显然，吴三桂是一个本来出类拔萃，却不幸被时势、制度与文化逼着走向了反派的悲剧人物。

可以断言的是：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我们过去历史上此类悲剧层出不穷的原因，今后，若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这样的悲剧还会层出不穷。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三藩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对眼下的三藩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皇帝，他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过于复杂而重大的问题。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乾清宫中绕殿徘徊，一个人对着那张条幅发呆，犹豫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流离，残破不堪的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百废待举。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条件下，若能像宋太祖赵匡胤一样实现杯酒释兵权，可能是解决三藩问题的最好办法。无奈，皇帝预备这样做，三藩却没有交出兵权、回家安享富贵的觉悟。或者，皇家翻脸无情、政治上翻云覆雨他们见得太多了，没有人敢相信皇帝的诚意。这种情形可能是酿成三藩之乱的部分心理因素。



后来，曾经有学者考证大清朝满汉开国功臣的身后故事，发现除了三藩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功臣的后代基本都生活幸福，许多人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都在安享荣华富贵。于是，感叹三藩见不及此，



结果，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自己也身败名裂、断子绝孙。言下不胜嗟叹。

据说，洪承畴在平定西南、返回北京之前，吴三桂曾经请教他：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的回答是："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刘键《庭闻录》卷三，第8页）——只要云南不安宁，他吴三桂的地位就不可动摇。此后，云南大事小事不断，不是土司叛乱，就是边境报警，搞得朝廷一年数惊，真的没人敢轻言撤兵减员了。有记载说，顺治十七年时，大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两白银，而当年供应云南一地的官俸军饷就要支出九百多万两。到康熙十年前后，国家财政收入约两千万两左右，三藩的开支仍然居高不下。时人评论说：吴三桂挟边事自重，因为害怕兔死狗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已经全然不顾国家劳民伤财了。（《庭闻录》卷四，第10页）当时，还有人说：吴三桂有向外省委派官吏的权力，以至于竟有"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一说。（《明清稗史汇编》卷十，四王合传）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但是，不管怎样，到康熙亲政之后，昔日开国之功臣，已变成今日国家之大患。三藩问题肯定令玄烨忍无可忍、寝食难安。而吴三桂，于功成名就之后，全无家国之情怀，为一己之念，不惜将刚刚熬过半个世纪战乱、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大半个中国再一次推入战火，就凭这一点，纵然他有千条万条理由，也够得上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了。

康熙十二年三月，七十岁的定南王尚可喜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允许他带领一批年老的部下返回辽东老家海城居住，王爵由长子尚之信承袭，继续镇守广东。康熙接到奏疏大喜，立即命令众臣商量处置办法。最后，决定借机撤藩，同意尚可喜归老辽东，并以父在不能由子承袭为由，命令全部撤回。

这个决定做出后，吴三桂与耿精忠也相继上疏，请求撤回安置。吴三桂的一位谋士建议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决不要自己提出撤藩，免得授人以柄。据说，吴三桂怒吼道："我就是说了，皇帝也决

不敢真撤，我就是要自己提出撤藩，消除他的怀疑。”他可能真的没有想到，刚刚二十岁的康熙皇帝竟然会断然下令，全部撤藩。皇帝的理由是：“吴三桂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现在是撤他要反，不撤他也要反，不如先发制人。”随后，正式下达撤藩令。八月二十四日，派专使前往昆明、广东、福建，命令三藩所有官兵及其家属全部北上，同时，要求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安置事宜。

吴三桂可能是在接到皇帝的撤藩诏书后，立即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从史料中看，吴三桂下这个决心和他的一个判断有关——大清朝的开国雄杰已经凋零殆尽：多尔衮、多铎病死了，代善、济尔哈朗老死了，阿济格、豪格、苏克萨哈让他们自己杀死了，鳌拜在大墙里面被幽禁死了，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范文程老病而死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死的死老的老，即便不死，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大约也在和自己想着同一件事情……放眼天下，哪里还有能够抗衡自己的强力人物？

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常年住在北京，其夫人是康熙的姑母和硕建宁公主，实际上等于是人质。吴三桂派人秘密入京，准备接应吴应熊出京。同时，他一边假模假式地和康熙皇帝讨价还价，抱怨中央政府安置自己的土地太少；一边和皇帝特使约定起程时间；一边封锁了云南进出内地的险关要塞，一切人等只许进、不许出，违令者一律就地处死。

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吴三桂下令起兵，并杀死誓死不肯参与叛乱的云南巡抚朱国治。这个朱国治曾经在江南为官，素有酷吏之称，名声很糟。此次为吴三桂所杀，遂成就了他的忠义美名。



十二月一日，大清云南同知刘昆当面痛骂吴三桂“在明亡明，事清叛清，两朝乱贼，天地不容”，吴三桂还是率领二十万大军，揭起北伐的叛乱之旗，终于把他自己定格成了一个乱臣贼子的形象，从此，再也没有可能洗脱这个恶名。

二十一天之后，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反对撤藩的官员如索额图坚决主张杀死力主撤藩的明珠等人，“以正国

法”。明珠等人惶恐无地，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此时的表现坚定坦荡，极有担当。他对群臣说：“其他人没有罪，这是我的主张。”并说，“我从小就知道，三藩的势焰越来越大，不可不撤。怎么可能因为吴三桂造反就诿过于人呢？”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号称明君，却在“七国之乱”时，杀死力主削藩的晁错，从而铸成千古大错。如今只有二十岁的玄烨，具有如此磊落之胸襟，比较起来高下立现，的确是不同凡响。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曾经率领大军打到了南京仪凤门外。当时，玄烨的父亲福临惊惶失措，一度准备放弃北京，退回到山海关外去，受到孝庄皇太后的严词呵责。后来，顺治皇帝又拔剑砍剁御案，准备御驾亲征。当时，顺治皇帝福临已经二十二岁。如今，康熙皇帝面对的局面比当年复杂危急得多，他的表现，也比他的父亲出色得多。

据说，在大军出征的仪式上，康熙皇帝亲自将大军送出西长安门，然后，他立马久久目送，直到大军的背影消失在远方。

长达八年的平三藩战争，就此拉开大幕。

值此战云密布之际，康熙皇帝的身边又连续发生了两次未遂暴动。一次，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当时，一个名叫杨起隆的江湖人士，自称是崇祯皇帝的三太子，秘密集结了一千多人，准备元旦那天，刺杀康熙，并在京师举行反清复明大暴动。事情虽然被扑灭，却也搅得北京城人心惶惶。



另一次则是发生在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河北总兵蔡禄是郑成功的老部下，投降后被任命为河北总兵。此次，南方烽火遍地，他便准备起兵响应。虽然这次兵变还没有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却足以令人心惊。

到康熙十三年四月，整个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湖南、福建六省全部落入叛军之手。全国形势异常动荡不安。

偏偏在此时，吴三桂犯了一个绝大的战略错误：他没有乘军事上连连获胜之机，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直上中原，却在长江边上勒



马观望起来。从此，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后世学者谈到这个原因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吴三桂深知自己在长江以北地区名声太糟，担心过江后处境尴尬；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吴三桂担心自己逼得太紧，会断送扣在北京的长子和长孙的性命。因此，他才会放还一直扣押在手中的皇帝特使，让他们带信给康熙皇帝，表示愿意划江而治、“裂土罢兵”。

结果，吴三桂想要保住子孙性命的想法，反而断送了他们的性命。康熙皇帝接到吴三桂的书信后，立即召开会议。他不顾悲痛欲绝的嫡亲姑姑和硕建宁公主的苦苦哀求，决定公开处死自己的姑父和表哥，即吴三桂的长子和长孙，以示决不妥协、不共戴天之决心。

据说，吴三桂得到一子一孙被处死的消息时，正在吃饭。他大惊失色，推翻饭桌叫道：“想不到皇帝小小年纪竟能如此行事！事情无可挽回了！”如今，他只能和小皇帝拼个鱼死网破了。但此时，他已经错过了将战火烧到敌人土地上的最好时机，只能在已经占据的土地上展开殊死战。

对于康熙皇帝来说，康熙十四、十五两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严峻、最为难熬的时光。前一年底，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镇守平凉的陕西提督王辅臣加入叛乱，北京侧后翼的战略后方立即呈现不稳态势！更糟的是，偏偏在此时，蒙古察哈尔部的布尔尼趁八旗劲旅南下、京师防卫空虚之机，发动叛乱，帝国真正的战略后方燃起大火。据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登陆福建，也加入了战团；甚至有消息说，属国朝鲜也想借此机会复仇雪耻，并且可能已经派出信使前去联络郑经。盛京沈阳和北京城里谣言四起，人心大乱。康熙皇帝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此时，一个措置不当，他不但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届时，就是想退回辽东的深山老林也都由不得他了。

王辅臣有一个外号叫马鹞子，是当时名气极大的一员猛将。他的臂力、武功、马术据说达到了神勇的境界，已经可以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相媲美，号称勇冠三军，以至于当时没有哪个将军敢于和他对阵。他曾经是吴三桂的部下，深受信任和倚重。



四年前，王辅臣被康熙皇帝调离云南，提升为陕西提督，出镇平凉。在其上任前，康熙皇帝亲手把一支蟠龙豹尾枪赠送给他。这是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留下来一对枪中的一支。康熙皇帝很动感情地对王辅臣说："这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外出必定把它列于马前，以记住父皇的恩德。你是先帝的臣子，我是先帝的儿子，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珍视，就把这枪送你一支。你见到这支枪就好像见到了我，我见到留下的一支，就好像见到了你。"当时，王辅臣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表示将肝脑涂地，报效皇上。如今，就连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参加了叛乱。

当时，王辅臣的儿子在朝为官。康熙皇帝将其招来，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去。康熙皇帝说，他不相信王辅臣会真心背叛，自己对他将一如既往，绝不食言。据说，王辅臣听到儿子转诉了皇帝的话之后，痛哭失声，从此，首鼠两端、进退失据。他接受了吴三桂送来的军饷和封号，却并没有进攻陕西。在拿下战略要地秦州即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之后，毁掉陕甘两省交界处的凤县偏桥，然后，就返回平凉去了。

此举意义重大非凡。继吴三桂勒马长江之后，王辅臣叛而不攻，再一次给了康熙皇帝极其宝贵的从容调度时间。

这时，玄烨的老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图海，是一个曾经坚决反对撤藩，但却很能干的满族官员。孝庄太皇太后告诉玄烨，用这个人，必可克敌制胜，定能打败察哈尔部的布尔尼。

布尔尼是察哈尔林丹汗的孙子。他的父亲归顺大清后，被册封为和硕亲王。后来，他几次违约背信，不按规定进京朝觐，结果被削夺王爵，软禁在北京。布尔尼便承袭了王位。此时，他听说为了对付吴三桂，北京已经没有兵力防守了，便煽动奈曼等部落谋叛，想趁火打劫，攻进北京，抢回父亲。

当时，北京确实已经无兵可调。谁知，康熙任命了图海之后，这家伙在几天之内，居然将满洲八旗人家中的青壮家奴组织成了



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图海动员这支大军参战的方式，和当年努尔哈赤组织八旗铁骑时的思路一模一样——他告诉这帮家伙：布尔尼是林丹汗的孙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当年，大元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逃离北京时，把全中国最珍贵的宝贝都带走，传给了林丹汗。布尔尼的父亲归顺时，皇太极恩准他保留下了那些东西。如今，都在布尔尼手里。图海说：他早就苦于没有机会拿到这些珍宝，如今上天终于把这些宝贝送到诸位眼前来了。他向大家保证，皇帝已经同意，拿到这些稀世之宝后，将全部分给作战勇敢的巴图鲁（勇士）。

结果，这批家伙被他煽动得嗷嗷叫，恨不得立刻就找到那个倒霉的布尔尼。就这样，图海连军需粮草都不准备，就带着这帮恶虎昼夜兼程地扑向布尔尼。他们一路上统统靠抢夺经过州县的粮草维持军需。碰上布尔尼的大军之后，没有任何悬念，一仗就把布尔尼的部队打得尸横遍野。布尔尼本人只带三十余人逃出战场，又迎头撞上了科尔沁部支援大清的部队，结果一个没剩地被消灭干净了。

一般说来，像三藩之乱这样的叛乱，最怕旷日持久的相持。一旦进入这种情势，只要政府不犯错误，政府军一方广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优势就将逐渐发生作用。如今的吴三桂就陷入到了这种境地之中。

到康熙十六年，曾经来势凶猛，蔓延到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福建、广东、江西、浙江、陕西、甘肃十一省的叛乱，已经被压缩到了云、贵、川、湘、桂西南五省内，并且，在北、东、南三个方向陷入重军重围之中。吴三桂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自己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热烈场面，怎么就会在几年之中，变成了一哄而散的局面？终于，他不想再等了，他要当皇帝了。

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登基称帝。他宣布建立大周国，定年号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然后，任命了一大堆的大学士、尚书、大将军等等。此时，这位“大周昭武皇帝”已经六十七岁。

八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召开军事会议，二十五岁的青年皇帝

有些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第二次提出，准备御驾亲征。第二天，大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在湖南衡州那简陋的临时皇宫里。死前，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等到他十四岁的孙子，从昆明前来接班。

三年后，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十一月十四日凌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京城黎明前的静谧——三藩之乱最后荡平的捷报传入北京。

在这场历时八年的大动荡中，尚可喜誓死不叛，被他的儿子尚之信软禁起来，曾经试图上吊自杀未遂，后来在忧愤中病死；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先是响应叛乱，后来又想退出叛乱，被吴三桂派兵杀死；尚之信参加叛乱后，见势不好，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被康熙皇帝下令赐死；耿精忠比尚之信更早参与叛乱，后来，和尚之信一样中途退出，叛乱平息后，与他的部下二十余人被分别凌迟处死或斩首；王辅臣只叛不攻，后来接受招抚，日夜忧惧，曾经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未死。昆明被攻克之前两个月奉命进京，走到西安时死去，死因不明。

这些骄兵叛将死则死矣，没有太多人愿意关心他们的下落。倒是有一个人的生前身后，似乎牵动着所有人的柔肠，她就是陈圆圆，那个可能在吴三桂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大影响的传奇女子。关于她的下落，始终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或发现。有一种说法，比较愿意为人所接受：据说，陈圆圆坚决反对吴三桂发起叛乱，后来，见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就在吴三桂闹事之前几年，出家进了佛门或者是道观，三藩乱起后，不知去向。如今在贵州和云南地区，有不止一处此女的香冢和传说。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却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怜香惜玉之优美情怀。



三藩之乱的平定，带来了另外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产品，那就是这场大动乱催熟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

从史书记载上看，唐代以前，中国政府可能就开始了对台湾的经营。到南宋时期，台湾隶属于福建晋江，元明两代均在此设立巡



检司。明末万历天启年间，荷兰人趁中国内政昏暗无暇顾及之机，占领了台湾岛。此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八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发动大规模长江口战役，先胜后败，遂于顺治十八年四月进攻台湾，郑成功敦促荷兰人“还我先人故土”，经过九个月努力，迫使荷兰人投降，夺回了台湾，并被明朝残余政权册封为延平郡王。康熙元年五月八日，正值英年的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接位。此后，郑经与清朝之间进行了十数年的博弈。

三藩乱起后，郑经立即响应，率数万大军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迅速扩大战果。他并不听从吴三桂的指挥，不但抢夺清军的地盘，也抢夺耿精忠的地盘，然后，大量劫掠物资运往台湾。闹得耿精忠大为恼火，再也没有心思全力北上，反而要回过头来对付郑经。

到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已经接近尾声。郑经一样兵败如山倒，甚至一度差点儿被手下哗变的官兵擒献给康熙。于损失惨重之中，郑经仅带一千多人逃回澎湖列岛。康熙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时机，他趁重兵集中在南方之际，立即将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之前，为了休养生息，康熙不愿再动刀兵，因此多次派人与郑经接洽，主张和平解决，为此也确曾一再做出让步，答应郑经，只要剃发称臣，便可封为“八闽王”，安享富贵。郑经则坚持免削发，不登岸，仿朝鲜之例称臣纳贡，以小尊大。此议被康熙驳回，康熙认为郑经本是中国人，不可能允许他仿效朝鲜等外国属藩。到了三藩之乱平息之际，郑经也就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回旋余地了。

郑成功一世英雄，他的这个儿子却并不争气。当时，有一位居住在台湾的著名观察家记载道：这位郑经败退回台湾后，不思进取，似乎受了什么刺激似的，凡事全部交给儿子裁决，他自己“放纵于花酒，不预政事，而竟卜昼卜夜之欢”。（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307页）就是说，这厮把国家大事扔到一旁，每天不分日夜地喝花酒。结果，康熙二十年正月，三藩之乱最后平定的前夕，在元宵节期间，郑经又一次行“竟夕之乐”，竟暴卒。当时，他还不到四十



岁。

此时，大清帝国的陆上武力相对强悍，水上军力很弱，在进攻金门与厦门时，甚至曾经要借助荷兰的船队。为了彻底收复台湾，康熙皇帝适时起用了精通海战的将军施琅，大力打造帝国海军。从而，收复台湾已经成了时间问题。

施琅是福建人，早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成为福建沿海最大的走私与海盗头子时，他就追随郑芝龙纵横于海上。在此期间，郑芝龙娶了一位日本姑娘，生下郑成功，并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后来，郑芝龙接受大明帝国招安，成为大明沿海地区的重要官员。郑成功也从幼年起，便拜几位极为著名的大学者为师，其中包括号称江南文坛领袖的钱谦益，成长为一位亦文亦武的出色人物。

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父亲分道扬镳，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并一举收复台湾，成为备受崇敬的民族英雄。施琅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代的重要战将。不幸的是，后来，郑成功与施琅之间发生摩擦，施琅逃离出去，其亲族多人被杀。因此，施琅坚持武力收复台湾，态度极为坚决。

后来，收复台湾的过程大体上可以描述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没有多么离奇复杂。原因是，郑经死后，他的几个重臣冯锡范、刘国轩等人杀死他的长子，拥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继位。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说来，但凡出现这种情况，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反季节、反常规，出其不意地在台风季里对澎湖列岛发起攻击，与台湾第一大将刘国轩发生激战。从历史记载上看，刘国轩太过囿于常规，他寄希望于老天帮忙，以为会有台风来帮他吹翻施琅的战舰。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军舰全部躲进避风港，不许出战。结果，连续数日艳阳高照，风平浪静。就此，刘国轩失去战机。这一仗打下来，清军一共战死三百二十九人，受伤一千八百余人便解决了战斗。澎湖三十六列岛望风而降。刘国轩带仅剩的三十余艘船冲出港口，逃回台湾。

刘国轩回到台湾后，岛内已是风声鹤唳，军队大体失去了固守台湾的信心和斗志，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岛外逃，并且整船待发。台湾民众听说官员们已经准备逃跑，置人民于不顾，一时间民心大乱，谣言四起。岛内盛传军队要“大抢掠而去”，人们日夜惶恐不安。刘国轩见人心瓦解，事不可为，倘一意孤行，恐怕会有不可测之祸，乃力劝郑克塽、冯锡范放下武器。最后，大家终于选择了一条现实而理性的道路——求降。

公元1683年10月3日，是为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台湾安平港外海堤之上，郑克塽、冯锡范、刘国轩等率领文武官员人等，在此迎接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从荷兰人占领台湾算起到这一天，时间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除率军收复台湾之外，施琅的表现中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在收复台湾的整个过程中，曾经有人担心他深蓄家仇私恨，会趁机大肆报复。从后来的发展看，他信守了以国以民为重、不计私怨的诺言，并在台湾后来的经营发展上，目光远大，表现出色，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爵，世袭罔替。

到北京后，郑克塽被授为正黄旗汉军公爵，冯锡范被授为正白旗汉军伯爵，刘国轩到北京陛见了康熙皇帝，被任命为天津卫总兵。据说，直到两百多年后，上述人等的子孙还在北京安享富贵。

这一年，康熙皇帝玄烨正值三十而立之年。台湾收复的捷报恰好是在中秋节那一天送到他手中的。为此，玄烨写下了一首对仗还算工整的七律，诗曰：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皇帝的文化素养、治国安邦的理想与情怀。从他一生治国实践看，应该说，他大体上是在按照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善于作诗、作秀的人物不在少数，



一般说来，对此，历史并不买账。政治人物倘若于国于民没有功德建树，想靠作诗、作秀来赢得历史的喝彩，应该说不太容易。这可能是康熙皇帝玄烨受到当时与后世人们赞扬与尊敬的最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根据施琅的建议，大清帝国中央政府正式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首府设在今日之台南市，于府治设台湾县、澎湖列岛归台湾府直辖；于其南部设凤山县，就是今天的高雄市；于其北部设诸罗县，位于今天台南县佳里镇。宋、元时代，中央政府在台湾设治时均设在澎湖。现在，首次将台湾地方政府设于本岛。根据施琅的建议，中央政府决定，在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两人，驻军八千人；澎湖设副将一人，驻军两千人。其下属编制均与内地相同。第一任台湾知府是镶白旗汉军蒋毓英，第一任台湾总兵官是正黄旗汉军参领杨文魁。

从此，台湾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当其时，在时年三十岁的青年皇帝领导下，他那庞大的帝国，在内部消除了最为重要的政治隐患，天下一统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然而，此时还远远没到欢呼盛世的时刻。

他脚下的土地疮痍满目，到处都是战争的创伤。

那条桀骜不驯的黄河，自古以来便如同悬在这个国家头上的利剑，没有哪一代帝王没有吃过它的苦头。从晚明时代天下大乱时开始，就很少有人去理会这条大河了。至康熙朝差不多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它几乎年年决堤。其时，几个县、十几个县、几十个县平地水深过丈，大地顿成泽国，人民或为鱼鳖，景象惨不忍睹。从懂事时起，康熙皇帝就知道，治理黄河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治理不好这条河的皇帝，就不配坐在皇帝的龙椅上。从古老得没有人能够说出年代的岁月开始，这个观念就深植进了这个国家的骨髓之中。康熙皇帝深知，治理黄河的凶险程度虽然不像平三藩那么大，其难度却是远远超过了平三藩！

然而此时此刻，他还不能全力以赴地对付这条大河。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将目光转向北方，转向白山黑水间的祖先故土。那里，闯



进来了一群“来自北方的狼”。他们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并不缺少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喝伏特加烈酒时，用人肉佐餐。当地的人们管他们叫“罗刹”，他们是一群效忠于沙皇的哥萨克骑兵。

事情的麻烦之处在于，他们不光闯进了北方的黑龙江流域，还在西北地区支持准噶尔部蒙古的噶尔丹，利用康熙皇帝平息三藩之乱无暇西顾的机会，得寸进尺，一步一步东向侵蚀，如今已经到了河西走廊边缘，开始威胁甘肃、内蒙古地区。

新的内忧外患正在向大清帝国逼近。

好在此时三藩之乱已经平息，台湾也顺利收复。康熙皇帝和他的大清帝国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可以也必须集中力量尽快消除这一内一外两大祸患。

康熙皇帝玄烨自幼熟读经史，此时已经继位二十二年。他可能对自己很不满意。因为，作为同样定鼎华夏的第二代君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仅仅二十三年，却已经开创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已经降临。而自己每时每刻还在忙于连年不断的战争。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别无选择。为了创造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他必须全力以赴。

时年三十岁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他立国华夏四十年的大清帝国，在从头收拾河山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第八章 康熙怒了：软硬兼施扫除内忧外患

大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十七岁的孙子在昆明自杀，标志着三藩之乱的彻底平息。帝国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隐患消除，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三件大事中排在第一位的三藩问题得以解决。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大清帝国水师登陆台湾，台湾岛重新回归帝国版图，成为康熙皇帝暨大清朝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帝写在乾清宫柱子上的另外两件大事——治理黄河和漕运也已经陆续开始。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内忧外患逼到了眼前：俄罗斯的哥萨克骑兵深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修筑城堡，似乎准备将那里永远据为己有；西北方向的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不断向东进逼，已经成为西北地区巨大的祸乱之源。康熙皇帝没有办法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政治理。他必须彻底消除这新兴起来的内外祸患。

哥萨克骑兵翻越乌拉尔山脉向东进发，大约始于公元1582年。这一年是大明万历十年，正是张居正去世的年份。第二年，康熙皇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

公元1636年，康熙皇帝的祖父皇太极将后金改名大清，正式成为大清皇帝。就在这一年，哥萨克们经过五十四年时间，行程六千公里，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土地囊括进了俄罗斯的版图。也是在这一年，沙皇俄国的军士们第一次在勒拿河的支流阿尔丹河边，知道了前方还有一条名叫黑龙江的大河。

公元1643年10月，多尔衮刚刚成为大清摄政王的时候，俄国军队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带领九十名哥萨克骑兵，翻越外兴安岭，闯进黑龙江流域的我国领土。半年后，大清入主中原。有资料显示，当时，多尔衮已经知道了来自黑龙江的坏消息，但他忙于平定全

国，没有能力顾及那一片祖先故土。康熙亲政以后，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俄国沙皇，希望和平解决边境纠纷，六年之内均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俄国派来的使团人员解释说，之所以没有答复，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读懂中国皇帝的信。

康熙十五年五月，俄国沙皇派遣了一个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到北京，代表团团长名叫尼古拉·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库。在曼考尔所著的《俄国与中国》一书中，评价这位尼古拉时，使用的词汇是：“爱好争吵”、“寡廉鲜耻”。走到中途时，这位使团长听说中国南方正在发生三藩之乱，遂写信报告沙皇说：“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现在中国皇帝极为衰弱，非常害怕哥萨克。”（巴特莱《俄国、蒙古、中国》卷二，第257页）在呈递给康熙皇帝的国书和照会中，沙俄只字未提边界纠纷，只是对中国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皇帝，每年必须运送数万斤白银和宝石给俄国沙皇，等等。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宴请使团人员，发现对方无可理喻，于是提出三条要求：引渡叛逃的一个索伦酋长；今后再派使节应该懂得礼貌，遵守中国礼法习俗；保持边界和平。否则，拒绝对俄派遣使臣和通商，随后将这批人打发走了。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在三藩之乱接近尾声之际，在几乎所有文武百官的反对声中，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他目光远大，认定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关系巨大，（《平定罗刹方略》卷二）因此，决定武力驱逐沙俄哥萨克。到康熙二十三年春天，除尼布楚即今日之涅尔琴斯克、雅克萨两个据点之外，其他地区的沙俄军队已经被驱逐出去，大片国土收复。

康熙二十五年五月，经过激战，据守雅克萨的俄军要求投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接受他们投降的条件是如此宽大：只要离开雅克萨并且发誓不再重来，就可以离去，甚至可以带走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武器。这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对于战败者最为宽大为怀的处置了。结果，七百多名沙俄军人安全离开，还有四十多名俄国士兵希望留在中国。就此，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



此时，清军将领犯了一个错误：他违犯康熙皇帝的训令，没有在雅克萨进行任何军事防护，便凯旋庆功去了。

半年后，当地人民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俄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就卷土重来。带队的正是那位带头宣誓决不再来的俄军督军托尔布津，他带领的作战部队在千人以上，并携带十二门火炮与大量军需物资。

五月，清军第二次围攻雅克萨。这一次，清军采用了当年松锦之战时的战术——筑垒挖壕，长围久困。半年以后，在风雪呼号的冰天雪地中，俄军弹尽粮绝并开始流行坏血病。几个沙皇特使昼夜兼程赶到北京，带来了俄国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希望中国方面撤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康熙再一次宽大为怀，同意和平谈判，下令解除包围，甚至命令前敌指挥官赠送给饥饿的俄军官兵一批粮食，派出医生为患病者治疗。当时，雅克萨城中只剩下六十六个饥寒交迫的哥萨克官兵了。

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正月，沙俄政府正式派遣使节前来谈判。这一年，著名的彼得大帝十五岁。五年前，他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伊凡同时成为俄国沙皇，由他们的姑母索菲亚公主摄政，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俄国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控制权的战争一触即发，在当年远征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大败亏输，完全没有能力顾及遥远的东方。这是只讲利益和实力，全然不知道义为何物且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肯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原因。可惜，大清帝国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结果，在谈判中吃了大亏，却还自我感觉良好。

从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开始，中国方面就在等候沙俄使节的到来，一直等到十月底，俄国谈判代表还没有到。这个谈判代表名叫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当年第一批进入黑龙江地区的哥萨克，就是他的祖父老戈洛文派出的。如今，他正在盘算建立祖孙两代开拓黑龙江的伟大业绩。之所以迟迟没有前来谈判，是因为他长时间逗留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贝加尔湖地区，试图将这一地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且多次与噶尔丹密谋，为他提供武器弹药，鼓动他



对抗中央政府。结果，这个该死的噶尔丹出兵偷袭土谢图汗，与戈洛文的沙俄军队两面夹击，迫使土谢图汗只能放弃贝加尔湖地区，向南撤退。就此，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局势极度恶化，给康熙皇帝和中国使团的对俄谈判增加了巨大压力。

就这样，直到一年半以后的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双方才在尼布楚城下开始正式谈判。

当时，戈洛文的皮包中装着沙俄政府给他的训令。谈判底线为三条：上策，以黑龙江为界，占据黑龙江北岸的全部地区；中策，以牛满江即今日布列亚河或精奇里江为界，占据黑龙江中游北岸；下策，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保留双方共同渔猎场。

康熙皇帝给中国政府谈判代表索额图交代的谈判底线也是三条：其一，以原属我国的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为界；其二，以尼布楚为界；其三，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考虑适当让步。这是在噶尔丹造成巨大困扰之后，康熙皇帝不得不做出的方案。

谈判开始后，戈洛文指责中国侵略自古以来属于沙皇陛下的贝加尔湖与黑龙江流域，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归还给沙皇陛下。索额图则据理力争，告诉戈洛文：鄂嫩河、尼布楚本来是中国蒙古茂明安部落的居住地；雅克萨是中国边民首领阿尔巴西的领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则是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草场。过去，中国自古以来的疆界就是在勒拿河岸边。在激烈的争吵中，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会谈再一次在争辩不休中结束。为此，索额图曾经一度准备停止谈判。

半个月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七月二十三日，经过反复拉锯，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为两国东段边界。这个条件，已经越出了康熙皇帝给索额图规定的底线。戈洛文返回莫斯科后，沙皇彼得一世给他颁发了一块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俄国争取到了尼布楚周边及以西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

索额图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满意，认为



索额图尽到努力了，他的让步没有丧权辱国，是可以接受的。此后，中俄东段边界和平安静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开打。

现在，对于康熙皇帝来说，他至少可以全神贯注地对付那个嚣张至极的噶尔丹了。

噶尔丹是西北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的儿子，青少年时期在西藏五世达赖喇嘛门下修行，达赖喇嘛认定他是一位活佛转世。他的父亲死后，哥哥僧格继承为首领，不久，发生内乱，僧格被杀死，二十四岁的噶尔丹被贵族会议推举为首领。他既是首领，又是活佛，结果，将笃信喇嘛教的蒙古各部迅速聚集到了他的旗下。噶尔丹性情豪迈奔放，富有激情，特别具有煽动性，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特别能忽悠，而且也不乏军事才能。刚刚结束的喇嘛生涯似乎并没有养成他慈悲为怀的菩萨心肠，或者他可能把杀人如麻也当成了普度众生的方式之一。于是，他开始了长期席卷草原大漠的军事生涯。

开始，他很像早期的努尔哈赤，一边吞并周边各部，一边始终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朝贡关系。面对如火如荼的三藩之乱，康熙皇帝基本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命令各地镇守将领小心防范。噶尔丹得寸进尺，派来朝贡的队伍动不动就有上千人，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时不时就连抢带夺，视天朝如无物。

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顺利收复，康熙皇帝下令，各部前来朝贡者，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其余人等一律在口外进行。噶尔丹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事实上，康熙皇帝可能也确实是冲着他去的。为此，噶尔丹开始在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制造矛盾，打打拉拉，意图趁火打劫，并不断派人前往俄国，在通商之外建立起了官方联系。

到康熙二十七年，经过二十多年攻伐征战，他的势力从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一直扩展到了青海、甘肃乃至喀尔喀蒙古地区。当此时，康熙皇帝正在组织喀尔喀蒙古各部联合抗击沙俄，谁知，噶尔丹这厮在沙俄谈判代表的支持下，竟然出动三万骑兵，翻越杭爱山，横着便插了过来，与沙俄军队一举形成对喀尔喀蒙古的两面

夹击，使沙俄在边界谈判中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令中国丧失了贝加尔湖以东原属喀尔喀蒙古的大片土地，并形成了沙俄由北向南继续推进的、很难扼制的态势。噶尔丹本人也率军直逼呼伦贝尔，兵锋直接指向了内地，甚至对京畿地区都形成了战略威胁。这可能是康熙皇帝切齿痛恨噶尔丹，三次御驾亲征，必欲置其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与俄国达成协议后，康熙立即筹备针对噶尔丹的军事行动。这时，噶尔丹自家内部却出了大麻烦。

以前，当准噶尔部贵族会议推举他为首领时，曾经有一个规定：僧格的儿子长大后，噶尔丹须将首领的位子还给他哥哥的儿子。如今，僧格的三个儿子陆续长大，噶尔丹当首领却当出了瘾头，不想还位给侄子，他觉得这个位子天生就应该由他来坐。为此，他不光毒死了自己的一个侄子，还不顾活佛的身份，把另一个侄子的未婚妻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导致他的侄子率众脱离他的控制。噶尔丹派两千人马前去追赶，被他的侄子全部干掉。偏偏祸不单行，当此时，天山南路又爆发了反抗他的浪潮，使他没有了回家的后路。或者说，他的家园和后花园如今已经都不再属于他。这家伙剽悍如故，索性不回家了，就在大草原上孤魂野鬼般地游荡开来。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康熙皇帝得到情报，说是噶尔丹军需匮乏，在靠抢掠过日子。康熙皇帝遂开始秘密布置，准备一举铲除这个祸害。

当年六月，清军前敌将领立功心切，没有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贸然开战。结果，遭遇噶尔丹凶猛反击，清军伤亡惨重，主将侥幸突出重围。康熙连忙致信噶尔丹，告诉他，开战非朝廷本意，请他到乌兰布通（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附近），双方派大员协商一下，看看今后怎么办。并且说，准备把噶尔丹向中央政府索要的两个仇人交给他。乌兰布通——克什克腾旗距离北京约三百五十余公里，康熙皇帝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将噶尔丹所部一人一骑一个不剩地一网打尽。



噶尔丹确实是个大胆枭雄。他回信给玄烨，说：“拉一只老

鼠的尾巴，它尚且要回头咬你的手，你们如此逼我，就算有十万大军，我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他有自己的打算：天山南北、中亚细亚大草原是不太容易回去了，乌兰布通附近可是个好地方，西部一带散布着几个大清帝国皇家与国家牧场，上面繁衍生息着数百万只驼马牛羊。一旦打垮清军，得到那些牧场，他的日子可就太舒服了。四十九岁的噶尔丹，身经百战，率领着剽悍无比的铁骑健儿，再加上刚刚痛击了大清的军队，因此，他可能确实没把三十六岁的康熙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一抖缰绳，带领自己的两万多骑兵，放开马蹄就向乌兰布通奔来。

进入七月份，康熙皇帝真的调集八旗精锐近十万大军，由帝国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率领，从各个方向开向乌兰布通，并从吉林、沈阳、科尔沁等地调军前来堵截噶尔丹。十四日，康熙皇帝全副戎装离京北上，奔赴前敌。从所有的布置可以看出，他的确志在一战解决问题。

不幸的是，走到半路，御驾亲征的皇帝病了，而且日渐沉重。不得已，他只好让哥哥裕亲王福全担任全军最高统帅，自己返驾回北京。

当月二十七日，噶尔丹几乎与清军同时来到乌兰布通，他抢先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

噶尔丹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围出了一个驼城——将成千上万只骆驼的脚绑住，让这些骆驼卧在地上，背上驮着箱笼，上面再覆盖用水浸过的毡子，以防矢石枪炮。战士们躲在后面弯弓射箭、开枪放炮。

八月一日，双方开始激战。这一仗从中午到晚上打得十分惨烈，攻击一方的清军死伤严重。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纲就是在此役中阵亡的。一直到黄昏时分，清军才将驼城撕开缺口，杀将进去。噶尔丹趁着夜色逃至乌兰布通山上。

玄烨在回京的路上，受到了福全派人送来的捷报。康熙立即让来人带给福全一份命令，让他务必乘胜全歼残敌，“勿留余孽”。





可惜，康熙的命令尚未到达前线，噶尔丹已经在十万大军的包抄下安然离去。原因是——次日天亮，福全指挥仰攻乌兰布通山，噶尔丹凭险固守，双方相持不下。八月四日，噶尔丹派遣他的随营喇嘛前往福全大营，请求清军停止进攻，噶尔丹愿意休兵罢战。他保证不会逃走，也不会抢掠。这个举动很奇怪，明明是个缓兵之计，心地厚道、缺少兵机谋诈训练的福全不听其他将领的意见，竟然同意了这个请求，并发布书面文告，通令全军“暂止不击”。当日深夜，噶尔丹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下山扬长而去。走到刚噶诺尔——今日克什克腾旗西沙窝子时，噶尔丹迎面撞上了康熙调来堵截他的吉林、沈阳、科尔沁部一万多名骑兵。噶尔丹把福全发布的命令拿给他们看，他们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结果，在这批生力军的眼皮底下，噶尔丹大摇大摆地走了。为了防止清军在后追击，他还在草原上放了一把大火。腾空的烈焰，遮断了追兵的来路。

就此，康熙精心策划、绵密布置、耗费无数军需钱粮和将士生命鲜血的一场大战役，就这样功败垂成。据说，玄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不止。从此以后，福全再也没有受到过政治和军事上的重用。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一日，在蒙古大草原小镇多伦诺尔，举行了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多伦会盟。“多伦诺尔”在蒙语里是七个小湖泊的意思。滦河的源头闪电河在这里划了一个优美的圆弧，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塞外小城。这里距离北京约四百公里。康熙皇帝将在这里会见喀尔喀蒙古各大部落首领，共同规划未来。

喀尔喀蒙古，又叫漠北蒙古，主要由扎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组成，在今天的外蒙古地区。这些部落之间，多年攻伐仇杀不已，在沙皇俄国和噶尔丹的逼迫下，先后南迁，投奔大清帝国，被康熙皇帝安置在内蒙古地区。如今，他们聚集到了多伦，希望能够在康熙皇帝的帮助下，恢复安详宁静的生活。

五月一日，康熙皇帝主持会盟，土谢图汗当众对自己挑起的争端做自我批评。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熙皇帝领导下的大清帝国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深受这些部族的感戴。在他的号召下，内外蒙古



王公们开展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后来数日会盟中，康熙皇帝对于各大部落领袖人选做出安排，大家认为皇帝的决定十分公正，于是，在欢呼声中，康熙皇帝升座，接受内外蒙古所有王公、喇嘛近两千人的朝拜，并仿照内蒙古的模式，将外蒙古各部一体编旗，从此，外蒙古地区心悦诚服接受康熙皇帝的任命与领导，正式归入大清帝国版图。这是康熙皇帝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一个伟大功勋。

会盟结束返回北京，经过各长城要塞时，康熙皇帝做出了永远不再修筑长城的决定。他认为，立国之本，在德不在险，如果国家政府不能造福人民，就是把长城修得高与天齐也没有用。这固然与世界早已走出了冷兵器时代有关，却也使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所有朝代加在一起，丝毫不用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梦想，第一次成为现实。这个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实现过的梦想，如今实现在了康熙皇帝手中。生活在长城内外的中国人，的确应该为此向他表达自己的尊敬与感谢之情。

随后，康熙皇帝又要为噶尔丹费心了。

噶尔丹一路狂奔逃离乌兰布通之后，一口气跑到了科布多，就是今天的外蒙古吉尔格郎图。在那里，他当着康熙皇帝特使的面，在威灵佛面前发誓："永远不再侵凌中华皇帝属下的喀尔喀与众生灵。"然后，请求皇帝上尊号，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康熙皇帝派人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并归还了扣押在归化城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支商队。冬天过后，就在康熙皇帝主持多伦会盟之际，这个浑蛋的噶尔丹则派遣使者前去向俄国沙皇求援。这一年，彼得大帝十九岁，两年前，在近卫军的帮助下，他一举将索菲亚公主关进了诺沃杰维奇女修道院，自己真正开始执掌沙皇的大权了。眼下，彼得大帝的兴趣正在从军事演习和施放焰火中，转向制造海船，他希望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作为俄国沙皇，他也很愿意在遥远东方的邻国里，扶持一个自己的朋友。于是，彼得大帝先后多次派遣使者，对噶尔丹给予支持。于是，噶尔丹又活过来了。他杀死中央政府的官员，口气很大地向康熙皇帝索要他的仇人，要求皇帝把那些喀尔



喀蒙古人遣返回他们的老家，并沿着当年逃跑回去的线路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东进序曲——策反蒙古各部，并东向抢掠。

这回，噶尔丹真的错了。他不知道多伦会盟产生了多么大的政治向心力，他也不知道康熙皇帝为了防范这一天花了多少心血。

康熙三十五年春天，康熙皇帝派遣三路大军征剿，他自己亲自担任中军统帅，统兵三万余人再一次御驾亲征。五月七日，在外蒙古温都尔汗东南部与噶尔丹前锋相遇。当时，侦察兵报告说，噶尔丹有骑兵二万人，并借得俄国哥萨克骑兵六万人，总计兵力八万，远远超过了康熙皇帝自己统领的三万多人。文臣武将们立刻慌了神，纷纷请求皇帝撤兵。史书记载说：康熙激愤不已，流着泪宣布“不灭噶尔丹绝不回军，有不奋勇进击者，朕必诛之”，遂亲自指挥大军肃然前行。

此时的噶尔丹同样有点慌，他已经知道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却不太相信。他不明白，这位皇帝怎么会不远数千里来到这个水草不生的荒凉地界？于是，他爬到一个山冈上，想亲自看个虚实。结果，他目瞪口呆地发现，远处，一个个清军方阵正在漫山遍野地向自己这个方向逼近。噶尔丹大叫一声回身就跑。他返回营地，命令抛弃一切兵甲器械、帐房营寨和病残老幼，连夜向西狂奔。

康熙皇帝来到克鲁伦河边，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对众将说，噶尔丹弃河不守，门户大开，必定已经西逃。他命令全军轻骑急追。就这样，沿着克鲁伦河谷，一个狂逃，一个急追，双方互相之间可以遥遥相望。康熙皇帝自己一马当先，连续追赶五天五夜。由于担心粮草不继，他集中二十天粮草，挑选精骑继续追击，自己带大队人马返回就粮。

据说，在此期间，他下令不许为他单独准备任何饮食，每天坚持和士兵们吃喝一样的食品。而噶尔丹则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逃到今日外蒙古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时，噶尔丹迎头撞上了康熙皇帝布置的另外两路大军，双方谁也来不及从容准备便展开厮杀。混战中，噶尔丹号称巾帼豪强的妻子阿努被杀死，噶尔丹最重要的将领几



乎死伤殆尽，他只带领几十个部下逃离了战场。这就是前清历史上很有名的昭莫多大捷。

昭莫多一战几乎扭断了噶尔丹的脖子。从此，他虽然力图振作，却终究无力回天。这个家伙真是倔强，在众叛亲离之中，死活就是不投降。以至于身边只剩三百多人时，仍然不肯服输，还要继续折腾，而沙俄政府却感到厌烦了。彼得大帝不久前发布了准备对土耳其开战的总动员令，此时，刚刚扑灭一次针对他的政变。他实在没心思理睬噶尔丹：他为什么总是打败仗？还要怎么帮他才行？难道真的要沙皇派兵去帮他打仗？那是不可能的。

此后，康熙皇帝连续两次亲征，最后，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在宁夏河套地区的黄河岸边，他终于迎来了噶尔丹的死讯。据说，这家伙早晨得病，晚上就死了，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当时和后来都有人认为，他是服毒自杀的。

据说，康熙皇帝得到噶尔丹死讯，当时就跪在了黄河岸边，对天叩拜，感谢上天帮助他消除了这个几近三十年的大害。当天，他给在京主持工作的皇太子写信，想让天下臣民尽快得知这一消息。这位平时下笔千言的皇帝，激动得拿着笔竟一时不知道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以至于“持笔不能成文”。无论如何，如今的康熙皇帝可以放下武器，全心全意治理他这个庞大的国家了。

此时，黄河的治理已经在进行之中。历史上，黄河水患一般经常出现在政治昏聩或者大动荡之后，因为那时的政府或者没有心思、或者没有能力治理它。观察一个朝代是否有出息，黄河是一个很有效的指标。清朝立足中原之后，从多尔衮时代就表现得极有气象，他当年五月初入据北京，七月份就派出了一位河道总督。这位名叫杨方兴的总河，一干就是十四年，勤奋而且清廉，退职后，布衣粗食、四壁萧然，极受时人敬重。接任他的朱之锡更是了得，此人一干十年，在黄河大坝上积劳成疾，死后，黄河下游民间盛传他已经被上天封为河神，仍在黄河大坝上护佑一方百姓。至今，这里某些地方民间仍有春秋祭祀朱大王的习俗，就是在纪念这位河道总督。

三藩乱起，无暇顾及黄河，先后几次溃决，下游七个州县淹为泽国。到康熙十六年，战局开始有了转机，康熙皇帝立即选派了一位新河道总督，就是后来极有名的治河能臣靳辅。

靳辅到任之后，踏查黄河形势，广泛搜求意见，曾经在一日之内连上八道治河奏疏，提出了疏下游、治上游、塞黄淮决口的整体规划，需要经费二百余万两白银。诸王大臣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没有想到要花费如此巨大一笔银子。康熙皇帝予以支持，遂开始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

这位靳辅很倒霉。就在他全力以赴扑在黄河岸边时，康熙十九年、二十年连续两年发大水。他所建设的主体工程经受住了考验，几处小堤坝被大水冲决。于是，朝臣对他发起猛烈抨击。甚至有人主张靳辅干的都是无用功，需要拆掉重来。当时有人形容说：这些抨击比洪水还凶猛。康熙皇帝深知中国读书人自己动手一塌糊涂，却特别擅长用大道理挑剔别人毛病的特长，于是，派遣重臣前去了解情况。不久，调查报告到了皇帝手上。其中谈到，工程“多有不坚固、不合适之处”，提出对靳辅要从重治罪，他应该负责赔偿部分工程造价。靳辅不服，上疏抗辩，认为整个工程已经完成十之八九，只要稍加努力，黄河即可顺畅入海。康熙皇帝无法知道究竟，只好下令将靳辅革职，但要戴罪督修水毁工程。皇帝很大度，没有让靳辅赔偿那些损失。



半年后，靳辅报告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告一段落。若要根治，还需下更大力气。皇帝遂下令恢复靳辅河道总督的职务。第二年，康熙皇帝决定亲自到黄河边上去走一圈，看看这治河工程到底进行得怎样了。据说，他在黄河大坝上见到靳辅时，几乎没有认出来，只见这位总督面容黝黑憔悴，手上满是龟裂和老茧。皇帝很感动，也很激动。巡视中，他欣然命笔，题诗一首，赏赐给靳辅，以表彰他的辛劳与心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皇帝这次不辞辛苦的巡视，竟给靳辅带来了无边的噩梦。从整体上看，在对文化知识的钻研学习上，康熙皇



帝可能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勤奋、最虚心、最聪慧的一位。有资料显示，为了治理黄河，他不光是选派官员、在行政与财政上予以支持，还自己阅读了大量治河方面的著作，研究各种治河工程图纸，并不厌其详地和各种人探讨治河方法。离开黄河岸边之后，皇帝心中一直萦绕着一个念头。他认为，按照眼下的方式治理，只是治标而没有治本，距离一劳永逸相差太远。他开始犯一个真正的错误。在许多聪明能干、屡屡获得成功又兼位高权重的人物那里，我们时常会看到类似的错误。在黄河大坝上匆匆走了一圈之后，康熙皇帝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皇帝认为，只要能够将黄河上游的来水和下游的淤积水顺畅地排出去，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皇帝想到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开挖海口。就是把黄河入海口处向下挖，挖出一条排水通道，使黄河、淮河淤水能够顺利排出。正在此时，皇帝派去考察黄河工程的一位重臣，回到北京，在向皇帝汇报时，这位和皇帝一样在黄河岸边走马观花的大员居然提出了和皇帝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案。由此，康熙皇帝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当即下令由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落实这一方案，责成靳辅给予支持，不得有误云云。

命令下达后，靳辅和于成龙相继上疏，形成了完全相反的两派意见。

根据多年治河经验和实地勘测，靳辅认为，海口之处千万不可轻率深挖。因为，如今的黄泛区呈现大锅底状，地势比海平面低得多，若将入海口挖深，不但排不出去泛区淤水，还将引起海水倒灌，实有可能形成不可测之巨祸。靳辅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筑堤束水，以敌海潮。

那于成龙则主张：应该坚决执行皇帝的决策，尽快开浚海口。

当时，敢于开口说话的大多数官员都赞成靳辅的主张。毕竟是靳辅而不是于成龙在黄河大坝上奔波了近十年。皇帝不以为然，表示应该按照于成龙的意见办，先开挖再说，并立即派遣官员进行实地



勘测，准备施工。不久，派去的官员写回报告说，当地百姓都认为这海口挖不得。结果，原来就反对开挖海口的朝中重臣们纷纷表示不宜轻动。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康熙皇帝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不料，三个月后，派去勘测海口的两位官员突然以回奏失实的罪名被撤职。原因是，原任江苏巡抚的汤斌被晋升为礼部尚书，他以前对开挖海口持反对态度，如今，他认为开挖是对的。而且，据他向皇帝报告说，自己曾经把这个转变后的态度向那两位官员讲过，而他们没有向皇帝汇报。汤斌是康熙一朝极为著名的理学名臣，为人清廉正派，是一个真正的清官，在当时和后世口碑极佳。他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至今还是个谜团。

康熙皇帝的怒火被点燃了。在他的感受中，事情变得很复杂、很严重。于是，他按捺住怒火，再次询问朝中重臣们的意见，结果，没有任何人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赞成开浚海口。康熙皇帝立即下发内币——皇帝的私房钱二十万两白银，命令一个叫孙在丰的官员负责这一工程。此时，皇帝已经开始怀疑靳辅之所以如此固执己见、抗旨不遵，其背后，可能是别有隐情。

几天后，工部呈递报告，弹劾靳辅治河九年，花钱无数，至今尚未成功，要求皇帝严加惩处。康熙说：河工重大，不可因一时不能成功就轻下结论，看他一两年再说。对此，大学士明珠立即表示赞同。另外一位大学士余国柱也不赞成轻易处分靳辅。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态度更加重了皇帝的怀疑。

半年后，孙在丰再次勘测后，要求靳辅关闭所有减水坝，以便开工疏浚海口。靳辅坚决反对，他认为若强行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黄河大坝决堤。当时，靳辅恰好正在北京，皇帝当着众臣的面，要求他将上游闸坝全部关闭，靳辅只好同意。此后，陆续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议论纷纷，致使海口疏浚工程一直无法进行。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以“直声震天下”的监察御史郭琇弹劾靳辅。皇帝突然当场问他：“弹劾的奏疏中有没有涉及阻挠河务的廷

臣？”一时间，举朝震惊。随后，皇帝更放出狠话：“当年，我能收拾鳌拜之流，如今，若有败乱国政者，我绝不轻饶。”显然，在皇帝看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治河，而是严重得多的政治问题。

不久，御史郭琇再上奏章，将矛头直指当朝重臣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人。他列举了八条罪状，指明珠等人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而靳辅和他们关系密切，每年治河经费，大部分被他们私下分肥；所用官员，多数是他们的私人，所以极力包庇。郭琇说：皇上圣明，定可洞察靳辅屡屡抗拒明诏，不是没有背景的！奏章一出，朝野震惊异常。第二天，康熙皇帝发表长篇训谕，历数朝中十数年积重难返之弊端，下令革除明珠、余国柱等数位大学士职衔，将被视为明珠一党的六部尚书一律撤职查办。他要求所有官员洗涤肺肠，痛改前非。随即，罢免查处了一大批贪劣官员。这是康熙朝最大的政潮之一。

一个月后，他命令靳辅和于成龙就黄河治理中的诸问题再次辩论。靳辅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波逐流。而朝中大臣已经知道了皇帝的明确意向，没有任何人敢于支持靳辅，大家一边倒地抨击靳辅，使他空前孤立。就此，靳辅终于第二次被撤职。此后，始终没有查出靳辅与明珠等人相互勾结，贪污河银的证据，因此，没有从重治罪，遂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靳辅被撤职以后，黄河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于成龙等一大批官员逢迎皇帝的意思，建议皇帝将靳辅所做的一切工程全部报废，重新来过。康熙皇帝这时变得很理性，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知道靳辅的工作不能全盘否定，令那些基本不知河工为何物，却特别胆大、特别敢于侃侃而谈的官员闭上了嘴。然后，他再一次派遣一批高级官员前去调查靳辅的工作。几个月后，这批官员写回报告，高度评价靳辅的治河成就。就此，黄河治理一波三折，除了靳辅，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南巡，再去亲自看一看，那黄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知道，这次南巡，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春



天。此时，除噶尔丹之外，国家已经大体和平安定，经济社会在迅速恢复。为此，许多百姓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地以外，携带着自己家里出产的酒食果菜，赶来请皇帝品尝。康熙皇帝受到了沿途人民相当真诚的欢迎与爱戴。

先期前来巡视疏浚海口工程的于成龙，向皇帝报告说：前往工地的水路和旱路艰险难行，而且没有住宿的地方，工程如今进展顺利，建议皇帝这次就不必去看了。据说，皇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也没有坚持要去。他大约很清楚，这是帝国官场避免尴尬的惯用机巧。必定是那个工程效果很糟，否则，他们决不会在皇帝面前失去那宝贵的露脸机会，他若坚持前去，君臣大家的脸上就势必会都很难看。

此后，康熙皇帝再也没有提起过疏浚海口的这个钦定工程，却在后来公开否定了这个做法。在巡视过程中，他曾经一再赞扬靳辅治理黄河的成就。在内心深处，他对那位倔强的治河能臣大约已经充满了愧疚。

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立即向群臣宣布：这次巡视黄河，所到之处，人们念念不忘地称颂靳辅，他实心实意地做事情，我们以前对他的处理是错误的。现在，要恢复他的一切职衔待遇，以原来的级别按退休老干部处理。康熙到底是康熙，他的胸怀应该是他在后世受到特殊尊敬的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有众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皇帝玄烨的品格乃最高者之一。从靳辅的例子中，或许可以看出这样说的部分理由，姑且存疑。

康熙二十九年，他筹划了全歼噶尔丹的乌兰布通大战；第二年，他举行了意义深远的多伦会盟。与此同时，大雨频降，黄河不断传来险情。而靳辅之后的继任者们不但没有在靳辅打下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反而靳辅已经做好的许多工程，也因为疏于管理而频频出险。康熙皇帝决定再一次请靳辅出山。

此时的靳辅已经年届七十，两次被撤职查办令他深受伤害。他告诉皇帝，自己太老啦，干不动了，请求皇帝另选贤能，免得耽误



河工大事。康熙皇帝说，除了你，别人我无法放心。我用你的心，不用你的力。靳辅毅然领命，再次登上黄河大坝。当年十一月，老先生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临死前，他唯一的请求是：为那些受自己牵连的官员平反。

多年以后，康熙皇帝每每想起靳辅，都会感慨万千，并一再追封他的官衔。从此，他再也没能找到一位像靳辅那样的河道总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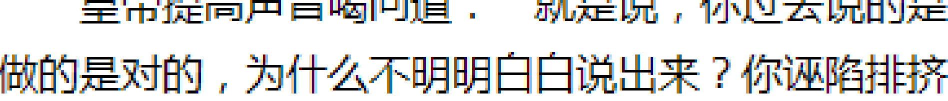
历史老人仿佛特别喜欢恶作剧一样。靳辅病逝在河道总督任上几年之后，又一位河道总督也和他一样病死在那儿，而这位后来者，偏偏就是当年处处与靳辅对着干的于成龙。

康熙一朝有两个于成龙，都极有名。前一个老于成龙被康熙称赞为天下第一清官，在历史上颇受好评。老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时，小于成龙是他手下的通州知州，不久，老于成龙调升两江总督时，向康熙皇帝推荐小于成龙可以大用。后来，老于成龙去世，康熙皇帝深为惋惜，突然想起了那个受过推荐的小于成龙，于是，就把他也陆续提拔成了直隶巡抚。前后两任都叫一个名字，前任还推荐过后任，一时传为佳话。

小于成龙本来不懂黄河治理，为了迎合皇帝，便拼命反对靳辅，一力主张疏浚海口，甚至暗中嘱托漕运总督慕天颜为靳辅栽赃。没想到，靳辅死后，自己竟被皇帝选为河道总督。他既不懂治河，也大体没有兴趣治河，如今只能打起精神走上那黄河大坝。结果，在总河任上的表现让皇帝很不开心，最后，终于在群臣面前让他出了一次很大的洋相——

当时，皇帝和他谈论治河问题，二人谈得特别不投机。皇帝就问他："以前你说减水坝宜关不宜开，现在你还这样看吗？"于成龙回答："以前我妄言宜关，现在看来，实在是错的。"皇帝又问："你说靳辅白白浪费国家资财，并没有真正治河，现在怎么看？"于成龙回答说："我现在都是按照靳辅的做法在做。"

皇帝提高声音喝问道："就是说，你过去说的是错的，靳辅做的是对的，为什么不明明白白说出来？你诬陷排挤别人的时候很容





易，轮到你来做河道总督就什么都难，这不是明摆着吗？”康熙皇帝越说越气，他指着于成龙对群臣说：这个人曾经对我说，他没有见到靳辅在河堤上植树，我南巡时，指着那些柳树问他，那是什么？他答不上来。他告诉我靳辅放水淹民田，我问他在哪里？他又说不是亲眼所见。皇帝越说越激动，劈头盖脸地一通臭数落，令于成龙羞愧得无地自容。群臣认为于成龙“怀私妄奏”，纷纷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康熙皇帝网开一面，命令以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于成龙懊恼万分，除了努力做出个样子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无奈，他是真的不懂治河，按下了葫芦起来瓢。康熙三十九年春天，眼看着雨季就要到了，正当万般无奈的康熙皇帝下决心要撤换他时，一封遗疏送到了皇帝的案头——于成龙在河道总督任上病逝。就这样，一个原本很能干的帝国重臣，稀里糊涂地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历史坏名声。

从史书记载上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一次都与黄河治理密切相关。面对这条浊浪排空的大河，他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深深知道，自己一跺脚，九州大地都会颤抖，唯独这条大河不买他的账，他时刻都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条喜怒无常的河。一般说来，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帝能够这样面对这条河时，就是中国人的绝大福气。因为，这种情形至少说明，这位皇帝还存着一份敬畏之心。只要如此，这个皇帝就大体不会坏得出格。我们也就大体可以知道他在治理这个国家时的基本情形了。

后来，他那个被称为乾隆皇帝的孙子，也曾经多次下江南。他的名义也是视察黄河。在历史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那吃喝嫖赌式的下江南和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基本是两回事儿。对此，历史已有定论。从中可以知道，不管一个人曾经有多大权力，也不管他以为自己多么聪明，历史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的。



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

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满八周岁的玄烨在聆听了父亲的遗诏后，宣誓“恪遵遗诏”，继位为皇帝。当时，他可能根本没听懂遗诏里说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那份遗诏里面，顺治皇帝历数了自己十四条罪过，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过分亲近汉族官员，导致满族官员没有心思做事等等，实际上等于用皇帝的口吻将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这份遗诏从皇帝临死到最后定稿，中间经过了大约十多个小时。因此，有理由将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满洲亲贵们的意志，而非出自福临的本心。

七年后，康熙七年正月，已经亲政半年的康熙皇帝为父亲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将顺治遗诏中对自己的批判翻转了过来。如顺治在世时，苦读经史，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大量选拔汉族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等等，过去一股脑的罪过，如今全部变成功德，并且成为康熙皇帝执政的基本国策。此时的康熙或许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这个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庞大国家，未来的自己，将要在这里汲取很多东西，并且会比自己父亲走得远得多。

事实上，形势使然，他们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在一种诡异的政治机制下，这种颠三倒四已经应该被看成是题中应有之义。

康熙继位时，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稳了脚跟。但扬州、嘉定、江阴、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长久的伤痛，薙发、圈地、逃人、投充之类更是恶名昭著。顺治十四年发生的江南科场案，顺治十五年发生的奏销案，顺治十八年发生的哭庙案和康熙二年发生的庄廷鑨《明史》案，



无不令人谈而色变，使那一时期变成了一个真正血腥的时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难。而人心恰是这江山的根基，没有人心支撑的江山，将恍如悬在半空摇摇欲坠的庞然大物，没有人知道那大家伙会在什么时间轰然砸下。

康熙亲政时，同一职级的满汉官员，满族官员的级别高于汉官。譬如，满族尚书、左都御史为一品，汉族尚书、左都御史则只有二品；满族大学士为一品，汉族大学士只有五品。其他职位也全部如此。当时，同样是尚书，汉官见到满官时，需行跪拜大礼。稍早一点的观察家甚至记载说：满洲八旗的低级官吏甚或兵卒，时常会在不高兴时，用马鞭抽打高级别的汉族官员，或是饱以老拳。

康熙八年，将鳌拜打翻在地之后，康熙皇帝大权在握，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拉平。他大力宣扬满汉一体，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也开始选拔汉族官员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贤能，不论是满是汉。吴三桂发起三藩之乱时，以为大清朝已经没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谁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汉族军政官员，却在平息叛乱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显然得益于他亲政后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刚刚有了一点转机，康熙皇帝便又举重若轻地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天下贤才。这是在清朝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笔运作，不但大面积化解了社会矛盾和敌对情绪，而且将全国富有影响的学者几乎一网打尽，导致文运昌盛，人才辈出，成为我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大美谈与盛事。若没有对社会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没有偌大的心胸格局与才干，恐怕是断然难以做到的。

这博学鸿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创的一个玩意儿。

本来，科举考试中没有这么一个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开元年间曾经开创了一个“博学宏词科”，就是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里面，再考选才学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后来，因为难度太大，虽然一直在延续，却没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这么一



个“博学鸿儒科”来，虽然只有一音两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词”变成“鸿儒”，意思就完全变成两回事儿了。鸿儒者，硕德饱学之大儒也，是学问之集大成从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铭》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现身，是可以蓬荜生辉的。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于是，一时间，能被推荐参加这场考试本身，已经成了读书人极大的荣耀，何况是皇帝亲自主持考选。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心里想的那点事儿，从而设了这样一个局，真是够难为他的。

在为此发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认为：自古一代之兴盛，必定需要天下贤才振兴文化、共襄盛举方可达成。因此，他下令，全国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品学兼优、学识卓越，不管是否已经做官，都可以在推荐之列，皇帝将亲自考试录用。随后，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搜求荐举人才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扩展开来。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

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

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



此后，坚冰出现了明显解冻的迹象。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弟子，在经史方面名气极大。他和老师一样，誓死不与清朝合作。被列



入荐举名单之后，他坚辞不就，地方官拿他毫无办法。如今，一大批远远不如他的人被皇帝请进翰林院，还要让他们修明史，这使万斯同痛苦万分，因为，修明史是他的终身梦想。他十分恐惧，害怕这帮家伙糟蹋了这个机会。终于，黄宗羲同意他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明史。当时，有关方面负责官员见这位刀架到脖子上都请不动的万斯同，居然肯大驾光临，高兴得差点晕过去，康熙皇帝也立即授予他翰林院撰修官之职。他坚决拒绝，声明自己不入史馆，不受官衔，不取俸禄，只以布衣之身参与明史修撰。若干年以后，这位可敬的大学者就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去世的。

把弟子送到北京之后一年，黄宗羲再一次派人前往北京。这一次，他派去的是自己的儿子黄百家。不仅于此，这位中国晚明前清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康熙皇帝是“圣天子”。而正是这位黄宗羲，根本不在乎以死相威胁，在著名抗清诗人张煌言兵败被处死后，为他撰写墓志铭，其中，就有千古名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里，在数千年其媚入骨的孔孟之道说教中，又是他，率先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祸害就是帝王政治！

如今，面对康熙皇帝，黄宗羲甚至希望自己的同志们一起来赞助国家的文化事业。假如康熙不是做得足够出色，大约很难令黄宗羲有这样的表示。

另外一位和黄宗羲同属超一流大家的顾炎武，一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到处奔走，联络抗清志士。如今，态度变得日益温和，从视大清政权如寇仇，到开始关心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发展与治理。康熙皇帝玄烨所做的一切，显然在其中发生了重大影响。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康熙皇帝在做这些事情时，前方平息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打得死去活来。一场血肉横飞、意义重大的战争和一次重大而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居然让康熙收发自如的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发生时，康熙皇



帝只有十岁。这件事情给当时的学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修撰明史时，大家都很害怕因文字得罪。为此，康熙皇帝多次发表谈话，要求一切从史实出发，“唯从公论耳”。有些话，他说得坦率而明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如果轻率地论断是非，后世自有公论，肯定要归罪于我，我不怕当时，但怕后人。我之所以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今天我们看到的《明史》，完成于康熙晚年，经过后来雍正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黑暗时代，在二十四史中，这部《明史》仍然被认为是一部良史，其中，康熙皇帝功不可没。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中，会说漂亮话的数不胜数，而从心里害怕后世公论、能够把事情做得像康熙这么漂亮的，真的找不出来几个。

在经济政策上，康熙十分开明。扳倒鳌拜自己执政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将京畿地区一千八百多万亩土地无偿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对新开垦或复垦土地征收赋税的年限也一再放宽，达到六年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永不征赋，并对耕种者预借耕牛、种子、农具；开垦出来的田地面积并不清丈，全凭自己申报；到康熙后期，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明朝后期的四五亿亩，增加到了七亿多亩。有统计数字显示，康熙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豁免税粮、丁银、积欠赋税五百四十五次，总数可能远远超过了几亿两白银以上。

这种情形，势必会令百姓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康熙很明白，他娴熟地应用古代圣贤的教导来解释自己的作为：“民为邦本，要把体恤他们放在第一位；政在养民，不要用赋税搜刮他们是最要紧的。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富足，我当皇帝的怎么会不富足？政府的好处不给老百姓，那准备给谁呢？”

说实话，中国历史上，懂得这个道理的政治家并不少，而照着去做的却实在是太少啦。

把猪养肥养大了之后再杀，是大家都懂的道理。帝国的皇帝和官员们从来都不弱智，问题在于，皇帝也是人，人所具有的欲望他



都有，人所不敢有的欲望，他也可以有。这是瘦猪小猪也要杀的基本原因。官员们则更是如此，他们的欲望同样比普通人强烈许多，他们需要政绩，需要更高的位子与权力，于是，也就有太多的理由需要钱，需要把钱弄到手的理由与机会。他们任期有限，更高的位子与权力是许多人都在热切憧憬和向往着的。而这头猪不是他的，早杀早出政绩，早杀早得实惠，他有一千个理由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动手？养肥养大之后，说不定就轮不到自己杀，而要便宜别人了。

康熙皇帝本人和他所推行的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令此种景象大为缓解。这应该是他收拾河山与人心取得成功，并进而赢得自己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

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治理情况。在江宁——今天的南京，他先是派遣官员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后，他自己又亲自来到明孝陵前，向这位前朝开国皇帝致敬。当时，他向朱元璋行的是最高级别的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在宝城前行三奠酒。这个举动，释放出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希望消除满汉仇恨，实现民族和解。应该说，尽管这一做法带有很强的政治用心，但表现出来的的确是一种善意。那些思明仇清的大明遗民，在胜利者的这种举动中可能会备感心酸和惆怅。

回北京路过山东时，康熙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大张旗鼓地直奔曲阜，跑到孔老夫子的故乡，来对这位汉族人心目中的第一大圣人表达自己的敬意。

十一月十八日一大早，他排开全副仪仗，自曲阜南门，直趋孔庙。在奎女阁前步行至大成殿，然后，趴在孔子像前，又是三跪九叩首大礼。一时间，乐舞大作，汉族官员与大明遗民感动得锥心刺骨、涕泗滂沱。

在孔府，康熙皇帝和孔圣人的后裔亲切交谈，听他们讲解儒家经典——尽管那些人生格言式的东西，康熙皇帝自己早就可以倒背如流——但他还是很专注、很谦虚地聆听着。然后，勉励他们继承和发扬先圣的光荣传统，将其世世代代发扬光大。最后，皇帝挥毫为孔



庙留下题词，曰：“万世师表”，至今悬挂于孔庙之大成殿中。

可能就是在康熙皇帝隆重跪拜在孔老夫子像前的那一刻起，一个“有道明君”、“一代令主”的形象，终于被他成功地树立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此，康熙皇帝再也不是气运不过百年的夷狄之君了。在潜移默化中，人们认为——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如今的大清帝国已经变成了华夏正统。于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皇帝从心理上征服了这个庞大的民族。如果说中国人特别自作聪明，特别喜欢玩“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套鬼把戏的话，在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还没有哪一位汉族同胞比玄烨玩得更精彩、更漂亮，能够让他的对手们如此心悦诚服地给他做奴才，并至今发自内心地对他赞不绝口、颂扬备至。

透过明孝陵前和孔庙中人们的婆娑泪眼，康熙皇帝可能找到了治理这个国家的灵丹妙药，从此，他越发娴熟地使用着这些技巧。在他治下的人们，则幸福地沐浴着圣人和圣君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直到鸦片战争开始。

上天仿佛成心要为康熙皇帝的政治行为艺术做出注释一般，在玄烨尽情挥洒着自己政治技巧与才华的同一时刻，北京城上空又冉冉升起了一颗璀璨夺目的词文艺术明星。这颗明星的光辉如此耀眼，不但令他的父亲——大清朝第一重臣明珠黯淡无光，就是与政治明星康熙皇帝的光彩相比较，其辉煌灿烂也丝毫不遑多让。于是，在大清朝的天空中，形成了政治和艺术领域里堪称两绝的双子星座，其光芒足以辉映千古。这颗艺术明珠，就是帝国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实事求是地说，假如不是因为正宗的皇家血统，使玄烨成了康熙皇帝的话，他的人生事业可能会远远不如纳兰性德。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纳兰性德和玄烨在同一年出生在同一座城市。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巳时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康熙皇帝玄烨出生在北京紫禁城景阳宫里，他的母亲佟妃属于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汉族佟氏家族，是故，玄烨身上有部分汉人血统。这年年底，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纳兰性德出生在北京一个皇宫侍卫的家



里。按照公历纪年，玄烨生在公元1654年5月4日，纳兰性德则生于1655年1月19日。

纳兰性德的身世十分特殊。因为，他的身上流淌着一半大清爱新觉罗正宗皇家血统，还有一半流淌的则是皇家仇敌的血统。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出身于大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的死敌叶赫纳喇氏。他的祖父就是坚定对抗努尔哈赤的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在与努尔哈赤的殊死战中，兵败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也许因为皇太极的母亲孟古格格是这位金台吉堂妹的关系，于是，他的后代便被努尔哈赤交给皇太极“恩养”。当时，皇太极统领正白旗，后来继位为汗后，正白旗旗色改为正黄旗，这可能是正黄旗中出身叶赫部落的人特别多的原因，包括明珠。因此，按照当时的汉文译名，明珠应该叫纳喇明珠，纳兰性德也应该叫纳喇性德。可能是接受汉族文化的缘故，纳喇显得土里土气，而纳兰，虽然只是一音之差，却立即变得兰香满口，读来顿觉铿锵，显得高雅而不流俗套。

纳兰性德的母亲则是更加大名鼎鼎的阿济格的女儿，是努尔哈赤正宗的孙女。算起来，纳兰性德和玄烨是堂姑表兄弟。

明珠大约是在顺治十一年前后结的婚。那时，他家的世职由他哥哥袭任，他只能自己出来闯前程，于是，成了顺治皇帝的宫廷侍卫。结婚时，他的妻子更倒霉——两年前，随着叔叔多尔衮去世，她的父亲阿济格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控告图谋不轨，抄家入狱，并被革除宗籍，他的家庭不再被承认属于皇族，不久在监狱里被处死。这位皇家格格也就变得十分破落寒酸，好在她嫁了一个极为聪明能干的丈夫，且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纳兰性德就是他们夫妻恩爱的结晶。

史料中，对于明珠的记载很多，而对于纳兰性德母亲的记载很少，我们只看到了一则，还对她十分不利。史书记载说，明珠的这位夫人悍妒异常，在明珠位极人臣之后，她仍然不允许丈夫和家里的侍女交谈。有一次，夫妻二人聊天，明珠偶然提到家里一个婢女眼睛长得漂亮。第二天一早，明珠起床梳洗时，夫人命一个男仆将脸盆放在明珠面前，里面盛着的，是那位侍女的双眼。这段记载，出自大清

宗室昭梿著名的《啸亭杂录》。昭梿是皇族成员，对大清上层的各种秘密了如指掌，他的这本书历来为史家所推重。假如这里记录的东西是真实的话，这位女士就太令人恐怖了。这样一个凶悍的妇人，居然能够养育出纳兰性德这样一颗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也算得上是个异数。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满族只有几十万人口，他们走出游牧渔猎生活的时间很短，几十年前，刚刚借助蒙古文字母，创造出了满文。据懂这种文字的人说，那是一种很难进行复杂表达的文字。到玄烨和纳兰性德大放异彩的时刻，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也才仅仅三十几年。什么样的机缘条件，竟能够培育出这样两位人物？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史命题。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纳兰性德《采桑子》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到醒来无味。

——纳兰性德《如梦令》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纳兰性德《画堂春》

这样的词句，就是放到柳永、李清照的时代，也应是毫不逊色。一句“天为谁春？”想必能问得普天下文人骚客张嘴结舌、黯然神伤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仅仅八个字，胸襟、抱负、才情、灵性便直追李、苏。那深受三纲五常浸染的明清时代诗界词坛，在这八个字面前，变得灰头土脸，再无神气。



在《原诗》一文中，纳兰性德写道：“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寥寥几句，便道出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痼疾之所在，为千年少见的真知灼见，真乃千古之评也！读他的诗文，令人常感疑惑：这位满洲少年，怎么会有如此纵横洋溢、飞扬灵动的才气？



在康熙皇帝的博学鸿儒科中，一些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流学者、诗人被网罗其中。陈维崧是著名东林党人、明末四公子之一陈慧贞的儿子，当时影响最大的词人，号称阳羡词派宗主，他的词为天下所传唱。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人，为浙西词派领袖，是极负盛名的学者诗人。严绳孙是明末刑部侍郎严一鹏的孙子，他在考试时借口眼睛有病，只写了一首诗，并且其中有的文句还不通。康熙皇帝特别指示：修明史不能没有此人，结果，以二等最后一名被录取。毛奇龄也是名声很响亮的人物，在答卷时大写女娲补天，康熙皇帝没有在政治上计较，将他取为二等。这是一些思念前明、仇视大清却又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视公侯权贵如粪土，偏偏全都是纳兰性德的挚友。他们当中，最大的比纳兰性德大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比他大近二十岁，没有人拿纳兰性德当宰相公子，却全都表现出对这位忘年小友的真心喜爱。他们在一起诗酒唱和，光风霁月，其乐也融融。

在此期间，纳兰性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做了一件很是令人称道的好事，就是帮助顺治年间遭受“科场案”迫害的著名读书人恢复自由。

科场案是清朝开国初期最著名的冤假错案之一，发生在顺治十四年。这一年，正值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当时，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省里举行的叫乡试，中选者是举人。第二年在北京举行会试，中选者就是进士。顺治十四年江南乡试时，发榜之日，舆论大哗。不久，就传出两位主考官贪赃受贿、徇私舞弊的各种细节。以至于这两位考官离开南京时，众多学子追着他们乘坐的官船沿江唾骂，并用砖瓦石头抛打。丑闻传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决心严厉惩处。本来，惩治贪官污吏是对的。可是，顺治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想借此机会镇压江南的反清情绪，于是，惩罚行动迅速扩大化，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冤假错案。

当时，两位主考官、十八位同考官全部被处死，家产充公，妻子籍没为奴。考生除了参与作弊者之外，许多被诬告的著名学者、才子，如桐城方拱乾、方孝标父子、兄弟、妻子一门和吴江吴兆骞等

一百多人都被籍没家产，锒铛入狱，并被发配到当时令人谈而色变的极苦寒之地宁古塔。

这是先皇帝御定的钦案，是故，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陆续死在宁古塔。纳兰性德从他的那些汉族好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开始设法营救。我们无法知道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但确实有人被陆续释放回来。《清史稿》中也记载了纳兰性德营救著名江南才子吴兆骞的事迹，可惜过于简略。当时，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尽管康熙皇帝对他很看重，但仍属人微言轻。他很有可能是说服了自己的父亲，通过这位当朝重臣办成这件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纳兰性德出了一笔钱，将吴兆骞赎回来的。不管怎样，《清史稿》描述说："士尤称之"——他的义举受到读书人广泛好评。

纳兰性德才华横溢，为人却极为谨慎，避而不谈世事、政事。他的忘年挚友严绳孙说他"惴惴有临履之忧"，意思大约是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按理说，他出身世家豪门，二十岁出头——康熙十四年就考中了进士，是满族人中少见的学识渊博、风华绝代人物，本来应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才对，为什么他会如此忧伤抑郁？至今，这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清史稿》记载说，康熙皇帝对他很是青睐，从三等侍卫，很快将他提拔为一等侍卫，在他生病时，皇帝正在外地，专门派人回来命令御医给他看病，并要求随时将他的病情报告给皇帝。这种情形若发生在一般浮浪子弟身上，早就令他们得意忘形了。但，若如此，纳兰性德便不成其为纳兰性德了。



在纳兰性德的诗文中，一种深深的忧郁悲伤始终挥之不去，并时常流露出对官场生涯的厌倦、对人生的不平——

高才自古难通显。独憔悴，斯人不免；

失意每多如意少。须知道，福因才折；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

有人从他诗词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判断，他很可能有一位青梅竹马、彼此深深眷恋的爱人，却不幸按照满洲皇家的规矩，被选秀入宫了。更不幸的是，诗人每天的工作却是在皇宫中担任侍卫。这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坏，又完全无法也不敢说出口的部分原因。

然而，从上面的词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如此，这也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今天学者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一位风华正茂的满洲贵胄少年，于膏粱锦绣、殿阁宫阙的包围下，每天出入于大清帝国最高门户之间，却发出如此多的不和谐之音。他似乎在提醒人们，浮华喧嚣的下面，尽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诚所谓“太平有道莫轻题”。年轻的诗人已经看透了帝国政治的无奈，泡沫下面，方才是生活本来的源流呵。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残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纳兰性德《金缕曲》

就这样，仅仅三十一岁，纳兰性德就患病去世了。时为康熙二十五年五月三十（公元1685年7月1日）。他为他的时代增加了一道极为靓丽的异彩，为后世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却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疑惑和遗憾，让人为他难过为他感伤。

纳兰性德逝去，帝国文化昌明的时代似乎刚刚现出曙色，便匆匆黯淡下去。从此，越来越多的倾轧、争斗浮出水面，且渐趋凶狠，帝国官场的千年痼疾——贪官污吏日益活跃，围绕着太子名位，皇家与帝国决策层里翻云覆雨，终至在康熙皇帝手中酿出新的恶名昭著的文字狱。面对帝国深层次的制度缺陷，即便是康熙皇帝玄烨，也难免堕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从此，帝国政治文化渐渐跌入雍正、乾隆主政后至为黑暗的时代。



为了收拾人心，重整河山，康熙皇帝将打击贪官污吏、澄清



吏治当成自己施政的极其重要环节。他曾经说过：“我恨贪官污吏更甚于恨噶尔丹，要是澄清吏治能像收拾噶尔丹一样就好了。”他深知帝国政治以下事上为其根本，官员层层巴结必然导致层层腐败。因此，他对中央官与地方官一级级交往时馈送贿赂极为厌恶，曾经专门下令严禁，一经发现，官员立即撤职，经手人要处以死刑。

从整体上看，大清入主中原之前，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均实行八旗分治、分享、分立原则，众目睽睽之下，徇私舞弊变得很困难，加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严于执法，因此，在大清早期，很少见到关于贪赃枉法的记载。大清入关之初，多尔衮认为，贪污受贿是败坏国家政治、人心的第一位因素，大明垮台，“罪莫大于此者”，因此，打击起来不遗余力，达到一经发现，就要处死示众的程度，受到广泛拥护。这是大清朝能够在备受贪官污吏荼毒的中原地区迅速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到康熙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康熙处理起来难免投鼠忌器，有时显得异常艰辛。

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曾经揭出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大贪腐案。

五月，监察御史钱珏上疏皇帝，指出山西省火耗甚重，请严行禁止。康熙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去年山西最高地方长官听到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就立刻下令禁止，但却连一个人都没有查处，由此可知，他是在巧为掩饰，阳奉阴违。”康熙没再说什么，但心中很不高兴。原因是，他知道山西官员不善者多，所以专门派了一批满族官员前去任职，穆尔赛担任巡抚。如今，就连他信得过的满族官员也有问题，他不胜叹息，为此，咨询了不止一个人。结果，所有被问到的人，都说那位穆尔赛口碑不好。于是，他决定要一查到底。

九月，他听取法纪部门的人汇报关于穆尔赛案件的进展情况，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回避实质性问题，处理意见也不痛不痒，遂命令带头揭发的那个监察御史钱珏，公开揭发事实。九天后，钱珏拿出了很扎实的材料。康熙皇帝大怒，把维护穆尔赛等人的几个满族重臣

痛斥一番，下令将山西所有涉案贪官全部押解来京，严加审问。

当年十月，审问结果出来后，康熙皇帝命令将庇护穆尔赛的满族大学士降二级、满族部级干部降三级，命令他们继续穷追犯罪事实，倘若胆敢以“弥天之手”徇情包庇的话，将严惩不贷。

十一月，案件核实清楚后，皇帝下令，将巡抚（相当于省长）穆尔赛及其部下布政使（主管财政的副省长）纳鼐、按察使（主管司法的副省长）库尔康及知府、知县等十余人全部处死。一时间，举国人心大快，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像这种贪腐案件，康熙皇帝一般处理得干净利索，并不拖泥带水。然而，还有一些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则使他大伤脑筋。

康熙二十八年，纳兰性德死后三年，他的父亲明珠被弹劾，牵出一批高官。不久，湖北最高行政长官在贪污案件中，供认出了两位皇帝身边的中枢重臣曾经接受过他的贿赂。其中，一个是徐乾学，另一个是高士奇。

徐乾学在当时名气极大，他和他的两个弟弟徐元文、徐秉义三人连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是当时流传极广的盛世佳话。徐乾学学问渊博，是大清修撰《明史》的总裁官、《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的副总裁。他入值南书房，升内阁学士，是陪伴在皇帝身边读书并负责机要文秘工作的心腹重臣，他还是纳兰性德的老师。在随后的一些弹劾奏章中，揭发出这位帝国重臣本人和他家人许多贪赃受贿、横行乡里的不法情事，称得上是劣迹斑斑。当时，和明珠一起被扳倒的一位大学士，名叫余国柱，人称“余秦桧”，而这位徐乾学，则被称为“徐严嵩”。民间歌谣曰：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



然而，皇帝偏偏对他网开一面。原因是，这位徐乾学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当代大儒——誓死不肯和大清朝合作的顾炎武。皇帝正在大力推进满汉一体，大力争取汉族士大夫的合作。打骡子马也惊，打了徐乾学，会不会影响这一基本国策的效果，这使康熙皇帝颇费踌躇。此时，徐乾学斯文扫地，自知没有脸面出入朝堂，请求皇帝“放归田里”。康熙批准他以原级别退休，但要留在北京继续修撰那几部



大书。

不料，监察官员们得理不让人，他们不依不饶，连连上疏，陆续揭发出徐乾学及其家人大量恶劣事实，弄得康熙皇帝毫无办法。虽然一再斥责甚至打压那些监察官员，无奈皇帝也无法命令这些人收回已经吐出嘴唇的话。最后，因为徐乾学的名声实在太坏，已经影响到了朝廷的形象，皇帝只能将他革去官职，逐出北京。即便如此，皇帝在他离京时，还手书匾额，曰“光焰万丈”赐给他。几年后，皇帝想想不对，下令仍然叫他回京来修书。这位名誉扫地的学者型大官僚，没能看到皇帝的恩眷就死掉了。

另外那位高士奇更是一个异数。此人博览群书，天资颇高，写得一手极漂亮的书法，但一直穷困潦倒，步行千里来到北京找机会，颇有点儿今天“北漂”的意思。不料，机会还真让他找到了，而且还是个天大的机会。当时，康熙皇帝正在如痴如醉地迷恋书法，对真、楷、行、草各体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喜欢米芾和董其昌的作品。皇帝曾经对身边的儒臣们表示：“治国之道首先推崇儒雅。”因此，他命令翰林院的官员们要把他们的诗赋辞章和书法作品随时送给他看。这还不算，皇帝命令翰林们要随时发现外面长于辞赋书法的人，把他们的作品也要送给自己。结果，高士奇被皇帝一眼相中，不但将他破格补为翰林，而且，直接让他入值南书房。这一步登天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鸡犬也跟着升天了。

高士奇成为皇帝的贴身机要近臣后，全力以赴，忽悠得皇帝对他特加宠爱，甚至说，“有了高士奇，我才找到了做学问的路径”，高士奇俨然成了帝王之师。于是，门庭若市，中央各大机关的龌龊官儿们纷纷奔走其门下。他则一会儿和这个结下亲家，一会儿和那个认了干亲，再不然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许多地方官员拜托他关照，馈送起来“成千累万”，中央部门官员则给他送“平安钱”，求他指点“真门路”。到最后，这厮居然和帝国最高监察长官合伙做起生意来。这位长官名叫王鸿绪，官居左都御史。他和高士奇两人合伙，在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一带大发利市，生意经营得红红火



火，达到了相当于今天几亿元的规模。有民间传唱的歌谣为证，词曰：“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那东海，指的是徐乾学，而这澹人，就是高士奇的字，他名士奇，字澹人。

这一回，事实俱在，皇帝也无法宽容。于是，罢了高士奇、王鸿绪等一帮子龌龊官员的官儿，让他们回家玩儿去。后来，皇帝南巡到杭州，还专门驾临高士奇的西溪山庄，赏赐给他一幅自己的书法作品。这个智商极高、品行不见得高的高级文化混混，在江南士林中不见得有什么崇高的影响，却有极广泛的交游。他从潦倒到发迹的过程，已经成为士林中的传奇。这可能是康熙给予他不同寻常宽容与厚爱的主要原因，因为，皇帝同样需要求才若渴、礼贤下士的传奇。

就这样，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出地面，沐浴着帝国温暖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生长得无比茂盛。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也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他要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杀贪官污吏最得人心；他要仁慈宽厚的名声，却不知道，在帝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家只能以霹雳手段，方能显菩萨心肠。他可能真的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却没有为深受贪官污吏之苦的人民解除这种痛苦，这些贪官污吏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最为危险的敌人，康熙皇帝却以他具有特殊政治目的的所谓宽厚仁慈，庇护了一大批这样的敌人。在他执政后期，贪官污吏渐有泛滥的趋势，令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不得不以“杀势”来制止这种趋势。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评。帝国政治因人而异之吊诡，真是举世无出其右者。

为此，康熙皇帝写了许多文章、文告、训谕，发表长篇谈话，苦口婆心地试图教化世道人心和那些贪婪的官员，从实际情况看，收效甚微。他自己克勤克俭，居住的宫殿里，一块地毯铺了近四十年，仍然不许更换；他吃穿用度之俭，可以列入帝国有史以来最节俭的帝王之列。他苦心发现了一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表彰，将他们树立成官员典范，希望全国的官员能够在他们的感人事迹面前，感到羞愧，从而天良发现。这些官员如江苏巡抚汤斌、张伯行，两江总督于成龙、傅腊塔、张鹏翮，江宁知府陈鹏年，嘉定知



县陆陇其等都是他先后大力表彰并树立的清官榜样。这些人确实优秀，在历史上也的确受到了长久的尊敬，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有限的，只能在特定的共鸣与共振点上发生作用，离开了这些条件，他们甚至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成为笑柄。何况，形格势禁之下，这些榜样本身就有着无穷的烦恼，譬如汤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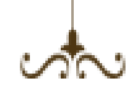
汤斌是康熙一朝最著名的清官，品行高尚，为官公正廉洁。他做江苏巡抚时，深受人民爱戴，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太子的老师。消息传出后，江苏人民扶老携幼哭成一片试图挽留他，皇命不可违，他只能去京城赴任。临行时，南京市人民罢市三天，人山人海地焚香送行。到北京后第二年，天大旱，一位中级官员上疏皇帝，指斥当朝重臣。皇帝命令群臣讨论此人的奏章。一位大学士说：“通篇胡言乱语，杀掉他就完了。”汤斌听说后，说道：“他是照皇帝的命令上书言事，怎么会有死罪？大臣不说，小臣说出来，我们难道不该反省吗？”结果，自然招致重臣们的痛恨。汤斌在江苏时，曾经发布过一篇文告，其中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字样。这些人认为这是在诽谤皇帝，遂向皇帝报告，并相继找出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请皇帝降罪汤斌。皇帝倒是很明白汤斌的为人，下令不许。这时，重臣们在外面散布消息说，皇帝要重重处置汤斌。当时，汤斌正在生病，他扶病上朝，准备接受皇帝的处罚。《清史稿》记载说，“道路相传，闻者皆泣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没有不哭泣的。当时，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江苏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到皇宫前敲登闻鼓为他鸣冤。《清史稿》作者感叹说，假如不是因为康熙皇帝始终信任并重用汤斌的话，他不知要受到什么样不可测之祸呢。

就是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清官，死后，康熙皇帝仍然很惆怅地问身边近臣：“我待汤斌不薄，他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对我不满呢？”

康熙皇帝，据说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汤斌，一位当时与后世公认的贤臣。他们之间尚且如此，其他真是不谈也罢。这种情形唯一可以表明的就是：帝国政治中的智慧资源与空间已经枯

竭。

步履蹒跚的老大帝国，走到今天实在不易，前方，已经接近山穷水尽。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帝国日益步入了回光返照的境地。







第十章 成功的皇帝，失败的父亲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御太和殿，举行册立皇太子典礼。他按照中国帝制传统中立嫡立长的原则，册立刚满一岁半、尚在襁褓之中的胤礽（yìnréng）为皇太子。这是大清朝自努尔哈赤以来第一次册立太子，也是整个大清朝唯一一位公开册立的太子。这种做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继顺治皇帝指定皇位继承人之后，康熙皇帝又在皇位继承制度上与汉族政治文化完全合流，事实上废除了努尔哈赤的继任者推举制度，使之彻底成为历史。

胤礽的母亲是正宫皇后，在胤礽出生时难产死去；而康熙皇帝玄烨与皇后感情极好，所以，册立胤礽为太子，以告慰太子的母亲。多年以后，康熙皇帝自己曾经表达过这个意思，因此，不少人接受了这种说辞。在我国历史上，以人之常情揣度皇家的心思，历来是一件很难靠得住的事情。康熙皇帝的真实意图，除感情的因素外，可能带有很深的政治考虑，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着密切关系。原因是——

册立太子的康熙十四年底，正是三藩之乱几乎达到高潮的危急之秋。吴三桂占领了长江以南的云、贵、川、湘等大部分地区，他的反满复汉旗号，在令天下动荡不安的同时，也令康熙皇帝寝食难安。入主中原之后，清朝一直以大明朝华夏正统的继承人为号召。此刻，除军事讨伐之外，完全按照中国王朝传统册立皇太子，可能是康熙皇帝政治对策的一部分。“授胤礽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册立诏书中的这句话，才应该是康熙皇帝的心里话。

他可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政治上系人心、定国本的灵机一动，竟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烦恼。

我国自周代以来直到明朝，两千多年间，皇位继承大体上采

用公开建储——预先册立太子，以备最高权力传承的制度。太子的选立，不是根据候选人的品质与才能，而是以候选人母亲的地位和候选人的年序为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意思就是说，在君主众多夫人生的孩子里，正夫人生的嫡子优先，嫡子中长子优先，正夫人没有孩子，才会考虑其他庶夫人生的庶子。因此，才会有未立之前子以母贵，既立以后母凭子贵一说。这是为什么我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人渣皇帝的原因，是我国家天下政治文化传统中，将家族利益摆在国家治理之上的典型例证，遂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中神圣不可动摇的信条之一。

权力继承，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中，应该都是绝对敏感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我国政治舞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的骨肉相残、殊死搏杀，其情节之离奇复杂、一波三折，比发生在丹麦王宫里的故事可要精彩太多了。我们找不到有哪一个君主曾经完全摆脱了这个阴影。

如今，这古老的故事即将由康熙皇帝、他的儿子与重臣们重新演绎一遍。他们虽然没有太多新鲜的创意，却也把这种帝制文化中的天性凶残，诠释得淋漓尽致。最后，众多权臣贵戚卷入战团，在这帝国最高级别的角斗场里角力，文人雅士则深陷污泥浊水，难以洁身自好。一个高士名臣云集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几乎人人都怀有深深隐痛，无法出淤泥而不染的时代。追究起来，似乎都与帝国名位和太子殿下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联。

太子殿下的母亲出身于正黄旗的赫舍里氏，他的祖父是顺治临死时指定的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据说，孝庄太皇太后改变在科尔沁故乡选皇后的做法，挑中索尼的孙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平衡四位辅政大臣的力量，削弱鳌拜的影响。皇后的父亲当时是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则是少壮有为的索额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索额图是康熙皇帝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人物，扳倒鳌拜时的那些童子军可能就是索额图负责组织和指挥的，他担任过皇帝的三等侍卫，很快晋升到了一等，康熙七年被任命

为吏部侍郎。康熙八年五月，索额图突然自己申请离开了那个要害岗位，回到皇帝身边继续担任宫廷一等侍卫。十几天之后，五月十六日，那帮除皇帝外其他一概浑不吝的小打手，便一拥而上，拿下了帝国辅政大臣鳌拜。随后，索额图被迅速晋升为内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衔，成为位极人臣的帝国重臣。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带有浓厚阴谋色彩的官场经历，时常预示着不祥的未来发展——

故事总是由纯情浪漫的喜剧开始：一个忠诚而勇敢的战士，帮助皇帝度过危难。皇帝宝座坐稳后，战士迅速受到重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除了坏蛋之外，人人快乐而幸福。然后，大人物自然而然地形成巨大磁场，将各色人等吸附到身边，其中众多的渣滓会吸附得最紧密。在他们的包围下，大人物会越来越感觉良好，而皇帝则会越来越不舒服。于是，悲剧开始发生：当年的战士——如今的大人物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家破人亡。当初，他崛起的速度有多快，今天，其败落的程度就有多深。我国社会中，诸如“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之类人生格言特别多，这是部分原因；那些阴狠柔滑达于炉火纯青的权谋智略，这里也应该是主要原产地。如果有谁说这是政治智慧，那就只能有两个可能：其一，说这话的人正在犯浑；其二，说这话的人即便不是此一行当中之高手，也是此道行之热衷者。

《清史稿》记载说：索额图权势日盛，权倾朝野。恰在此时发生了一次地震，这是王朝不祥的征兆。有人告诉皇帝：索额图凭借权势贪纵不法，所以上天才有此警告，请求严惩。康熙很宽容，说：“反省修身应该从我开始。”第二天，皇帝召索额图和各位大臣训谕道：“这次地震，我在反躬自省，你们也应该洗涤肺肠，凡事出以公心和忠诚才对。现在，你们的日子过得都很富饶，大家勾在一起，越发贪渎。如果事发，国法具在，将绝不宽贷。”当时，索额图和明珠两人共柄大权，各自有一大批追随者，皇帝一揽子教训之，并书“节制谨度”条幅赏赐之。



随后不久，索额图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离职。皇帝对他褒奖有加，命令他改任内大臣，随之授议政大臣。紧接着，皇帝以索额图对弟弟管教无方导致其懒惰骄纵为由，罢免了他所有显赫的职位，只保留了一个低级的八旗佐领职位。

康熙二十八年以后，索额图在对俄谈判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对噶尔丹的战争中，重新获得皇帝赏识，遂恢复了所有官职衔位，直到康熙四十年九月，以年老请求退休。

按理说，现在，索额图应该算是安全落地、功德圆满了。谁知，事情远远没到尾声。

两年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索额图突然被逮捕。皇帝下达的训谕中说，三年前，索额图的家人就控告过他，我压在手里没有处理他，他做的事情，随便举出一件就该处死。我念他曾经是大臣的份上，心中不忍，姑且饶他一死。皇帝下令严惩索额图的追随者，命令将索额图一系的同祖子孙全部罢官，一个大臣因为家中有索额图的私人书信而判处死刑，索额图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陆续处死。（《清史稿》列传五十六，索额图）当时，没有人能够知道，索额图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会令皇帝如此恼怒。

谜底在五年多以后揭开了一个角，事情原来和太子殿下有关。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在避暑塞外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前，康熙皇帝命太子殿下跪在御幄门前，诸王大臣、文武百官和侍卫们垂手侍立，老皇帝泪流满面地宣布废黜皇太子胤礽。他历数太子殿下的失德诸事，其中，使用了“不法祖德”、“暴戾淫乱”等字眼，说这位太子“种种恶端，不可枚举”，有些事，甚至皇帝自己都觉得“无法说出口”，为此，皇帝对他已经包容二十年矣。



康熙皇帝数落说，最不同寻常的是，太子殿下每天晚上都要逼近皇帝避暑的御帐，从帐缝向里面窥视，令皇帝不知道是今天会喝到毒酒，还是明天会被害，从而日夜胆战心惊。说到这里，老泪纵横的皇帝竟然扑倒在地，吓得群臣手忙脚乱地把他搀扶起来。皇帝说，

几年前，索额图暗中帮助太子“潜谋大事”，被皇帝发现后，处死了索额图。如今，太子是想为索额图复仇，所以才会结成党羽，犯下种种罪孽。随后，皇帝下令将太子身边的人，处死六人，流放四人，把太子本人捆绑看押起来。

九月十六日，康熙皇帝返回北京，立即召诸王贝勒、满朝文武齐集午门之内，宣布废太子。在祭告天地、祖先、神灵的祭文中，有“虽然有许多儿子，却都远远不及自己”之语。废太子胤礽看到祭文后，对康熙皇帝说：父皇责骂的罪错，所有事情都事实俱在，唯独说我有弑逆之谋，我确实没有这个心思。

皇帝命令把锁在儿子脖子上的锁链解下，仍然将他幽禁于咸安宫中。

至此，实情究竟如何？索额图到底是怎样帮助胤礽“潜谋大事”？还有什么事情令康熙皇帝“难说出口”？全部成为了历史谜团，至今没有人能够考证出令人信服的说法。

不久，康熙对廷臣们说：“过去，索额图出于私心，倡议让皇太子穿衣、器具都用黄色，一切礼仪制度差不多都和我一样，太子的娇惯放纵都是由此开始的，索额图实在是本朝的第一大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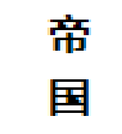
就这样，索额图——皇后的叔叔、皇太子的叔姥爷、帮助皇帝扳倒鳌拜的第一功臣，变成了第一罪人。

事实上，发生在皇太子身上的一切，究其根源，恐怕他的父亲康熙皇帝难辞其咎。因为，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索额图这位叔姥爷是没有可能对皇太子“娇惯放纵”的。



历史学家孟森教授曾经极敏锐地指出：早在二十多年前，康熙朝名臣汤斌做太子的老师时，事情就已经很棘手了。

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五年，当时皇太子十三岁。皇帝准备为他找一个好老师。主持朝政的明珠、余国柱等人向皇帝推荐了汤斌，说是“辅导皇太子之人，非汤斌不可”。汤斌是最具盛名的清官，又是学识渊博的理学名臣，皇帝很中意，下旨把汤斌从江苏巡抚任上，调到北京来担任太子教育的最高负责人。看起来，这是明珠等人荐贤



和皇帝对汤斌的重用。谁知，其中却有着明珠等人极阴暗而不可告人的动机。

当时，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受到皇帝的特别信任，是首席大学士，另一位大学士余国柱则是他的忠实战友和追随者，其他内阁成员基本要看明珠的脸色行事，满朝文武也没有人敢于违背他的意志。

索额图能够得到皇帝的信任，除他本人的能力、剪除鳌拜的大功之外，皇后的叔叔这层身份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明珠则不同，他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才干，在底层一级一级干上来的。康熙三年，皇帝还没有亲政时，明珠已经升迁为内务府总管。康熙亲政后，明珠历任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还充当过皇帝经筵讲官，可见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

三藩之乱时，明珠力主应该撤藩，索额图坚决主张不能撤。为此，吴三桂起兵后，索额图曾经请皇帝杀掉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皇帝说："主张撤藩是我的主意，别人没有罪。" 从此，开始重用明珠。在册立太子的康熙十四年，将明珠调任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两年后，便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三藩之乱平息后，皇帝曾经很得意地对大家说："唯有明珠几个人懂得我的心思。当时，还有人建议杀掉他们，我要是听了他们的话，这些人都要含冤九泉了。"

有史家认为，明珠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升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要用他来平衡权力过大的索额图。如果皇帝确实是这样考虑的话，那么，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因为，此时的明珠与索额图已经呈现出冰炭难容的情势。



在为人上，索额图与明珠很不一样。索额图出身豪门，平时盛气凌人，常常公开排挤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清史稿》说他在朝士中，只看得起那个深得康熙信任的李光地，树敌很多。明珠则表面特别谦和，轻财好施，广结善缘，对异己者总是想办法暗中给人下套，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特别喜欢玩阴的。

索额图对于太子殿下是无微不至地好，而明珠则反其道而行

之。《清史稿》说，朝士有侍皇太子者，皆阴斥去。大概就是把朝中对太子好的人，都想办法赶走吧。他之所以推荐汤斌来做太子殿下的老师，就是个很阴狠的一箭双雕之计。

明珠和余国柱很讨厌汤斌，直接的原因就是汤斌不肯为他们弄钱。《清史稿》谈到明珠时，使用了这样的词汇："明珠既擅政，簠簋（fǔguǐ）不饬，货贿山积。"簠是古代装稻米的大筐，簋是装食物的大柜子，饬是整顿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明珠当政以后，来者不拒，家里收受的贿赂堆积如山。余国柱就是靠这一套被明珠推荐、提拔起来的。但是，这两个人在汤斌那儿全都吃过闭门羹。

有一次，江苏受灾，皇帝下令豁免那里的赋税。余国柱告诉汤斌：全仰仗明珠才做到的这一点，江苏人民应该表示表示。这等于是公开向汤斌索贿，汤斌置之不理。三年一度的官员大考评，考语最终要由明珠定夺。皇帝则根据这个考语，决定官员的提升还是贬黜。因此，考语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政治前程。《清史稿》说，携金带银到明珠家去的地方官员络绎不绝于途，唯独汤斌及其属下的官员一个也没有。

如今，他和余国柱推荐汤斌来做太子的老师，表面上冠冕堂皇，是推荐全国最好的贤才。其实，他看准了，这件事情里面埋伏着大麻烦，他要让汤斌吃一个极大的苦头，同时为太子的未来埋下一个极深极长的伏笔。

现代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大凡在富贵娇惯下长大的孩子，特别容易形成高度自私的人格特征。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缺少教养和人类基本的怜悯心与同情心，不懂得为别人着想，骄横不法和忤逆不孝的比例很大。汤斌被调来做太子殿下的老师时，在康熙皇帝与索额图的娇惯下，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孩子可能已经形成了这种品性。



果然，汤斌成为太子的老师后，大吃其苦头。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大旱。皇帝下诏求直言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上疏皇帝，提到两件国家头等大事都有问题：谕教元良，慎简

宰执。前一句指的是皇太子的教育有问题；后一句指的是宰相人选不慎重。皇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教育不好当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宰相行为不端，所以上天才会降下警告。

皇帝看完后，下令九卿开会讨论。有一位大学士认为董汉臣妖言惑众，杀掉他就没事了。汤斌则表示，大臣不说的话，由小臣说了出来，自己面对董汉臣感到很惭愧。余国柱立即将汤斌的话报告皇帝，皇帝传旨，要盘问清楚汤斌是什么意思。

汤斌说：“我是负责太子事务的，我的行为中有违犯典章制度之处，感到很内疚。”皇帝说：回答含混不清，令再问。汤斌再一次回答说：“我很愚昧，面对皇帝的天籁之音，有点手足无措。实际上，我年纪大了，一年来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有不少违犯礼仪制度之处，请严加处分，以警后人。”皇帝还是认为汤斌遮遮掩掩，下令予以痛斥。

其实，汤斌的苦恼特别简单：他已经六十一岁了，身体一直不好，而辅导太子读书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每天从早到晚的十几个小时中，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侍候，而且每当和太子讲话时，都必须下跪，为太子指定背诵章节时，也必须跪下，捧接书本后，等太子背诵完毕，才能起身回到原处去依然站着。当时，正值盛夏时节，汤斌等几位老师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学究，他们常常昏倦得几乎摔倒。按照当时的礼仪规定，这就是失仪，或者再严重一点说，就叫做“君前无人臣礼”。因为太子是储君，储君也是君，在帝国制度规定中，大臣们在他面前，和在皇帝面前几乎是一样的，这种疲倦不堪，足见事君不诚不敬，已经可以构成一款大罪。而十三岁的太子殿下对老师们的困窘明明看在眼里，却自顾坐在那儿读书，极少让老师们也坐下歇歇。



终于，有一天，一位老师当场晕倒。康熙知道后，派人前来传旨说：“你们自己不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每天是站在那儿的？太子委托给你们，没有我说话，他自然不敢做主让你们坐。”结果，反倒变成是老师们自作自受的责任了。其实，康熙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说的并不是事实。皇太子当然有权力让老师坐下，并且他也这样做过，只是次数极少罢了。显然，只有高高在上的浑账，才会说出这么蛮不讲理的话，来为自己的儿子缺少教养辩护。史书记载道，老师赶紧解释说：“我们知道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当辅导重任，是我们自己愿意站着的。”（《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有一天，不知道出于什么肚肠，康熙皇帝突然当着太子的面，命令汤斌等几位老师回答书经中很偏僻的典故和词语，并命令汤斌背诗，结果，他们不是答不出，就是背不全。这种做法迹近恶毒，无非是想告诉儿子，不必对老师怀有敬畏之心，他们只是奴仆而已。（《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孟森先生叹息道：清代名流，以汤斌为一代名臣之最，而“康熙皇帝没有尊重儿子老师的诚意”。（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不久，汤斌等几位老师相继病倒。有一天，太子命令汤斌用自己的红笔，圈出汤斌认为自己写得好的字。那种红笔，只有太子和皇帝才有权力使用。结果，汤斌遭到弹劾，受到降级处分。当年九月，一代名臣汤斌就这样病死了。后来，似乎就没有特别正经的老师来专门教导过太子殿下。这真是当时大学者们的幸运，否则，后来康熙皇帝收拾胤礽时，他们必定会首先家破人亡。因为中国历史上，每当太子倒霉时，还没有能够不更加倒霉的老师。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他的那些儿子有什么不成器的举止时，康熙皇帝从来不去纠正自己儿子的品性，每每都是从重责罚他们的老师，为此，甚至不惜强词夺理、歪曲事实，最有甚者以至于让他的儿子们亲自在场监督责打他们的老师。徐元梦就是屡屡受到这种侮辱的一位，和他的遭遇比起来，汤斌们简直是太过幸运了。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在瀛台教儿子们射箭，皇子的老师徐元梦是个书呆子，不善骑射，不能使用硬弓。康熙便没有什么道理地责问他，他连忙解释了几句，史书记载说：“康熙震怒，命令边上的人将他摔倒在地，予以痛打，使他身受重伤。康熙还不依不饶，下令抄其家，将他的父母发配到黑龙江去。”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



业，当天夜里，康熙让医生为他治伤，第二天便命令他照常去给儿子们上课。

当时，下着大雨，徐元梦裹着伤，跪在皇宫门前的泥水里，号啕痛哭着请求那些御前侍卫，请他们转奏皇帝：自己奉职无状，罪该万死。自己的父亲一生廉洁，当官数十年，家产不及五百金，请圣主明察。现在，父母都已年迈有病，自己正当壮年，请求让他代替父母去黑龙江，还可以披甲效力。

皇宫的侍卫们都是铁石心肠，大家谁都不敢理他，纷纷捂着耳朵快步离开。最后，来了一位叫关保的，把他痛骂一顿，然后，向康熙转奏了徐元梦的话。皇帝这才下令赦免他的父母。此时，徐元梦的父母已经被装进囚车向黑龙江出发了。两旁观看的人群中，没有不流泪的。（《国朝先正事略》第九卷，第262页）

到此时，徐元梦的噩梦还远远没完。

康熙四十六年，玄烨看到几个皇子写给他的请安奏折文句不通顺，认为是老师徐元梦不尽心教诲所致。下令让全体儿子在一旁监督，由乾清门侍卫杖责三十。（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二月十一日）这些皇子中，可能就有他的学生，而这些学生能够学成什么德行，应该是不难想象。

后来，到康熙五十二年太子殿下第二次被废前，还再一次侮辱这位倒透了霉的老师。

当时，这位老师为皇家服务至少三十年了，不知为什么事情，胤礽对年龄可能已经六十开外的徐元梦破口大骂，一直骂到了他的父母，然后，把他推到河里，又拉出来殴打。此时，康熙皇帝恼怒的不是儿子的禽兽之行，而是恼怒儿子在骂老师时，竟敢背对着自己！（《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483页）

读了这些事迹之后，假如有人还愿意颂扬康熙皇帝的仁慈与伟大的话，也就让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一代明君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这样教导出来的孩子，根本就应该是衣冠禽兽，不管他们多

么有学问，武艺多么高强，多么有所谓治国的才能。

就这样，当康熙皇帝培养出一批毫无人类心肝情怀、为了皇位恨不得彼此一口咬死其他兄弟的儿子时，当他后来为了太子殿下大吃其苦头时，当他的儿子雍正继位后，不停地荼毒自己的兄弟们时，甚至——倘若真如传说的那样，康熙病情已经好转，他的儿子胤禛来看望过他以后，便莫名其妙地死掉了的话，他的确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那是报应，根本就不值得同情。难道不是吗？

孟森先生评论道：康熙父子兄弟间的惨祸，不能被看成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57页）自己的儿子们什么德行，精明如康熙不可能不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熙皇帝玄烨对他众多儿子的教育，开始由老师们的噩梦，渐渐加上利息、丝毫不爽地报应成了大清帝国爱新觉罗皇族的噩梦，变成大清帝国的噩梦。

从史料上看，太子殿下精通满、汉文字，娴熟于骑射，每当皇帝让他在众人面前显示才干时，他策马射箭、吟诗作句，常能博得一片马屁声。

让皇帝感到不愉快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当时，在御驾亲征噶尔丹的途中，皇帝患病，且越来越重。康熙命令把皇太子和皇三子胤祉召到行宫来。谁知，这位太子殿下服侍病中的父皇时全无忧色，一点都看不出着急难过的样子。皇帝很不高兴，把他先打发回去了。

不久，康熙三十三年，发生了一件本来很小、后来却变得不算小的事情，再一次证明康熙皇帝是如何种下恶因，从而结下恶果的——



这年三月，礼部向皇帝报告祭祀奉先殿时的礼仪安排。报告中注明，将太子殿下跪下磕头时用的垫子，摆在大殿的门槛里面。皇帝批示，让礼部尚书沙穆哈把太子的拜垫挪到门槛外面去。沙穆哈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大怒，下令严加议处。议处结果是，沙穆



哈下刑部议罪，两位吏部侍郎撤职。最后，皇帝决定将沙穆哈撤职，两个侍郎姑且饶过。

这是一件特别明白的事情，表明此时太子殿下的骄纵失德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礼部官员害怕降低太子的拜垫位置会引起他的记恨，未来招致报复，所以才请皇帝下旨，记录在案。康熙对这些官员的处置，和他对皇子老师们的处置如出一辙：通过惩罚老师，遮掩儿子们在学业上的过失；通过惩罚官员，遮掩儿子们在品德上的不足，并以此让他的儿子们、老师和官员们想想清楚：谁是主子？谁是奴仆？

康熙三十六年，在最后一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时，有人告诉皇帝，一些不入流的人和太子殿下往来密切，使太子殿下的表现有些令人担心。皇帝回北京后，立即下令调查，最后，将太子身边的厨师、茶房、仆役小厮杀掉了几个。其中，没有一个士大夫。当时，太子殿下二十四岁。

作为太子，他是皇帝之下第一人，是帝国未来的国家元首，为了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康熙皇帝专门命令由凌普担任内务府总管，原因是，凌普的妻子，是从小把太子奶大的奶妈，由她的丈夫担任内务府总管，可以方便太子殿下的予取予求。按理说，在这种情形下，太子殿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求的了。他愿意整日和这批不入流的人厮混在一起，想必有他自己的考虑。想起来，似乎让人只能往下流处去猜。至于，他们干了些什么，有什么值得皇帝大开杀戒的，仍然是个谜，想来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个中究竟。

皇太子可以到内务府去索取需求，其他的皇子自然也各有各的高招。

明朝对皇室子孙管理极严，皇子全部有自己的封国，成年后，他们就必须到各自的封国去居住，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许随便离开封地，他们被严格禁止干预行政事务，甚至在人身活动范围上都有明确规定。清朝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承袭了明朝的制度，唯独在这一点上不同，原因可能和清朝皇室子孙控制八旗的制度有关。因此，康熙



时代，他的众多成年皇子差不多都参与过国家事务的处理。许多重大或机密事项，康熙皇帝都交给自己的儿子去办，致使他的儿子们成了一批炙手可热的特殊人物，势必也为他们聚敛财物、贪纵不法提供了无人可及的条件。

大清朝官方史料中不可能记载这些，朝鲜使节们则在给国王的报告中，记录了不少此类事迹：康熙皇帝子女甚多，他们时常受贿卖官。比如漕运、盐务等职位，根据其肥缺肥差的程度，定有不同的价格。而且，他们经常勒索京畿地区的富裕之家，多的可以达到数十万，少的也都累计万金，夺占田园人畜的事情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他们花样百出，“侵虐万端必夺乃已，而不禁”，意思是，他们若想得到什么，必定想尽一切办法巧取豪夺到手才算完，没有人敢于或能够制止他们。就连雍正皇帝登基之前，也曾经以贪渎致富；当了皇帝之后，才将所夺占的财产还给原主，并且曾经训谕诸兄弟：过去，我虽然也没有免俗夺人利己，但从来没有伤害人命，对你们杀人伤人之事，我十分怜悯。你们所夺民财，限一年之内还给主人。不然，如果有人告到我这儿，我决不会徇私宽贷。

据说，京畿地区受灾时，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禟都曾经囤米居奇，不许发售，等到米价飞涨之后赢利。（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382 - 4383页）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的确可以看成是康雍乾时代社会的缩影。曹雪芹的祖先曹寅，深受康熙皇帝信任，被皇帝派往南京担任江宁织造，实际上肩负着许多特殊使命。他不但是皇帝派往江南的耳目喉舌，还负责为皇家处理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务。其间，不仅要输送江南美貌女子进京，为晚年的康熙皇帝充实后宫，为皇帝的儿子们购买苏州女子，可能也是一项经常而重要的业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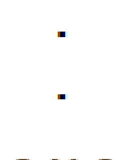
康熙父子兄弟之间的故事，发生在这样一批花花太岁身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朝鲜史料中看，当时，北京城里广泛流传着关于皇子特别是太子殿下的各种传闻，认为这位皇太子性情残

酷，不忠不孝。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说他“阴蒸诸妹”。（《李朝实录》，肃宗三十五年己丑）古代汉语中，以下淫上曰“蒸”，哥哥和妹妹之间发生性关系用这个字并不合适。因此，有人推测皇太子是和自己的庶母即康熙的妃嫔有私情，或者就是不仅和庶母，而且和自己的妹妹之间也有这种关系。这样，就可以明白康熙皇帝为什么废太子时说，有些事情“说不出口”了。在同一篇报告中，朝鲜使节记录说，康熙皇帝的其他儿子，暴虐的情形比太子殿下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皇帝所谓包容了太子二十年一说，由时间上推算，正是太子殿下的老师汤斌等人备受折磨后一年左右的样子。可见，当时太子和其他皇子不成器已经广为国人所知，康熙自己也应该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势下，他依然要从重惩治那些老师和官员，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康熙四十七年夏天，皇帝前往塞外避暑。途中，刚满七周岁的皇十八子胤祄得了急病，高烧不退。康熙皇帝似乎特别喜爱这个儿子，表现得十分焦虑。诸大臣看到皇帝焦虑，自然也都跟着焦虑。偏偏太子殿下不以为意，一切如常。九月四日，这个小皇子病死。当天，康熙痛斥皇太子胤礽，虽然是小皇子的哥哥，却绝无友爱之意。父亲骂他了几句，他还表现得气急败坏，怨气冲天。康熙认为他“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平治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终于痛哭流涕废黜太子。

康熙废黜太子后，愤懑不已，连续六个夜晚睡不着觉。把扈从诸臣召来哭诉自己的悲愤，大家一起跟着哭。在此期间，废太子胤礽的表现是白天酣睡，半夜起来吃东西，喝几十大碗酒都不醉，面对神灵牌位会惊吓得不成样子，遇到雷雨天气则畏惧不知所措，语言颠三倒四十分失常。



回到北京后，皇帝命令搭一个帐篷将废太子拘押在里面，让他的哥哥皇长子胤禔和弟弟皇四子胤禛负责看守。

皇长子胤禔时年三十六岁，常年跟随康熙，也算是立过一些功劳。康熙皇帝在把废太子拘禁起来时，曾经命令胤禔负责保护自



己。但不久就兜头泼了他一盆冷水，曰："我让胤禔保护我，并没有立他为太子的意思。胤禔性情急躁愚顽，哪里是太子的材料？"如今，将看守废太子的责任交给他之后，这家伙还真是急躁愚顽。他可能自说自话给他的弟弟多加了好几条锁链，以便把他捆得更难受些。然后，看到康熙时常情绪不好，便对父皇说："有一个叫张明德的人，相面的名气特别大，他说八阿哥胤禩是大贵的面相。胤礽行为卑污，大失人心，要是想杀掉他，不用出自父皇之手。"就是说，他推荐皇八子胤禩做太子，父皇要是觉得胤礽不好处理，他可以替父亲干掉自己的弟弟。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召集所有皇子开会。他劈头盖脸地将胤禔一顿臭骂，认为他不懂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简直就是个天理国法不容的乱臣贼子。随后，逮捕张明德，证明这厮与皇八子胤禩有过交往，但没有陷害太子的证据。于是，下令把这位名气很大的算命大师凌迟处死。

谁知，这位胤禔挨完骂后，并不气馁，他再接再厉，又想出了新的主意，使事情变得一波三折，格外诡异曲折。

皇三子胤祉是康熙皇帝的所有儿子中，学识修养最好的一个。十月十五日，他突然出面控告皇长子胤禔，说他家里供养着一个名叫巴汉格隆的喇嘛，每日在用魇胜法诅咒废太子胤礽。其做法，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在一个小木头人身上，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心口钉上钢针，埋到被诅咒者的床底下、居室里。据说念一段时间咒语后，就可以使被诅咒的这个人迷乱而死。

康熙皇帝立刻派侍卫前去胤礽的住处搜查，结果，搜出十几件魇胜物。皇帝这回算是真的知道，他苦心培养出来的这帮儿子有多么厉害了。他下令革去胤禔王爵，将他幽禁起来，并严厉告诫负责看守者，若有疏忽，将要杀他们全家。

皇帝将满、汉文武大臣们召集到畅春园，宣布太子不能不立。他命令大家畅所欲言，除皇长子胤禔外，在诸皇子中，推荐一位太子。他声明说："大家推举谁，我就立谁为太子。"（《清圣祖实



录》卷二三五，第18 - 21页）结果，众多文武大臣推荐的都是皇八子胤禩。皇帝很不高兴，几乎是立即就翻脸不认账了。

他斥责胤禩：到处妄博虚名，自己所施恩德，都被这小子据为己有，大家都称赞他，那我在做什么？如此一来，胤禩不就又成一个太子了吗？皇帝宣布说，今后，有一个说胤禩好的人，我就杀一个。这个大权岂可让给别人！几天后，康熙皇帝再次召集皇子们开会。这次，被痛骂的对象仍然是皇八子胤禩。

他声色俱厉地告诉儿子们："皇帝的宝座不是可以随便窥视的。废太子后，人们就在说胤禩好。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胤禩奸柔成性，狂妄地怀有当皇帝的大志。对此，我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结党营私，谋害太子，现在已经全部暴露。"随后，下令锁拿胤禩，严加议处。

他的话，激起了几个皇子的不满。皇九子胤禟对十四子胤祯说："到现在了，你我还不说话吗？"于是，皇十四子胤祯奏道："八阿哥没有此心，我们愿意为他担保。"康熙怒斥说："你们指望着他日后做了皇帝，封你们个亲王吗？我看你们是梁山泊的义气。"胤祯不服，抗言申辩。康熙怒不可遏，拔出腰刀说："我看你是想死。"皇五子跪着膝行上前，抱住康熙的腿，其他皇子一起磕头求饶。康熙扔下腰刀，操起板子打将起来。皇九子胤禟上前劝止，也挨了两个嘴巴。最后，皇帝下令将胤祯打二十大板，然后，将皇九子胤禟和皇十四子胤祯赶出乾清宫。

紧接着，康熙皇帝削去皇八子胤禩的贝勒爵位，废为闲散宗室，将一批有牵连的人夺爵的夺爵，降级的降级，幽禁的幽禁，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做出惩处。其中，包括那些按照他畅所欲言的命令，推举胤禩为太子的人。他再一次警告自己的儿子们，必须遵照自己的指示办，要不然，有一天自己死了，这帮儿子就要把父亲的尸体放在乾清宫内，然后，穿上盔甲拿起刀枪去抢皇位了。

这里，围绕着太子名位，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疑案——康熙为什么要大家推举太子，又坚决将几乎众望所归的皇八子胤



禩排除出局？他历数胤禩的罪恶，包括他妄博虚名，庇护奶妈的丈夫，他的母亲出身微贱，他的妻子是个嫉妒成性、凶悍异常的女人，导致胤禩没有生孩子等等。所有理由都很可笑，差不多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而构成罪恶的。那么，康熙到底想干什么？

当时，在康熙十来个成年的儿子里，除胤禩自己外，皇长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全部冒着被皇帝处罚的风险支持他做太子；大学士马齐、遏必隆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皇帝的表弟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明珠的儿子揆叙、汉大臣王鸿绪等人也一致推举他，他们的推举获得几乎所有人的赞成。

在皇亲国戚中，皇帝的舅舅佟国维表现得相当另类。

他宁愿得罪皇帝，也要坚持立皇八子胤禩为太子。后来，在皇帝明确表示准备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时，佟国维坚持认为胤礽不如胤禩。须知，在当时，这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不要说从此成为太子的死敌，就是不同意皇帝的决定，也是一项可怕的罪名。皇帝已经老了，时常闹毛病，太子殿下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皇帝。一旦出现此种状况，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人头落地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甚至更多人将会万劫不复，其令人恐惧的程度可想而知，为此，佟国维理应也在事实上受到人们很高的赞誉。

在当时众多的皇亲国戚中，佟国维大约是文武双全、威望最高的一位。康熙皇帝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他恩崇备至。从佟国维一生行事判断，此人显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小人。康熙皇帝疏远并冷落他，就是在他坚持推举皇八子胤禩之后。由此可知，这位胤禩必定有过人之处，方才能够得到如此坚定而广泛的支持。仅仅用他善于收买人心来解释这种情形，是康熙的意思，却并不一定是事实。他本人更不是像后来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不堪。那些描述，以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基本可以归于胡说八道之属。中国文人习惯于以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观念，跪拜在胜利者面前称颂赞美。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许许多多胜利者中，许多人根本就配不上那些称颂和赞美。



仔细检视这场太子风波的前前后后，有众多资料表明：康熙此时并不是要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做太子。很有可能，越是众望所归，他越要将其排除出局。因为，他特别害怕大权旁落，特别不希望除自己之外，再出现一个政治中心。这种表示，在他此阶段的谈话中，几乎比比皆是。这是他出尔反尔等许多作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当时的朝鲜史料中，认为此时的康熙皇帝处事特别颠三倒四，甚至殴曳大学士马齐，几近疯狂。当时，康熙接近六十岁，不知是否和更年期综合征有关，使他显得很乖戾，对身边的人和权力特别神经过敏。

权力这玩意儿，还真的是可以让人丧心病狂。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皇帝下令第二次立胤礽为太子。他的理由是，太子以前被诅咒，迷失了本性，如今疯病已经痊愈。他召集来几位亲王和满洲大臣，告诉他们说：自己梦见孝庄太皇太后了，太皇太后的神情特别闷闷不乐，与平时大不一样。太皇太后是因为太子被冤来给我托梦的。而且，那天抓太子时天色突然变暗，那时，我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现在，太子的病好了，是我的福气，也是诸臣的福气。因此，复立为太子殿下。

在后来的岁月里，皇帝采用了盯人战术——他自己走到哪儿，就把太子殿下带到哪儿，一天十几个小时，不让太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在三年半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这哪里还是生活，根本就是苦役，对双方都是绝对的苦役。终于，在这种苦不堪言的境地中，皇帝累了，而太子殿下则已经不仅仅是累。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皇帝从热河匆匆返回北京，驻于畅春园。在他的命令下，太子殿下和诸皇子匆匆进入澹宁居。康熙开口便宣布：皇太子胤礽狂疾未除，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遂第二次废黜太子。

朝鲜史料记录说：太子殿下被皇帝每天拘在身边，痛苦不堪。他想象着弟弟们在外面的诸般快乐，常感自己生不如死。后来，好不容易皇帝到承德避暑去了，太子殿下全面自由，沉溺在酒色之中。他派遣诸路人马，分赴一十三省富饶之地，为他勒索钱财，搜寻

美丽女子。稍不如意，便找借口将令他不开心的官员罢官去职。最后，“上至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徇其私而后已”。（《李朝实录》，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癸酉）

据说，太子殿下经常对亲近的人说：古今天下难道有四十年的太子吗？的确，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康熙皇帝也实在不想要他这个四十年的太子了。于是，皇帝将那些曾经接受太子托付，为他徇私帮忙的部院重臣一一抓进监狱，以极端严酷的刑罚惩治被认为阿附太子的重臣，如刑部尚书齐世武的身体被用大铁钉钉在墙上、呼号数日而死等等。然后，康熙再一次把太子殿下幽禁起来，他说：前一次废太子时，自己气恨异常，这一次，则是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

很难想象，他怎么还笑得出来。



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

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七岁时继位，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岁去世，他在位的实足时间已经接近六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所有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康熙一朝，气象万千，开启了我国帝制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诚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如影随形的阴暗也着实不算少，可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

或者换个角度，说不定可以这样思考：仅仅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而且越来越精彩，面对这种情形，帝国显得很无奈，于是，才会有回光返照一说。否则，拜帝王政治和孔孟之道所赐，我们大约可以在朝代轮回中永远地轮回下去。如果不信，看看洪秀全及其奋发有为的同志们，曾经何等意气风发，他们建立短命政权太平天国之后，在南京城中、天王宫里的作为，大体能够让我们明白那轮回的力量有多大。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康熙皇帝玄烨的很多政治行为艺术做了匆匆巡礼。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贴近这个人，做一番稍微细致一点的近距离观察。

十七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

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人们听取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伊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这个科学院的外国名



誉院士之一。当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俯下身子捡起那只红彤彤的苹果时，遥远东方的紫禁城里，比牛顿小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可能正在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发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当时，在帝国钦天监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最高长官杨光先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先支持下编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中，有许多误差，而杨光先等官员坚决不承认，导致南怀仁上疏皇帝予以揭露，杨光先随即上疏反驳，双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论辩。

在那一堆堆天文、历算的术语面前，康熙皇帝如坠云里雾中，完全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于是，十四岁的小皇帝采用了最为简单也最为聪明的办法予以裁决：他下令，让争论的双方，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结论存在的理由。为了保证实测的公正性，他派遣内阁大学士等二十名高级官员临场监督。一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他们分别检测了立春、雨水、月亮、火星、木星，结果很不幸，杨光先一派采用我国传统方法所做的测算是错误的，而南怀仁采用西法做的预测几乎分毫不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皇帝命令双方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广场上，用日晷针测试阳光在正午时的位置。这一天，所有朝臣齐集午门之外，所有人都很关心事情的结果，大家瞪大双眼盯着那两根日晷针影。随着太阳的移动，针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恰在正午时分，南怀仁所划的刻度与针影重合，而杨光先所划之刻度尚差几分。至此，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杨光先受到申饬，皇帝命令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副长官，参与天文历法的测算与编制。

事情并没完，因为这场争论，涉及了发生在几年前一场更大的事件。

就如表现出来的那样，杨光先自己对天文历算懂得的很有限，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情形和今天互联网上的那些激进民族主义“愤青”很相似：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各国情势所知甚少，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对自己不懂的事



务发表评论。杨光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对西式天文历算发起攻击并成功入主帝国钦天监的。

晚明前清时代，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历算著作——《崇祯历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启所推荐的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帮助下完成的。

邓玉函（SchreckTerrenz）是德国传教士，本人是山猫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与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尚书》、《诗经》、《春秋》及《尧典》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对我国晚明前清近代天文历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邓玉函死后，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他对推动晚明时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大影响。那时，天文历算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个官职。中国官员非常讨厌这个有可能抢夺他们官位的洋夷，因此，汤若望曾经受到过士大夫们的猛烈抨击，使他受到多方排挤和难堪。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安排汤若望和一批中国天文官员，同时观测一次日食，结果，汤若望的计算与观测分毫不差，那批龌龊官员则丢尽脸面。梁启超认为，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大事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汤若望编制的崇祯历，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便宜了大清朝，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安。

但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族也是“夷”，这使他们很难受。到顺

治十六年五月，当时只是江南省歙县秀才的杨光先开始发难，他不太明白西洋历算，对中国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认为，爱西洋历法十分危险，就像爱虎豹美丽毛皮而将它们豢养在卧室里一样，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也就没人理睬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先。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历法狱案”，第二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而这位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的位置。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方才逃过这一劫。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望，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一年后，死在东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历法都没有，实在不是件体面事儿。康熙八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儿去以后，南怀仁上疏皇帝，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望意图谋反，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议政会议讨论后，认为这杨光先的确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建议处死，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认为，杨光先年纪不小了，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结果，杨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历算、数学和几何。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除传教士们进献的之外，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用来学习这些知识，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

几年后，当他已经成为一位准天文学家时，曾经下令：“从今以后，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历算者，不许在钦天监做官，做了官



而对此道不熟练者，不许升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可以在野外，根据星座的位置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可以用简单的器具，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与距离。多年以后，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如何使用器具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老先生曾经预言：这门学问将来会大行于世。康熙通读全书，在上面做了大量圈点批阅，然后，得出结论是，此书没有大毛病，但算法不够完备。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将梅文鼎请到他的御舟上，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最后，很遗憾老先生年纪太大，无法请他出山。一年后，康熙下令把老先生的孙子召到北京大内去研习。年轻人读了皇帝学过的数学著作后，认为康熙的造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清史稿》梅文鼎传及文鼎孙谷成传）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中国以农为本，从很久远的年代，便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定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可能从汉代时开始，每年开春时节，皇帝都要率领百官来到京郊，举行躬耕大典，就是在钟鼓齐鸣中，由皇帝亲自扶犁，耕下春天第一犁，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和劝勉。到后来，和我国许多形式化的东西一样，大体成为象征性的假模假式。

满族人以渔猎立国，对农耕所知甚少。入关以后，满洲八旗会种庄稼的人很少，圈占的土地主要由汉族农民替他们耕种，偏偏康熙皇帝特别喜欢种庄稼。据他晚年自己说：他自幼时起，就特别喜欢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所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这应该不是夸口。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确实有一块皇帝自己耕种的农田。而且，他还亲手选育成功了一个水稻优良品种，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若在今天，他的这个成果可是能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的高级别奖项。

康熙皇帝自己写过一本书，名叫《几暇格物编》，其中谈



道：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他在自己的稻田边上散步，发现一株稻十分奇异，不但比别的稻子高，而且应该九月成熟的稻穗，在六月已经接近成熟。他遂将这株稻穗收藏起来，作为种子。第二年，这些种子播下后又在六月成熟。以后，他连年播种，越收越多。于是，康熙将这些种子拿到承德避暑山庄里试种，仍然大获丰收，并可以在白露前收获。据说，康熙每年到承德避暑山庄时吃用的稻米，都是他自己种的，且有富裕。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在江南地区试种。

在南京和苏州地区试种的结果是：由于生长期短，加上江南无霜期长，这个品种一举做到了一年两种两收，亩产平均增长五成左右。书上描述说，这种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区曾经广泛种植的“御籼稻”、“百日种”优良稻种的来历。此稻后来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迅速普及，两百多年间一直是当地水稻的当家品种。据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

在江浙一带巡视时，他发现往来船只上，载着很多猪毛、鸡毛，便询问船家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船家告诉他，福建地区的水稻田时常引山泉水灌溉，山水寒凉，用这些东西可以使禾苗生长正常且早熟。康熙回到北京后，立即在西山的玉泉山下实验，“果然早熟且丰收”。他还注意到：江浙一带稻田大多使用池塘水灌溉，池水不寒，所以不用这个办法。

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研究深耕、除草、合理密植、治旱、治涝、治蝗等等心得。他认为，冬天利用农闲时节，深翻土地，可以把虫卵冻死，是治蝗最好的办法。虫子繁殖时收拾易，长成后收拾难；小时候收拾易，长大后收拾难；在地上跳时收拾易，能飞以后收拾难。到今天，这都是符合治蝗规律的真知灼见。

由此，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位皇帝受到人们尊敬的部分理由。有学者譬如孟森先生曾经感叹说：假如康熙皇帝能够在他所学到的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园艺中，升华出一般规律，然后，以他的巨大权力和威望，在全国大力鼓吹与提倡的话，说不定中国就会与同

时代的欧洲一道步入科学昌明的时代了。

可惜，假设对历史没有意义。

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

当时，以及直到后来很久很久，中国的读书人仍然认为，科学技术是旁门左道，是奇技淫巧，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有一位学生，向孔老夫子请教农业技术问题，他老人家很没有好气。这位学生离开后，孔丘很恶毒地咒骂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这位颇有点儿势利眼的圣人心目中，只有做官才是正道，是君子之道。遂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不懂科学的苦恼与耻辱，直到今天，还在苦苦追赶与挣扎。

据康熙说，他学习天文历算、数学、几何，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无法在臣子们打架时判断孰是孰非，因此，发愤苦读。如此想来，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钻研大约也有这种动机，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杀人放火的粗野夷虏，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到后来，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与立国之本。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尚未平息，他就写道：“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表明他特别清楚地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与他帝王统治的治统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苦心研读四书五经之类，就此超出了自身的欲望，成为他现实政治的需要。“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先世大儒之口，说得真好。他要让那些汉族士大夫知道，除了皇家的姓氏之外，天没有变，道也没有变，一切都不会变。这应该是他学习那些儒家经典的最深层动机。



康熙初年，曾经一度废除了八股经义取士，改为策论，要求应考的学子们针对社会问题，在命题范围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唐宋时期实行多年的科举考试方式。康熙亲政后，将这种有助于活跃思

想的方式再次废除，又改回到了那种僵死的经义和八股之中。由此，我们就会知道此人的大体思路——一切以维护皇家的权威为基本前提，任何可能的背离都在不能允许之列。并且，也就能够明白，在他手里是不可能实现什么科学昌明了。

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同样在康熙皇帝身上，为什么会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面。

从各种史料中判断，康熙的文化素养还不错。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福临有一股狠劲儿，在刻苦钻研那些古代典籍时，曾经累得吐过血。玄烨和他的父亲一样，据说也曾经在废寝忘食的学习中“咳中带血”。有资料说，为了练习书法，他临摹的大家手卷有万种以上，手书寺庙匾榜多达千余。高士奇等当时和后世的书法家称赞康熙的书法“深得古人之意”，应该不仅仅是在拍马屁。还有一种说法，对康熙就大为不利了，说是在宫中档案里，发现了一些康熙写的亲笔信，字迹拙劣得就像低年级小学生，由此认为他那些冠冕堂皇的书法作品可能都是别人代写的。若果真如此，大清朝皇家作假的本事可就太大了。在有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存疑。

至于康熙写的那些诗文辞赋就真的不好说了，基本看不出什么古意来，像大红大绿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紫禁城，满眼俗不可耐的暴发户气息，很少能够读出才华灵气，能让人记住的东西不多。可能是害怕别人说他没文化，所以康熙拼命堆砌华丽辞藻和古僻典故，使很大劲头抡高档形容词，声嘶力竭地加重语气。结果，因为太使劲儿，反倒露了馅，透出一股子小家子气。就像今天读书没读通的文化人，写出文章来，通篇没人能看懂的生造词汇，仿佛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吃什么拉什么。不过，和他号称“十全老人”的孙子弘历——乾隆皇帝比起来，他又强出了许多，他毕竟还说过不少人话。那位据说一辈子写过五万首诗词的乾隆皇帝，才真正是制造文字垃圾的高手，在他那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御制诗文中，几乎没有一句是让人能够记住的人话。除了炫耀权势富贵、显示滥情纨绔之外，至少在诗文方面，这位智商极高的乾隆皇帝，大体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为老不



尊的老花花公子。若非如此，他也没有本事把父、祖几代人留下的大好基业，糟蹋成鸦片战争之前的那副凄惨模样。

康熙做的另外一件事儿，倒是颇有古意。他大约很想将宋仁宗君臣在后苑赏花钓鱼的佳话再现于当世。于是，在三藩之乱平息后的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把侍从文臣和部院重臣们召集到瀛台，让他们使用事先备下的小舟、渔具，在皇家花园的亭下桥边任意游玩捕钓，并可以将钓到的鱼带回家去，与家人共享。他可能举办过很多类似的活动，可惜，也许是刻意的成分太重，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美谈。

另外一个时代的因素，肯定也在起作用：宋仁宗一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制度到皇帝本人的秉性，仁慈宽厚是真的，由此，才会在四十年间出现那么多鼎鼎大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大清朝在血肉横飞的凶残之基上立国，康熙皇帝本质上十分专横。他的所谓仁慈宽厚，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为政治目的做作出来的。他太想博得这样的名声了，与汉文帝、宋仁宗大体是两回事。于是，六十年间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仅有的一个纳兰性德还夭折了。由此可知，玫瑰花的美是自然而然的，若是这朵花每天嚷嚷着让人们来欣赏自己美貌的话，大概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愿意挨近它。

与此相关，大清朝的臣子已经蜕变成了奴才——禽兽补子马蹄袖，脑袋后面拖着根难看无比的猪尾巴，官帽上插着根孔雀毛，全身都是皇家犬马、家养宠物的装扮，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官员们形容成是彻头彻尾的衣冠禽兽。他们只能秉承主子的旨意行事，全无自己的思想灵性。因此，除了曹雪芹之外，整个大清朝三百年没有产生一位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叫得响的一流历史文化人物，原因端在于此。而曹雪芹之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大约也是拜没有跻身官场之赐。



有一种说法，认为康熙皇帝出于仁慈宽厚、出于对汉族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大力推行孔孟之道并礼遇士大夫。这种说辞固然会为康熙所欣然接受，但很有可能不是事实。在现实中活不出个人样的中国文人，喜欢沉浸在白日梦里意淫。有众多证据表明，康熙皇帝鄙视满洲人与汉族士大夫诗文唱和的情趣



追求，特别讨厌他们学习汉族文化，坚持骑射武功为满族之根本国策。

他多次训谕自己的儿子们，“我们这些上等人，要时时训诫，防止沾染汉族习俗。历史上，金、元时代，渐渐汉化，竟变得像汉人一样，我对此深深警鉴，并屡屡告诫你们，这实在是我朝最首要的事务。对此，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庭训格言》第95、52页）对满族大臣，他说得十分坦率：“为国家长治久安考虑，满洲人决不可学汉人”，“文臣中许多人希望我学习汉族习俗。汉族文化有什么难学的？一入汉俗，便大违祖宗明训，我誓死都不会去做”，“我身边的这些儿子，若有人沾染汉族习俗的话，我决不会饶过他，有祖宗成法在，就是想姑息也难”。（《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

在这种心态之下，他的确只会推行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一家一族的利益，而不会为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虑，去提倡什么科学。

对于汉族士大夫，他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能也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有多少宽容仁慈的成分，实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康熙十八年，他曾经痛骂汉族官员：“大小汉官凡事推诿，满族官员做的好事，他们都要归功于自己，事情搞砸了，就推给别人。满汉官员在一起谈论事情，往往不能和衷共济。汉官总说满官偏执，若汉官真能出以公心，满官岂有不从之理。”（王先谦《东华录》卷二十四，康熙十八年八月）

最能表达他真实体会的，应该是康熙五十五年八月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发生在康熙与他的子孙之间，因此特别坦率。当时，康熙已经六十三岁，他告诫自己的子孙：“汉人人心不齐，不像我们满人、蒙古人那样数千万人一心一意。我治理这个国家多年，深知汉人之所以难治，都是因为他们不能齐心的缘故。国家太平的日子久了，你们一定要居安思危。”（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五十五年八月）

皇太极时代，文臣在内廷办公的地方称为“书房”。康熙皇

帝亲政后读书的地方，叫“南书房”，位置在乾清门内西侧的朝房里。康熙皇帝先后选拔了一大批文臣入值南书房。表面上，这里只是皇帝读书写字、讨论经史的地方，实际上，有着很深的政治考虑。

当时，诸王贝勒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废止，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在许多国家事务的决策上，对皇帝仍然具有钳制作用，这可能使康熙皇帝很不爽。于是，当这些文臣入值南书房之后，便成了他事实上的机要秘书班底。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通过皇帝直接下发诏旨的方式，避开了王公大臣议政制度的牵制，使皇帝逐渐向独操权柄方向靠近。而那些心有灵犀的文臣，也兢兢业业地帮助皇帝暗度陈仓。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陆续被皇帝提拔为部院甚至内阁重臣，致使入值南书房，成为当时汉族士大夫最高的政治追求与梦想。

最后，南书房终于过渡为雍正朝及其后来的军机处，并最终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在事实上被废止。就此，大清朝终于蜕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极权专制政体。这些，都是在康熙皇帝仁慈宽厚的政治秀中，逐步实现的。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在康熙皇帝指导下，发生了恶名昭著的大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代就以才识过人而闻名乡里。康熙亲政后，戴名世只是个秀才，曾经被破格任命为知县，他没有接受，自己卖文为生。他为人坦诚，说话直率，一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有点儿怕他那张嘴，也就自然有些恨他。康熙四十八年，已经五十七岁的戴名世参加会试，结果一举考中第一名，并在殿试中仅次于状元，成为当年的探花郎。于是，进入翰林院，授职编修。



戴名世进入官场之后，不改书生本色，仍然不大会看人脸色，实话实说，出语惊人。当时，老先生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一辈子就这样过来的，实在是要改也难。结果，他成了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的另类。偏偏此人名气太大，寻常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于是，大家便“力挤之”，希望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事挤出朝廷，让他回家玩儿

去。

这些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戴名世政治上反动的证据——

三十年前，戴名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记录几个南明政权垮台的历史。既然是写这一段历史，他自然就使用了那些政权的年号。结果，被这些小人翻腾出来，指控他妄图否定大清朝的正统地位。这戴名世生在清朝，长在清朝，考的是清朝的官职，他的文章里，只是意图写出那些南明政权，是如何由于“乱贼误国”而导致垮台的史实，希望以此警示后人，的确看不出反清复明的意思。他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生在盛世，居然要为三十年前的一篇文章获罪。他更加没有想到，仁慈宽厚的康熙皇帝竟然会为没影的事儿而雷霆震怒，把他视为禽兽不如的乱臣贼子，下令要彻查严办。

就这样，先后有一百多人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来。刑部官员经过几个月的严刑追逼，确定这是一桩相互勾结的大逆不道罪案，属于十恶不赦范围内之大罪。于是，拟定了许多人分别凌迟处死、斩首示众、发配为奴的处理意见。

到康熙五十二年，经过一年多的反反复复，终于最后定案：戴名世从宽处理——斩首，已经死去的一位学者开棺戮尸，其他一百多人抄家的抄家，流放的流放，为奴的为奴，最轻的三十二位官员，也都受到了降级撤职等处分。由此，为雍正和乾隆两朝愈演愈烈的、文化上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就在戴名世一案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江南乡试——高考作弊案又闹得沸沸扬扬，读书人从大闹学宫开始，一直闹到两名最高地方官员互相弹劾。这是当时最有名的两位封疆大吏，他们之间的纠葛，涉及当时最敏感的问题，到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程度。一时间，全国为之震撼，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康熙皇帝，希望知道皇帝会怎样处理如此棘手的难题。



事情是从一桩考试作弊案开始的。

当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放榜后，引起一片哗然。原因是，

中榜者大多是盐商或官宦子弟。苏州考生近千人，只录取了十三名，除一人之外，其他入选者都十分可疑。随后，有消息说，其中至少有五人是给考官送了钱的。当时，主考官是都察院副都御史左必蕃，副主考是翰林院编修赵晋。考生们写了一副对联，曰：“左丘明有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国家考试场所的大门上，有人将“贡院”两个字增减笔画，改写成了“卖完”二字；扬州考生将左必蕃的祠堂拆毁，以发泄愤怒。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发展到了顶点：上千名考生抬着财神像浩浩荡荡来到教育管理机构，将财神爷像和孔圣人像放到了一起。

康熙皇帝在收到的报告上批下了五个字：“可羞之极矣！”遂派出钦差大臣前去查办，并命令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会同查办。

谁知，案子刚刚开始查，就演变成一督一抚两位封疆大吏之间的殊死战。原因是，案子牵涉了两江总督噶礼。

当时，通过复试，查出确实有被录取者作弊，作弊者不但文理不通，就连卷子都是枪手代考的。审讯中，作弊者供认了行贿作弊的过程。结果，发现有三百两行贿的黄金下落不明。继续深究时，一个叫李奇的家伙当堂招供说，那三百两黄金是行贿给了两江总督噶礼，会同办案的主审官一下子成了犯罪嫌疑人。当着钦差大臣的面，噶礼怒不可遏，下令将李奇乱棍打死。就在衙役们抄起大棍时，江苏巡抚张伯行坚决制止，会审公堂一时几乎变成全武行。随后，在那李奇家里搜查出银两。李奇大叫“陷害”，坚决予以否认。至此，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复杂万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往下查了。



几天后，噶礼和张伯行的奏疏分别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张伯行弹劾噶礼，在此一案中收受贿赂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千万元人民币。张伯行说那噶礼“卖官、卖法兼卖举人”，可谓罪恶累累。噶礼则弹劾张伯行“猜忌糊涂”，眼下正在查办的戴名世《南山集》在苏州就印了三千册，张伯行并不查办等等。弄得康熙皇帝也不识就里，只好下令将二人一起停职，以便钦差大臣放手查案。



结果，没有几天，从江南织造曹寅那儿，送来了秘密报告，说是被牵连进案子里的两个县官，一个翻供，一个上吊自杀，江南人民纷纷传说是杀人灭口。那两位钦差可能是害怕案子拖久了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便草草结案，建议皇帝将涉案人员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流放的流放，该抄家的抄家。对于噶礼和张伯行则是这样判定：二人互参，查无实据，是属虚妄。张伯行无端弹劾总督，导致二人互参，所以，噶礼降一级使用，张伯行革职流放。

这个报告还没送到皇帝手上，江南地区已然是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两个钦差大臣根本就是一对浑账，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曹寅在给皇帝的秘密报告里告诉康熙：此次，钦差大臣在江南地区的名声受到极大损害，人人都认为这个判决是糊涂徇私的结果。眼下，已经有大批士子、百姓聚集在江苏巡抚衙门，为张伯行申冤请愿。

康熙皇帝随即发布指示，斥责钦差大臣草率，认为必须将一督一抚的互相弹劾一案彻底查清。朝中重臣们开会商量后，建议皇帝仍然让二人继续审查。皇帝认为不可，此二人已经不堪信任，另派两名重臣前去审理。

这两位重臣在盛夏时节，来到江南，于挥汗如雨的酷暑之中，走马灯一般审理案情，煞有介事。大家一看，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儿，应该是有一个公正了。谁知，判决一出来，竟然比前一个判决惹出的众怒还要大。原因是，这次判决中，对考场舞弊一案的涉案者一律从严从重处理，然后判处噶礼与此案无关，张伯行诬陷帝国重臣，应该撤职查办。

此时，皇帝两派钦差，历时一年，查办的结果，除了噶礼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没有天理，甚至认为，根本就是康熙皇帝在袒护贪官。

曹寅又一次紧急呈递秘密报告，称：江南地区民心不服。第一次判决时，张伯行从扬州返回苏州，数万扬州民众担心张伯行被人谋害，沿江列队保护，苏州人民则扶老携幼携带瓜果饭食沿途奉献兼



作保护，场面极其壮观感人；如今这第二次判决下来，张伯行回苏州候旨之际，整个苏州家家焚香遮道，为张伯行祈福，从枫桥到葑门，张伯行经过之沿路二十余华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可行。谁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人们认为不是皇帝袒护贪官，就是贪官勾结蒙骗了皇帝，否则，不会有这么离奇的判决。

其实，百姓们的判断很有道理，事情还真的和皇帝有关。两拨钦差大臣捣糨糊、弄出一本浑账，原因特别简单——皇帝态度暧昧，他们摸不清楚皇帝的底牌，只好委屈张伯行，做出有利于噶礼的判决。原因同样特别简单：噶礼是满洲勋贵的后代，皇帝对他比对张伯行要亲近信任得多。

这噶礼不是一般人，他的曾祖父是努尔哈赤时代赫赫有名的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噶礼本人也极受皇帝赏识，因为在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正当前线军粮不足，即将影响军心士气时，噶礼及时将粮草送到了前线，从而保证了战事的顺利进行。此事，给皇帝留下至深之印象，认为他勤敏能干、忠诚可靠，很快就将他提拔为山西巡抚。从此，这家伙贪赃枉法，纵容部下盘剥百姓，把山西人民坑得不轻。《清史稿》说他："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就是说，这厮主政山西几年，山西老百姓被他搜刮得痛苦不堪。

康熙四十二年，皇帝西巡太原、西安。噶礼驱赶着山西百姓一直迎接到了河北省的望都县，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约合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为皇帝修建行宫。迎接到康熙以后，他进献了四位美女给皇帝。康熙揶揄噶礼说："怎么着，想给我使美人计是不是？把我当什么人了？"（李光地《榕树续语录》卷十八，第828页）康熙虽然没有收下这些美女，有证据证明，从此以后，皇帝对噶礼是更加信任了。此后，凡是弹劾噶礼的监察官员，不是报告送到皇帝手中便没有了下文，就是不让继续追查，甚至还曾经将几位弹劾噶礼的官员撤了职。随后，大约是觉得山西太穷，不方便噶礼施展的缘故，在屡屡被弹劾"贪酷无比"之后，康熙皇帝将他升迁为两江总督，调到了天下最富庶的膏腴之地——江南，让他来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的

鱼米之乡大展拳脚。

张伯行则是康熙一朝最负盛名的清官之一，其名声之大，差不多可以和汤斌、于成龙比肩。他比噶礼晚半年被派任巡抚江苏，在此之前，他是福建巡抚。其离开福建时，曾经发生了数万福建百姓拦住马路，哭着挽留他的景象。

来到江苏之后，张伯行很快就意识到，和这位噶礼在一个省里共事实在不好玩，于是，上疏皇帝，以年老体衰的名义，请求退休，求皇帝放归田里。皇帝批示说："我知道你操守清洁，江苏重地，不得以衰病辞。"把他的请求驳回。就在张伯行进退两难时，发生了这场考场大案，把他身不由己地卷了进来。

十月五日，钦差大臣的判决结果送到朝中复议。帝国重臣复议的结论是：张伯行撤职，噶礼免议。报告呈递皇帝后，皇帝终于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他先是把噶礼和张伯行各打五十大板，认为此二人互参是出于私心，实在可耻。随后，话锋一转，他认为钦差大臣担心噶礼权势显赫，所以不敢较真，害怕给自己招祸，也很可耻。再往后，皇帝明确指出：张伯行的操守天下第一，断不可参；这个判决，是非颠倒，同样可耻。皇帝下令，重新审议再报。

这回，帝国重臣们终于知道皇帝的底牌了。第二天，重臣会议后对皇帝说：皇上的评议极为精辟，天下臣民无不心悦诚服。但如何处理，重臣们还是没有定论。皇帝很英明地指示说："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共知，噶礼的操守，我没法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在江苏，噶礼有本事把江南的一半装进自己口袋。我自幼饱读诗书，要是这样的清官都不能保全，那么数十年读书有什么用！你们这些重臣明明知道张伯行是清官，为什么一言不发！如今，我说出来，你们才表示赞成，晚啦！"



十月十二日，全体朝官一致决议：将二人同时撤职，张伯行是否革职留任，请皇帝定夺。皇帝下令：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就这样，号称操守天下第一的张伯行，好好地做着官儿，却

无端地被贪官牵累，受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成了此案中的输家之一。

噶礼明明天下贪渎第一，却仅仅是被革职。而且，还不再追究其罪行。这简直是贪官污吏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好出路了，从此，他算是安全着陆，再也不必提心吊胆，他可以用他那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幸福地享受生活了。于是，噶礼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之一。

而最大的赢家则毋庸置疑是康熙皇帝。

史书记载说，皇帝的圣旨下达到江南时，江苏百姓欢声如雷，人们纷纷书写条幅贴在大门上，上面大字书写道：“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在宣读圣旨时，曾经出现了数万人拜谢皇恩，齐声欢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壮观场面。半个月之内，有数万苏州百姓手持香火，集体跪在畅春园外，愿意每人各自减寿一年，献给皇帝，愿吾皇长命万年。

据说，福建百姓也出现了万众欢呼万岁的场面。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无法得知皇帝的反应如何。无法知道，面对此情此景，他心中是不是会泛起一丝不安？或者，他可能会一笑，说：这帮人，真是天下最好的百姓！他们真够可以的。

这里面，最叫人牵挂的，其实是噶礼的命运。《康熙起居注》记载说：这厮回到家里，享受了一年半的幸福生活。忽一日，他的老母亲竟然来到皇宫门前叩阙告御状，说自己养了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原来这厮派人在老太太的饭菜里下毒，要毒死他妈。悲愤的老人家还揭发了儿子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劣行。刑部报告皇帝：依大清律，噶礼需抄家后凌迟处死。康熙大怒，以至于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曰：“噶礼断不可留。当官就不是个好东西，又不孝，还有这么多劣迹。问问九卿，九卿虽然被问，谁敢说这家伙该杀？能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该撤职的人。满洲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凡满洲应共杀之！”（《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随后，皇帝命令宽大处理，将凌迟处死改为赐令自尽。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康熙五十年前后，是个真正的多事之秋。两废两立太子发生在此期间，给康熙朝带来恶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在此期间。江南考场案和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发生在此期间。在处理这些无穷无尽烦恼的同时，康熙皇帝受到后世无穷赞美的著名仁政——“永不加赋”也发生在此期间。

所谓“永不加赋”，并不是指永远不增加赋税，而是说，从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再征收人头税。原话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引发了雍正皇帝一项意义极为深远的赋税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巨大深远影响，至今还在发生极为重大的作用。目前，尚看不清后面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康熙皇帝有多少妃嫔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话题，有名号的大约是六十七位。这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为皇帝生出了五十五位子女。其中，有三十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就目前所知，在中国的高产皇帝中，宋徽宗赵佶以六十五个拔得头筹，唐明皇李隆基以五十九个位居第二，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只能屈居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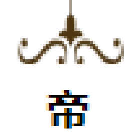
《清朝外史》第二篇关于康熙朝的记载中谈道：康熙的大学士张英备受皇帝宠信，他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雍正与乾隆朝大名鼎鼎的张廷玉。张廷玉的弟弟也是朝廷重臣，据说，其夫人乃国色天香。一次，太后过生日，贵戚命妇进皇宫朝贺，他的妻子，出宫后虽然服饰依旧，却面目全非，被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康熙大帝对这位美丽女子一见钟情，他自己留下享用了。据说，汉族命妇不允许进宫朝贺，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可能是为了维持皇家的尊严，保护皇帝的体面。于是，也就有了“脏唐，臭汉，鼻涕宋，邋遢清”一说。

在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往山坡上抛洒金银钱儿，为的是看那些脚踩花盘底高跟鞋的妃嫔宫娥前仰后合地争抢，以此作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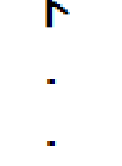
曹雪芹的祖先曹寅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表明，到康熙皇帝晚年时，他还在江南搜罗美女以充实后宫。皇帝的大儿子四十多岁时，皇帝的小儿子们还在陆续出生。

曹雪芹说得没有错，盛世当中，除了门前那一对石狮子，干

净的东西真不是特别多。







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时，大约晚八点前后，康熙皇帝玄烨病死在畅春园。当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从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遗诏颁布天下，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猝死于圆明园，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时间不长，却是整个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直到今天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间，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情——从他继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争论和见解，作好作歹，说什么的都有。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权威到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于他要写出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全方位地为自己、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遂成为雍正年间最为奇异的景观。

事情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

岳钟琪是继年羹尧之后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岁。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岁时受封三等公，官居



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路大军。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除了年羹尧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我国官场的常态，于是，围绕着岳钟琪便出现了许多传言。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具有巨大杀伤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五百年前，岳飞对抗大金，壮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岳钟琪要继承先祖岳飞“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的遗志，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去。这些传言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疏皇帝，认为岳钟琪“不可深信”。据皇帝说，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个疯子，在成都的繁华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说：岳公爷将带川陕大军造反，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将同时发难，见人就杀等等。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钟琪劝雍正皇帝修德，惹恼了皇帝，皇帝要召他进京，削夺他的兵权，就像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最后冤死在风波亭一样。而岳钟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忠义爱民，坚不奉诏云云，传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使岳钟琪心惊肉跳、苦不堪言，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这位秀才，就是曾静。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衣冠江山。永兴县蒲潭村，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道路崎岖难行，是个人迹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岳钟琪大将军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能够穿透皇家凌迟灭族的天罗地网，跨越千山万水达于此地，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究的万丈雄心，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且自古以来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效力惊人。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仅仅依靠凌迟处死、抄家灭族还远远不够，

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钟琪看到那封投书，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一谋父，认为雍正为夺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原因是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祯；三弑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于雍正二年，是被害无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杀死的；五贪财，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九怀疑诛忠，指的是雍正杀死年羹尧、隆科多；十好谀任佞——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在曾静的笔下，雍正无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和坏蛋，因此，导致“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静谴责岳钟琪背弃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声大损。臣子选择君主，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忠告大将军：现在，唯有顺应天下大势，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熙。为了把自己择干净，他特地请一位满族高级官员在审讯室边上的暗室里旁听。

不料，那张熙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恐吓打骂，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经过三次审讯，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最后，岳钟琪告诉他：前任的大将军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自己这才放下心来，可以相信他了。

据说，岳钟琪流着泪告诉张熙，他老师的信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自己决定甘冒风险，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然后，在张熙的坚持下，岳钟琪对天盟誓，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永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就这样，张熙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岳钟琪。

就此，曾静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



置下，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一网打尽。随着被牵连进来人数的增多，侦察范围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最后，查来查去，竟然发现，那些关于皇家龌龊事儿的信息来源，居然来自北京，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充军。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讲一路。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他们就大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岂能封住我们的嘴？"（《大义觉迷录》卷三）于是，皇帝如何改诏篡位，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便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第4页）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他一条一条地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被皇帝改造好后写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要将该省、府、州、县的教育长官从重治罪。（《大义觉迷录》卷一）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师生二人免罪释放。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静已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他在《归仁说》里谈道，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尧舜再生，实在是个好皇帝，至孝纯仁，

受位于康熙，一举兼顾传子与传贤两个伟大传统。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是当今圣贤无疑。（《大义觉迷录》附录《归仁说》）

于是，皇帝决定让这位曾静到南京、苏州、杭州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让他的学生张熙到陕西去宣讲，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随时听候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则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二十八，第24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名叫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援引圣贤的教导，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时，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为了避免受到纠缠，他索性削发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静对这位吕留良特别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往吕留良的故乡，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这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一番还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论起干点什么，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令张熙失望之余，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吕留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有家族、亲人、后人、学生、学生的学生、朋友、刻印过他的书的人、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还有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供奉着吕留良的牌位等等。于是，已经死的人，要掘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活着的人，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后处死、抄家为奴、流配千里、削职罢官等处分，人数众多，不一而足。

就这样，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带出了一个吕留良大文字狱案，又由此扯出无数小文字狱。纳兰性德的老师、备受康熙恩宠的徐乾学早已作古，他的儿子名叫徐骏，是个骄狂暴劣的高干子弟，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害死了责罚他的私塾学究。此人作诗一首，诗中有个对偶句，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我国文人对着那清风明月已经伤感惆怅了数千年，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给这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举报者认为，徐骏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同意这一判断，按照大不敬罪，将他斩首。（《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条）

这就难怪了，后来，有人写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倒还真把那陈词滥调写出了一点新意和情趣。谁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一联不错的佳句，看来看去，愣是从中看出来：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将那倒霉的诗人杀死。

沈在宽是吕留良学生的学生，曾经作诗曰："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深州理旧疆。"他还抄录了一位叫黄补庵的文人写过的两句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宽被皇帝下

令立即处死，黄补庵已死，家人妻子发配至功臣家中为奴，父母祖孙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对于沈在宽教的学生们，皇帝念伊们尚且年幼，姑且饶过。（《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条）

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诠的人，自称是读书人，也捐了一个秀才功名。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特别能忽悠的混混。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做“托儿”为生，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忽然认定那个张熙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着。几天后，他的事迹又升格为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脱出法网。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此人自我感觉极佳。忽一日，官府前来拿人，他不退反进，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过曾静，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等等。经过反复侦询，最后，官府认定这厮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给他戴上一面大号枷锁，交给他的父亲管束，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第240—241页）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神。另外一种情形则更加令人欲说还休——

还是在浙江，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出身名门。他素来崇敬吕留良，听到《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认为自己有话要说，偏偏皇帝也下诏让大家直言无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静，认为像曾静犯了弥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为何不能施恩于吕留良等受牵连的人呢，他觉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陕总督投书。因此，如果皇上允许，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吕留良遗属中的年轻一代担保，保证教育他们绝不反清，誓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谁都不敢替他把这篇奏折送呈皇帝。于是，这位读书人千里迢迢地自费来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员也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告诉他说，他的折子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



官负责呈递。倒霉的齐周华只好返回杭州，来找浙江学政——省教委主任，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扣下，关了起来，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抓回北京，凌迟处死。消息传进监狱，齐周华大喜，在日记中写道：“实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吕留良的子孙还没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书中介绍，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监狱的齐周华号称看破红尘，赴武当山修道。三十多年后，他竟然又思念红尘，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齐周华去叔叔家探亲，有人恶作剧，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僧道不许滥入齐府”。齐周华以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并告发叔叔暗中与吕留良一案有牵连。报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齐周华的叔叔，相反，这齐周华揭发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讨厌。于是，只是把齐周华的叔叔革职，却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孙充军黑龙江。那曾静于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会大呼：“实在太痛快了。”

就这样，由曾静投书案，牵连出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后，还在余音袅袅。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下面这件事情才称得上是世纪疑案，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武侠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直令今日之历史学家还在大费笔墨——



据说，在吕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动中，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名叫吕四娘，侥幸漏网。从此，她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学会一身绝顶武功。有民间传说认为，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师傅，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吕四娘学成后，化名混进宫中，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四娘遂趁机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是关于雍正猝死之谜中的说法之一。根据这种说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会予以

证明，如今，姑妄听之。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觉迷录》统统收回销毁。当时的命令很严厉，凡有胆敢私藏者，将是灭族的大罪。这样一来，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突然变得无比宝贵。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把它偷偷收藏起来。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带到了吕宋、日本等地，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并确实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后，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揶揄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史景迁继续谈道：“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浓厚的行为艺术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创作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迹，让那些本来满怀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在莞尔中，有机会说出如此机智的评论来。



就这样，围绕着一位仅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几乎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表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则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差距可以远到十万八千里。在我国历史上，似乎还



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像雍正一样，成为这么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这位皇帝确是不同凡响。

除了篡改遗诏、毒死父亲、逼死母亲之外，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修理他那些亲兄弟的故事、雍正杀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这些故事统统变得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使他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多么力图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样一点，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有一个普遍而又醒目的规律：政治地位与人性、人类情感呈反向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与人类的情感就越为缺失淡漠。所以，苏东坡才会感叹：高处不胜寒。原因在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崇尚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既然如此，阴谋与狡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类情感——这种东西只会坏事，在那里，只要有了利害的计算与利益的争夺就足够了。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间的感情就更加不谈也罢了，那里根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权力与利益的角斗场。胜利者标志着随心所欲，失败者意味着万事皆休。这就是我们拿着放大镜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间骨肉亲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还是不太多见。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三人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禔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后来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认为他的死与

雍正有关。

诚亲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阴狠残忍。

从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修的。为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为此，雍正的心里可能特别不舒服。胤祉对废太子很好，并在老大胤禔魇胜太子时予以揭发，保护了太子，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这两位助手，一位叫陈梦雷，一位叫杨文言。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杨文言精通天文历算与数学，达到的程度，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两个不是东西的人：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李光地，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陈梦雷与李光地是福建同乡，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进士，考中后，一同选入翰林。帝国官场最看重的人脉关系——同乡同年同事他们都具备，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乱。耿精忠胁迫陈梦雷参与叛乱并招徕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时，陈梦雷的密友杨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军之中，李光地从老家来到福州时，对于是否响应耿精忠有些犹豫。陈梦雷、杨文言二人力劝他脱身回京，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精忠的计划，让李光地想办法带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欣赏，并被迅速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却坏了良心，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并在耿精忠事败后，不为陈梦雷、杨文言二人辨冤，导致二人身陷牢狱。为此，陈梦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使李光地虽在皇帝那儿宠信不衰，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和杨文言的才华，将他们重新起

用，派给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帮助他编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为了打击胤祉，把以前的老账翻腾出来，再次罗织罪名诬陷陈梦雷和杨文言，导致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屈。随后，雍正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将他削夺爵位，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为嫉恨的一个兄弟，他被削夺了爵位后，由四哥雍正皇帝为他改名为“阿其那”。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代表着什么意思。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他死时，状极痛苦，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祯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祯”字发“征”音，与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胤禛。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御驾亲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继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胤祯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胤祯富有才干，威信也很高，雍正继位后，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抱不平有

关。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一直将他幽禁在那儿，留下了他一条性命。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意是说，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不得不如此云云。近年来，为雍正唱的赞歌响彻云霄，对上述事迹也做了符合雍正愿望的解读。因此，在人性与人格上将这些歌唱者与雍正归入一类，想来应该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三字经》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之外，说起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约就要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死最为富有戏剧性了。

《清史稿》中，评价年羹尧时说：此人“才气凌厉”。从其一生行事判断，这位抚远大将军的确够得上是文武双全、才气纵横。年羹尧出身帝国高级官宦之家，他可能有许多种方式为官为宦，如恩荫、荐举等，但此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参加科举考试，硬是一举高中进士高第，从此顺风顺水地走上仕途。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老四——后来的雍正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的。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该人似乎从来没有能够身登大宝的迹象。以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甚至沮丧地建议未登基前的雍正，想办法把自己安排到台湾去做地方长官，以便形势不好时，可以把主子四阿哥胤禛接到那里去避难。



在官场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羹尧怎么会投靠这位四阿哥，看准了他来烧冷灶，是一个很难找到确证的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就是因为年羹尧投靠了四阿哥，才在这位皇子的保举下，一路青云直上的。这种说法，有它的可疑之处。

显然，年羹尧不是那种只会拍马屁、靠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才能混迹江湖的宵小之辈。此人一生颇多风浪，没有真本事，是很难在那么多风浪中屡屡过关斩将，从而功勋卓著的。《清史稿》记载说，康熙年间，年羹尧在四川为官时，处理突发或紧急状态时的举措很受康熙皇帝的欣赏，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更加不同凡响的是，因为年羹尧“治事明敏”，康熙皇帝鉴于巡抚没有督兵权，特别因人设职，专门为年羹尧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让他担任总督，兼管巡抚事宜。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皇帝，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儿子的影响做出这种安排，除非在一种可能性之下：他存心要为这个儿子培植势力才会这样做，但是，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后，年羹尧在川陕总督的岗位上，可能为雍正顺利继位做出了绝大贡献。原因是，当时皇十四子胤祯是大将军王，正在青海用兵，而年羹尧的位置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使他在有形和无形的形格势禁之下，几乎没有可能对雍正形成什么威胁。

事后，年羹尧受雍正重用，取代皇十四弟胤祯出任大将军，西北用兵之军政大权尽入其掌控。在那一段岁月里，年羹尧的军政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他收发随心，每战必胜，称得上用兵如神，终于大获全胜。以至于雍正皇帝兴奋得简直有点语无伦次，他情不自禁地把年羹尧称为自己的恩人，要求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性格强悍之能臣猛将的命运一样，年羹尧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业巅峰上待的时间实在太过短促。他遭遇到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政治数千年——他没有可能一边率领千军万马出入于血肉横飞的战阵，一边还能徇徇如也，保持着满口仁义道德

的谦谦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回到北京觐见皇帝，受到隆重而崇高的表彰。可能就在同时，雍正皇帝已经下定了收拾他的决心。十一月，在回任的路上，年羹尧收到皇帝发来的一份谕旨，话里有话地警告他：“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三个月以后，雍正三年二月，天空上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之天象，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征兆。对于年羹尧来说，却成了真正的恶兆。他和众臣一样，给皇帝上贺表。结果，把赞美皇帝励精图治的“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认为，这是有意不敬。他说：既然你不想把朝乾夕惕许给我，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许给你，我还没一定呢。

四月，皇帝下令免去年羹尧总督一职，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九月，命令将年羹尧押解进京。十二月，众臣认为年羹尧犯有九十二款大罪，请求将他立即处死，以正国法。雍正皇帝不忍处死，恩赐年羹尧自尽。就此，年羹尧家破人亡。（《清史稿》列传八十二，年羹尧）

年羹尧是皇亲国戚。他的妹妹嫁给了皇四子胤禛，胤禛成为雍正皇帝后，年羹尧的妹妹被晋为贵妃，在后宫中地位崇高，使年羹尧成了雍正皇帝名副其实的大舅哥。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皇帝收拾自己这位大舅哥，也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时，雍正皇帝更加手下留情。



雍正为什么一定要置年羹尧于死地？当时的群臣和后世，包括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为皇帝找到了很多理由。从众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乃至传奇看，普通老百姓似乎并不认同这些罪名。和那些官员与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好像更懂得中国政治传统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道理。于是，对于年羹尧之死便呈现了众说纷纭，言人人殊，五彩缤纷的景象。

不管怎么样，年羹尧被赐死了，留下了许多传说，许多无奈。



隆科多的死，和年羹尧有某些类似的性质。

隆科多是佟国维的儿子。从亲族关系上，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又是他的内弟。因为隆科多的姐姐是康熙皇帝的孝懿仁皇后。雍正皇帝幼小时，曾经由孝懿仁皇后抚养，因此，雍正皇帝称呼隆科多为舅舅。康熙皇帝晚年，隆科多担任步军统领一职时间长达十一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全部由他负责。康熙皇帝经常将一些极为机密的事项交给隆科多办，表明对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临死时，只有隆科多在场。他一个人代表大行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因此，许多人认为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扶持雍正登上帝位。雍正继位后，隆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与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隆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到雍正三年初，他的步军统领一职被解除。当年，在收拾年羹尧时，雍正顺便把隆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皇帝警告他：“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你们要老实点儿，不要自己找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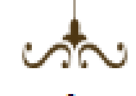
两年后，雍正五年，隆科多被捕，群臣审议出四十一款大罪，其中的一些罪名，比加给年羹尧的还要可笑，但只要皇帝认可，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最后，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下令在畅春园边上盖了三间小房，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第二年，隆科多在禁锢中死去，死因不明。

其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他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离皇帝太近。有一句西方谚语说：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就是最该死的人。事实上，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孟森教授在谈到雍正皇帝时认为，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都很没有教养；唯独雍正皇帝，在治国上，“天资独高”。他“好名图治，于国有功”，上天保佑大清，使大业偏偏落到他的手里。孟教授认为，雍正皇帝不失为像唐太宗一样“逆取顺守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68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

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之一，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同时，由于上面所述和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在清朝的皇帝中，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定火耗，加养廉”，通俗地讲就是过去官员们鱼肉百姓是巧立名目暗中进行的，就如今天的各种回扣、附加费之类；现在要把这些名目化暗为明，变成官员们的养廉银子，将各种不合法的附加费合法化，使得官员们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不舒服的是：这些回扣、附加费化暗为明之前，若狠狠心再加上手段辣，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如今却没有了名目，只能拿那有限的养廉银子，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于是，他们嘴里也很难有什么好听的话了。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雍正朝无清官”一说。意思是说：康熙爷在时，虽然有巧立名目的衣冠禽兽，却也有洁身自好的清官。如今，没有巧立名目了，却也没有清官了。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贪赃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在位时，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雍正采用霹雳手段予以清理，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各级各类官员。雍正整饬吏治的努力及其力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种种原因，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又心地龌龊的士大夫，不会说他什么好话了。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则是“摊地丁，停编审”。

通俗地讲，就是摊丁入亩，或者叫地丁合一。也有人将其解释为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政策是在大清雍正元年（公元



1723年）开始推行的，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重大治国政策中引申和发展而来。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重大国事宣言，宣布从这一年开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其当时和后来的世代里，这被看成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九年后，雍正皇帝继位伊始，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之，开始实施摊丁入亩，将在中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年的人头税取消，改为田亩税。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也把官僚士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徭役，如今根据官绅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大的善政与德政，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缓解了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势必加重了官绅的负担，有效加剧了士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士大夫拉成了一个平面，在皇帝面前，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不可能不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中国士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训练，因此，在掌握话语权的这批人口中，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样一项德政善举在和其他社会因素交织缠绵后，竟演化得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记载和后世研究统计中看，在此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从来没有超出过一亿人，排除天灾人祸、改朝换代的因素，最多时，基本在六千万上下徘徊。实行上述善举德政之后，解除了人头税压力的中国人再无顾忌，人口迅猛增长。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永不加赋”政策当年，中国人口总数为两千四百六十二万人。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其后，以年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速度膨胀。四十年后，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中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两亿，到公元1793年英国国王第一次派遣特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时，这个国家的人口达到三亿以上；到鸦片战争前后，该项数字突破四亿。这便是在后来很多年间，我们一直听到的“四万万同胞”这一说法的由来。

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已经不断有学者指出：人口过度膨胀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的不平衡，是这个国家诸多社会问题与动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七；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

然而，视科学研究为旁门左道、“奇技淫巧”的中国人，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于是，直到今日还生活在这个巨大的梦魇之下。没有人能知道，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于是，上述一切，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悖论。

但是，不管怎样，假如有所谓康乾盛世这回事儿的话，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雍正的努力，就不会有所谓康乾盛世。



尾声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暴政

现在，我们应该而且也可以了解下面这一组数字了。这组数字部分告诉我们，明清之际，中国人为了争夺皇帝这个宝座，或者用正式术语讲，中国人为了实现政治权力更替所需要付出的人口成本是：

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前后，中国人口大约在6069万左右。（胡果文《论清代的人口膨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大清入关七年后，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063万（数据出处同上）。这一年，多尔衮病死。

按照孟森先生根据食货志考据的数字，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总数为1920万。（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475页）

就是说，有80%左右的中国人，为这次权力转移、改朝换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假如有人告诉你，历史上，我们曾经是一个富有政治良知与智慧的群体，我想，你完全可以和他急。这些数字和上面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理由。而在我们的历史上，这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

大清帝国前期到乾隆皇帝时为止所制造的文字狱，从绝对数量上看，可能比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总和还多。自打入关以来，从顺治年间开始，康熙、雍正一代比一代严酷，到了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乾隆皇帝弘历制造的文字狱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中最多的一个。不必怀疑，在人类文化史最龌龊、最耻辱的那一页上，此人有资格与希特勒比肩。

乾隆真不愧是雍正的儿子，他绝对是一个制造文字狱、制造冤假错案和毁灭文化的专家与高手。在他手中，以文化工程——修四库全书的名义，毁掉的书籍，可能超过秦始皇烧掉的书籍一百倍也不



止。他应该是需要为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落后，以至于到愚蠢程度负责的第一人。

看看他所做的那些浑账事儿，你决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变态者，假如同时再看看那些无耻文人对他的赞美，你必定会明白迫害狂和被迫害狂、施虐狂与被施虐狂是多么完美的组合、多么亲热的一对儿。使人无法怀疑，中国文人士大夫具有一种已经成瘾成性的阉割和受虐情结。没有人阉割他们时，他们就自己阉割自己，没有人虐待他们时，他们就自我虐待或相互虐待。

那是中国人做了奴才还要赞美奴才生活美妙的时代。

譬如纪晓岚。

自从汉武帝以后，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浑账皇帝敢于公开地、丝毫也不掩饰地对自己的臣民说：对于你们，我不过是像对待娼妓那样，像豢养畜生一样养着而已。乾隆皇帝就敢如是对纪晓岚说。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人物纪晓岚，则诚惶诚恐，叩谢天恩。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文人士大夫中的许多人，的确比大多数宠物还要可爱，获得主子的怜爱常常是他们的终身事业、终身的光荣与梦想、终身的奋斗目标；而乾隆皇帝也凭借上述作为——那些应该是足够了——证明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暴君。

这个时代理应受到永远的憎恶与诅咒。

假如一定要在以往的世代里，说出哪一个时代更好一点的话，我宁愿这样表达：那些帝制之下的时代，没有更好，只有比较不坏一点而已。而对雍正培养出来的儿子乾隆，我只能使用“更坏”这个词汇。

为此，那些为所谓“康乾盛世”和“乾隆大帝”欢呼的人，没有理由不受到蔑视。

就这样，大清帝国政治制度由军事贵族共和制向集权专制的转变，由努尔哈赤埋下伏笔，由皇太极发端，由多尔衮、顺治、康熙加快了脚步，由雍正皇帝完成，并在雍正与乾隆父子手中，以最终取消八王——王公大臣议政制度为标志，与帝王政治传统完全合流，形

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真正的专制暴政。

从此，这个王朝发生的故事，和历朝历代比较起来，在政治上便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说：这里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只会变得更可笑了。看一看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故事，对此，应该很难有什么异议。

